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四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四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十四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1.25 插页8 字数 250,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平) 35,000

统一书号: 11094·117 定价: (平)1.55元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目 录

徐海东	陈志凌 (1)
陈少敏	高玉临 (65)
黄 爱	唐振南 田余粮 (106)
庞人铨	谷 茨 (128)
卓恺泽	汪成法 纪 杰 (149)
杨石魂	熊泽初 罗可群 (171)
黄学增	阮应祺 邓荣诗 杨杰生 (193)
俞作豫	覃尚文 吴忠才 (220)
杨开慧	方大铭 杨布生 (246)
聂 耳	徐继涛 (260)
祁天民	张宝裕 陈秀玉 祁鲁梁 (277)
邹风平	乔毅民 阙孔璧 (294)
刘 型	邱 锋 熊巢生 刘求真 (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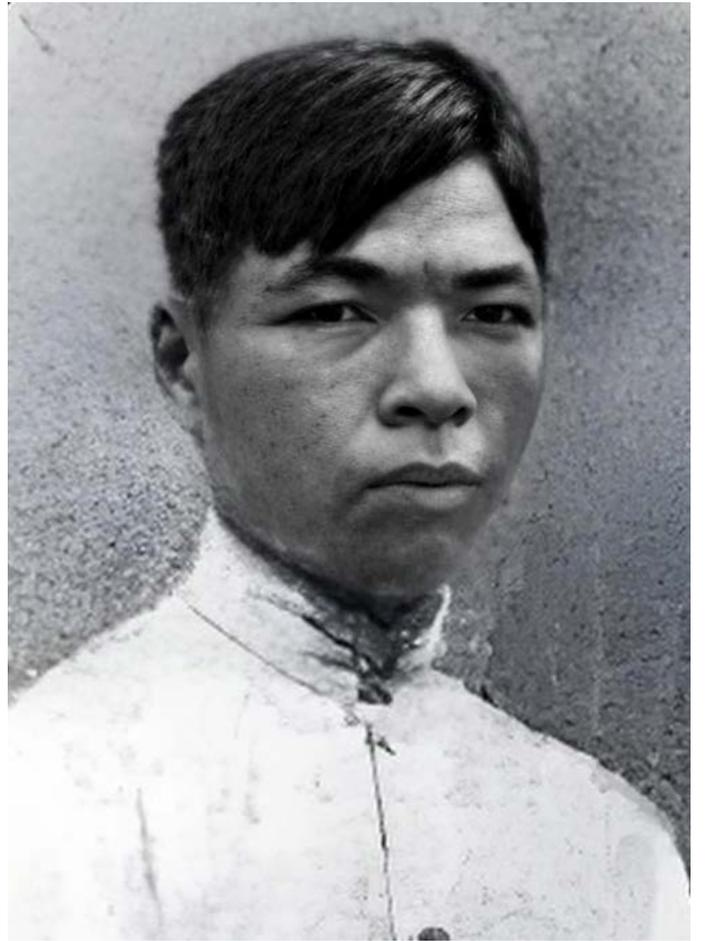
徐 海 东



陈 少 敏



黄 爱



庞 人 铨



卓 恺 泽



杨 石 魂



黄学增



俞作豫



杨开慧



聂耳



祁 天 民



刘 型

说明：本卷缺 邹风平照片

徐 海 东

本页缺失

土；冬天，他迎着寒风，衣履单薄，冻得耳脸通红。

一九〇九年，徐海东九岁时，被母亲送进喻家祠堂他舅舅任教的私塾就读^①。在这所私塾念书的多半是富家子弟，他们嫌徐海东穿的烂，不愿意同他共桌。本来教书先生给他起了个叫徐元清的名字，但同学们总是习惯称他的诨号“臭豆腐”。为此事，他多次同那些富家子弟发生争吵甚至厮打起来^②。在富家子弟中，有个名叫吝积堂的，和徐海东要好，不欺负他，也不嫌他穿得寒伧，同他同坐一张桌，放学一路回家。后来，吝积堂成为他参加革命的引荐人。

徐海东在私塾里，听课用心，记性也好。先生要他背的书，他背得很熟；教他识的字，他都能认出来；字写得也很工整。但在读到第四年的时候，有一天，一个财主的儿子名叫黄守本的，无端的骂他是“狗也不吃的臭豆腐”。他被激怒了，举起砚台抡过去，把黄守本的头砸破了。先生不敢惹财主，同黄家一起强逼他退学。徐海东收拾书本，决然离开了学校。三年半的私塾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徐海东离开学校，回到窑厂做工。当时正值荒年，灾情严重，衣食无着，家里人还闹分家。徐海东由于年幼体弱，干不了什么活，兄嫂们都不愿意收养他，要他自找生活出路。徐海东父亲年老多病，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母亲双目失明，连家务活也无法承担。老人子女虽多，但无人愿意承担赡养义务，到了晚年，还是没有依靠，成天为生计发愁，更无力照顾海东。

^①徐海东：《生平自述》。

^②埃得加·斯诺：《西行漫记》，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270—271页。

徐海东从小个性倔强，看到兄嫂们那种不近情理的态度，便一气离开了家，跑到百里之外的沔阳沙湖，替人放鸭，挣钱糊口。在那里，他跟着一位老农，赶着鸭群在湖边、河沟和稻田里游牧，风餐露宿，熬过了一个冬天。在那里，他惦记着家里的父母，对双目失明的母亲尤其放不下心。于是，第二年开春，他便返回家乡，重新进窑厂做工。

当时在农村以烧瓦缸、瓦盆、瓦罐为生的手工业工人，多半是结伴做工，自烧自卖。徐海东同兄长一起干活，他不服小，单独操作木轮盘、木模，制造各种坯件，还学着看火烧窑。由于他勤学苦练，加上兄长的帮助，很快便成为一名熟练的窑工。他和其他窑工一样，在制坯、烧窑的同时，还经常肩挑烧好的器具串村叫卖。遇上好年景，瓦盆、瓦罐卖得快，尚可勉强养家糊口；年景不好，陶器卖不出去，连自己也混不饱肚子。有年冬天，徐海东穿着一条破单裤挑担串乡，一连跑了好几个村庄，没有遇到一个买主。身无分文，冻饿交加，他实在支持不住，晕倒在一户农家门前。幸得这家好心的农妇给了他一碗热粥吃，他才又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①。这种贫困潦倒的窑工生活，徐海东整整过了九年，饱尝了人世间的痛苦和折磨。他恨这个社会，也恨富人，希望改变那种穷富不均的社会制度，产生了一种朦胧的自发的革命要求。

一九二五年初，在武昌一所小学教书并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吝积堂，由武昌返回了家乡。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很快，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号召党团员和青年学生利用寒假返回家乡，宣

^①徐海东：《生平自述》。

徐海东从小个性倔强，看到兄嫂们那种不近情理的态度，便一气离开了家，跑到百里之外的沔阳沙湖，替人放鸭，挣钱糊口。在那里，他跟着一位老农，赶着鸭群在湖边、河沟和稻田里游牧，风餐露宿，熬过了一个冬天。在那里，他惦记着家里的父母，对双目失明的母亲尤其放不下心。于是，第二年开春，他便返回家乡，重新进窑厂做工。

当时在农村以烧瓦缸、瓦盆、瓦罐为生的手工业工人，多半是结伴做工，自烧自卖。徐海东同兄长一起干活，他不服小，单独操作木轮盘、木模，制造各种坯件，还学着看火烧窑。由于他勤学苦练，加上兄长的帮助，很快便成为一名熟练的窑工。他和其他窑工一样，在制坯、烧窑的同时，还经常肩挑烧好的器具串村叫卖。遇上好年景，瓦盆、瓦罐卖得快，尚可勉强养家糊口；年景不好，陶器卖不出去，连自己也混不饱肚子。有年冬天，徐海东穿着一条破单裤挑担串乡，一连跑了好几个村庄，没有遇到一个买主。身无分文，冻饿交加，他实在支持不住，晕倒在一户农家门前。幸得这家好心的农妇给了他一碗热粥吃，他才又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①。这种贫困潦倒的窑工生活，徐海东整整过了九年，饱尝了人世间的痛苦和折磨。他恨这个社会，也恨富人，希望改变那种穷富不均的社会制度，产生了一种朦胧的自发的革命要求。

一九二五年初，在武昌一所小学教书并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吝积堂，由武昌返回了家乡。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很快，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号召党团员和青年学生利用寒假返回家乡，宣

^①徐海东：《生平自述》。

徐海东从小个性倔强，看到兄嫂们那种不近情理的态度，便一气离开了家，跑到百里之外的沔阳沙湖，替人放鸭，挣钱糊口。在那里，他跟着一位老农，赶着鸭群在湖边、河沟和稻田里游牧，风餐露宿，熬过了一个冬天。在那里，他惦记着家里的父母，对双目失明的母亲尤其放不下心。于是，第二年开春，他便返回家乡，重新进窑厂做工。

当时在农村以烧瓦缸、瓦盆、瓦罐为生的手工业工人，多半是结伴做工，自烧自卖。徐海东同兄长一起干活，他不服小，单独操作木轮盘、木模，制造各种坯件，还学着看火烧窑。由于他勤学苦练，加上兄长的帮助，很快便成为一名熟练的窑工。他和其他窑工一样，在制坯、烧窑的同时，还经常肩挑烧好的器具串村叫卖。遇上好年景，瓦盆、瓦罐卖得快，尚可勉强养家糊口；年景不好，陶器卖不出去，连自己也混不饱肚子。有年冬天，徐海东穿着一条破单裤挑担串乡，一连跑了好几个村庄，没有遇到一个买主。身无分文，冻饿交加，他实在支持不住，晕倒在一户农家门前。幸得这家好心的农妇给了他一碗热粥吃，他才又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①。这种贫困潦倒的窑工生活，徐海东整整过了九年，饱尝了人世间的痛苦和折磨。他恨这个社会，也恨富人，希望改变那种穷富不均的社会制度，产生了一种朦胧的自发的革命要求。

一九二五年初，在武昌一所小学教书并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吝积堂，由武昌返回了家乡。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很快，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号召党团员和青年学生利用寒假返回家乡，宣

^①徐海东：《生平自述》。

传马列主义，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吝积堂就是遵照党的指示利用寒假返回徐家桥的。吝积堂找到好友徐海东，开始给他讲马克思的著作，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and 意义。徐海东听不懂，摇着头说：“武昌我都没到过，你别讲外国人的事了。”^①吝积堂转而对他讲解打倒军阀、地主的道理，他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②吝积堂还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主张。他听了心里热呼呼的，但又不敢完全相信。他如痴似醉地回味着吝积堂的话，心想：真的象吝积堂说的那样，穷人就可有盼头了啊！

经过吝积堂的引导和启发，徐海东产生了一种新的希望^③，促使他下决心离开家乡，投奔革命。他主动去找吝积堂问：能不能带我去找共产党？吝积堂回答得很肯定，又反问他：你舍得家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这个穷家没有什么可恋的。吝积堂听了很高兴，又叮嘱一句：我们青年人说话要算数，不能变卦啊！徐海东决心已定，坚定地说：“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不会后悔！”开春后，按照预先商定的时间，徐海东与吝积堂一起，离开徐家桥，步行二百四十里，来到了武昌城，在古楼大街一个小铺里住了下来。

武昌当时仍属军阀统治的地盘，到处死气沉沉，乞丐、游民比比皆是。徐海东有些厌恶这座城市。加上人地生疏，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过了一些日子，他想回家乡去；但又觉得找不到事做跑回家，有些丢人，心事重重。为了解决吃饭问

①②徐海东：《生平自述》。

③《徐海东大事年表》。

题，他通过客栈老板娘，找了个卖水的事做。在挑水的岗位上，徐海东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经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挑水卖这是一个又苦又累，收入微薄，很少有人愿意干的活儿。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上一百斤重的水桶，在六七十级的码头台阶上爬上爬下，一直干到天黑。肩膀压得又红又肿，晚上躺到床上腰酸腿痛，不到半个月，他就病倒了。

一天，吝积堂、李树珍、田道生来看望徐海东，问他愿意不愿意当兵？如果愿意，田道生的叔叔在刘佐龙的二师有位朋友，可以介绍他去。徐海东想，当兵总比挑水强些，革命不能从早到晚都挑水卖，表示愿意去。这样，他便去湖北二师二营六连顶替下士副班长柳金彪的名字，当了一名新兵。按这支军队的规定，新兵三个月不发饷，三个月后，每月发八元。但徐海东却分文没有落下。上士班长陈德金是个兵痞，装着跟徐海东要好，同他结为把兄弟，其实是欺侮他这个忠厚老实的乡下人，想从他身上刮钱。徐海东每月的薪饷，不但被陈德金扣下，连卖水时积攒的二元钱，也被这家伙骗去抽大烟。徐海东找到吝积堂诉苦说：我口袋什么钱也没有，连党费也没有钱交，实在不想再当这个穷兵了。吝积堂耐心地劝他说：“革命是要动刀枪的，你就借此机会，靠上姓陈的学习军事，没钱交党费，我替你交。”并说这是党交给的任务。徐海东听说当兵习武是党交给的任务，当即表示坚持干下去，并下决心积极参加操练，钻研军事技术。为此，还买了笔记本，从《步兵操典》学起，边学边记。陈德金是个老兵，军事技术上确实有一套，由于用了徐海东的钱，自然也就卖力地教徐海东操练。结果，在全连测验操练成绩时，徐海东名列第一。半年后，被提升为下士班长；又过去了三个月，晋升为中士班长。

湖北二师这支军阀部队，官长欺压士兵，尅扣军饷、抽大烟、嫖女人成风，士兵中也有不少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徐海东对这种腐败现象越来越感到愤慨，实在不想再呆下去。一九二六年四月的一天，吝积堂和李树珍来找他，商量一起去广东的事。吝、李提出：到广州后，如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我们就参加北伐；如暂时还不北伐，就报考黄埔军官学校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徐海东认为这正是脱离军阀部队的好机会，欣然同意了。他们说动便动，吝、李二人向组织立即汇报并办理组织关系。徐海东向部队请假，说母亲病重，要回家探望母亲，得到了连长的同情和批准。于是，他换上便衣，扮作挑夫，同吝积堂、李树珍一道，离开了武昌。

徐海东一行跋山涉水向南步行了一个多月，六月间进入广东韶关的时候，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的一支队伍拦住了去路。他们要求见连长，从连长那里了解到，国民革命军已于七月九日正式誓师北伐，黄埔军校招生已经停止。这位连长也将他们的情况向团里作了汇报。团党代表正想找个去湖北的向导，听说他们是从湖北来的，便亲自出来接待，向他们询问了湖北方面的情况。他看到徐海东等年轻，懂得许多革命道理，就动员他们参加北伐军。徐海东愿意留下，吝积堂、李树珍却坚持去广东，三人只好分手^①。临别前，吝、李向团党代表介绍了徐海东的情况，并留下他的党员组织关系。党代表也是共产党员，很器重徐海东，当即派他到三营九连当代理排长。

^①据徐海东回忆，吝积堂、李树珍二人，一个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时牺牲，一个下落不明。

这个连有四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在这个部队里活动公开，享有很高威信。对此，徐海东心里很高兴。多少年来，他做梦都盼望革命，如今不仅是参加了革命，而且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他情绪激昂，行军打仗都主动积极。汀泗桥战斗中，他奉命带领全排冲向敌军炮兵阵地，杀伤了大批敌人，缴获了十二门大炮。战斗结束后，被正式任命为少尉排长。九月，部队进军武汉，徐海东参加了攻占武昌城的激烈战斗。武汉三镇攻克后，他随三十四团经修水、武宁、德安会攻南昌。南昌解放，又奉命回师武汉。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出师河南，举行第二次北伐，徐海东参加了三十四团攻克洛阳城的战斗；六月初又随部队撤回武汉。当时，武汉汪精卫集团反动势力活动猖獗，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开始疏散。徐海东在党小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离开了部队，返回黄陂老家。

（二）

黄陂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洪流推动下迅猛开展。徐家桥附近的村庄，多数都组织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响遍四方。徐海东由武汉回来之前，已经有一批共产党员如田道生等，分别由各地返回家乡，担任了党和农会的负责人。徐海东回来后，首先去找田道生。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田道生介绍了全县农民运动情况，徐海东倾谈了武汉方面的见闻，二人推心置腹，谈得十分投机。经田道生建议，第二天，徐海东去中共黄陂县委请示工作。县委书记陈金台热情地欢迎他说：现在我们组织农民自卫军，缺少军事指挥人材，你回来得正是时候。当即派他担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队长。徐海东

从陈金台的介绍中，知道这支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使用的武器只有梭镖和大刀，便认真地对他说：军人最宝贵的是钢枪，没有那玩艺儿是不行的。陈金台送给他一支手枪、十四发子弹，并告诉他：把队伍拉起来后，去打民团、打盐局，从那儿搞枪，武装自卫军。

河口区农民自卫军满共十三个人，他们年纪很轻，勇敢热情，但纪律性较差，又没有学过军事，更没有打过仗。徐海东到任后，带领他们出操，教他们射击，进行严格训练。起初，这些年轻人学得都很卖力，进步也很快。日子一久，有些熬不下来，先后有六七个人退出不干了。徐海东感到很懊丧！怎么办？他想，发动别的人参加农军有困难，徐姓本家人多又穷，组织起一支“徐家军”也许比较容易，古人不是说过“呼家的兵，杨家的将，老婆孩子一齐上”吗？他抱着这种天真的想法，满腔热情地回到徐家桥，同大哥、二哥商量，找四哥、五哥劝说，还做了嫂子、侄儿的动员工作。得到的反映是，有的当面反对，有的敷衍应付，真正愿意抛妻舍子和他一起干的，竟连一个也没有。“徐家军”虽然没有组成，但徐海东这一番宣传动员工作却没有白做，它给徐家桥徐姓的穷苦窑工进行了一次革命的启蒙教育，撒下了革命火种。后来，随着大别山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他们中有一大批人参加了革命，不少人奔赴战场，英勇杀敌，为国捐躯^①。

^①据徐海东回忆，徐家先后参加革命而英勇牺牲的有他的四哥徐元海、五哥徐元波；堂兄徐元洪、徐元大、徐元庆、徐元兴，以及侄儿徐文初、徐文财、徐文阶、徐文朗等。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的亲属更多。另据《西行漫记》记载：“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六十六人”。其中有徐海东的“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

徐海东分析了河口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形势，认为必须组织力量打一、二次小胜仗，缴获几支钢枪，才能吸引群众，打开局面。在县委领导下，他率领农民自卫军偷袭了夏店雨坛盐卡民团一个班，缴获了七支长枪。这个胜利对自卫军队员和附近农民的鼓舞很大。此后一个月，自卫军人数就扩大到三百多人。县委对这支农民武装很重视，选派了几名曾经当过兵的党员来担任班排长。徐海东还给这支农军规定了四条纪律：集合不准说话；不许穿长袍；不许吃乡亲的东西；不许打骂乡亲。这些规定是很有必要的，但要建立一支完全服务于人民又有一定作战能力的革命武装，这几条要求还远远不够。这时的徐海东，只会指挥自卫军配合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捉拿流氓地痞，但对队伍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的重要意义认识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抓。因此，这支队伍，在思想和组织上都很不巩固。不久，国民党地方武装向自卫军发起进攻，徐海东正指挥部队进行迎击，阵势还没有摆开，敌人一阵排子枪打来，就把自卫军大半队员吓得跑散了，留在徐海东身边的只有少数党员和他的亲属。徐海东非常气恼，但他并未灰心。为了革命，他又开始东奔西跑，重新招集队员，准备继续斗争。

十一月十三日，黄安和麻城工农民众三万余人，包围黄安县城，举行了武装暴动。黄陂县委紧急命令河口区农民自卫军赶赴黄安参加暴动。徐海东动员了几名当过兵的窑工，连同原来的自卫队员一起，组成了一支二十七人的农民武装，向黄安奔去。当他们赶到黄安时，县城已打开两天了。徐海东应邀参加了十一月十八日举行的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受到鄂东革命军副总指挥吴光浩的接见。徐海东深为黄麻民众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认为黄陂也应象黄安那个样子才算是革命。他

根据吴光浩的要求，只身返回黄陂河口区，收集失散的自卫队员。不久，黄麻起义遭到反动派镇压而失败，起义领导者王志仁、潘忠汝壮烈牺牲。随后，反动军队向黄陂“追剿”过来，县委通知农民自卫军暂时解散。这时，反动军队在民团和豪绅地主操纵的红枪会配合下，四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并且指名要抓徐海东。徐海东先回徐家桥躲避，敌人在徐家桥严密搜查，呆不下去，就又跑到河口。他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写道：“家不能回，职业也没有，处境困难极了。今天这里躲，明天那里藏，多次遇险”^①。最后，在徐家叔伯的齐心保护下，又回到徐家桥当上了窑工。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徐海东仍然想着革命。他凭着懂得些军事，胆子又大，白天在窑厂干活，晚上出去秘密组织农民武装。在“进剿”的敌人撤走后，黄陂县重新建立党的工委，组织黄陂县游击大队，徐海东被任命为游击大队的分队长，又公开干起农民武装斗争来了。

一九二八年秋，徐海东担任黄陂县委委员、军事部长，他领导的游击队已扩大到六十余人。县委决定恢复党的工作，指派他担任夏区区委书记。他到夏区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组织了秘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把反霸斗争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九年初，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发动年关暴动，委任徐海东为年关暴动委员会总指挥。亲自经受过黄麻起义挫折的徐海东，认为发动暴动应该谨慎从事。因而，受命第二天，他就跑到县里找县委新的领导人，询问有关暴动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县委新领导人武断地说，上级指示，“革命，就是要暴动”，“暴动就是一切”，对暴动不容怀疑，要他回去赶紧作好准备工作。

^①徐海东：《生平自述》。

徐海东虽提出了暴动时机问题，但他当时还不明白，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暴动时机才算成熟。他相信县委，回去后坚决贯彻县委指示，很快整编了农民自卫军，做好了起义时用的旗帜。腊月三十晚上，暴动开始了！他指挥暴动队冲进地主豪绅庄园，点起火把，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四乡正愁过年没米的农民，捉捕恶霸地主分子游街。豪绅地主垂头丧气，穷苦农民扬眉吐气，几个村庄顿时被搞得天翻地覆。但没过几天，敌军一团人开过来，驱散了暴动队，杀了很多人，年关暴动失败了。徐海东是夏区区委书记，又是这次暴动的总指挥，名声很大，敌人到处搜捕没有抓到他，就抄了他的家，烧了他做工的窑厂。他的母亲、妻子和兄嫂都被迫逃亡他乡。

年关暴动失败后，徐海东带领几名暴动队员离开徐家桥。经过许多曲折，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一九二九年底，鄂豫边区特委将游击队组成五个教导队，徐海东被任命为第五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一九三〇年四、五月，他又任黄陂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根据鄂豫边区特委的指示，他利用蒋桂阎冯军阀混战的大好时机，配合各路红军游击队，转战在大别山区，打了许多胜仗，扩大了赤卫队。十月，黄陂县赤卫队升编为补充六师，徐海东任师长，不久，复任第五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一九三一年初，又调任鄂东警卫二团团长。这时，徐海东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和发动地方武装，领导小型的游击战争。一九三一年三月，徐海东率领的鄂东警卫二团整编为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八团。他继续担任团长，成了正规红军中一名中级指挥员。

徐海东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他自幼当窑工，苦大仇

深，养成了勤奋、勇敢、不怕困难、不怕挫折等许多好的品德和作风。但他和许多窑工一样，有嗜酒的习惯。他喝酒不用菜，半斤白酒两三口即喝光。有一次，他酒醉之后，民团打进村来，几乎被敌人俘虏，幸亏房东大嫂机警地把他藏在草堆里，才未被敌人发现。事后，县委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这才决心戒酒。徐海东在旧军队里呆过，学到了一些军事知识，但也染上了旧军人打人骂人的不良习气。一次，四班一个战士从家里拿来一只鸡炖着吃，他误认为是偷了老乡的，立时火冒三丈，抡起皮带要打那个战士和班长。战士们不服，全班和他顶撞起来，班长还甩手要走。他这才醒悟到是自己错了，马上向大家承认错误。战士们气消了，谅解了他。革命的暴风雨教育着徐海东，使他提高了认识，增长了才干，同时也荡涤了他身上的污泥浊水。

(三)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四月上旬，敌军四十六师及安徽警备一旅共九个团进攻皖西。随后，敌三十、三十三两师从光山、黄安出发合击新集、七里坪我根据地中心区。徐海东在率领三十八团配合主力反击敌军的一次战斗中负重伤，左腿连中两发机枪子弹，一颗穿过皮肉，一颗卡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由于流血过多，在包扎所昏迷了一天一夜，送到红军家属陈大娘家，才慢慢苏醒过来。陈大娘是陈锡联的母亲，她像对待亲儿子一样照料着徐海东。徐海东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归队心切，未等伤痊愈就拄着拐棍找部队去了。回到部队时，团长、政委

都已配齐，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部队，主动向师里提出并得到师部的批准，当了一名副团长。同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他被调到红十二师三十六团任团长。

年底，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一九三二年一月底，敌军主力沿商、潢公路和高店向商城疾进。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新的敌情和我军有利条件，部署了杜付店战役：以红十二师在杜付店正面阻击，十师、十一师从左面包抄，十三师从右面迂回，围歼敌军。二月初，大雪弥漫，道路泥泞。徐海东指挥三十六团在正面战场上与敌军一部对峙。这时，敌第二师、十二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共二十多个团，突然从河南方向压了过来，徐海东所率的三十六团成为敌军的主攻目标。一营苦战一昼夜，损失很大，营连排干部大部伤亡，前沿阵地被攻破，情况危急。徐海东跑到前沿阵地，脱去棉衣，奔走在白雪皑皑的阵地上指挥战斗。警卫员负重伤下去了，司号员牺牲了，命令无法传达。他接过军号，亲自吹号指挥。战士们见团长上了前沿，退下来的又纷纷冲了上去，负伤的爬在雪地上端起枪继续射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徐海东高喊：“共产党员，牺牲也要向前倒！”鼓舞指战员奋勇抢夺阵地。这次阻击战，关系着全战役的成败。因此，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密切注视着三十六团的阵地。陈赓师长也三次派人向徐海东传达了“坚决守住”的命令，并说：如果守不住，敌人从这里打开缺口溃逃，围歼任务就可能落空。徐海东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向首长坚决表示：“一定守住！请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他带领全团指战员坚守了三天三夜，打退了敌人二十多次进攻。到了第四天，我军包抄迂回敌人的部队赶上来，前后夹击，数万敌军顿时人慌马乱，全线崩溃。这次

战斗，历时半月，毙伤俘敌四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战斗结束后，陈赓来到三十六团，对徐海东说：“这一仗，你们团打得多好啊！”“三十六团算打出来了！”^①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红十、十一师由固始地区出发，兼程东进，赶赴皖西迎击敌人。三月二十二日，红十师包围苏家埠敌军六千余人。二十三日，红十一师包围敌一三七旅一个团于韩摆渡。鉴于苏家埠、青山店等地寨高壕深，强行攻击不易奏效，总部决定只围不打，诱敌打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三月二十一日，敌四十六师师长岳盛谊指挥六安、霍山两地敌军增援苏家埠之敌，被我十一师、十三师分别在途中消灭一个团，击溃一个旅。四月底，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率领两万余敌军从合肥增援，被我红十三师、十师、十一师围困于婆山岭老牛口高地，经终日激战，援敌全部被歼。这两路援军被歼后不久，苏家埠、韩摆渡敌军全部受降。是役俘敌总指挥厉式鼎、五十七师师长梁鸿思等以下官兵二万余人，解放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是鄂豫皖红军获得的空前大胜利。徐海东没有直接参加苏家埠战役，他奉命在商城、潢川一带深入发动农民群众，组织游击队，打击地方反动武装，配合主力红军歼敌。当他了解了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经过时，对徐向前总指挥的围城打援战术非常钦佩，并且从中得到了一个启示：一个好的指挥员不仅要有“勇”，敢于和敌人拚杀；更主要的是要有“谋”，善于和敌人斗智，调动诱骗敌人而歼灭之。他深感提高战略战术思想的重要。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指挥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共三十

^① 《红四方面军战史》。

万人，分三路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采取了错误的作战方针，战术指导上又有着失误，白白浪费了反“围剿”充裕的准备时间，使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开始时就陷于被动局面。此时，徐海东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后改任红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十月，他率领七十九团去英山地区打掩护，与主力部队失掉联系，在前后畷作战两昼夜，不见师政委带走的另两个团靠拢来，也不知主力红军去向，心情很沉重。为了摆脱敌人的围攻，他带领七十九团翻过一座大山，来到了土门潭。

土门潭街头街尾都是伤兵和逃难的群众，一片混乱。徐海东到处打听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的去向。伤兵们说，他们在金寨见过蔡军长。徐海东立即跨马去金寨，途中遇见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郭述申说：十月初，张国焘在河口之黄柴畷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少数人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外转移。张国焘给你我和刘士奇（东路游击队司令员）留下一封信，要我们组织鄂豫皖工委，留在皖西坚持斗争。郭述申还告诉徐海东：蔡申熙军长牺牲了。徐海东听后极为悲痛，他改变了去金寨的打算，与郭述申一起在附近一个村庄找到了刘士奇。他们根据鄂豫皖分局的指示，组织鄂豫皖工作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刘士奇、徐海东任委员，并决定由徐海东负责把七十九团和英山、霍山、六安的地方部队合编成六个团。此后不久，成立红二十七军，刘士奇任军长，郭述申任政委，徐海东任七十九师师长。

红二十七军成立后，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红二十七军行动方向问题。军部认为苏区大量的逃难群众和伤病员跟随部队行动，使部队不便机动，不易摆脱被动局面，遂提出离开苏区、

抛开伤病员和随军群众渡江游击的计划。徐海东坚决不同意部队过江，更反对抛弃逃难群众和伤病员，主张坚持根据地斗争^①。会后，他指挥七十九师从湖北的英山打到安徽的霍山、宿松、潜山、太湖一带。又从六安返回黄安，艰苦转战一个多月。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带好部队、保护群众上，不论行军还是打仗，前面有事他赶到前面，后尾有事他又折回后尾，一连二十三天没有上床睡过觉。当部队摆脱敌人稍事休息时，他一躺下竟睡了三十多个小时，醒来后就大口吐血。这次行动牵制了敌人很多部队，掩护了部队的安全转移和保护了大批的群众，抵制了军内领导人的错误，最后终于胜利地回到了苏区。郑位三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这种掩护战关系于这个部队的存亡，又是困难万分时的掩护战，如果没打好这些掩护战，也没有二十七军回来。”^②红二十七军回到苏区后，省委专门召开了总结会议，狠狠地批评了军部一些领导人的错误，同时表彰了徐海东坚持的正确意见，“肯定了他在指挥作战中所起的决定作用”^③。

（四）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后，鄂豫皖苏区留下的几支部队指挥不统一，不利于对敌作战。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将原红二十五军特务营、七十五师的五个营、红九军二十七师等部队共一万一千余人，编成红

①②③郑位三：《我对红二十七军问题的意见》（1957年8月17日），未刊稿。

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徐海东被任命为七十四师（由原红二十七军改编成的）师长；一九三三年二月末，升任二十五军副军长，仍兼七十四师师长。二十五军重建后，分散活动两个多月，始终未找到有利战机。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敌三十五师一〇四旅（两个团）进占郭家河。鄂豫皖省委侦知这路敌人装备较差，战斗力较弱，又是新接防地，人地生疏，决定集中兵力，乘敌立足未稳将其歼灭，并把主攻任务交给七十四师。五日晚，徐海东率领七十四师和军部特务营开向郭家河，六日拂晓到达郭家河东南戴家岗一带。徐海东察看了地形，命令二二〇团和特务营迂回到郭家河东北方向主攻敌阵地，二二二团从郭家河以南和西南配合夹击；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周围山头上呼喊鸣枪助威。战斗打响后，敌军一部被歼，其余仓皇逃窜。逃敌窜至二道河东南角，又被我埋伏部队包围于一块洼地之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将其全歼。这次战斗共歼敌二千余人。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八门，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两千余支，战马百余匹；我军伤三十人，牺牲七人，创造了敌我双方伤亡一百比一的战例。战后，吴焕先在省委书记沈泽民面前称赞徐海东会打仗，说他是一员真正的虎将。

四月十四日，鄂豫皖省委发布《通告一〇六号》，宣布以夺回新集、七里坪作为反攻时期的主要任务。这是省委执行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作出的一个错误决定。徐海东当时看不到中央命令，也没有参加省委的讨论。吴焕先回来传达省委的决定，讨论围攻七里坪部署时，徐海东表示了两点不同意见：第一，兵力不足，围城就没有打援的，如果敌八十九师从黄安来增援，我军无力消灭敌人；第二，供养困难，苏区无粮供应

部队，要抽部队到白区去筹粮，这种形势，不能打象七里坪这样的攻坚战^①。七里坪位于黄安县城北四十里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西北两面有倒水河作为天然屏障，东南两面均为平地，大小悟仙山为突出制高点。敌十三师六千余人驻扎那里，建筑有几道坚固的工事；周围还驻有敌军两个师，随时可以增援；而我红二十五军三个师加上军直属队共计一万余人，既无围歼守敌和阻击援兵的足够兵力，又无攻击坚固设防据点的经验和条件，冒然进攻，只能招致损失。但是，省委没有考虑他的意见，强调这是中央的指示，坚持要打。吴焕先还说，现在是二十五军内部反革命猖狂，需要肃反。五月四日，我军开抵七里坪。接连几日，与敌数次交手，既未攻占敌军阵地，亦未予敌以重大杀伤。八日晚，我军二一七团袭击小悟仙山，被敌反击回来。十日，我军攻击大悟仙山，亦未得手。战斗开始十天后，我军粮断，军部决定抽出一部分人去筹集粮草，留在前线的指战员只能以野菜树叶充饥。面对这种事况，徐海东再次建议省委撤围^②。他说：我们围困的目的是消灭敌人，现在相反，敌人一点困难没有，我们自己饿垮了。钢军铁军吃了饭才能打仗，自古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未等他把话说完，军长把桌子一拍：“谁动摇围攻七里坪，谁就是政治上的罪人。”不但不采纳徐海东的建议，反而批评“怀疑能拿下七里坪和各中心城镇的就是‘右倾思想’。”部队饿着肚皮继续围攻，肃反错误继续扩大，七十三师党组织被解散，全军被当做“反革命”逮捕的干部和战士达三千人以上（杀了二千五百

①徐海东：《生平自述》。

②《红二十五军战史》。

余人)①。至六月中旬,我军由于多日断粮,长期露宿,各种传染疾病迅速蔓延,病、饿至死者达三千余人,加上战斗伤亡,全军只剩下五千余人,而且体质虚弱。七里坪久攻不克,主力部队损失惨重,根据地中心区域又遭到敌军破坏。至此,省委才不得不作出全军于六月十三日撤出阵地的决定。

七里坪战斗失利后,徐海东被通知参加省委召开的骨干分子会议。主持会议的省委书记沈泽民,要大家对这次部队行动发表意见。徐海东站起来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小资产阶级领导,只顾自己吃饭就行了。……这几句话刺痛了沈泽民,他未等徐海东把话说完,就用烟头指着徐海东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资格参加会议!”②戴季英(红二十五军政委)落井下石,说:徐海东“变”了。

徐海东被赶出会场后,思想上负担很重。他想到在肃反中讲了几句怪话的人,就给带上反革命的帽子杀害了,这一次他直接批评省委领导,一定要定成反革命,三天之内就会被抓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攻上来,形势很危急!徐海东想:与其叫人扣个“反革命”帽子杀死,弄得不明不白,不如在战场上战死,也落得个光荣。他抱定牺牲的决心,先把二二〇团、二二二团团长找来,研究了敌情,分配了任务。然后,他脱下上衣、上裤,穿一条短裤衩,从警卫员手里要过枪和子弹,并命令警卫员原地不动,注意保管他衣服口袋里的文件。随着冲锋号声,他带领交通队首先向敌群冲去。

①徐海东:《生平自述》。

②1933年5月24日《通告第一〇七号》。

战士们见副军长带头冲锋，一个个奋勇向前，像猛虎出了笼一样，一齐扑向敌人。徐海东那负过四次伤的腿，怎能跑过这些年轻的战士们！一刹那间，两个团和特务营、交通队的战士都从他的身边冲到前面去了。这样一冲，把敌人一个旅冲垮了，俘虏敌人四百七十名，其他各路敌人纷纷后撤，敌两个师的进攻停止下来了。

徐海东走下战场回到村上，喝了碗水，感到很累，负伤的腿十分酸痛。他躺在床上，担心当“反革命”的思想又开始在脑子里翻腾起来：本来准备牺牲，了此一生，想不到打了胜仗又活下来了，今后怎么办？想来想去，得不出结论。第二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泽民来了。他对徐海东说：你打仗很勇敢，不怕牺牲，是好样的。为什么政治上不进步？徐海东反问道：表现在哪里？沈泽民说：几次省委通知你开会，你不参加，这不是政治上不进步！徐海东答道：不是我不愿意参加，每次开会，戴季英说他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他开完会回来给我传达，我不必去。省委书记沈泽民这才联想起戴季英在省委会上曾说，徐海东不会打仗，连哨都不会放，胜仗都是他指挥的等情况，对徐海东才有了正确的了解。事后，他对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①。

徐海东回忆这段历史时，心情沉重地写道：“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份，别的权利没有。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

^①徐海东：《生平自述》。

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①在这种情况下，他小事尽量忍让，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从不让步。例如：一九三三年六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在向皖西北转移途中，给养困难，部队有一半人员非伤即病，连队大部分人都在抬担架。徐海东随七十四师行动，拐着一只因伤残废的腿，艰难地步行着。当部队进到福田河一带时，突然接到军部命令：过福田河以东筹粮不用调查，牛羊猪鸡都可以杀，以改善部队生活。这一命令是错误的，是旧军队军阀主义的表现。徐海东见到命令后十分生气，马上将七十四师三个团长找来，嘱咐他们不得执行这一命令。他特别强调群众的牛不能杀，说它是贫苦农民一家的命根子，杀一条牛就等于杀人全家，工农武装应该为工农着想。由于徐海东抓得紧，七十四师的指战员一路上宁愿忍饥挨饿，也不骚扰百姓，很好地维护了群众纪律。途中，他还派人把军部丢下的牛皮、牛骨头埋起来，并赔偿了损失。以后沈泽民见到徐海东时，曾流着泪对他说：“海东同志，要像你这样的党性，二十五军不会这样。”^②

八月中旬，敌军四个师向皖西进攻。我军艰苦转战，未能扭转局面。九月初，省委指示红二十五军向鄂东转移。部队连夜从南溪、葛藤山出发时，徐海东患重病，发高烧，只好躺在担架上，随同勤杂人员由特务连掩护，走在全军的后尾。天刚亮，部队来到黄土岗公路附近，遭敌三十一师的拦截，队伍被切断了。吴焕先率领大部队通过了公路，徐海东带着特务连掉了队。战斗很激烈，徐海东从担架上下下来改乘骡子，指挥特务

^{①②}徐海东：《生平自述》。

连登上东边的大山，敌军一个旅向他们围攻过来。徐海东在命令特务连守住山头的同时，估计到这次偶然与敌遭遇，会有一些人员掉队，便命令司号员吹联络号。过了一会，山下果然答号了，原来二二〇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也掉了队^①。敌人听到山上山下我军号声一片，弄不清红军到底有多少人，不敢进攻。徐海东指挥这联络起的六个连队边打边撤，但公路冲不过去，只得折回皖西。在部队摆脱尾追敌人之后，他又将一些零星掉队人员编成一连，丢掉一些挑子，又将挑伕组成一连，总共八个连，分别编成三个营。

十月二日，徐海东率部到皖西红旗山丁家埠与皖西郭述申率领的红八十二师会合。十二日，皖西北道委在南溪吕家大院召开会议，将红二十五军未能过路的部队编为八十四师，与八十二师合编成红二十八军，共二千三百余人，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部队还根据徐海东的建议，制定了“不消耗战，不硬拚，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使部队弹药物资充足，吃饱穿暖”的行动方针。十一月初，徐海东率领八十四师在石门口与敌独立四十旅遭遇。我军乘敌无备，猛烈进攻，歼敌一个团，俘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八百余支，大衣七百余件。这一仗改变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情绪，是红二十八军坚持皖西斗争的良好开端。

不久，郭述申患重病，皖西地区党政军全部工作，主要由徐海东主持^②。徐海东指挥部队以商城为中心，广泛地开展游

^①徐海东：《保卫红色土地》，见《星火燎原》第2集。

^②郭述申：《优秀的将领，伟大的一生》，见《红旗飘飘》第21集。

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农会和基层政权，成立农民自卫武装。时值初冬，寒风凛冽，全军大部分人员还穿着单衣。为了筹措过冬的棉衣，徐海东经过调查，派人到段集、吴桥两地土豪开的布行里搞了六百多匹布和几百斤棉花，又从霍丘、叶集搞来一千多斤棉花。有了布匹和棉花，徐海东召开干部会，动员大家自己动手缝做棉衣。全军上下，你帮我，我帮你，不几天，每人做起了一套棉衣和一副绑腿。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徐海东指挥部队在固始经过几次战斗，消灭敌四十五师一个团另两个连，后转移到金寨。在那里，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分粮斗争。三月上旬，驻守金寨的敌独立第五旅一个团和该县县长率领的民团围攻过来了。徐海东以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移到侧后，一个冲锋，把敌人一个团打垮，俘虏敌人八百多名，缴了三门迫击炮、四挺机枪、四百多支步枪。战斗结束后，部队转移到葛藤山。因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十分疲劳，徐海东让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做饭休息。但饭还没有做好，敌五十四师一六一旅（两个团）从南溪攻来，火力很猛。徐海东观察了地形和敌军的部署，命令八十四师第一营坚守阵地阻击敌人，八十二师两个营顺着一个突出的山梁向小石家沟佯动，造成敌人错觉，吸引敌人。尔后，只留下一个排固守阵地，其余的部队又顺原路撤回来。敌人误以为小石家沟是我军主要阵地，便将主要兵力和火力转向那里。此时，徐海东率领四个营从东西两侧迂回至敌人侧后，突然发起进攻，激战一个多小时，将敌两个团大部歼灭，俘虏代师长柳树春以下官兵一千六百多人。柳树春被押到徐海东面前，望了一阵，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摇头。柳树春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徐海东说：“你别问了，我既

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柳树春听后捉摸半天又问：“这青山大学在哪？”徐海东用手指指门外的山说：“就在那儿！”柳树春这才低下头不语了。

徐海东在皖西战斗将近半年，皖西苏区扩大到东西二百七十余里、南北一百余里的范围，红军由二千人增加到三千二百余人。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商城的豹子岩会师。次日，两军合编组成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军长。当晚，他们二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吴焕先首先表示：此次改编后，我们一定要把部队带好，才能对得起革命，军事上，由你负责，政治工作我多做些，你看怎样？徐海东听了，很受感动，诚恳地说：焕先同志，过去如象你今天说的这样，有一点民主就好了，二十五军肯定不会如此惨败。吴焕先说：不碰钉子，没有血的教训，我没有这个认识，今后一定改正。徐海东说：能改正就好，你很聪明，工作积极，只要我们加强团结，真诚合作，一定能把工作做好。从这时起，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作风开始转变，“部队的行动，不再是个别人的独断专行”^①，而是集体商量、决定。徐海东感到心情舒畅，他在军事上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更好的发挥，与战友们一起，领导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也抵制了军内少数领导人的错误。

部队在豹子岩休整数日，又转向鄂东北找省委。四月十九日，部队经过潢麻公路，敌一〇九师两个营从沙窝追来。徐海

^①徐海东：《保卫红色土地》。

东命令二二三团埋伏于高山寨，其余部队继续前进。当敌进入我伏击阵地后，我七十四师突然回击，敌军两个营全部被歼。四月二十日，部队在高山寨西南一个村庄找到了省委书记徐宝珊。省委召开了会议，研究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向，并宣布补选徐海东为省委委员^①。七月中旬，红二十五军转移到白鸭山一带，发现敌军分四路包抄白鸭山。徐海东命令部队按兵不动，积极准备干粮、草鞋，等敌人包围圈合拢后，他指挥部队冲垮其一路，再牵着敌人鼻子向殷家冲方向走。当我军进到长岭岗附近时，徐海东从望远镜里发现敌一一五师三个团摆在一个山坡上戒备松懈，几门炮架在山头上盲目乱打。敌人未发现我军，我军所处地形极为有利，长岭是个孤岭，敌人难以展开抵抗。徐海东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让通讯员赶快去请政委上来。吴焕先到后，他说：你看看长岭岗上的敌军样子，似乎是个好机会，打一仗怎么样？政委观察后连声说：对，打吧！他俩研究好了打法之后，随即命令二二四团团团长熊升宽带第一营打掉敌排哨，二、三营攻击岳家沟以南敌之连哨，徐海东和吴焕先各带两个营从正面攻击。长岭岗上顿时枪声大作，红军战士挥舞刺刀，猛扑敌群，混战三小时，便把一一五师打垮了，除敌师长带几百人逃命外，俘敌团长以下官兵三千七百余，缴获机枪六十（一说二百）余挺。这是红二十五军在豹子岩会师整编后打的第二个大胜仗。

八月初，红二十五军再次转战皖西北地区。月底，省委为了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决定攻打英山县城。徐海东奉命带领

^①徐海东是在1933年10月省委会议上补选为省委委员的，这次才宣布。

部队到达英山县城附近后，对敌情地形作了详细调查，得知城里驻有敌四十七师一个团和十几队民团，工事坚固，碉堡林立，防守严密。他派出一个小分队进行火力侦察，一下伤亡了二十余人。根据这种情况，他建议省委不打英山，改攻太湖。他说：太湖没有工事，没有正规军防守，只有民团，我军远距离奇袭，突然发起进攻，定会使敌人措手不及，容易取胜。太湖是安庆的大门，工商业都较发达，若论影响，不比英山小^①。省委经过讨论，采纳了他的意见。九月三日，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从英山县城东北的杨柳湾出发，一夜行军九十里，到达太湖县西北的回龙湾。四日下午，部队继续前进，连续急行军一百三十里，于午夜神速地攻下太湖县城，消灭守敌伪安徽省警备旅一部，缴获布匹、药品等大批物资。战后，徐海东带领几名战士清查敌营房货物时，发现敌军用仓库里存放着大宗雨伞。他高兴地对战士说：这是好东西，快派人收点好，每人发一把。他还强调说：要知道，一把雨伞就是一间房啊！攻打太湖的胜利，震惊了敌人，影响了群众，太湖县附近的几个县，大批群众自动起来进行抗捐抗税抗租和分粮的斗争。

十一月四日，红二十五军来到葛藤山，收到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给徐宝珊、徐海东、吴焕先的来信。信中说：党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工作，现已到达道委，建议省委率红二十五军来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计划。六日，徐海东和吴焕先率部从葛藤山出发。七日，在商城以南的汤池，歼敌一〇九师工兵营四个连，通过了从麻城到商城的封锁线。当天，在商城西南大柳树又击溃敌一〇七师两个团，并打垮了前来增援的敌一〇八

^① 《红二十五军战史》。

师先头部队，通过了从商城到新集的封锁线。部队到达余家集附近，徐海东命令全军休息五小时。深夜，全军迅速通过了从双柳树至新集的封锁线。后又遵照徐海东的命令，跑步前进，一个小时跑出了二十五里，甩掉了潢麻公路上的敌人，到达了光山县城南的斛山寨。

部队在斛山寨休息不到两小时，敌一〇七师、一一七师四个团尾追而至，从东西两面向我发起攻击。我二二三团遭敌包围，二二四团被敌第四、五支队压到朱家坳的一片洼地里，难以进行有力的还击。此时，敌机又对我阵地狂轰乱炸，我军处境危急。徐海东和吴焕先一同登上斛山寨附近的制高点，仔细观察和分析了敌我占据的地形和双方力量对比之后，徐海东对吴焕先说：要以“走”来摆脱敌人是困难的，只有打垮敌人的进攻，才能继续前进^①。吴焕先同意徐海东的意见，两人商定：由吴焕先指挥七十四师从正面攻击敌第四、五支队，徐海东率二二四团迂回到敌后，攻击一〇七师，并协同二二三团攻打一一七师。该敌在我军三面夹击下，纷纷溃乱，战斗从下午打到黄昏，共毙伤俘敌四千余人，我军伤亡数百人，我七十四师政委姚志修负伤后牺牲。战后第二天，徐海东率领先头团继续西进，于十日晚到达宣化店以北的鄂东北道委所在地——殷家湾，会见了中央代表程子华。

(五)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

^① 《红二十五军战史》。

会议，传达了中央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九日《致鄂豫皖省委训令》等文件，决定红二十五军向京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省委还决定红二十五军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近三千人。根据徐海东的建议，省委任命程子华为军长，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十六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何家冲出发长征。^①

长征一开始，徐海东亲自带领手枪排走在全军前头，以便掌握敌情，及时处理行军战斗中的各种问题。部队经青石桥、黄龙寺进入桐柏山地区后，蒋介石急令鄂豫皖敌军五个支队共四十多个团跟踪追击，还命令驻河南南阳的敌四十六军、驻湖北老河口一带的四十四师迎头堵截。军部研究敌情时，徐海东提出，桐柏山地区靠近京汉铁路和汉水，地方狭小，难以发展，建议向伏牛山和陕南方向挺进。吴焕先、程子华同意了他的意见。三人分手后，徐海东仍到前卫团。为了甩掉尾追的敌人，他派出一支小部队佯攻枣阳县城，主力隐蔽待命。待敌人扑向枣阳“围歼我军”时，我主力突然从枣阳城北回头东进，在保安寨冲破敌“追剿队”第五支队的阻拦，转向东北，又在桐柏县歇马岭一带击退敌“追剿队”第二支队的进攻，然后绕道泌阳县城，经马谷田乘虚北进，由方城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区。

吴焕先、程子华见徐海东在前卫团过度劳累，两眼熬得又红又肿，坚持要他到后卫团，他俩到前卫团去了。这天晚上下

^①徐海东：《会师陕北》，《星火燎原》第3集。

雨，半夜以后雨更大，很多战士都摔倒在地，变成泥人。这时，前面传来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疲劳不堪的战士们，跑到路旁老乡房屋前面和牛棚避雨，一倒下就呼呼睡着了。一会儿，前面又传来“继续前进”的命令，但多数人都醒不过来。徐海东找了根棍子，先把团长、团政委捅醒，再挨个去捅醒战士，一个村子里唤出了二百余人^①。因为部队连续转移，战士中思想混乱，有的伤员丢下没有人抬，徐海东亲自抬着伤员走了五里多路。雨还在下，他和战士们一样，一天未吃东西，又冻又饿。但他一直在鼓励干部、战士：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由于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又勤于检查、督促，才使部队减少了逃亡。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军前梯队进到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但敌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先我到达，占领了七里岗、砍山铺一线阵地。当敌发现我军后，趁我立足未稳之际，向我发起猛烈进攻，并从两翼包抄过来。吴焕先举起大刀，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率领部队冲了上去，和敌人展开白刃战。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全军奋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晚，我军趁风雨交加、天色黑暗，穿过敌人空隙地带，绕道急行，经叶县保安镇附近通过许南公路，进抵伏牛山东麓。在独树镇战斗的当天，省委委员、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对徐海东说：郭述申是皖西第三党的首领，应该干掉他。徐海东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说：郭述申要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那就散伙吧^②！由于徐海东的坚决反对，郭述申才未被杀害。

^①徐海东：《生平自述》。

^②郭述申：《优秀的将领，伟大的一生》。

二十八日拂晓，敌四十军骑兵五师一一五旅追来，先头部队已超过我军，并部分控制了泮河西岸我军前进道路两侧阵地，妄图南北夹击我军。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抢过泮河，占领河西岸的山口高地，击溃敌骑五师的进攻，控制了入山要道。于此同时，二二五团抢占上马以北高地，击退敌骑兵团和一一五旅的进攻，掩护二二四团过河。十二月九日，我军西抵雒南县庾家河。十日中午，省委正在庾家河开会，敌六十师从鸡头关方向发动突然袭击，所属三五六团已抢占了东山坳口有利地形，向我军猛烈攻击。省委立即停止开会，由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冲过去夺回了东山口。接着，二二四团、二二五团跑步抢占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协同二二三团打退了敌人进攻。敌军两个团又增援上来，组织反扑，全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红军从军长到伙夫都投入了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反复冲杀二十余次，终于将敌人打败。我军指战员非常英勇，二二三团团长在指挥部队同敌人拚刺刀时，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一挺重机枪在同敌人对射中接连牺牲了三名射手，仍继续射击；军部司号长下颚负伤不能吹号，就以土地庙作掩护，向敌人投掷了几十颗手榴弹，给敌以重大杀伤，最后壮烈牺牲。

这次战斗，共杀伤敌人百余人，我军伤亡二百余人，程子华负重伤；徐海东被一颗子弹从左眼底下打进去，从后颈穿出，伤势比以往哪次的都重，抬下阵地后，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吴焕先、徐宝珊、郭述申、郑位三等轮流守在床头。到第五天，徐海东醒了过来，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守护在旁的女护士周东屏高兴地答道：还出发呀！四天四夜不省人事，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含笑地说：我可不急，倒是睡了个好觉。

这次战斗的胜利，最后打垮了敌人对我军的连续进攻，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略转移，为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问题，提出了《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新苏区选择和当前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会后，征得徐海东的同意，我军在蔡川进行了整编，把二二四团编入二二三团和二二五团。随后，部队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雒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一路上，消灭了许多民团，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一九三五年一月底，陕军一二六旅、警二旅、警卫团进至镇安县以南地区，发动对我军“围剿”。二月一日，我军同进剿军打了第一仗，歼灭敌军一个营。战后，我军主力北移蓝田葛牌镇。五日，敌一二六旅两个团向葛牌镇我军发起猛烈进攻，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吴焕先两次派人请伤还未痊愈的徐海东上战场指挥。他接到通知后，马上让四个警卫员前拉后推地将他送到军指挥所山头上，了解了敌情，与吴焕先一起商量决定，派出一个营向侧后出击，成功后，再由正面反击。结果我军两面夹击敌军，歼灭其一个团又两个营，其余敌人慌忙溃逃，使我军摆脱了困境。战斗结束后，徐海东等乘胜指挥我军在鄂豫陕边区北部的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边区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并以缴获的部分枪枝帮助地方建立了第三、第四两个游击师。

二月十八日，省委在郧西召开常委会议。这次会上，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区单独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展开了一场重

要的斗争。还在庾家河战斗之后，省委个别委员就提出，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不能单独建立根据地，加以陕南尽是高山峻岭，土地贫脊，人烟稀少，红军发展困难，更不同意在此建立根据地，主张西入四川会合红四方面军。不少人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陕南地理条件不错，战略地位重要，建立根据地，可以牵制东北军、西北军，对东南西北各方的斗争，都可以起配合作用。红二十五军力量目前虽不大，只要政策正确，发展会是很快的。徐海东坚决支持后一种主张。他的坚决态度，对决定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作用很大。但由于当时敌人大规模进攻即将开始，特别是春荒的到来，前一种意见妨碍了省委意见的统一，对反“围剿”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极为不利。郧西会议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坚持了在鄂豫陕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会议作出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建新苏区的决议案》，要求扩大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要求主力红军“打到富足地方去”。

在这次会上，军部某一领导人提出手枪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是反革命，要杀掉。徐海东回答说：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不像是反革命，可以放出来让他们做苦工，继续考验他们。在徐海东的斗争下，他们中的大部分同志才获得释放^①。

为了贯彻省委决议，配合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西战役，二月下旬，徐海东指挥部队由郧西西进，接连攻战宁陕、佛坪两县城，消灭了新城的保安队。三月十日，他指挥部队在华阳镇南石塔寺附近消灭敌警备二旅五个营，毙伤敌人二百余名，俘

^①徐海东：《生平自述》。

敌团长以下四百余名。战后，我军乘胜开辟华阳地区，建立了华阳、石塔寺等七个乡政权，组织了华阳、茅坪两支游击队和几百人的抗捐军。

三月下旬，由于红四方面军已从陕南回师，红二十五军决定东返。当部队进占柞水县城后，原准备休息半天，但杨虎城的警备三旅赶到柞水，与我军接触。我军急转蔡玉窑，敌人即进占柞水县城。我军进止曹家坪，敌人又进驻蔡玉窑，步步紧追。据敌旅长张汉民派来联络的人供认：张汉民原是共产党员，以后叛党，加入法西斯蒂。鄂豫皖省委根据联络人员口供，决定消灭该旅。四月七日，我军由蓝田县葛牌镇南返数十里，徐海东指挥部队在九间房设伏。该旅毫无戒备地进入伏击圈，顿时枪声四起，敌旅溃不成军，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告结束，该旅几乎全被俘虏，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参谋长戴季英在处理战俘时，张汉民说他是共产党员，并有一些共产党员出来作证。戴季英不信，坚持把张汉民等人一起处决了^①。

四月中旬，省委趁反“围剿”胜利的机会，在葛牌镇召开了扩大会议，正式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副书记）、徐海东、赵凌波、田守尧、李隆贵、张明先组成。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根据地”。会后，我军继续东进。四月十八日傍晚，徐海东指挥部队攻占雒南县城。部队进城后，遵照他的命令，不惊

^①西北地下党组织证明，张汉民同志没有叛党，杀害张汉民等人属于误杀。在写红二十五军战史时，当时担任交通队长的张体学向徐海东反映此情况，徐海东说：从军事观点上看，红二十五军决定打张汉民旅是对的，杀害张汉民是错误的，这是红二十五军的一次沉痛教训。

扰百姓，露宿在街道两旁。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开仓分粮。接着，我军进至雒南、商县以东，开展创建根据地工作。徐海东还从军队中抽出干部和派二二五团第八连指战员下地方专做发动群众工作。

在我军战斗胜利的鼓舞下，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军。商南县平房村一家兄弟四人，一起要求当红军。徐海东接见他们，并作了劝说：一家四个劳动力都走了，会给家庭生活带来困难，你们回家再商量一下。过了几天，不只他们兄弟四人都来了，还带来几个青年，坚决要当红军。攻克雒南后不到半个月，红军就扩大了六百多名新战士。

红二十五军入陕五个月，部队发展到三千七百人，并在鄂陕区、豫陕区、华阳地区等建立了五个县工委、数十个乡政权，发展游击队、抗捐队达两千人以上，初步建立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五月初，我军转入龙驹寨。四日，徐海东根据省委庾家河、郧西会议上提出的“提高军事技术”、“用大力训练军事干部”的要求，从实际出发，领导部队进行战备整训。他规定整训的具体内容是：形势任务教育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射击、投弹、刺杀、机枪使用等技术，从单兵进攻到排进攻的战术教练，以及连进攻的示范演习等。十一日，整训结束。

五月上旬，蒋介石命令杨虎城指挥四十一个团的敌军向我进行反革命“围剿”。敌六十七军九个团和九十五师三个团布置在雒南县以东和以北，向南进攻；四十四师四个团由郧西县向北进攻；四十军五个团，陕军十个团，配置于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从西面截击我军。五月十四日，我军进攻山阳县城，未克，遂改变打法，跳出敌合围圈外，率部南下

郧西地区。五月下旬，省委在郧西开会研究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吴焕先请徐海东先提个方案。徐海东首先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认为正面阻击对我不利，敌人可以用十个拚我们一个，结果我们的人拚光，敌人还光不了，因而建议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他还具体地提出：敌动我不动，部队进行动员，准备草鞋、干粮，待敌人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们向敌人空虚的地方突围出去，把敌人甩在后头，拖着转圈子。拖到一定程度，敌哪一路先到，就打哪一路，求得将东北军歼灭一、二个师，或者将杨虎城的部队消灭一、二个旅，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省委与会同志一致赞成徐海东的建议^①。

六月初，徐海东带领一个手枪排走在全军的前头，按照预定路线，跳出敌人包围圈，先向北，又向南，再转东南，拖着敌人走。六月十五日晚，手枪排在徐海东带领下冒充敌四十四师部队，通过敌人封锁线，一夜急行军一百三十余里，十六日午前到达荆紫关，一举打垮守点一个营，活捉敌肖之楚师的军需长，全歼守敌二百余人，缴获了大量物资。随之，敌六十七军三个师，四十四师和陕军警备旅向荆紫关蜂涌追剿过来。但敌之“围剿”部署已乱，敌军被拖的相当疲劳，患病和逃亡的很多，尾追的四十四师大部分连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我军在荆紫关补充了给养和武器弹药，当晚，又开始了急行军。第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第二天又走了一百四十里，翻山越岭，接连走了四天，走出了五百六十里，进入了陕南山阳县黑山街一带驻下，隐蔽待机歼敌。等到第四天，杨虎城的警备一旅赶来。徐海东指挥红军主力埋伏在袁家沟口，命令一支小部队将敌军

^①参见徐海东：《会师陕北》。

诱进袁家沟口布下的包围圈内，一霎时，伏兵四起，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经过八小时拚杀，我军毙伤敌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枝过千，其它敌军闻风逃窜，反革命“围剿”被粉碎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初，红二十五军从杨家斜出发，跨过终南山，到了西安西南四十五里的殷家卫。在这里，有人从一张《大公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流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七月十五日，省委在洋峪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行动方向问题。徐海东坚决主张部队西征北上，迎接红一、四方面军。他说，能牵制敌人，保证主力红军顺利北上，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①。会议通过了徐海东等的意见。八月一日，部队西征到达陕甘交界的双石铺附近，遇上胡宗南别动队四个连，将其全部歼灭，并活捉了一名少将参议。徐海东亲自审问这个参议，从他的口供里，证实了我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的消息，还得知胡宗南部主力已全部西调阻击主力红军，后方留守处设在水天。按徐海东建议，我军由双石铺挥师北上，攻打天水。刚打下天水北关，敌一个旅的增援部队到了，只好放弃原计划，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

八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静宁以北的兴隆镇。这是一个回民聚居的地方。徐海东当即提出并经军部几位领导人同意，向部队宣布了四条纪律：不住清真寺，不毁坏古兰经，不在回民家吃猪肉，不打回民土豪。为了主动团结回民并影响全军，军部还向清真寺的阿訇赠送了礼品和匾额。红军战士坚决地执

^①徐海东：《会师陕北》。

行了军部规定的纪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受到回族群众的欢迎。部队离开兴隆镇那天，全镇男女老少齐集街头，两旁摆设香案、果品，为红军祝福送行。

部队驻扎兴隆镇时，吴焕先问徐海东：党中央、中央红军现在弄不清到了哪里，我们下一步朝哪里走？徐海东说，我也正为这事发愁，晚上觉也睡不着。我考虑最好是向西迎接中央，这是我们全军的希望，是上策；若接不到中央，就去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是中策；这个目的也达不到，最后只好回陕南打游击，是下策。“为什么回陕南是下策呢？”吴焕先问。他说：渭水是个大害！背水作战是兵家所忌的。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在大渡河大败，最后全军覆没，就是吃了背水作战的亏。吴焕先听了点头称是，完全同意徐海东的分析。

八月二十一日，部队在泾川城西王村南下渡河时，突然山洪暴发，把渡河部队切成两半。吴焕先、程子华已随前卫部队过了河，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被隔在河的北岸四坡村。为等候河水下降，他命令部队暂时进村休息。我军进村不久，敌二〇八团一千余人围攻上来，前头是骑兵，后尾是步兵，攻势很猛。我军仓卒应战，一时部队秩序相当混乱。徐海东命令三营坚决在正面顶住，不让敌人冲杀过来；他亲自率领一、二营插向敌人侧后打过去，击溃了敌军，敌团长被打死，毙伤敌军大部。吴焕先听到徐海东和后卫部队遭袭击，马上率领交通队十余人跑步回来支援。在抢占一制高点时，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徐海东得到政委牺牲的消息极其悲痛，亲自带上交通队把吴焕先的遗体送过河，为他洗掉身上的血迹，给他穿上他生前最喜爱穿的青呢大氅，并和其他领导人一起抬着烈士的棺木送葬。

四坡村战斗胜利后，我军西进金龙庙，威逼崇信县城，南

下十字镇，一路打听主力红军的消息，但一无所获。此时，敌第六师十七旅已抵泾川县，敌三十五师、一一三师也向泾川、凤翔一带调来。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担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代理政委的徐海东，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我军去陕北。九月初，红二十五军经太白镇、东华池进入人烟稀少的绍山，三天没遇到一个村庄，全军已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许多人饿倒在路上。那天下午，忽然碰到一个羊贩子和他赶的五百多只羊。徐海东即派人和羊贩子商量，把这一群羊买了下来分给各连队。没有盐，锅也少，有脸盆的就用脸盆煮，没有脸盆的便把羊肉切成薄片放在石板上烤，有的把羊腿放在火上烧。吃了这顿羊肉，部队才抖起精神继续前进，于九月七日到达陕北苏区的豹子川。在那里，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徐海东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为政委。九日，徐海东见到了陕甘根据地特意派来迎接红二十五军的习仲勋和刘景范。徐海东第一句话就说：“可找到你们了！”随后，部队通过永宁山又走了四天，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结束了。

长征结束时，徐海东同自长征以来一直战斗在一起的战友周东屏结了婚^①。

（六）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在永坪镇

^①周东屏，安徽六安人，193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入伍，1935年9月转为中共党员。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局顾问。

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刘志丹和徐海东在会上都讲了话，号召两军加强团结，共同为粉碎敌人“围剿”、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而战。徐海东还代表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对陕北人民和红军的热烈欢迎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会后，召开了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会议，宣布了由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合组成的陕甘晋省委的决定，将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任命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军团下辖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全军共七千余人。

此时，敌人已发起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敌军除原在陕北的四个师外，东北军七个师也从豫陕一带调到陕北。九月十九日，省委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敌作战方案。有人主张打北路，吃掉米脂方向之敌；有人认为打东北军，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徐海东说：东北军是我们的老对手，他们的“脾气”我们摸得很透，打它比较容易。只要打垮东北军一路，陕北形势就要发生变化。在如何打法问题上，徐海东又提出“调虎离山”，用围攻甘泉的办法，调动延安的敌人，拦路打它的埋伏。与会者经过讨论，一致赞同徐海东的意见。作战方案定了之后，部队经三天急行军到达甘泉以西的王家坪休息。徐海东和刘志丹带领团以上干部来到甘泉以北的劳山附近看了地形，在劳山公路两侧埋下了伏兵。第三天下午，敌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率领几千人马，四路齐头并进，钻进了我军的埋伏圈。我军发起猛攻，两边山头上机枪、手榴弹一齐打向沟底公路上的敌群，打得敌人抱头鼠窜，狼突豕奔，各逃性命。红军战士边打边喊：“缴枪吧，放下武器，一律优待！”有的敌兵当过几次俘虏，懂得红军的俘虏政策，纷纷缴枪。经

过六个多钟头的激烈战斗，敌一一〇师全部被歼，三千余名敌军当了俘虏，敌师长和参谋长均被打死。

为了扩大战果，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又于二十五日乘胜强攻榆林桥，消灭了敌一〇七师四个营，俘虏了敌团长高福源。高福源原系北京大学学生，又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当过张学良的警卫营长。他被手枪团清查出来后，在徐海东面前装着很硬气，说：“要杀就杀，随你们的便！”徐海东扬起马鞭，本想抽他几下，但一转念头，还是放下手臂，冷笑着说：“哪个杀你！你是东北人，现东北三省都被日本强占了，你的父兄成了日本强盗的奴隶，你要有点骨气，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你们东北军弟兄，见了红军，枪都朝天放，你还充英雄好汉，跟红军拚杀！”说得高福源低下了脑袋，不吭声了。在我党的耐心教育下，高福源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他主动要求去做张学良的工作，成为红军和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的牵线人，后来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劳山战役后，徐海东召集军团干部开会，研究和中央红军联络问题，并且每天派手枪团的人进城打听消息，搜集报纸。一天，手枪团的人从敌占区背回一大捆报纸，军团几个人从中翻到一条消息：“毛匪流窜固源、西峰镇等地骚扰。”这真是大喜讯！徐海东拿起这张报纸看了几遍后，告诉手枪团：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接受新任务。第二天一大早，徐海东派出手枪团战士化装成当地回民向西峰镇出发了。黄昏时分，侦察员回来报告徐海东，已联系上中央红军啦！徐海东马上找来经理部长查国贞问：“我们手里有多少钱？”查答：“一万元边币。”他听后以命令式的口气说：“中央红军到了，他们一路上很辛苦，我们多送些钱去，这些钱都送去，一点不留。”他怕查国

贞思想不通，又解释说：中央红军刚到，困难比我们多，我们要勒紧腰带，多为中央红军解决困难。他还让财务科长傅家选代红十五军团领导人给彭德怀和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上说：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他们内心无比喜悦，表示坚决拥护遵义会议决议，拥护党中央领导，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这封信还汇报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以后的情况。信写好后，徐海东让手枪团侦察员将钱和信用一块蓝色的印花包袱包好，立即送去。第二天，侦察员返回部队，带回一封复信：

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同志：

你们辛苦啦！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援。我们日久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区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了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听到你们会合的消息，不断取得消灭白军、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现在，中央红军、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此致

敬礼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

司令员 彭德怀

政治委员 毛泽东

为了迎接中央，以打胜仗庆祝两军会师，十一月初，徐海东又带领七十五师、七十八师攻打张村驿。战斗刚开始，程子华派通讯员送信给徐海东，告诉他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毛泽东同志今日下午到军团司令部来^①！徐海东喜出望外，立刻命令部队暂时停止攻击。他翻身上马，向军团部驻地奔去，一百三十五里路，三个多钟头就赶到了。徐海东进屋坐下不久，毛泽东到了，陪同来的有彭德怀、李一氓、贾拓夫等。经程子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徐海东，同他握手问好。毛泽东说：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徐海东连声回答：中央领导同志辛苦，中央红军辛苦！徐海东汇报了当前敌情。毛泽东取出了三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一边听，一边看着地图，还不时点头。彭德怀也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毛泽东问：你们说这第三次“围剿”能粉碎吗？“能，完全可以粉碎。”徐海东说。这时，警卫人员端上饭菜，大家边吃边谈。饭后，徐海东对毛泽东说：“我马上回前方去。”毛泽东交给他一部电台，要他带到前方使用。当晚，徐海东返回前方，向红军指战员传达了他见到毛泽东的情况，并发出攻打张村驿的命令。战士们爬上张村驿两丈多高的围墙冲了进去，打开了这个有三百条枪的民团据点。战斗结束后，他用毛泽东送给的电台，向中央报告了张村驿战斗胜利的消息。

十一月三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徐海东为西北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

为了从人员和物资上支援中央红军，十五军团专门召开了

^① <徐海东大事年表>。

干部会进行动员。徐海东首先发言，他说：我们盼望已久的中央工农红军来啦！两军胜利会师，将使陕北革命斗争出现一个新局面。中央红军军政素质好，战斗作风硬，多次打破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计划，粉碎了蒋介石的“剿共”阴谋，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我们要向中央红军学习，搞好团结，不要闹宗派，搞山头。大家鼓掌支持他的看法。他问大家：“我们用什么作为见面礼，表表我们红十五军团的心意？”没等大家回答，他又提高声音说：“拿出实际行动来，节衣缩食，从人员上、物资上支援中央红军！”会场又热烈鼓掌。其他首长也讲了话，到会的人进行了讨论，一致表示：给中央红军送礼物，是全军团的心愿。

徐海东宣布军团支援中央红军的人员和物资的决定：1. 每个连队抽出机枪三挺和一部分其它枪枝、弹药；2. 经济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医药用品；3. 在榆林桥和劳山战役中入伍的全部解放战士。为了保证质量，做到三不送：不送缺损零件的枪枝；不送变质药品；不送破脏衣服。军团部还成立了督促小组，检查各连队任务落实情况。每个连队都组织人员擦洗枪枝，补洗衣服。保证每支枪不但完好无损，而且油光发亮，没有锈迹。许多人还把自己的羊皮袄拿出来，准备送给中央红军。新兵团的训练抓得很紧，教员们耐心地为他们上课，讲述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不当亡国奴的道理。解放战士也积极响应号召，为了争取早日到一军团，当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而努力学习，军事政治素质提高得很快。一切都准备齐后，将物资和人员转交给了中央红军。

这段时间内，十五军团生活很苦，吃的是酸菜、山药蛋、小米稀粥。徐海东和其他军团领导人到大灶就餐，和战士吃一

样的饭。

十一月六日，中央红军到了甘泉的象鼻子湾一带，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此时，敌军又向我军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南面敌以一一七师沿洛川、富县大道北进，西面敌以五十七军四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富县运动。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决定会师陕北的各路红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以迎头痛击。十七日一大早，徐海东带领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来到直罗镇西南一座山上观察地形。直罗镇是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马路穿街心而过，镇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庙，北面有条流速缓慢的小河。他与先行上山的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一起，边观察地形边研究，都说这一带地形很好，敌人进到直罗镇，真正钻进了“口袋”。为了防止敌人利用镇东头寨子作据点，按彭德怀指示，徐海东命令一个营连夜拆掉这个寨子，还留下一个排，在直罗镇担任警戒，主力集中在张村驿进入战前的准备工作。第三天下午，敌一〇九师在六架飞机掩护下进入直罗镇。翌日晨，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我军发起战斗。冲锋号一响，中央红军由北向南打，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打，冲杀拚刺之声震耳欲聋。敌人慌作一团，南边枪响向北窜，北边枪响向南跑，根本无力抵抗红军的强大攻势，中午时分即纷纷缴械投降，红军占领了敌师部所在地直罗镇。敌师长牛元峰逃到镇东头一个小寨里，一边负隅顽抗，一边给军长董英斌连电求援。他不知道董英斌派的一〇六师在黑水寺一带被红军歼灭了一个团后溃退了。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残部突围西逃。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尾追不放，歼灭了这部分残敌，并俘虏了牛元峰。这一仗敌一〇九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被我全部歼灭，无一漏网，共俘虏敌军五千三百多人，打死

打伤一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三千五百多支，轻机枪一百七十六挺，迫击炮八门，无线电台两架，子弹二十二万发；迫使敌一〇八师、一一一师退回甘肃境内，敌一一七师退出富县，彻底打乱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

直罗镇战役后，十一月三十日，在东村举行了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在讲到直罗镇战役胜利的意义和影响时指出：“我们的胜利，告诉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许你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和全中国；我们的胜利也告诉国民党，我们不许你们卖国。”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区扩大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举行了奠基礼”^①。一九四六年九月，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到红军与东北军建立联合战线的过程时，特别谈到徐海东及其红十五军团的功绩。他说：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②，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直罗镇战役后，天气骤然变冷。徐海东考虑到，应该给战士特别是从南方来的战士，添点棉衣、增加点山药蛋，让大家过个温饱的冬天。一天，他来到经理部，问他们还有多少现洋？回答有七千块，并报告说：添冬装要用多少，买药用多少，买盐、买油……，要是再有三、五千块，这个冬天就好过了。徐海东指示经理部，要尽快发钱给各团改善伙食，添制冬

^①徐海东：《奠基礼》，《星火燎原》第4集。

^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集。

衣，以后打了胜仗，从敌人那里缴获了钱再补给你们。

第二天，中央红军杨至诚来见徐海东，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毛泽东亲笔写的要借两千块钱以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的纸条。徐海东马上把经理部长找来，要他们把七千块钱留下两千，拿出五千送给中央，经理部坚决地照办了。一天，彭德怀见到徐海东说：那些钱真是“雪里送炭”，应多多感谢你这位财神爷！徐海东不好意思地说：彭司令怎么这样客气，这是应该的，本应多给些，无奈我们穷，拿不出来呀！

这时，徐海东以敬重的心情，从军衣上兜里掏出一块心爱的旧怀表，交给彭德怀，说：你的表坏了，这块表给你。徐海东还告诉说，这是瞿秋白从苏联带回的，后来瞿秋白送给沈泽民，沈泽民又送给了我^①。彭德怀问，你怎么办？徐海东回答：我还有。彭德怀说：好吧，这块就借给我，我可是有借无还呀！说毕哈哈一笑。

直罗镇战役前，王明“左”倾错误在陕北根据地的执行者，把陕北红军的创建者刘志丹、习仲勋、汪锋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打成“右派”、“反革命”、“第三党”，将刘志丹从前线调到后方，准备逮捕。逮捕刘志丹的命令是陕甘保卫局派人直接送给军团部程子华的，通讯员不认识程子华，中途误交给刘志丹本人。刘志丹看后，主动去保卫局就捕。在前方，随即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陕甘苏区和原红二十六军的负责人抓了起来，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杀害了，给陕北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危机^②。中央红军长征到

^①这块表一直被彭德怀珍贵地保存着，1946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从新疆出狱回到延安后，又交给了杨之华。

^②聂洪钧：《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见《革命史资料》1980年第1期。

陕北后，徐海东还有其他人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了陕北肃反情况，盼望中央拯救刘志丹等同志^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立即表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请徐海东等放心，一定会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随后，中央命令国家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等到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控制事态的发展。王首道、刘向三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十二月初，党中央进驻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听取了王首道、刘向三等汇报后，下令释放刘志丹等所有被捕的干部。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戴季英，说：“象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②中央撤销了戴季英等人的职务。

党中央很快扭转了由“左”倾错误给陕北苏区造成的混乱局面。但是，对原红二十五军一些领导人过去搞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还没有得到纠正。一天，徐海东找到毛泽东说：“我们部队还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接着，他把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汇报。毛泽东问：他们是些什么问题？徐海东说：“有的是说了几句怪话，被扣上“第三党”；有的是丢了枪上的一个零件，被当成反革命嫌疑犯；有的是无根据地被指控为“AB团”成员；也有的说是历史上有问题，但找不到证明人。从鄂豫皖到陕北，一路上，他们被剥夺了拿枪的资格，每天抬伤员，挑子弹箱，背东西，处处受人监督，不能随便说话。我总觉得他们不像反革命。毛泽东思考了一会儿指示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

^①王首道：《怀念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徐海东同志》，1980年12月4日《光明日报》。

^②张麟：《徐海东将军传》，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头，为什么还当反革命？”“历史证明人，我看不用了，他们长征过来，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①毛泽东要求徐海东亲自去做解释工作并安慰受害者。徐海东回到部队，找来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嫌疑犯”，宣布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定。顿时，三百多人声泪俱下，被感动得全哭了，徐海东也痛心地流了泪。

直罗镇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派暂时停止了对陕北苏区的进攻。但陕北地区土地贫瘠，出产不丰，人口有限，要养活这么多的红军部队困难很大。因此，根据地的发展方向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由这里向北，是浩瀚的毛乌素沙漠；向西，是人烟稀少的回民聚居区；向南，是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地域虽好，却是国民党统治西北的大本营，有重兵盘踞，打不出去，即使打下西安，也难守住；只有向东进攻，打到山西，才能大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在延长开会，研究战略方针，徐海东等军团领导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说明必须东征的原因：通过东征能建立起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相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他还说：现在阎锡山与日寇勾勾搭搭，我军东征讨日，师出有名，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讲，都对我有利。徐海东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东征讨日方针。返回部队后，他迅速召开了军团军事会议，传达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布置所属各部队的战斗任务。会后，他又领导全军团开始了东征作战的动员、训练和强渡黄河的各项准备工作。

^①徐海东：《生平自述》。

长期以来，徐海东养成了一种习惯，每次战役或战斗之前，总要反复思考和做好三方面的事情。一是敌方的情况，包括敌军的数量、装备、战斗力、驻守或运动的方位，甚至一些将领的特点，也要摸得很透。他掌握着大量的侦察部队，认为这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是红军打胜仗的重要条件。二是我方的情况，包括哪个部队能打什么仗，干部的战斗作风和特长，战士的情绪和想法，后勤供应能否得到保证，都要了解得很准确。三是地形和民情，通过亲自观察和调查，对战场周围的高山、平原、河谷、制高点、封锁线，以及地方党、游击队和民情风俗，都要详细掌握。由于徐海东注重调查研究，分析判断比较符合实际，从而能及时地把握战机，克敌致胜，并能在上一个战役或战斗结束之后，很快提出下一个战役或战斗的作战方案，做到步步主动。当然，“智者千虑”，也有“一失”的时候。由于敌情的突然变化等因素，徐海东也打过败仗。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能最快地掌握变化了的新情况，及时修改作战方案，使我军转败为胜，或将失败的损失减到最小程度。

东渡黄河作战，对徐海东来说是个新课题。黄河天险怎么渡？他心里很不踏实。军团干部会议开过后，徐海东带领一些干部，骑马来到黄河岸边的沟口和沙口一线，进行调查研究。他一边察看地形，一边找老羊倌、老船工和去过河东的人谈话，一连忙碌了五个昼夜，直到把我军行进的道路、渡河地点和河东岸敌军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都调查清楚之后，才返回军团部。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央军委在延长吉峪村召开团以上干部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再次阐明了渡河东征的意

义：一、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迫使其撤退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运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实现；三、扩大自己的力量，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和根据地。中央决定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统率下，渡河东征。

二月二十日，红一军团由林彪、聂荣臻率领从沟口渡河；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从舍峪里渡河。两个军团过河后，同阎锡山的三个师、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的优势兵力打了一仗，歼敌约两个团。随后，根据毛泽东兵分两路、“各撒一网”的指示，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经临汾、文水东进，前锋进占离太原只有五、六里路的晋祠。沿途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筹款，征集物资，为抗日战争作准备。

我军进抵太原附近，威胁到阎锡山的老巢，迫使阎锡山急令调回驻陕北绥德、米脂的两个师，使无定河中下游两岸苏区联成一片。

三月下旬，抗日先锋军总部决定，兵分三路，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北进至苛岚、岚县一带；红二十八军和红三十军为中路军，在石楼、午城等地活动；一军团为右路军，直插汾河流域。此时，阎锡山急调他的主力部队十五个团向红十五军团猛扑过来。徐海东采用他的拿手好戏“先疲后打”的战术，率红十五军团北上，拖着敌人十几个团从晋中走到晋西北。在白文镇，会合了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把尾追的敌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连消灭。四月中旬，蒋介石派出十个师和阎锡山的五个师另两个旅，向我军压来；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东北军、西北

军，在蒋介石的驱使下，也企图沿河北上，卡住黄河渡口，消灭我军于隰县、石楼一带。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央军委立即决定，抗日先锋队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在回师的路上，由于刚下过雨，道路泥泞，黄河渡口渡船太慢。徐海东有些发急，骑马飞奔渡口查看。快到渡口附近，突然一个战士从队列中闪出。徐海东怕战马冲倒战士，急忙两手勒缰，结果马头猛一甩，他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摔在一块石头上，头碰得皮破血流，两颗门牙也跌掉了，在担架上睡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周东屏埋怨那个战士不该出列，一位跟随徐海东多年的马夫也嘟嘟囔囔要给那个战士处分。徐海东批评他们说，没有把人踩死，还要处分人，哪有这个道理！不久，召开东征战役总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时还风趣地说：我们东征取得了很大胜利……只是徐海东丢掉了两颗门牙，找不回来了！说得全场干部大笑不止。

五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军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组成西路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分左右两路军西征。十九日，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十五军团从延川王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进驻长城脚下的宁条梁。围攻小桥板时，经过谈判，敌人开寨迎接我军。此后，十五军团分两路西进：七十八师攻克定边，歼敌马鸿逵一个骑兵连及保安团全部，俘敌三百五十余人，缴获战马一百八十余匹；七十三师、七十五师在徐海东指挥下，于六月底进攻豫旺县城。豫旺是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市，城外有个大的清真寺，市民约有四五百户，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为了保护这座城市和回民的生命财产，徐海东要求以小的代价，消灭守城敌军。围城到第十天晚

上，红军一个连爬城进去歼灭马鸿逵骑兵旅一个营及民团一部，缴获战马六百余匹，我军只牺牲一人，伤七人。战斗结束后，有几百名俘虏兵要求参加我军，使军团骑兵连扩充为骑兵团。接着，七十三师攻占同心城，并与七十五师协同作战，攻下韦州。七月上旬，徐海东率领七十三、七十五两师转战到海原东、灵武南的金鸡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七月底至八月初，根据徐海东的命令，全军团各师先后集中到豫旺地区，进行整训。

八月的一天早上，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彭德怀的司令部，碰到正在那里开会的徐海东，引起了他的注意。斯诺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彭德怀决定让斯诺到十五军团去，徐海东说：“你把个外国人介绍给我，我拿他怎么办？”彭德怀告诉他，斯诺对我们是友好的，对这位记者可以说实话，可以请他在部队参观访问。徐海东这才心底踏实了，向斯诺表示：欢迎到我们那里参观，什么时候来，告诉一声，我就派人来接你。

八月二十六日，徐海东派一排人接斯诺到十五军团部驻地豫旺县城，陪同前去的还有黄华、马海德等人。那天，城墙上写上了“欢迎美国进步记者斯诺等来苏区调查”的标语，红军列队欢迎，徐海东在一座最高炮楼门口（斯诺的住处）迎候他。

斯诺在豫旺城住了五天，有时从早上谈到下午五点以后，有三天每天下午和晚上谈几个钟头。斯诺向徐海东和他部下，了解了他个人的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的斗争，目前在西北的情况等等。在斯诺眼里，徐海东是一个“神秘的人”、

“阶级意识最强的人”。他写道：“徐是一位惯于戎马生活的老练战士，他身上先后负伤八次，但是和彭德怀一样精神奕奕，他俩有超人的魅力。……真诚，彬彬有礼，而又仪态大方。他身材瘦长，黝黑而又结实，威力胜人，好骑射，枪法极准确，经常以此示人”^①。

斯诺很敬佩徐海东的卓越的组织能力。他在采访日记中写道：“昨天，我们到基层单位（团部）采访，看见他们绝大多数战士还作长期的扎营打算。但今天一清早，各种各样的东西——地图、书籍、工具、口粮、军火弹药和武器都统一地装上骡马背上去了，比之我们还来得要快呢。在军队开拔前的一个晚上，徐海东陪同我们在一起，你想不到他把八千多人开拔出去同叫一个人出外散步一样地容易。”^②

八月三十一日，徐海东率领部队出发向南走，斯诺则要继续向西去。徐海东拉着斯诺的手步行一里多路，边走边谈。徐海东请斯诺给他们的工作提意见，感谢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客人看望他的部队并将他的部队的活动情况向全世界报道，邀请他再来访问。到了一个分手的三岔路口，徐海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只黑色玉雕的鼻烟壶赠送给斯诺，并说：“请收下作个纪念吧！这是我和我们十五军团送的，以志不忘。这件东西以前是蒙古皇子的，拿去吧，祝一路平安。”

九月初，徐海东率部集中行动，先西行后南下，向兰新公路挺进，迎接二、四方面军。九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出腊子口向陕北开来。九月底，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与四方面军三十军在会宁西南会合。不久，军团主力与四方面军总部在打

^{①②}斯诺：《中共杂记》第17章《随军日记片断》。

拉池会合。一天。徐海东去看望朱德，张国焘也在座。徐海东紧紧握住朱德的手说：总司令，你指挥打仗的办法，程子华早就给我讲过。朱德说：“你的名声我早就知道，很会打仗呀！”徐海东说：“我是个粗人，窑工，不是参加革命，现在还当窑工！”张国焘插话说：“他很会打仗，在鄂豫皖，他是有名的徐老虎！”徐海东向张国焘叙述了红二十五军长征、肃反扩大化，以及中央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历史过程，正告他中央执行的路线，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十月八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在打拉池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这时，国民党五个军分四路向红军追剿过来。徐海东奉命率领红十五军团掩护红一、二、四方面军东进陕甘苏区，三天中在十五里之内连续转战，阻击了胡宗南部等八个师和一个骑兵旅的进攻，杀伤了大批敌人，后转移到同心城、王家团寨休整。

十一月二十一日，为了打击胡宗南部，壮大我军声威，军委命令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配合红一军团，会攻山城堡敌军。敌七十八师由山城堡向东攻击，进入我伏击圈，我军首先截断敌人西逃的退路，然后按作战部署，十五军团由东北往西南打，一军团从西南朝北打，以猛烈炮火，夹击敌军，经一昼夜激战，全歼胡宗南主力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旅两个团，打死敌旅长等高级军官多人，仅红十五军团就俘敌三千余，取得了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迫使敌主力停止了对我军的进攻。

十二月七日，徐海东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应张学良、杨虎城急电邀请，我党派出周恩来、秦邦宪等组成

的中共代表团于十七日到达西安。国民党亲日派紧急调兵威逼西安，军情紧迫，人心惶恐。张学良、杨虎城见到中共代表团第一个要求就是派徐海东率领红军主力开到西安地区，协助他们抗击何应钦向潼关的进犯。周恩来将张杨二将军的要求转告党中央，经中央同意，立即命令徐海东火速率部前往西安一线。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离开宁夏海原，日夜不停地向西安地区开来。途经东北军、西北军防地时，徐海东对王首道说：

“做统战工作要依靠你老兄和李克农同志，你们是我的高级参谋。”红十五军团由于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路上得到了东北军、西北军有礼貌的热情的接待。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徐海东率领部队到达咸阳，被任命为南路总指挥。周恩来和杨虎城从西安赶到咸阳看望。周恩来对徐海东等说：谈判已达成协议，张学良未同我们商量，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现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很混乱，你们要立即开往商州，坚决阻止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为东北军、西北军撑腰^①。杨虎城见到徐海东时惊喜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杨虎城还把他的警卫旅临时拨给徐海东指挥，划归徐海东指挥的还有东北军一个师，我陕南红七十四师和抗日第一军。杨虎城还赠送给红军一辆吉普车、一百箱子弹。此时，蒋介石已调遣三十几个师分五路向陕西推进，卫立煌指挥国民党第五集团军四个师向商洛开来。徐海东命令红军指战员跑步前进，第二天抢占了商州城北面的一座大山，控制了商州城，并构筑工事，严阵以待。敌人一小时后也赶到了，当敌人得知红军已到此地，便连夜后撤四十里。十

^①孙瑞翠：《开往西安的路上》，《星火燎原》第4集。

三天之后，周恩来从西安来电报：命令我南路红军在三天内全部撤过渭水。根据中央指示，徐海东率部按时撤过渭水，进至礼泉、乾县地区。三月初，经彬县、长武，返回甘肃的西峰镇、驿马关地区整训。

(七)

一九三七年七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徐海东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八月底，他率领三四四旅从三原出发，通过济水平原到达资川。九月上旬，徐海东奉命率部星夜向平型关前进。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围歼日寇板垣师团的战斗打响了。徐海东指挥六七八团从左翼突击，经过艰苦奋战，从早晨打到天黑，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平型关战斗结束后，徐海东率领部队跟随朱德、彭德怀破坏敌人从灵丘到团城口、大营的交通线，在沙河伏击从代县出来增援繁峙的敌人，破坏从张家口到代县的交通，十一月太原失守后，徐海东出兵河北，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伏击正太路和平汉路之间的敌人。

一九三八年二月底，徐海东奉命率部转移到山西南部，拨归一二九师领导，准备参加打击日军对晋东南发起的九路围攻。三月初，日军以一〇八师团为主，先后攻占沁县、屯留、潞城、襄垣、武乡、榆社、黎城、涉县、武安、辽县，以及临屯路全线。徐海东旅担任正太线战场阻击任务。他开始指挥部队袭击南峪、北峪，北峪敌人几乎全部被歼；南峪敌人呼救，石家庄之敌派三百人增援，在火车上遭我军袭击，死亡过半，

余敌退入碉堡。敌人又从娘子关派三百人增援，半路又被我军击退。最后，敌人从石家庄派出一千余人，并随带数门大炮，我军闻讯，遂乘黑夜撤出战斗。不久，石家庄敌人向余桥岭发起进攻，遭我军伏击，杀伤敌一百余人。四月中旬，敌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四月底，徐海东率部进占长治，追歼南逃敌人，随后，收复黎城、潞城。

六月，日军企图打通山西晋城至侯马的公路。六日十时，日军第二十五师团一个联队由晋城开来，进至阳城以北的町店地区休息。徐海东经过再三请示，才批准他指挥我三四四旅两个团，利用地形，隐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猛攻。激战至深夜，全歼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日军近千人，并击退从阳城增援之敌，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半年多来，徐海东率部从山西打到河北，日夜转战，驰骋数千里。由于劳累过度，他又大口吐血，病倒在华北战场上。同年八月，徐海东奉命回延安养病。

十月，徐海东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身份，参加了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后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他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各种学习活动，都积极参加。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所作的结合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國革命战争实际的报告，深入浅出，生动深刻，他尤为爱听。在马列主义学院十个月，先后学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等课程，使他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都有较大的长进。他在《自述》中写道：“通过学习，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党史、政治经济学等问题，有了进一步提高，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以及当时许多重要讲话，对自己教育更深。”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徐海东随刘少奇离开延安，经过两个月行程，于十一月到达华中，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中共中央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委员。十二月十八日，驻南京、明光、蚌埠一线的日军二千余人分四路合击周家岗，徐海东率领部队迎击。战斗从二十一日打响，二十四日结束，打垮了周家岗日军一个整营，毙、伤、俘敌军一百六十余人，活捉了一个日军分队长。战后，新四军军部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许多领导人发表了讲话，指出这是新四军成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仗取得了经验，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新四军指战员继续歼敌的信心。不久，徐海东在给营以上干部作报告时，突然口吐鲜血，又病倒了。经医生诊断是肺病复发，病情一天天严重，吐血量不断增加，以至卧床不起。

皖南事变后，抗战形势日趋紧张。徐海东感到国难当头，自己却长期患病不能为国出力，心情急躁不安，因而病情不时加重。华中局把徐海东的身体状况反映给毛泽东。五月，毛泽东亲自给徐海东来电，要他“精心养病，天塌不管”^①。徐海东看了电报，感动得掉了泪。他让秘书把那八个字用毛笔写在月份牌上，放在担架上，借以控制自己的急躁情绪。

抗日战争的后五年，徐海东基本上是在担架上、病榻上度过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徐海东病情稍有好转，但仍不能起床。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军撤出华中地区，徐海东随后方机关转移到山东诸城、莱阳等地休养。

一九四六年八月，徐海东奉中央指示，离开山东根据地，从威海秘密乘船，九日抵苏军占领下的大连港，住进大连市文化街七十五号一座幽静宅院里养病，直到全国解放。这期间，

^①徐海东：《生平自述》。

一位留美的肺病专家和苏军一位上校军医，为他作了仔细认真地检查，断定他的肺大部分功能失效，说不上是几期肺病了。医生们认为，徐海东在前线几年，只靠着一些中草药，居然维持了生命，简直是奇迹。毛泽东对徐海东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关注，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七日，徐海东给毛泽东去信，汇报他患病医疗的情况。八月二十日毛泽东给他回信：“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①

一九五四年，徐海东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一九五六年八月，徐海东从大连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由于医疗条件好，身体健康略有好转。九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八年九月，徐海东去武汉，先后到武汉钢铁厂、长江大桥、旭光农业社、鄂城钢厂等处参观巡视。一九六〇年，徐海东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这前后，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给编写军史提供资料，他自己带头撰写革命回忆录，公开发表的有：《保卫红色土地》、《回忆红二十五军长征》、《会师陕北》、《奠基礼》、《冀察晋抗战》和《生平自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徐海东出于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关心，亲自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提出了三点希望：一，中央领导权必须交给那些一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二，趁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一

^①徐海东：《生平自述》。

定要把埋藏在中央的“定时炸弹”挖出来，以防后患；三，担负中央各种领导职务的干部不宜撤换过多，提升到担任重要领导岗位的干部一定要符合接班人的条件。这封信里集中反映的是一般的当然是极重要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问题，但却击中了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江青的要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始造谣说徐海东写信给毛主席，“逼毛主席下台”，“让毛主席交权给刘少奇”。并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由陈伯达、戚本禹唆使一群打手抄了徐海东的家，抄走了那封给毛主席信的底稿。接着，强加给徐海东的罪名一个接一个，什么“参加‘二月兵变’”，什么“张国焘的黑干将”、“彭、黄的黑干将”、“刘少奇的黑干将”，什么“反对毛主席”等等；还指责他推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迫他检查。一天，一群人冲进他的卧室，在他的床前开了什么“床头批判会”，又诬蔑他是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大连休养时和高岗开过“黑会”、“想当国防部长”、要“夺总参党委的权”等等。“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造成党和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坏，对他的迫害也一天超过一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大楼上和他家的院墙上，出现了“打倒徐海东”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在他的名字上又打上了叉。他的存款被冻结，公务员被撤走，药品供应受到限制，最后连氧气也不供应了。徐海东因氧气不足，呼吸急促，大颗的汗珠从额上滴下来，嘴唇和手指甲都变成紫色。他痛心地对他的夫人说：“东屏，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一个战俘都不如了。”徐海东开始发烧了，但却没有药物治疗。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的长子徐文伯找王震陈述情由。王震把对徐海东断药断氧这一紧急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得

知后，命令解放军总医院立即恢复对徐海东药品和氧气的供应。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亲自提名徐海东为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并经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阻挠，直到四月一日，徐海东才被通知参加开会。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然而，对他的迫害并未终止。十月二十五日，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徐海东被强迫“遣散”到河南郑州干休所，住房潮湿，没有暖气，没有药品，连酵母片也不给。后来据林彪在河南的死党交待：林彪要他采取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的方法，置徐海东于死地。徐海东患了重感冒，引起肺炎，又由肺炎引起肺气肿。家属要求从北京派医生来会诊，他们拒绝了；要求在郑州请医生会诊，他们采取“拖”的办法，推说找不到合适的抗菌素。郑州铁路医院一位医生提出正确的治疗方案，立即被“轰”走了。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五日，这位身经百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战士，含冤离开人世。

徐海东逝世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还规定：“不准登《人民日报》、不准登照片、不准写评价文章、不准送花圈、骨灰盒上不准覆盖党旗。”

（本文得到徐海东将军的夫人周东屏同志和长子徐文伯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和他们熟悉的情况，并对本文初稿、二稿提出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附：主要参考书、文目录

1. 王宏坤：《苏家埠四十八天》。
2. 徐海东：《保卫红色土地》。
 （以上载《星火燎原》第2集）
3. 徐海东：《会师陕北》。
4. 詹大南：《回马枪》。
5. 刘震：《袁家沟及战斗一角》。
6. 魏文建：《华阳游击队》。
7. 汪治国：《挫折》。
8. 霍春华：《永平会师》。
 （以上载《星火燎原》第3集）
9. 聂荣臻：《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斗》。
10. 徐海东：《奠基礼》。
11. 肖华：《渡河东征》。
12. 韦杰：《右翼梯队的战斗》。
13. 孙瑞翠：《开往西安的路上》。
 （以上载《星火燎原》第4集）
14. 韦国清：《在徐海东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摘要），载197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15. 伍修权：《我军的忠勇将领徐海东同志》，载1979年1月24日《人民日报》。
16. 郭述申：《优秀的将领 战斗的一生》，载《红旗飘飘》第21集。
17. 王首道：《凛然正气 铮铮铁骨》，载1980年12月4日《光明日报》。
18. 韩先楚、刘震、陈先瑞等：《一生忠勇，居功不骄》。
19. 刘华清：《徐海东同志与红十五军团》。
20. 傅家选：《心意》。
21. 关盛志：《四坡村反击战》。
22. 徐文伯：《传播革命友谊的怀表》。

23. 周东屏：《海东受迫害的经过》。
24. 徐海东：《回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25. 徐海东：《冀察晋抗战回忆》。
(以上载《忆徐海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6. 周益三：《张汉民同志是怎么牺牲的》，载《革命史资料》1982年第6辑。
27. 徐文伯：《张汉民被杀经过》，载《革命史资料》1982年第6辑。
28. 徐文伯：《学习爸爸徐海东的革命精神》，载《燎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9. 聂洪钧：《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载《革命史资料》1980年第1辑。
30. 斯诺：《中共杂记》。
31. 《红二十五军战史》、《红四方面军战史》、《西征红军战史》。
32. 《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33.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4. 《罗瑞卿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陈 少 敏

高 玉 临

陈少敏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长期坚持党在白区的秘密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主持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名驰中原、威震遐迩的巾帼英雄。建国后，她领导工会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英勇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走上革命道路

陈少敏，原名孙进修，曾用名孙肇修，参加革命后，为坚持秘密斗争，改名陈少敏，后又化名老方。她一九〇二年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一个无田无地的贫苦农民家庭，全家人先以结发网的手工劳动为生，后靠佃种土地过活。

陈少敏有兄弟姐妹五人。一九一五年，她十三岁，因家里生活困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童工。半年后，父亲又设法把她接回。此后，她在从事推磨、碾米等家务劳动的空隙，跟随父亲读书识字。父亲孙万庆，辛亥革命时曾在山东潍县组织革命军并任连长，失败后回寿光老家一边务农，一边创办范于小

学，宣传民主革新思想。陈少敏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对提倡妇女放足、男女平等、女孩子上学读书等新思想接受很快，从小就坚持不裹脚。有人故意叫她“孙大脚”，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要打柴、挑水，有一双大脚，长大了更好干活，有什么不好？几十年后在鄂豫边区，当有人称她为“陈大脚”时，她抬起双脚，十分自豪地说：我这对大脚是我从小反抗封建旧道德的见证，没有这对大脚，我就不能到鄂豫边区来和你们一起进行抗日斗争！

陈少敏勤奋好学，父母很喜爱她，后来送她到离家二十里以外的黄家庄教会学校读书。在那里，她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她深知没有文化的苦楚，每逢假期回家，便把自家的西屋当教室，办起妇女识字班，教本村的十几名妇女学习拼音字母、唱歌、诵诗。有人讥笑她“傻气”，指责她“异样”。她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很有一股不屈于旧势力的倔强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寿光县相继遭到德国殖民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战祸加上灾荒，逼得陈少敏一家逃荒要饭，父亲、哥哥和姐姐、妹妹四人，相继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一天，母亲把她和弟弟叫到身边，含着眼泪说：伢伢，俺养不活你们，弟弟去帮人家干活，你到有钱人家去做媳妇，谋一条生路，要不，在家里会饿死的。陈少敏哭着回答：决不到有钱人的家里去。

一九二一年冬，陈少敏带了几件旧衣裳和一点干粮，又步行五百多里来到青岛，进了日商纱厂当纺织女工。在这里，她每天要干十二小时以上的活，晚上和同伴们挤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睡觉，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牛马生活，还经常挨资本家

和工头的皮鞭。

一九二三年以后，邓恩铭和王尽美先后来到了青岛领导工人运动。陈少敏参加了秘密工会和工人夜校，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她积极串联工人，为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虐待工人而斗争。一九二五年四、五月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先后举行反对日商资本家的大罢工。陈少敏参加了为反对资本家开除五十名工人代表和摘掉工会牌子而举行的罢工，和一批女工、童工在厂内坚持斗争。反动兵士冲进工厂进行镇压，不少女工遭枪杀、水淹或被抛入海中，陈少敏幸免一死。她目睹这种惨状，更加激起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深仇大恨，不顾反动当局的种种迫害，继续发动工人坚持斗争，因而被厂主开除。

中共青岛市委鉴于当时的恶劣环境，把很多工人派回农村开展革命工作。陈少敏离开青岛返回寿光、潍县等地进行活动，后到潍坊进了美国人办的文美女中读书。这所学校是美帝国主义从思想上、文化上奴役中国人民的据点，它严格规定圣经是学生必读的主要课程，不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这就激起了进步学生的强烈不满^①。

一九二五年秋，到潍县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庄龙甲，在文美和文华两所中学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讲演小组。最初参加讲演小组的共七人，内有女生三人，陈少敏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小组中，她从《向导》、《新青年》等刊物上学习了不少革命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还深入工厂、农村向群众进行宣传。当一九二七年三月潍县党组织在文美女中开始

^①张子元口述：《陈少敏家世及青少年事迹片断》。

建团时，她第一批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担任了团的寿光县委妇女部长。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文美女中的美国人校长李恩惠，趁机宣布不准学生出校门，强迫学生们做小礼拜、大礼拜，禁止她们和文华中学的男生接触，不准学生订阅报刊读物，严禁学生集会活动^①。对于学校这种无理限制，文美女中的学生无不愤慨万分。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董汝勤、陈少敏、牟秀珍等进步学生骨干开会决定，以要求信教自由、读书自由、出入校门自由等为条件，派代表与校方谈判，上述条件得不到完满答复，即举行全校罢课。在谈判中，校方不但拒不答复学生的正当要求，李恩惠还把董汝勤叫去说：“你是共产党分子，不相信上帝，破坏校规，反对师长，不求上进，学校决定开除你回家。”^②董汝勤回宿舍马上与陈少敏研究对策，决定校内、校外配合进行斗争。她对陈少敏说：“我出去后与党联系，你们坚持斗争，直到夺取胜利。”^③

董汝勤离开了学校之后，陈少敏发动已经罢课的同学，在校内同反动校长坚决斗争，吓得那些美国人不敢出宿舍，慌忙指使校方又宣布开除陈少敏、武克清、刘浩义等同学。这一下，激起了学生们更强烈的反抗。陈少敏怒不可遏，组织一部分同学痛打了美国牧师美道等坏家伙。李恩惠不敢再在潍坊停留，只好声明将文美、文华两校停办。

大革命失败后，陈少敏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而且向帝国

①②③董汝勤：《潍县文美中学的革命活动简述》（访问记录），原件存潍坊地区档案馆。

主义分子及其走狗进行了勇敢的斗争。党组织经过考察，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批准她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坚持白区斗争

一九二八年冬，党派陈少敏重返青岛，参加中共青岛市委下设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任工委委员兼街道党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工人运动。为便于工作，她在华北酒精厂（当时名打蛋厂）当了工人，以这个厂为据点，直接领导大英烟草公司和日商各纱厂的工人斗争。她和市委把指挥机关秘密设在甘肃路三十三号徐子兴家里。徐子兴的爱人李毅（即李文美）后来回忆说：“那时，陈少敏领导全面工作，她不仅指导妇女运动，工人运动，还直接深入工厂，组织宣传，散发传单。我的家被称为‘市委之家’，她和市委的同志常常到我家来开会，会后就在我家里吃饭。他们写的文件和传单也在我这里刻写油印，然后带到工厂去散发。她工作深入，胆大心细，当时我们就叫她陈大姐。”^①

陈少敏经常走家串户，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为唤醒工人觉悟、建立工会组织而辛勤奔波。一九二九年春节期间的一天早晨，她来到工人周兰英家里，同周兰英和来周家拜年的赵秀兰、于金魁、马玉琴等，进行了一次亲切地交谈。

陈少敏问大家：“咱们工人为什么祖祖辈辈都受穷？”

赵秀兰回答说：“咱没有钱，还能不穷?!”

“资本家的钱是哪里来的呢？”

^①访问李毅记录（1982年8月20日）。

“他开工厂挣的。”

“你们为什么不开工厂挣呢？”

“没有机器。”

“资本家的机器是他一生下来就带来的吗？”

“他老子留下的。”

“他老子的机器又是怎样来的呢？”

“……………”

这一下把大家问住了。几个人面面相觑，谁也答不上来。陈少敏笑着说：“你们的说法不对。人的穷富，不是有没有本钱的问题，更不是命中注定。资本家是依靠剥削我们工人才发财的，我们工人是因为受了资本家的剥削才贫穷的。‘洋鬼子’剥削工人的方法更狠，所以我们的痛苦更重。”说到这，陈少敏又问：“我们就这样甘心受‘洋鬼子’压迫吗？”

大家说：“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呢？”“有时气极了，就拿东西出气，磨磨洋工，或者故意浪费材料。”

“光这样还不行，这是消极的办法，资本家会想出更毒辣的办法来对付你们的。”陈少敏因势利导，谈话步步深入，“咱们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工会，大家一条心，同‘洋鬼子’作斗争，才能得到胜利。”“工会是干什么的？”她进一步讲道：“工会就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它和工人一条心，处处为工人办事，和工人站在一起，工人有什么要求，都可以通过工会去办。例如，我们成天受气，工会就会帮助我们出气。”

这次谈话持续到午后二时，给工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秀兰在三十年后，仍然能把陈少敏的话复述出来。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陈大姐给我们指出了斗争的路子，我们恨不得立

刻把工会成立起来^①。

一九三〇年七月，青岛人力车夫在反对车行老板提高车租而举行的罢工中，有一百三十多人被反动派逮捕。陈少敏认为要营救被捕工人，必须争取社会上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还要发动被捕人力车夫的家属起来斗争。她和街道党支部委员董汝勤、李文美等，分别去串联和发动人力车夫的家属。在一个车夫的家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向陈少敏哭诉了儿子被抓、全家老小生活无着的痛楚。她安慰老人说：你家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一定想法把你儿子救出来。

七月下旬的一天，陈少敏带领几百人的家属请愿队伍向市政府走去，其中就有那位年已古稀的老太太和她的儿媳妇。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街上的行人无不责骂市政府丧尽天良。这支家属请愿队伍来到市政府门前，坚决要求立即释放他们的亲人。反动市长派出会见车夫家属的一个秘书，想用欺骗的办法把大家支走。家属们在党支部和陈少敏的领导下齐声高喊：“不答应条件，我们死也不走！”那位秘书溜回市府请示。过了一会，他出来说：“为照顾你们的生活，被捕的人很快放出来。”家属们提出：人放出来之前，要管我们的吃饭问题，每天要给每户发四角钱的生活费。市政府也只得答应。生活费发了一个星期，市政府感到不划算，只好将被捕的人全部释放。家属请愿斗争取得了胜利。

正在这时，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山东省委贯彻了这一“左”

^①以上春节谈话，参见赵秀兰 1959 年 5 月的回忆，郭镜堂记录整理，存山东省总工会。

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决议，在给青岛市委的指示中说：“从一厂一部分暴动，可以引起全厂的暴动；全厂的暴动可以引起全市的暴动；全市可以引起全省，全省可以引起全国，于是革命就可以成功。”青岛市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于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日，即“全国苏维埃运动日”，举行全市工人游行示威，游行示威不成，就开“飞行集会”。鉴于陈少敏在大英烟草公司等工厂领导过工人运动，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市委遂决定由她以过路人的身份到现场去具体指挥。

陈少敏坚决执行上级决定。那天，她带着装有传单柳条箱于上午十一点左右来到大英烟草公司附近，但等到十二点后还是不见各厂工人集合。原来，保安队已把七大纱厂和四方机厂等工厂包围起来了，使工厂游行队伍没有集合起来。陈少敏按照市委关于搞不成游行就开“飞行集会”的指示，打开柳条箱，抓起传单，向大树下正在吃饭的一群工人中撒去，并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共产党万岁！”刹那之间，洋槐树上飘起了一面斧头镰刀红旗。工人们顾不得吃饭，都争着看传单、望红旗，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陈少敏和互济会的张子颖，站在人群中间先后发表了演说，突然，厂警挤进人群，抓走了张子颖，有的工人很快把陈少敏保护起来。她指着张子颖说：“人家不是为他自己的事来的，他说的话代表了我们的要求，不能让他一个人吃亏，要坐牢大家一起去。”^①工人们遂一拥而上，把老张夺了回来。

这次在“左”倾错误指导下的“飞行集会”，使党的组织和干部暴露了，市委遭到了破坏。总指挥张路亭被捕后叛变投

^①陈少敏：《第一面斧头镰刀红旗飘扬在青岛上空》（1959年5月）。

敌，供出了党的组织和陈少敏等干部名单，不少领导人被捕牺牲。陈少敏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于第二天（八月二十一日）离开青岛到寿光老家暂避。一星期后，陈少敏又秘密返回青岛，当晚在原“市委之家”李文美处，见到了董汝勤和市委书记唐汝贤。她提议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前段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的斗争策略。但作为领导这次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唐汝贤，不仅不检查自己执行“左”倾错误的责任，反而对陈少敏进行批评和指责。这时候，敌人仍在四处追捕陈少敏，这就迫使她于八月三十日又化装离开青岛去潍县。九月底，再次返回青岛。中央鉴于当时的情况，决定派陈少敏到党的北方局去工作。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陈少敏和爱人任国桢一道先回寿光老家住了几天，于十二月二十日来到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党先派任国桢任北平市委书记；一九三一年春，又调他回天津作工人运动；九月，再派他往唐山任市委书记。在这期间，陈少敏伴随任国桢作党的机关工作，往返战斗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协助他处理大量党内事务和职工运动问题。十月，中央派任国桢任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陈少敏因生小孩住北平协和医院没有随同前往。这时敌人正在到处搜查陈少敏，她在医院里生活极为困难。正当她处境十分危险的时刻，不幸的噩耗接连袭来：与她并肩战斗的亲密伴侣任国桢，于十月十八日被阎锡山匪徒逮捕，不久即惨遭杀害；他们留下的唯一小女孩，也因疾病无钱医治而夭折。这对于陈少敏是多么沉重地打击！然而，她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也没有因为自己频遭不幸而沉溺于悲痛之中，她化悲痛为力量，以革命为重，英勇地坚持战斗。

一九三二年，组织上调陈少敏到河北省委秘书处工作，负责天津职工运动。她只身来到天津，同市委组织部一位同志接上关系后，住在周家祠堂一位工人的家里。一星期后，她到天津和记打蛋厂当了工人，通过拜把子、拜干姐妹联络了一群女工，常在周家祠堂、大王庄一带工人居住区开展革命活动。

不久，省委决定陈少敏担任天津市委秘书长，她联系的面更广了。两个月后，她被和记打蛋厂开除，又设法进了美国资本家办的宝成纱厂。这个纱厂的资本家为了剥削工人，把工人分为南方上海派和北方东北派，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工人之间的团结。陈少敏针对这种情况，通过拜干姐妹，把工人团结起来，并组织大家同厂主进行了坚决斗争。

党组织考虑陈少敏担负的工作较多，决定让她离开工厂，专做党的工作。此后，她利用做临时工的机会，先在周家祠堂建立了党的支部；又在日本人办的裕元纱厂工人中发展党员，使这个原来连工人群众组织也没有的日商纱厂，很快成了有党的领导，有党、团组织和工人组织的红色基地。

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正统治着党中央。河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要天津市委搞工人苏维埃。陈少敏不同意这种作法，她说：“什么叫苏维埃，我们也不懂，怎么搞呢？”在天津，党的力量还很弱，有些工厂，“连个小组都没有，怎么搞苏维埃。”^①她主张现在还是向工人作宣传组织工作，以不断积蓄革命力量。为此，她被市委某些领导人指责为“机会主义”。陈少敏对这种不深入了解工人实际情况，盲目指导运动的领导作风很不满意。她说：“我深深地感到，党要做工作就

^①陈少敏：《回忆天津党的活动情况》（1959年1月7日）。

要到群众中去，和他们一起劳动，这样就可以吃得开，你说话人家才会听”；“站在局外那是搞不好活动的。”^①

一九三二年七月，有一批青年学生从北京到天津，在宝成、裕元等纱厂搞工人运动。有一次，他们中一个叫小刘的女同志病得很厉害，陈少敏知道后，决定把她接到城南治疗。当陈少敏来到小刘的住处时，看到屋里坐了许多人，暗暗责怪这位不懂秘密工作规矩的年轻人。不一会，又来了一个叫小吴的，一进门就东张西望，神色很不对头。陈少敏好象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便机警地把自己的假发整理了一下。正在这时，一个持枪的汉子闯了进来，对陈少敏进行了搜身检查，因一无所获，只好作罢。事后，陈少敏立即向市委作了汇报，并对那个叫小吴的提出怀疑，建议市委采取必要措施。

陈少敏有比较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她当时联系的面比较广，还结识了国民党张宗昌部下一个旅长的六姨太太王静宜。此人经陈少敏的教育，后来入了党。陈少敏利用这个关系，把党的重要文件放在她家里，并常到她家去作客。通过王静宜的关系，陈少敏又认识了她的房东朱老先生。朱老先生对陈少敏很好，当知道陈少敏没有房子住时，就要她搬到自己家里来。由于她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这次到天津以后，还一直没有发生什么危险。但从在小刘家里被人持枪搜查后，就开始有特务跟踪她，党的机关也连遭破坏。

一天，陈少敏打算约几个支部的负责人，到朱老先生家去开会。她到朱家一叫门，哭得眼睛通红的朱老太太出来，示意她马上走开，因为王静宜的家被搜，现在特务正在里

^①陈少敏：《回忆天津党的活动情况》（1959年1月7日）。

屋和朱老先生纠缠。陈少敏当即向市委汇报了这一情况，但市委一位负责人仍要她照常外出联系工作。第二天，陈少敏一出家们，就被特务盯上了。当她上船过河到达对岸时，特务们在码头上大喊：“捉女共产党！捉女共产党！”陈少敏无法走脱，被一伙匪徒逮捕了。

陈少敏被带到市警察局。当时的警察局长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矛盾很深。局里有一位官员不相信陈少敏是共产党，竟和特务们吵起来了，问他们为什么要捉人。他还问陈少敏带了什么东西。陈少敏说：“几本书，我不识字，也不晓得是什么书。”他接过看了看说：“这不是共产党的书。”接着又关照陈少敏：“你以后要小心！”但是，特务们既然把陈少敏抓来了，警察局也只能将她收监关押。陈少敏看出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她决定利用这种矛盾来保护党的组织，掩护同志。

一天，特务机关来人提审陈少敏。上次到小刘家持枪搜查的那个人果真是特务，也参加了“审讯”。他对陈少敏说：“你姓孙，什么事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很坚强的共产党员，我们并不打算争取你，只要你承认是共产党，今后不在天津活动就行了。你说话呀？”

“我没有什么说的。”陈少敏答道。

特务要她离开天津。她反驳说：“你们没有权力叫我走。”特务们气急败坏，声言要杀她。她轻蔑地说了声：“杀吧！”

整个下午的审问，特务们没有得到任何口供，只好把陈少敏送回班房。

不久，警察局提审陈少敏，有一个局长也参加听审。到小刘家搜查的那个特务上堂控告陈少敏是共产党，硬逼着陈少敏

承认，还很得意的说：“小吴是我们的人。”

陈少敏的回答还是那一套，特务们也拿不出其他证据。听审的局长看没有什么证据，认为是特务机关给警察局找麻烦，就宣布“退庭”。

后来，陈少敏被解送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军法处。在这里，她每天两次被审。但是，由于她坚不吐实，加上东北军中一些进步军官的同情和帮助，最后终于被释放^①。

当时和陈少敏关在一起的张桂英（现任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顾问）回忆说：“我和陈大姐关押在一起的这些时间里，大姐怕我年纪小，在法庭上顶不住敌人酷刑的折磨，就抓紧一切机会对我进行教育，她一再谆谆嘱咐我：‘小张同志，你可千万要顶住敌人的一切酷刑呀！’我说：‘大姐放心吧，我头可掉，血可流，共产党人的气节决不会丢！’大姐听了，满意地笑着说：‘我放心！’”^②

陈少敏出狱后，于一九三三年秋，被河北省委派往唐山任市委宣传部长。她一到唐山矿区，就“向着背负沉重煤炭的矿工们大力宣传，帮助他们认识受压迫被剥削的原因。她和工人们打成一片，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自己力量的认识，她把革命的思想传播到了工人们的心坎里。”^③

一九三四年三月，河北省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办一个油印小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特别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指导工人运动，并决定由陈少敏负责这一工作。陈少敏接

①陈少敏：《回忆天津党的活动情况》（1959年1月7日）。

②张桂英：《回忆陈少敏同志在天津的一些活动》（1982年3月13日）。

③康克清：《工运领袖陈少敏》，载《中国建设》1978年5月号。

受任务后，由唐山返回天津，在小白楼租了一间房子，购置了腊纸、钢板、油印机和纸张等物品。她和一起工作的赵仲研究并报请省委同意，把小报定名为《实话报》，五日出一期。一切筹备就绪后，由她负责组织稿件、画版面和印刷；赵仲刻写腊板，《实话报》很快就与读者见面。

天津当局发现《实话报》后，追查很严。陈少敏和赵仲商量，每次将印好的小报拿到三不管的地方分给卖报的小孩，每份卖一、二分钱。工人们见了都争着买，每期七、八百份，有时上千份，一下就卖光了。报童很喜欢卖这种报纸，警察也把小孩没办法，《实话报》继续出版，还配合斗争出过《罢工策略》专号。

陈少敏主办的《实话报》，对宣传党的政策，激励工人群众的斗志起了很大作用。上级党组织夸奖说：这个小报“内容丰富，油印精巧”^①，鼓舞了人民，打击了敌人。

这期间，党派陈少敏去济南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她到济南不久，便被国民党特务发觉了。两个特务死死跟着她，她借上厕所之便，化装成一个长辫子妇女，继续在街头行走。可是狡猾的特务随后又跟了上来。此时，她想到了在济南女子中学任教的同村老乡李成章，便大步进了女中。那时的女中有一个规矩，不经学校许可，外面的男人不许随便入内。所以，特务追到校门口，只好呆在外面监视。陈少敏找到李成章说明原委，李深明大义，让她留下躲避，还给了她十元大洋作生活费用。陈少敏在李成章的宿舍里又化装成一个老太婆，手拎包袱，大模大样地走出校门然后乘车去了。两个特务一直等到傍晚，没

^①陈少敏：《回忆天津党的活动情况》（1959年1月7日）。

见出来大辫子姑娘，便回去向特务机关报告。特务机关立即出动一批特务去女中找人，找不着又传讯李成章，李坚持不说真情，只好不了了之。而陈少敏却于第二天完成了联络任务，胜利地返回天津了。

九月，河北省委派陈少敏以妇女代表的身份到冀鲁豫边的沙区工作。这里以濮阳为中心，包括濮阳以南的两门、桑村，濮阳以西的千口、化村、井店，内黄以南的马集、张固、太平，以及滑县以北的齐村、邵村等地，其中内黄、滑县一些地方归河南省委领导，其余则归河北的冀南特委领导。由于是冀豫两省交界的“叉花地带”，敌人统治势力较弱，但土匪蜂起，“司令”遍地，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也特别残酷，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陈少敏来到后，积极开展工作。她在去各村进行串联，或到某地开会时，都在自己的行李包中夹带一些简单的药品和几本耶稣教的圣经，假扮医生和传教的教徒，掩护自己的革命身份。有时，她也化装成当地的农村妇女，与群众同吃同住。她用这种办法，在太平村先串联了十多位中年妇女积极分子，又通过她们去发动妇女群众。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她们讲述妇女翻身求解放的重要性，讲述穷人都是地主剥削穷了，根本不是命穷的道理。她们都把陈少敏看作亲姐妹，纷纷向她倾诉自己的苦痛。后来，陈少敏把她了解到的妇女受压迫的事实，编成革命歌曲，教给妇女们广泛传唱，进一步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鼓舞她们起来斗争。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的：

纺花车，哼又哼，
雪花落到当院中。
大人没衣穿，

孩子光吵冷，
都叫地主剥削穷。

穷人难，穷人难，
塌的窟窿大如天。
到麦天，要本钱，要利钱，
逼得穷人泪涟涟。

帝国主义、国民党，
剥削群众如豺狼，
咱们穷人团结起，
打倒这些狗豺狼^①。

一九三五年春，河南省委遭到破坏，河北省委指示，将卫河以南、黄河以北的三角地带改称冀鲁豫边区，并成立党的特委，陈少敏任特委组织部长（后任特委副书记）。为了工作之便，又在上述“叉花地带”建立濮、内、滑中心县委，王立人、张增敬先后任县委书记，陈少敏以特委代表身份参加县委的领导工作。沙区群众生活苦，普遍缺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和县委的同志决定，在太平、野庄、江村、次范等村建立“好人会”和“讨饭队”，组织贫苦农民向大户借粮，或趁黑夜武装抢收田里的庄稼。旧历年前，县委的同志曾带领几十个“讨饭队”和“好人会”的会员，到王告村向一户地主借了

^①陈少敏：《鱼水情深》（1959年在全国总工会谈话记录整理），载《燎原》第2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一批粮食，使贫苦农民每户分得二三十斤，让大家过了一个好年。

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和奴役人民，在冀鲁豫沙区建立了不少天主教堂，以传教之名，行破坏革命之实。陈少敏等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对教会破坏革命活动的斗争。

有一天，清丰县一个叫杨玉子的铁匠来千家村打铁，闲谈中说了句对教会不满的话，被教会头头知道了，把他叫进教堂，打得遍体鳞伤，还罚请客两桌，取保发誓不再说“坏话”才算了结。这件事，激起了群众极大义愤。

陈少敏抓住这个机会，发动党团员，组织了几百人的“叩头会”。一九三五年旧历正月十三，“叩头会”带领群众，潮水般地涌进教堂大院，拉出教会头头，进行说理斗争。在群众的强大声威和事实面前，教会头子只好低头认罪，向群众赔礼道歉，并退还了强占群众的财物。这一胜利使人民群众看到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他们在大街上鸣放鞭炮以示庆贺！

但是，狡猾的敌人却乘机向濮阳县反动当局告密，说共产党要组织农民暴动，女共产党员老方（陈少敏的化名）是指挥暴动的负责人。反动当局立时张榜悬赏通缉，并命令各地民团搜捕。一时间，濮阳城乡到处都传言要捉拿“共党女匪首大脚老方”。

党教育下的人民群众掩护了陈少敏。在敌人悬赏通缉的日子里，她饱食千家粗茶淡饭，身穿百家褴褛布衣，不仅没有被民团抓住，还照样开展工作。她到马家村，王秀花把自己纺线赚来的钱给她用；她到了化村，王秀芝、王宪荣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馍馍拿来给她吃，舍不得穿的布衫送给她穿；她到了千

村，张栋老汉嘱咐他的女儿云凤给她做袜子、做衣服。在觉悟群众的热心帮助下，她有时女扮男装，穿一件大棉袄，戴一顶三块扣的大风帽，蹬一双大沙鞋，在乡间奔波；有时又穿一件长大衫，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棍，象一个教书先生到四处活动。当她和党的干部在确河西岸三孔桥秘密开会时，群众主动送吃的、用的，邻近的妇女装成挖野菜、串亲戚、走娘家的样子，为他们站岗、放哨。这种情景，陈少敏一直难以忘怀，解放以后她回忆起来，仍然深情地说：“群众是水，我是鱼，只要不脱离人民群众这个汪洋大海，就能海阔任鱼跃。”^①

一九三五年冬，河北省委指示冀鲁豫特委，在大名、磁县、井店一带组建一个红军师，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陈少敏和王从吾、王立人、张增敬等坚决贯彻省委指示，立即发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军参战，很快就有一大批人报了名。有了人，没有枪怎么办呢？陈少敏和特委的几位同志商量，决定一方面筹划买一些，一方面组织力量从敌人手里夺，“夺取地主武装，建立工农武装”。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冀鲁豫沙区建立了一支拥有长枪三十支，短枪三支，扶把百十支，造枪所一处，三百多人的红色武装。后来，这支革命队伍，正式编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武装第四支队。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逐渐形成。斗争需要大批抗日干部，党组织决定派陈少敏到中央党校学习。不久，她来到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一天，组织上通知她去见毛泽东主席。她高兴地跑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毛泽东热情招呼她说：现在先派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徐特立同志要回湖

^①陈少敏：《鱼水情深》（1959年在全国总工会谈话记录整理）。

南工作，你假扮徐老夫人，送他到湖南后再回延安。开始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想到是党交的任务，便满口答应了。毛泽东叮嘱说：“陈少敏同志，你一定要扮得很象，象个贤妻良母的样子，要那样才能完成护送任务。”陈少敏爽快地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当她把徐老送到湖南自己又返回延安时，党中央领导同志赞扬了她，毛泽东、张闻天等亲自送她去中央党校学习。在党校欢迎新学员的开学典礼大会上，毛泽东特意对党校负责人说：“给你们送来个好学员，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陈少敏同志。”^①

陈少敏被分在党校第十二班。这个班的学员大多来自白区，他们有的搞工人运动，有的搞农民运动，有的搞学生运动，有的搞情报工作。她和大家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多次聆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的报告，对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党校十二班学员中，有一位中年同志叫涂正坤，原先是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他和妻子化装转移，途中妻子被敌人逮捕，随后与许多革命群众一起被敌人集体屠杀。陈少敏和涂正坤常在一起学习、讨论。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同样不幸的个人遭遇，把他们的感情紧紧连结在一起。学习结业时，他俩结婚了。

不久，党分配他们一起去南方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陈少敏在南方工作不久，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涂正坤的前妻在那次反动派的集体屠杀中并未牺牲，她从死人堆里爬

^①转引自魏晓松：《陈少敏在豫鄂边》，载《燎原》第4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出来，辗转到了延安，还给涂正坤写来了一封信。陈少敏接到这封信，又喜又愁。喜的是革命队伍又多了一个阶级姐妹；愁的是自己所处的困难处境。她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终于作出了抉择。她把信交到涂正坤手上，坦然地说：“俺已经想好啦！这位同志和你出生入死，现在又死里逃生，她更需要温暖，更需要爱情，更需要你的关怀。你快给她回信吧，咱俩马上办理离婚手续，俺这就回延安去，请组织上把她调来南方。”涂正坤用泪眼望着陈少敏，仍不知如何是好。陈少敏郑重地说：“你看，咱俩相处这么长时间，难道你还不了解俺？俺可不是在情人怀抱里成长的，俺是在党的怀抱里成长的，俺马上回延安，找党啊！”^①为了战友和同志的幸福，她甘愿自己忍受感情上的最大痛苦。这是多么高尚的革命情操和无产阶级的崇高品德啊！

领导抗日救亡

一九三七年底，党派陈少敏随曾山到江西建立省委。省委建立后，她担任妇女部长，并参加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的领导工作。为了开展妇女统战工作，她提出以抗日救国为中心任务，以爱国的先进妇女为骨干，争取一切愿意抗日的社会力量，把妇女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的工作部署。根据她的意见，妇女部选派大批优秀妇女干部，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四十多个县里动员组织了五十多万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陈少敏的名字在江西很快传开，进步妇女都对她怀着敬仰

^①转引自魏晓耘：《陈少敏在鄂豫边》。

之情。南昌市妇女生活改进会的女青年刘桂英和妇女干部潘玉梅，就曾慕名来访，她同她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她还以新四军办事处的名义，设宴招待了潘玉梅和雷洁琼教授^①。

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妇女运动的深入发展，陈少敏领导创办了江西的《妇声》双月刊，并为该刊撰写过重要文章，对全国妇女同胞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任务、要求和希望^②。不久，她利用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的地址，又举办了妇女干部训练班，聘请进步教授雷洁琼担任训练班第一、二期的班主任，选派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培训工作，她亲自给训练班讲授革命理论和妇女运动史等重要课程^③。

一九三八年五月，陈少敏奉命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洛阳特委书记。她在省委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举办教导大队，培训抗日干部。这些干部培训结束后分别派往各县开展工作，建立抗日游击队。陈少敏兼任了一支游击队的政治委员，直接领导抗日武装斗争。

武汉沦陷后，鄂豫地区的局面极为混乱。党中央决定派李先念和陈少敏分别率领一部分武装力量南下，到靠近武汉的鄂豫边区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创建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李先念率领一部分武装力量先行南下。随后，陈少敏又带两个连队 and 一部分从延安来的干部共二百余人，离开确山竹沟，经四望山，于六月六日到达鄂中安陆的赵家棚与李先念会师。这两支队伍和由陶铸、杨学诚等领导的当地武装部队一

①雷洁琼，燕京大学进步教授，应邀参加南昌市“妇政会”，并主持培训妇女干部的工作。

②③《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0年12月出版。

起，成为以后坚持和发展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

根据中央指示，由陈少敏担任鄂中区党委书记。六月十一日，区党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大山头召开会议，按照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关于“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以上的武装部队，以巩固我党在鄂中的领导地位”^①的指示，决定统一整编鄂豫边区及鄂中党所领导的武装，成立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十月一日，陈少敏到竹沟向中原局汇报鄂中工作，刘少奇听了后指出：“形势很好，要大发展。”^②此后，中原局作出决定，把鄂中、鄂东、天汉党的组织统一起来成立鄂豫边区党委，由陈少敏任书记。一九四〇年一月，又将鄂中、鄂东部队统一扩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至此，完成了边区党和武装力量的统一和整编工作。

边区的党和武装力量统一后，陈少敏根据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明确指出：“为了把中国人的子弹对准日寇射击，为了使中国人的部队集中抗日，不要把中国人的抗日力量消耗在自相残杀的战场上，我们一面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新四军，一面命令自己的部队忍痛向后撤退。只要各部队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愿意和任何抗日军队共同坚持敌后抗战，保卫边区抗日根据地。”^③她同时强调：“我们为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自然要采取一定限度的自卫战争，坚决抵抗反共军的进攻。”^④

一九三九年十月，陈少敏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一支队，

①见《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初稿）。

②陈少敏1960年5月9日谈话记录。

③④陈少敏：《艰苦奋斗的三年》，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由平汉线路东向路西挺进。夜经东双河时，由于我部军马受惊突然嘶叫，被东边的日寇岗哨发觉，随即开枪射击；在车站炮楼内的日本兵也打出照明弹，向我放枪。陈少敏一边指挥部队作好战斗准备，一边召集干部分析敌情，她说：日寇虽然敢在国民党军队面前逞凶，但害怕我新四军，特别是不敢同我进行夜战，所以，他躲在“乌龟壳”里乱放枪，不敢出来活动。我们先不理他，继续过河。部队按照她的部署继续西行。敌人等了一会见没有动静，一百多鬼子兵乘轻便火车向南探索前进。此刻，陈少敏命令部队隐蔽在铁路两旁的山上，待敌人火车回返时，乘机予以痛歼。根据指战员的建议，她决定由党团员带头组织一个突击队，准备近战伏击，速战歼敌。向南搜索的敌人没有发现我军踪影，遂在天亮之前乘车北返。当轻便火车进入我军埋伏地段时，陈少敏一声令下，指挥员率领部队一跃而上，一阵手榴弹轰隆爆响，打得敌人猝不及防，一百多鬼子兵全部被消灭。

在边区，伪军也是人民的一大祸害，李又唐部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有二千多人枪，仗势独霸一方，残害百姓，群众称之为黑匪。一次，陈少敏指挥我军攻打另一支日伪军时，李又唐趁机向我攻击。鉴于李又唐等坚持反共立场，陈少敏决定消灭这支日伪武装。九月二十一日，她命令我军一、三团和“应（城）抗（日）”一支队从京山大山头出发，猛扑应城杨家河、两河口李又唐伪匪巢穴。那天上午，大雾迷漫。我军在浓雾之中一面冲杀，一面开展政治攻势。战斗进行了两天一夜，李又唐怕被我军活捉，丢下部队仅带几个随从逃进了云梦县义堂镇敌伪据点。陈少敏指示我军按原计划留在五家山一带就地争取分化和围歼伪军。在我强大攻势下，该部除一个大队逃走

外，其余七个大队全部被歼，而我军则无一伤亡。

陈少敏等领导我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在狠狠打击日伪军的同时，还要同国民党反动派施展的反共阴谋进行斗争。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政府第五战区前敌指挥部通知我纵队司令部，要我们派负责干部去参加军事会议。

陈少敏认为，顽固派的突然“邀请”，决不是真心要召开抗击日寇的军事会议，不过是蒋介石指使他们搞的阴谋诡计。但为了表明我方团结抗日的诚意，她还是决定派王显周、丁文俊等前去参加。

会议的主持人声称，这是奉蒋介石之令召开的“反攻信阳的军事会议”^①，要求我军担负保护京汉铁路的任务，在北起两河口南至武胜关一带牵制和堵截日寇，“协同收复国土”。陈少敏听了王显周等的汇报后，立即洞察出顽固派的阴谋所在：他们想要我们把主力集中到铁路线上，好来个一网打尽。纵队首长同意陈少敏的分析，决定将我军主力向远离铁路线的应山一带转移，派孔化率一个中队到国民党指定的地区，相机对付。事实果然不出陈少敏所料，当孔化率队来到铁路线上时，国民党顽军即以预先设好的袋形包围阵势向我军发起猛烈进攻。陈少敏接到孔化送来的报告，当即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面目，同时命令我军主力对两河口的顽军坚决打击。在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我军击毙了顽军总指挥包刚。国民党阴谋败露，不敢公布实情，只好自欺欺人地说这是一场“误会”。陈少敏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给顽军以狠狠打击后，率领部队挺进鄂东，去

^①王显周：《新四军豫鄂边区挺进纵队的建立和发展》。

开辟新的抗日战场。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后，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兼副政委。由于部队流动性大，党委机关不便随军行动，因此，陈少敏主要肩负边区党委和地方政权建设的领导重任。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边区召开第一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陈少敏担任大会主席。在她的主持下，代表们着重讨论了区党委提出的《鄂豫边区施政纲领》（草案）。她向代表们详细解释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不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而实行二五减租的政策，希望代表们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拥护二五减租和党的各项政策。她的话浅显易懂，代表们听了心悦诚服，最后一致通过了施政纲领。

大会以后，陈少敏组织各级党政机关认真贯彻施政纲领，应城、京山、汉川、安陆等十多个县普遍实行了政权民选，参加选举的人数达三十万以上，使鄂豫边区得到进一步巩固。正如她在后来的一份总结中指出的：“边区的民主政权，经过一年的斗争，普遍地建立起来了，边区的根据地就成为有武装、有政权、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抗日根据地。”^①

陈少敏根据人民战争的思想，狠抓了边区人民武装的建设。她说：“单靠新四军这个力量，还不能给敌人致命的打击。要想粉碎敌人的新进攻、新掠夺，还必须要全民武装。”^②她明确提出：要“把全边区人民，组织到保卫家乡、保卫边区的斗争中来，每个保组织一个游击小组，一个自卫队，一个少

①陈少敏：《艰苦奋斗的三年》。

②陈少敏：《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先中队。”^①由于全民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配合了我新四军第五师主力部队对日伪顽的作战。

这期间，国民党对我抗日部队停发经费并实行经济封锁，给边区的财政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边区党委成立以陈少敏兼书记的财经委员会，学习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军队打仗保护老百姓，老百姓搞好生产支援战争”^②的口号，要求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用主要力量抓好财政、粮食和统战工作。在区党委领导下，边区的机关、部队、学校，上自党委书记、师长，下至每个干部、战士和老百姓，人人动手，大搞农副业生产。陈少敏带头开荒种菜。她赤脚下田，送肥拔草，为干部、战士树立了榜样。“陈大姐，种白菜，又肥又大人人爱”和“陈大姐的纺车响，一天纺四两”的歌谣，传遍鄂豫边区。

一九四二年，边区党委接到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的决定》后，立即成立了总学委会，开展整风学习。陈少敏为总学委委员，参与领导边区的整风运动。她深入部队了解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情况，对地方党组织的复杂成份进行了调查研究，联系边区实际，先后撰写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后》、《加强部队中干部的学习》、《在斗争中建设党》、《在斗争中整风》、《加强党性》等重要文章，正确地阐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整风、建党的指示精神，总结了边区建党建军的经验。在这些文章中，她强调“调查研究工作，是全部工作深入、工作转变、克服主观主义的关键。”^③“学习是培

①陈少敏：《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②陈少敏 1960年5月20日谈话记录。

③陈少敏：《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后》，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养干部的主要工作，是进步的基础，是克服错误的有力武器，要求我们的党政军全体干部加紧学习，造就出大批坚强的干部，去担负那很多的重大任务。”^①她号召大家向毛泽东学习。她说：“在长征的时候，毛泽东生着病，坐在担架上，叫人到处找书看，因为环境关系，自己的书报少，不够他看的，外面的报纸又找不到，所以逼的毛泽东同志叫通讯员、特务员到处找破字纸来看。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尚这样虚心学习。（这种）不自满求进步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②

针对封建主义毒素对我们党思想上的侵蚀和组织上的破坏，她提出：“改造党也必须是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从组织上改造，一方面从思想上改造，改造思想是治本的，改造成份是治标的。”^③她亲自带领四十多个干部深入农村支部，开展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推动了边区党的建设。当时的边区党委机关刊物《党的生活》曾发表文章，号召“各地地委、县委、区委要学习（区）党委陈少敏同志亲自深入支部的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领导支部党员举起自我批评的武器，毫不妥协地向它（指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引者）进行艰苦的斗争。如果边区成千成百的支部内展开这个艰苦的斗争，则我们的支部一定不断向着巩固的路上迈进！”^④

一九四四年初，为贯彻中央关于鄂豫“边区在反攻前的斗争方针以巩固为主，巩固工作当前的中心是首先把人民的大多

①陈少敏：《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后》，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②陈少敏：《加强部队中干部的学习》，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③陈少敏：《在斗争中建设党》，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④豪枫：《×支部的大脓疮开了刀》。

数组织起来”^①的指示，陈少敏带领党委机关干部，到礼南县安来乡抓点，并兼任该乡乡长。她发动群众从组织生产入手，在短短七天中，就把全乡十四个保的农救会组织起来了。在抓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乡、保政权，开展拥军活动，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战爱国教育。她说：要团结抗战，“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少一个仇人，少一堵墙。”^②只要是抗战，执行边区政府法令，不反对农救会，不论他是地主、富农、商人、士绅、流痞，农救会都要和这些人交朋友，大家团结起来打敌人，对破坏分子则决不能妥协，要坚决斗争。”^③区党委推广了陈少敏在安来乡抓点的经验，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边区召开了第一次农救代表大会，陈少敏被选为全区农救会主席。她代表边区党委作了《一年来农救工作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开展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全面具体地准备反攻等战斗任务。在她的主持下，制定了农救会斗争的纲领和农救会简章，发布了全边区准备大反攻的战斗宣言，为迎接大反攻，积极作好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准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少敏立即和李先念、郑位三等开会，讨论中央关于“五师集中主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的指示。五师各部队和边区所属各军分区的全体指战员，按照李先念、郑位三和陈少敏的命令，迅速向

①转引自《区党委关于赶紧组织人民大多数的指示信》（1944年2月17日）。

②③陈少敏：《团结起来生活，不怕天灾人祸》，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被敌伪盘踞的大小城镇、交通要道进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

中原突围前后

早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南征。陈少敏忙着布置扎彩门，贴标语，发动群众准备慰劳礼品，象迎接亲人一样的欢迎大军的到来。

八路军指战员早就听说过陈少敏的事迹，这次来到鄂豫边区耳闻目见，果然是一位名不虚传的巾帼英雄。有的指战员从群众送来的慰问袋中，取出边区生产的“女将军”牌香烟，久久凝视着印在烟盒上的跃马举枪的新四军女将军形象，都说这就是中原人民爱戴的“陈大姐”。于是，广大指战员对陈少敏更生敬佩之情！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南下支队和五师举行了会师大会。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在会上说：“新四军五师在李先念师长、郑位三政委和陈少敏同志的领导下，创立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你们功勋卓著，中外驰名，你们辛苦了！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们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①陈少敏代表边区党委在讲话中指出：“我们两军会师后力量壮大了，但是还要在此基础上更加壮大。”她指着台下老百姓送来的一篮篮红鸡蛋，风趣地说：“在我们这里，老百姓只有在生伢时才送红鸡蛋。你们看一看，今天群众挑来那么多红鸡蛋拥军，这是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多多地‘生伢’，大大地发

^①王首道：《忆南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展呀！”①

第二天，陈少敏和李先念、郑位三等，共同签署了《为庆祝大会师慰问八路军兄弟书》，再一次表达了鄂豫边区全体军民对八路军的真挚情谊。

在欢送八路军为解放江南人民继续南征时，陈少敏对王震说：我们一定遵照中央指示，发动边区人民积极支援你们。区党委决定，将边区积存的黄金全部拿出来，支援南下部队。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少敏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到处抢城掠地，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中央指示五师：“内战迫在眉睫，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应付内战。”②遵照这一指示，陈少敏一方面抓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同时对武汉外围的秘密工作也作了部署。

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中央又紧急指示王树声率领河南军区部队南下，命令王震、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北返。当李先念、陈少敏得知艰苦转战的南下支队全军指战员初冬季节还没有棉衣、棉被的情况后，立即作出决定：五师所有部队一律停发棉衣，把已经做好的新棉衣和被子，全部留给即将北返的南下支队指战员。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八路军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和新四军第五师三支大军在桐柏地区胜利会师。三十日，中

①王首道：《忆南征》。

②《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初稿）。

中央决定将原鄂豫皖中央局改建为中原局并成立中原军区。中原局以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王首道、王震为常委，郑位三代理书记，陈少敏担任组织部长。

中原解放区及其武装部队，是插入国民党反动派心脏的一把利刀。蒋介石为了发动全面内战，调集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连同地方武装共三十万人，在刘峙指挥下，不断向中原解放区进攻。

李先念，陈少敏等领导的中原军区部队，严格遵守国共双方停战协定，对国民党的挑衅一忍再忍，并按照中央指示，从一九四六年一月起，陆续向宣化店地区集中。蒋介石利令智昏，四月底亲自飞到汉口，直接谋划中原内战，阴谋突然袭击宣化店，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

党中央在揭露蒋介石内战阴谋的同时，决定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五月五日，周恩来来到宣化店，和中原局、中原军区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了什么时间转移、如何转移和转移时各部队的行动路线等问题。陈少敏还向周恩来汇报了边区党的工作以及动员群众为部队筹集粮食、鞋袜等情况。当她说到边区群众宁愿自己少吃，也要把粮食拿出来支援部队时，周恩来高兴得连连点头。

在紧张的转移准备阶段，陈少敏主要负责党务和群众工作，包括布置秘密工作、整顿组织、调整干部、安排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人员、组织干部撤退等等。她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夜以继日地忙碌着。眼睛熬红了，身体拖病了，仍然在拚命工作。李先念等十分关心她的健康和安安全全，曾考虑派人先送她撤走。她坚决不肯，说：不能为了个人的安全离开部队，就是死我也要和大家死在一起。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有一大批非战斗人员，其中县团以上干部就有两千余人，还有不少眷属。如让这些非战斗人员和眷属随军转移，不仅党的这一批宝贵财富可能蒙受损失，而且会牵累主力部队的作战。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陈少敏多次召集会议，想尽千方百计，把他们先送走。她把多数干部分成许多小组，让他们化装分散转移：把一批女同志和眷属组织起来，送往华北解放区，或通过武汉先到上海，再转往苏北解放区；有的则利用送伤病员的列车带出去；一部分高级干部，则坐军调处的飞机撤走。对一些来不及撤走的干部，她又采取沿途化装疏散隐蔽的办法，以减轻部队的压力。

为了给转移部队筹集粮食，陈少敏组织地方干部向群众一升一升的借。她还同张体学一起，仔细研究，部署了留下的一部分武装如何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的问题。“等到她离开时，已经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才能通过敌人的包围圈了。”^①

那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以六倍于我的兵力向宣化店地区大举围攻。全面内战开始了。蒋介石狂妄地宣称，要在四十八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我中原军区全体将士，“创造”什么“惊人的胜利和奇迹。”^②

我军主力在李先念、王震、陈少敏等指挥下，于六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奋勇突围，向西转移，粉碎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蒋介石又严令他的围攻部队对我追击，并调胡宗南部由陕南堵截，叫嚷要在七月二十日前，“于荆紫关以南地区，将李部包围歼灭”^③，“活捉李先念、王震、陈少敏等人”^④，并悬

①康克清：《工会领袖陈少敏》。

②见1946年10月5日《解放日报》报道。

③④见1946年8月1日《新华日报》报道。

赏一百万到二百万元，收买他们的人头。

我突围部队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加上山高路险，粮秣断绝，处境极为艰险。作为中原局副书记和中原军区副政委的陈少敏，既要和大家一起行军打仗，又担负着运筹指挥的繁重工作，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身边的战士们凑了一小把炒米给她煮了一小碗稀粥，她不喝，说“送给伤病员同志吧！”战士们搞了一副担架，要抬着她冲出重围，她挣扎着伸出一只手，说：“给我一支手枪，你们走吧！你们年轻，要留下来继续革命，不要让我连累了你们。”^①患病期间，她柱着一根树枝艰难地随军行进，依然充满着胜利的信心。部队强攻荆紫关时，在她的建议下，把剩下的一批干部编成两个干部团（四十一团、四十二团），和司令部的警卫团组成十四旅，即干部旅，由她直接指挥。经过艰苦转战，十四旅终于和主力一起突破敌人包围到了陕南，为党保存了大批有丰富经验的干部。

突围后，根据党的决定，陈少敏化装为串江湖的医生，于同年八月到了延安。康克清回忆说：“我第一次听到她的事迹是在延安的时候。她不仅有很强的组织才干，而且也具有和男同志一样指挥战斗的能力……。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当她回到延安时的情景来，那时她留着短发，穿一身男人的军装，她的这种打扮使我对她更为崇敬。”^②

陈少敏和随后到达延安的李先念、郑位三等，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举行了会议，总结五师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关于五师的工作，刘少奇在给陈少敏等的信中，曾给予充分的肯定，他

①马兆祥：《怀念陈少敏同志》，载《文史通讯》1981年第3期。

②康克清：《工会领袖陈少敏》。

说：“过去五师在十分困难的斗争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它完成了当时极为重要的牵制敌人的任务，他们损失是有代价的，正如在胜利的战斗中有损失一样，是光荣的。”^①毛泽东对中原突围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它“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继续起更大作用。”^②

中原突围到陕南的五师部队，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奉命北渡黄河到山西晋城休整。陈少敏在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之前，也东渡黄河到晋城与部队会合。随后，奉中央军委命令，将五师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由刘伯承、邓小平统率南下挺进大别山。在我军解放中原的伟大事业中，陈少敏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领导工会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青岛刚刚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解放出来，党中央即派陈少敏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那里主持工作。陈少敏到青岛后，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把眼睛“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她依靠工人阶级，教育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动员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积极搞好生产。她以当年做过工的纺织厂为试点，组织管理人员和工人代表商讨恢复和发展纺织生产的各项措施，向各工厂明确提出：“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废除侮辱工人的搜身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等口号，深得工人群众的拥护，大大

^①刘少奇给郑位三、李先念、戴季英、陈少敏、刘子久的信（1947年12月26日）。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03页。

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使这座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蹂躏的海滨城市，很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少敏奉命到北京筹备成立全国纺织工会。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陈少敏等四十九人为全国纺织工会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陈少敏为主任委员。她在总结报告中对“国营工厂管理民主化”等问题作了详细说明，再次强调指出搜身制度是侮辱工人人格的东西，必须坚决废除。同年三月，她在纺织工业部召开的全国国营纺织会议上发表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工厂管理民主化、合理调整工资、积累资金与完成国家生产任务等问题，号召与会代表要坚决拥护人民政府统一财政经济的一切措施，努力搞好生产，为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作出贡献。

在陈少敏的主持下，经过半年的积极筹备，中国纺织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〇年七月在北京举行。陈少敏向大会作了《关于半年来中国纺织工会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她指出：“组织生产竞赛是工会组织领导群众生产工作的基本方法。”^①会议选举陈少敏担任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为了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纺织工业，陈少敏在青岛、上海、天津、东北等地，组织纺织工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增产棉纱的号召。对于投机商人企图以囤积棉纱垄断市场的手段来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活动，他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坚决斗争，大力发展棉纱生产，粉碎

^①见1950年7月24日新华社报道。

了奸商的阴谋。她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经常和工人们在一起劳动，受到工人们的热情赞扬。她虽年过半百，身体又不好，但仍坚持学习纺织科学技术，在秘书和技术员的帮助下，每天都要读几小时书，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纺织生产的有关知识。

有一次，她从一位技术员送来的报表数字中，发现某车间违反生产规章制度擅自提高工人劳动强度，于是，她便把厂长找来进行严肃的批评。陈少敏的业务知识使那位技术员大为惊讶。事后，那位技术员问厂长：“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①

陈少敏领导纺织工会，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使纺织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人民政府给纺织工会四万元奖金。根据陈少敏的提议，这笔奖金用来为纺织工人修建了一座疗养院，她还亲自参加了疗养院的设计和修建工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陈少敏主持召开了全国纺织工业会议。她在向大会的报告中，就增产节约及推行新工作法两个重大问题，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批评了某些保守思想及严重的浪费现象，给到会代表以极大的启发和鼓励，各地代表随即开展节约用棉的友谊挑战。会后，在全国纺织工业战线上，掀起了增产节约和推行新工作法的高潮。

陈少敏获悉青岛纺织厂女工郝建秀的先进事迹后，立即派技术人员帮助她对其工作方法进行科学总结。经陈少敏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广，不仅使郝建秀工作法在纺织工业中发挥了重

^①康克清：《工会领袖陈少敏》。

要作用，一年之中就为国家增产了四万包优质棉纱；而且涌现出一大批新的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她亲自培养的郝建秀小组，一直是纺织工业战线上的先进标兵。为了使郝建秀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为纺织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陈少敏和郝建秀所在的国棉六厂的党组织研究决定，保送她到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速成中学学习，毕业后又进华东纺织工学院深造。

建国初期，陈少敏还为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增加工人的福利，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的纺织女工们，每当想到她们在生产条件方面的今昔变化以及诸如享受保健、工厂幼儿园和托儿所、工间喂奶等等各种福利的时候，她们总不免要想到为她们创办这些条件的陈大姐”^①。

一九五四年九月，陈少敏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在会上就工会工作发表讲话，阐明了党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党同工人群众的血肉关系，以及工会的主要任务。她说：“工会是共产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是人民政府的支柱。”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广大职工群众的政治、文化和技术教育，引导他们切实地遵守宪法、遵守劳动纪律，积极地参加企业管理，深入地开展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厉行节约，增加生产，保证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集中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

陈少敏坚决反对脱离工人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她自己处处以普通劳动者要求自己，生活仍和战争年代一样简朴，从不允许别人对她搞特殊照顾。在食堂吃饭，她和大家一起排队。

^①康克清：《工会领袖陈少敏》。

后来，她还把积蓄的一部分工资拿出来，支援家乡人民搞基本建设。

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少敏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又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为社会主义时期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继续战斗。

一九五八年以后，陈少敏因身体不好，医生建议休息，但她仍带病坚持工作。三年困难时期，医生一再要她住院治疗，她却很少考虑自己的病痛，一直悬念着人民的疾苦。一九六二年，她坚持要到鄂豫边老革命根据地去搞调查研究。她带着氧气瓶，拖着胸背上着钢架的病体来到武汉时，许多老战友和老部下见了，无不为之动情。然而，她却象没事一样，约了几位同志一起继续上路，到老苏区去看看战争年代同甘共苦的乡亲们。在老苏区，她每到一地，都是很远就下了汽车，然后慢慢步行进村。在一个山头小集镇，她向一位正在做买卖的老大爷打招呼。那老人抬头认出是陈少敏，情不自禁地高声喊道：

“陈大姐来了！陈大姐来了！”周围的群众一下子向她的身边拥来。随从人员怕不安全，想把大家挡住，她连忙制止说：别挡了，我就是来看大家的，等会儿还要和大家一起开个座谈会呢。后来，她对随行人员说：过去我们与群众同甘共苦，亲密无间，我们就战胜了敌人；今天我当了中央委员，为什么要同群众分开呢？短短几句话，使在场的同志很受教育。

在黄陂访问时，陈少敏听说干部搞强迫命令，弄虚作假，高指标、高征购，以致群众没有饭吃。然而，县里的某些领导人却用丰盛的酒席招待她。她一见桌上的酒菜，扭头就走，并把县委负责人找来批评道：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国民党的官僚，现在群众没有饭吃，你们不去关心群众，却来招待

我。你们这样搞，群众不骂共产党才怪呢！此后，接待单位都按照她的吩咐，一餐吃一个菜，或按医生的建议，另加半个鸡蛋。

陈少敏在大悟县调查访问期间，特地回到了她曾经兼任过实验乡乡长的安来乡（今芳畈公社）。她把原来的乡干部和群众代表召集在一起说：“今天我们再来开个乡干部会，请大家谈谈，有什么困难，怎么解决。”她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大家一起总结了农村工作的经验教训，要求大家发扬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努力克服“左”的错误造成的暂时困难。她听说这里的群众穿衣困难又很少种植棉花，就鼓励大家多种棉花，她说：“你们干部带头，在房前屋后都种棉花，今年每人做一件棉衣。”^①

一九六三年后，陈少敏的肾脏、心脏病恶化，除带病坚持全总日常工作外，主要采取按摩治疗。一九六四年秋，她感到身体好多了，便带着工作人员，去青岛国棉六厂和大英烟草公司进行调查研究。

一九六四年冬到一九六五年春，陈少敏奉派到山东曲阜地区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这期间，她虽然在总的方面也贯彻了中央当时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工作中，她仍然坚持要实事求是。东郭庄大队党支部委员、著名劳动模范郭守明，被工作队打成“坏干部”、“假劳模”而遭撤职、批斗，一时轰动山东全省。陈少敏花了很大气力调查研究，证明这是一起错案。她带上材料上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去兖州找省委书记商量，回曲阜对工作队领导人进行说

^①见屠忠琳随陈大姐访问老苏区谈话笔记。

服，终于使这一错案得到平反。当陈少敏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平反决定时，郭守明十分激动，“没说几句话就哭了。”^①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陈少敏遭到江青、康生一伙的迫害，被诬为“有预谋有组织的叛徒集团”成员、刘少奇在华中根据地的代理人之一，经受了无数次的围攻和批斗。但她始终坚毅刚强，宁折不弯，为捍卫真理而同邪恶势力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她坚信“刘少奇没有什么问题”。当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她伏在桌上根本未予理睬。会后，康生问她为什么不举手，她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我的权利！”为此，她遭到更残酷的迫害，被赶出北京，送到河南罗山劳动。她后来回忆说：到罗山后，“我的心脏病发作，关节炎引起半身不遂，乡下缺医少药，只好去住信阳铁路医院。在医院里，多亏得到原来那个跟我做警卫员的李开元同志的照顾，‘九·一三’事件后我才回到北京。”^②

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江青一伙还在台上表演。陈少敏意识到斗争还没有结束，但她相信党和人民一定胜利。她对一位在一个雷雨天来看望她的老战友说：“党内还会出现象刚才刮来的狂风暴雨，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坚持真理，永不屈服，自己的言行要对党，对群众，对国家负责到底，千万不能犯软骨病！”^③陈少敏就是敢于向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的硬骨头。她和全国人民一道，终于迎来了粉碎江青

① 《陈少敏日记》。

②③转引自宁准：《回忆陈少敏大姐片断》，1982年6月5日《解放军报》。

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正当她满怀喜悦地准备继续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时候，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魔夺走了她的生命，终年七十五岁。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青岛革命史稿》，中共青岛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1982 年 6 月编印。
2. 《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
3. 《党在湖北革命斗争史资料》第 5 分册，1961 年编印。
4. 《战斗在鄂豫边区》（回忆录之一、之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5. 王首道：《忆南征》，人民出版社出版。
6. 陈少敏的文章、报告、书信、回忆录等共 50 篇。
7. 《陈少敏的日记》。
8. 张子元、赵秀兰、张桂英、康克清、江仲华、汪立波、周志坚、王显周、王海山、豪枫、马兆祥、朱明达、徐觉非、任子衡、宁淮、郝建秀、郝世君、宗宝来、陈卫平、徐杰等同志的回忆文章和访问记录。

黄 爱

唐振南 田余粮

黄爱是湖南劳工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一九二二年一月，壮烈牺牲在军阀赵恒惕的屠刀下，他和庞人钰是中国最早为无产阶级奋斗而死难的先烈。

(一)

黄爱，字正品，号建中，生于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湖南常德人。父亲黄一尘，是个乡村知识分子，有四子一女，黄爱是最小的一个儿子。父亲虽有几亩田产，生活并不宽裕，但总想让聪颖伶俐的黄爱多读点书，以图将来有所作为。

黄爱七岁时，在常德县第四小学校启蒙。其后，家境日益穷困，待到他小学毕业时，父亲已无钱供他继续升学，遂被送到一家商店当学徒。

黄爱辍学后，仍然一心向往着进学校读书。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他给在热河政界做事的二哥黄瑞清写了一信，说：

“我幸受了二十世纪的小学教育，稍明白了一点事，如何肯就此罢休？况且营商是专门牟利的，充其量弄得个衣丰食足，独善其身罢了。是这样人生有什么价值？现在深入其境，目经商场的一切鬼怪现象，尤其一刻难过，又如何能终身从事此道呢？家庭不是不许我继续求学，只不过是经济上不可能，只要你

能应我最低限的经费，我情愿去做一个苦学生。”^①从这封信可以看到，少年时期的黄爱，就已经认定人生的价值决不是独善其身。他对商场里唯利是图的现象深恶痛绝，渴望继续求学，追求真理，是一个有理想、有志气、有热血的少年。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他的二哥。依靠二哥的接济，他得到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一九一三年丹桂飘香的时候，十六岁的黄爱背着简单行装来到长沙，考入了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他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入学后，刻苦勤奋，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学业上，不管是严寒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天，总是如饥似渴地埋头苦读。四年以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湖南电灯公司当技术工人。在工作中，他踏实苦干，勤于实验，获得了工人们赞许。该公司的长沙电流分配全图，就是他反复实测绘成的。但他并不满足，仍想进一步深造。在电灯公司干了一年多时间，便决心离开工厂，前往京、津一带，继续寻找读书的机会。

一九一九年春，黄爱插班考入了天津高等工业学校。不久，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黄爱和天津爱国青年闻讯涌上街头，支持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五月十四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黄爱参加了学联会执行部的工作，担任周恩来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他办报观点鲜明，反帝态度坚决，工作又能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常常得到学联干事和评议员们的好评。

八月间，山东镇守使马良残酷地镇压人民、枪杀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等的暴行，激起了山东和华北各省人民的公愤，

^①转引自翦去疾：《黄爱、庞人铨事略》，见1922年《血钟》“五一增刊”。

不少地方纷纷派代表进京请愿。黄爱是天津学生第二次请愿代表之一。二十六日，北京学生会同天津请愿代表共三四千人，浩浩荡荡向北洋政府总统府进发，在新华门前被军警包围，露宿三天，饮食断绝，部分代表遭逮捕。黄爱因中暑下痢非常厉害，到京后即被送往朋友处调养，才未遭反动军警的毒打和拘捕。后来他每跟同学谈及此次请愿时，常以自己未能同军阀走狗直接搏斗而引为憾事。

请愿失败后，天津学生界普遍有了新的觉醒，开始认识到，要爱国，就要推翻封建军阀统治，改造社会。但怎样改造，主张则多种多样。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认为，专向政府作温和的请愿是一件傻事，主张作激烈的斗争。他们打算组织“牺牲十人团”，以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团的名义，带着“最激烈否认北京政府”的传单到总统府门前散发，准备让政府枪毙，以流血来唤醒人民，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此时的黄爱，极端痛恨强权，思想激进，是提倡这种主张中的一个，是“牺牲十人团”成员之一。后来由于天津各界联合会的阻拦，才使他们的打算没有实行。另一种观点认为，要根本改造社会，必须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周恩来、邓颖超、谌志笃、郭隆真等人就是这种主张的中坚力量。为了实行唤醒民众觉悟的主张，他们在天津学联办公室成立了革命团体觉悟社。黄爱虽然不是觉悟社成员，但他反帝、反军阀、要革命、不畏艰险等基本点与觉悟社成员是相通的，所以他与觉悟社社员之间关系较为密切，尤其与周恩来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被认为是觉悟社的社友^①。

^①1977年9月胡华等访问谌小岑谈话记录。

九月底，天津各界联合会联络各省区代表为山东问题发动第三次请愿。十月一日，天津、南京、武汉、河南、湖南等七个省区代表三十二人，又齐集于北京，强烈要求北洋政府严惩镇压爱国运动的山东军阀马良。黄爱又以天津学生联合会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斗争。他与各地代表在新华门前伫立了一天。总统徐世昌闭门不出，拒不接见，却在当晚十点钟，出动军警百余人，逮捕了全体代表。黄爱被捕后，在狱中仍积极进行活动。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不怕死的勇气，深为同学们钦佩。正义战胜了强权，在各地人民的声援下，三十八天后，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他们。当他回到天津时，学校当局假借他旷课太多，予以除名。坐牢、失学，并没有扑灭他的革命意志，倒增加了他奋斗的精神。从此，他立志弃学，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〇年初春，他离开天津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加入了工读互助团。不久，他又请李大钊介绍，由北京赴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并在《新青年》杂志社替陈独秀做缮写、校对工作。在上海期间，黄爱耳闻目睹社会的腐败现象，进一步激发了他对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军阀的痛恨。此时，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在报刊上时有介绍，马克思主义已有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正在深入。黄爱密切注视这些情况和动向，在陈独秀影响下，开始注意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又取得陈独秀的赞助，决意回湖南身体力行地去从事劳工运动，准备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一条改造社会的道路来。这时，他恰巧连续接到父亲和哥哥催其归家的来信。六月的一天，他离开上海，经南京、汉口回到家乡——常德，九月中旬又来到长沙。在长沙，黄爱走访了毛泽东、何叔衡。在何叔衡的赞赏和支持下，他在《通俗日报》上发表了《告工友书》一

文，并立即与志同道合的同学、老友庞人铨等，进行创建湖南劳工会的准备工作。

(二)

五四时期的黄爱是坚决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主义者。他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强权政治极端仇恨，对压迫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深恶痛绝，对欧洲资产阶级启蒙学家鼓吹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非常向往，对先辈们曾经描绘过的“太平盛世”、“大同世界”梦寐以求。然而究竟怎样达到理想的境地，究竟用什么思想指导工人运动，他仍是茫然无知，正处在摸索之中。

五四时期各种思潮和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等，就象打开了闸门，潮水般地涌进中国。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而造成的长期与外界隔绝的中国青年，对于这些舶来品均视为新鲜东西，什么书都看，什么学说都去接触。黄爱也和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把各种学说都取来学习，兼收并蓄。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较早，流行很广，它标榜反对剥削，主张实行共产，反对专制政府，鼓吹绝对自由，很适合充满革命狂热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胃口。而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尚没有与工人相结合，没有工运经验的知识分子难以理解。黄爱在浏览各种思潮学说时，有一段时间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较感兴趣，接受了某些无政府主义观点，并体现在他最初从事工人运动、组织湖南劳工会的活动中。黄爱是湖南真正的劳工团体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他当过机械

工，对工人疾苦比较了解。当年湖南工人每日劳动十二小时以上，有的长达十六小时。而工人工资却微乎其微，矿工每日工资合铜元二十七枚，纱厂拣花工只合二十枚，根本不够养活自己。而这点微薄工资，也往往是不值钱或不兑现的“官票”、“乌票”和“市票”，变成一堆废纸。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广大工人要求团结起来，进行反抗，“劳工团结”、“劳工神圣”成为工人们的普遍口号。黄爱、庞人铨等顺应工人的要求，立志发起创立“本着心思体力的本能用在技术上，而能得生产的结果的劳工”组织^①。黄爱为创建这样的组织四处奔波。经过他艰苦努力，终于克服军阀政府、资本家及各方的层层阻挠，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省教育会坪正式成立了湖南劳工会。在成立大会上，黄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本会纯是自动的组织，打破领袖和男女界限的”工人团体。劳工会的成员，决心“本着坚韧不拔的精神，自觉自决，朝着光明的路上走去”^②。会议通过了劳工会简章，选举了各部主任和评议员若干人。劳工会设有评议、教育、出版、交际、调查、介绍、俱乐、会计八部。黄爱任教育部主任，庞人铨任出版部主任。他俩均为驻会干事。

此时，黄爱生活非常艰苦，有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但在湖南劳工会成立时，他与庞人铨把身边仅有的二百八十文铜钱，全部拿出来作为劳工会的资金。后来，人们赞誉这种艰苦创业精神，称劳工会为“二百八十文起家的劳工会”。

湖南劳工会会址，在皇仓街惟楚化学社。会徽是：在红底

①《我们的账》，载《黄庞三周年纪念册》，1925年1月出版。

②1920年11月22日湖南《大公报》。

中心画着地球，地球上重叠着“劳工”两字，象征着地球的主人是劳工，在红色的道路上要实现全世界工人的大团结。

湖南劳工会成立之初，会员多是甲种工业学校、楚怡工业学校、第一职业学校等技校的毕业生。在斗争中，随着劳工会威信的提高，第一纱厂、造币厂、黑铅炼厂和土木、缝纫、理发、建筑等行业工人也逐渐加入。甚至一些封建把头、监工、手工业主，在反对华实公司垄断第一纱厂的洪流里也混进来了。到一九二二年一月第一纱厂举行罢工时，会员达三千人左右。不仅会员成份复杂，而且领头人观点极不一致。黄爱、庞人铨虽沾有无政府主义观点，但终究是纯洁、正直、勇敢的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青年，王光辉、谌小岑当时则相信无政府主义。由于会员复杂，领头人观点认识不一，组织又不严密，这就为尔后劳工会的分化种下了祸根。

劳工会成立后进行的第一个重大活动，是收回湖南第一纱厂公有运动。湖南第一纱厂位于长沙湘江西畔的银盆岭下，是一九一三年从湖南银行提拨二百余万元筹建的公办企业，后被军阀谭延闿将该厂股权承租给湘商华实公司。一九二〇年，赵恒惕上台，又接受华实公司贿赂股本五万元，继续承认其承租权利。华实公司因无力单独经营，又将其中部分股权，转租给湖北资本家赵子安，并由赵任经理，从湖北招募工人。湖南地方工商业家早已不满华实公司的垄断，即以华实资本不足为由，主张取消华实租约，另招湘股。当劳工会发起纱厂收归公有运动时，他们也极力赞助，企图借用工人力量，打破华实公司的垄断，继则取而代之。

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黄爱等十人被湖南劳工会会员推为收回纱厂公有运动代表。八日，黄爱等发表“反对纱厂商办”

宣言，指出：“湖南三千万人的膏脂兑来的第一纱厂，完全的利益都归到几个商人的荷包”，我们“誓死反对”。宣言质问赵恒惕为什么将湖南三千万人“唯一的生产机关”，“轻轻的拱手送掉”？质问承租第一纱厂的华实公司，为什么把湖南人民共有的一个生产机关，“硬要掠夺去”？并表示：“无论何人，纵有吃人不见血的手段，我们总有最后对付的方法”。宣言要求赵恒惕省政府立即取消同华实公司的租约，由“湖南三千万人里面推出有工业技术的人管理”^①之。

“反对纱厂商办”宣言发布后，省长公署恼羞成怒。他们一面打电报给纱厂经理赵子安，说“纱厂急待开工，请驾速莅，湘劳工会无理取闹，即行制止”^②。一面发出训令，对劳工会恫吓说：“纱厂事业，为吾湘一线生机，既不使丧失主权，复不容借词破坏”^③，“近查有劳工会代表黄剑白、庞人铨、王光辉、黄爱……等发布传单，出名反对，殊属不合”；“该劳工会代表等，不得借端阻挠，倘敢故违，定即查拿究办，决不姑容”^④。省长公署还以“过激党”、“受人利用”的帽子加在劳工会头上；复又拢络政客、绅商组织“调解委员会”，企图诱使劳工会妥协。

黄爱等劳工会领导人，不为军阀压力所屈服，三月十六日起草了劳工会呈文，指出湘省工业“决不容少数商人垄断”，恳请“取消华实公司承租契约，收回纱厂公办”^⑤。十八日，劳工会又发表宣言，列举华实公司“（一）垄断利权；（二）妨

①1921年3月9日湖南《大公报》。

②④1921年3月14日湖南《大公报》。

③1921年3月13日湖南《大公报》。

⑤1921年3月16日湖南《大公报》。

害金融；（三）违约招股；（四）违约用人；（五）不用女工；（六）丧失主权；（七）违约接收；（八）暗阻湘股；（九）苛待湘人；（十）绝无天良”^①的十大罪状。二十日，劳工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中黄爱登台演讲，说“我们这回游街的宗旨，无非在收回纱厂的利权”；并誓言“非达到收回这个厂利权的目的不放手”^②。当时，湖南《大公报》充当赵恒惕的喉舌，攻击收回纱厂公有运动。黄爱等又向报界发表声明，进行反击。声明宣布劳工会“对于华实，非专为用人问题，系志在打破其资本家的专利行为”，“工会全体之反对华实，系为湖南全体人民着想，绝不受人利用，且绝无主使之入”，“劳工会主张纱厂公办，绝对不是官办”，“无论各方压力如何，工界人等决不退缩，必达到与华实解约为止”^③。

四月十三日，劳工会鉴于赵恒惕及华实公司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愤而约集长沙各工厂工人及各工校学生近三千人，到第一纱厂示威，迫令华实公司毁约。工人、学生抵厂后即将各门把守，包围纱厂办公室，质问经理赵子安：“汝欲安全返鄂，还是欲办湖南纱厂？”赵子安慑于群众威力，只得承诺“不办湖南纱厂”，并当众扯毁华实之经理聘约和出具“不办湖南纱厂”的自愿书。华实公司副经理向森、董事彭祖植也被迫立誓：“决计不承租湖南三千万人民的第一纱厂。如敢再违，任凭湖南工界打死无论”^④。随后，愤怒的群众押着赵、向、彭等人到湖南省财政厅毁约。赵恒惕闻讯，即派军警数百

①1921年3月18日湖南《大公报》。

②1921年3月21日湖南《大公报》。

③1921年3月25日湖南《大公报》。

④1921年4月14日湖南《大公报》。

人驱散示威群众，当场捕去劳工代表四人，同时派兵一排驻扎纱厂，通令工人上工。反动当局还应华实公司的请求，到处捕捉黄爱等劳工会领导人。二十八日，黄爱等被捕入狱。

此时，原来参与反对华实公司垄断纱厂利益的绅商眼看劳工会遭受挫折，无利可图，转而与华实公司妥协，以求利益均沾。劳工会的工人群众和黄爱等则继续奋斗。黄爱早有牺牲一己以殉纱厂问题解决的坚强意志。五月一日，他在狱中开始了绝食斗争，并下定决心：“我的生命，终必为劳动运动一死”^①。他身系图圜，心怀劳工会，时刻关心着劳工会的工作和五一节的活动。同日，他在狱中写信给庞人铨等会员说：“游艺大会今天举行了么？念念。”“现在会中一切事情很盼望你们竭力维持”^②。他叮嘱战友对于纱厂问题，宁肯奋斗而死，不可趋于投降式的和约，即使保不住劳工会，也在所不惜。

黄爱被捕后，庞人铨组织劳工会会员到处宣传控诉、揭露赵恒惕的罪恶行径，并派出代表质问赵氏。赵恒惕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乃于六月八日将黄爱等人释放。那天，数千工人、学生都去欢迎。黄爱当场演讲：我们“入狱出狱不算什么，此次湖南纱厂公有问题，不过是放起码炮的运动。来日方长”，我们“光明而且伟大的事业，正赖努力”。他提醒大家，“不特要注意现在军阀、财阀打成一片；且当防范绅阔之专横，阻碍社会进步。至此以后纱厂问题，如果不得公允解决，专为少数人所垄断，于大多数生产者无丝毫利益，则将来湖南社会革命，难免不以纱厂问题为起点”^③！黄爱的演说，表达了他坚定的斗争意

①1922年3月23日北京《晨报》副刊。

②黄芝岗：《黄庞二先烈和湖南劳工会》（1962年4月）。

③1921年6月10日湖南《大公报》。

志和对斗争前途充满信心。也说明了他开始觉悟到受了绅商的欺骗，被绅商所利用；初步认识到军阀、财阀是勾结在一起的，要反对华实公司的垄断，必须首先反对赵恒惕军阀政府继续承认华实的经营权利。

黄爱出狱后，华实公司曾托人向黄、庞试探，愿以每月薪金三百元，聘他俩为“高等顾问”。面对金钱的利诱，黄爱诙谐地说：“殊不知我们只有干劳工运动的命，却不希罕享做‘高等顾问’的福”。华实公司仍不死心，见劳工会经济困难，又指使董事陈友梧向黄爱表示：“我愿意捐助五百元，做一个名誉会员。”黄爱冷笑道：“入会并不娶会金，五百元大款，不愿承受。且君等非工人，请加入其他冒牌的工会吧！”^①

收回纱厂公有运动归于失败，但黄爱等领导的劳工会反对华实公司及赵恒惕军阀政府的斗争并未结束。黄爱说：“从前敌人方面向本会要求条件上的妥协，这是诱骗的行为本会没有承认。因为我们很知道劳资两阶级不容许有调和的余地”^②。黄爱、庞人铨等坚信：“湖南永远会要落在我们工人手里”^③。

(三)

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就能更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黄爱从惨痛的失败中猛醒过来，认真地清理指导

①湖南《劳工周刊》（1922年2月17日）。

②《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

③《湖南印刷工会成立纪事》，载《劳动佳节》，1921年5月1日。

思想上的错误。他在狱中时，就曾写信给庞人铨：要“趁着这个安闲，好好的把思想组织起来，着笔做几篇文章”，要“多看几本书，救救知识的饥荒”^①。他从亲身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是不可分的，政治斗争是取得经济斗争胜利的前提。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怀疑增长了，对马克思主义亲近了。他渴望马克思主义者的帮助，经常主动向当时在长沙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劳工会的活动情况，争取他们的指导。

毛泽东、何叔衡也非常重视和关心劳工会。因为当年长沙有产业、手工业工人七千余人均在劳工会的影响之下，其中三千人左右参加了劳工会。虽然劳工会成员复杂，但真正的工人群众是绝大多数，又有象黄爱、庞人铨这样纯洁的青年做领导，争取劳工会，把他们的工运活动引上正轨，是很必要的。于是，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把注意力放在劳工会，对其中的先进分子，重点培养，紧紧依靠。他多次找黄爱等人谈心，热情赞扬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军阀的勇敢精神，耐心帮助他们分析“纱厂风潮”失败的原因，对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政治目标的工人运动方针进行了批评。同时，还经常选送马列主义书刊给他们看，使他们懂得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教育工人，指导行动。一九二一年，毛泽东还特邀黄爱、张理全去安源，考察安源工人的生活状况和要求。他除了自己经常帮助、教育劳工会的骨干成员，还指定中共党员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同黄、庞的关系时说：“在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并且通过协商，阻止

^①黄芝岗：《黄庞二先烈和湖南劳工会》（1962年4月）。

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①。

劳工会成立周年时，毛泽东在《劳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②，肯定了劳工会取得的成绩，指出：“劳工会这一年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开始写第二页了。我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鲜明，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完备”。文章针对劳工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赢得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胜利，“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工会组织要有民主产生的全权办事机构，劳工会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甚不妥当。三是为加强工人对工会的组织观念和工人自己养活工会，准备罢工基金及选举基金，必须缴纳最低限度的会费。文章最后以“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③等马克思主义的口号，鼓励劳工会会员进行新的战斗。

在毛泽东等的耐心帮助、教育下，黄爱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飞跃。他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写的《劳工周刊》发刊词中就鲜明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发刊词公开声明主办《劳工周刊》的“目的是促进劳工们‘阶级斗争’的觉悟；鼓吹‘劳动组合’”，它“完全是为着被掠夺而过非人生活的劳工们说话，绝对的反抗资本阶级的压迫”；“绝对的防止‘地

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②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

③黄芝岗：《黄陂二先烈和湖南劳工会》（1962年4月）。

域’‘帮口’的谬说的流传”。“总之，我们是为人类大多数的劳工们谋最大的幸福”^①。黄爱等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改组了劳工会，把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由这三个部的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黄爱任书记部委员，庞人铨任教育部委员，张理全任组织部委员。黄爱还敦请毛泽东助理会务，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改组了基层组织。黄爱在《敬告本会员诸君》一文中说：“‘小组织大联合’是我们工人准备向资产阶级作战第一步的计划，这是工人人人都应该有这怀抱的”。“此后应兴革的地方虽多，究之，各工团成立工会，要算是唯一的、最大的、紧急的事体”^②。于是，黄爱等领导劳工会内各工团，按照产业或行业联合的原则进行改组，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会员也交会费了。

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帮助，黄爱在总结自己从事工运的惨痛教训中，洗刷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等思想影响，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并于一九二一年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劳工会也曾一度变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团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黄爱入团时，曾庄严地宣告：“我现在觉得我的前途有无限光明”！“我决定洒我的热血，作第一个牺牲者，去换得自由来。将来世界都能享着自由，这不是我最大的希望么！”^③从此，黄爱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英勇战斗在湖南的政治舞台上。

① 1921年10月22日湖南《劳工周刊》。

② 1922年1月13日湖南《劳工周刊》。

③ 1922年3月4日湖南《劳工周刊》。

(四)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太平洋会议。与此同时，列宁在莫斯科筹备组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做好赴莫斯科代表的选派工作，中共湖南支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一方面与黄爱等劳工会领导人协商，要湖南劳工会派出代表随同各革命团体代表团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另一方面，建议由劳工会出面，发起反对太平洋会议的游行示威。黄爱按照中共湖南支部的意见，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

十二月二十五日，长沙举行了有土木、机械、纺织、印刷、理发、第一纱厂、黑铅炼厂、造币厂、铁路工人等十八个团体八九千人参加的反对太平洋会议的集会和游行。黄爱任大会主席，庞人铨任游行示威的总指挥。会上，黄爱报告了太平洋会议的由来以及工人对于太平洋会议应采取的态度和应有的觉悟。他说：“今日是我们工友们反对太平洋会议的游行大会，很能够使我们对于工界的将来，极抱乐观。不过，那万恶的太平洋会议，准备实行国际资本主义的太平洋会议，我们固然要竭力反对。万恶的资本家，万恶的资本家政府，我们也一样要竭力反对。我们不但要把我们湖南的劳工团体，坚强地团结起来，我们更要联合全世界的全劳动阶级，准备实行全世界的大革命”^①！大会揭露太平洋会议是强盗分赃会议，喊出了“打

^①翦去病：《黄爱、庞人铨事略》，载1922年《血钟》“五一增刊”。

倒帝国主义”、“打倒国际资本主义”、“我们的朋友在俄国”、“世界是工人的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身先士卒向资本主义总攻击”等口号。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黄爱英姿勃勃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亲自率领大队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据当日记者报道，“他们那种震地惊天、掀波撼岳的高叫，实在很可以表现湖南民族的刚毅伟大的精神呵！他们那雪片似的传单，不下三十余种，二十万份，飞布全城。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会议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①。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这次集会和游行示威表明，黄爱及其领导下的湖南劳工会，已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跳出了只作经济斗争的小圈子。黄爱还曾积极支持长沙理发工人、泥木工人、湘鄂印刷局工人的罢工斗争，成为湖南早期工人运动的积极领导者。黄爱等领导的工人运动，狠狠打击了长沙的资本家和湖南军阀赵恒惕。尤以反对太平洋会议的政治性举动，吓坏了赵恒惕。赵说：“他们一喊一万多人，如果要造反，岂不就造反么？”^②从此，赵恒惕蓄谋杀害黄爱、庞人铨。他诬蔑劳工会是“过激党的总机关，是鼓吹工人哗变的总机关”，决心“非解散办人不可”^③。

一九二二年一月，春节在途。湖南第一纱厂工人要求按照沪、汉等地纱厂的规定，年终发给工人双薪，遭到华实公司资本家的拒绝。工人气愤已极，于十三日下午六时全体罢工，群

① 《血祭的五一节的复仇檄文》，载1922年5月1日《血祭的五一》。

②③黄芝岗：《黄庞二先烈和湖南劳工会》（1962年4月）。

聚总经理室，再作请求。厂方即令厂警殴打工人。工人怒不可遏，与厂警搏斗，并向厂方提出十一项条件，限十五日答复，否则决不上工。华实公司资本家对工人的正义要求置之不理。

事情发生后，黄爱立即驰往太平街华实公司办事处提出质问和警告。随后又以劳工会名义亲临省署，当面质问赵恒惕：为什么“省宪”刚公布几天，庆祝会之红灯未熄，就惨无人道地镇压工人？

劳工会的坚定态度，使华实公司资本家坐卧不安。于是华实公司总经理与早蓄杀机的赵恒惕明来暗往，布设圈套，密谋杀害工人领袖。华实公司的经理、董事们一面装着笑脸，请黄爱、庞人铨出面调解；在调停中，悄悄取出二千元支票，企图收买黄、庞。一面以五万元巨款贿赂军阀赵恒惕，要求武力对付。黄爱、庞人铨不为金钱所利诱，当场把支票掷于议事桌上。

十六日晚，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黄爱、庞人铨与华实公司老板在劳工会继续谈判。深夜两点钟，赵恒惕派来全副武装的士兵百余人，突然包围了劳工会，将黄爱、庞人铨逮捕。赵恒惕害怕工人闻讯暴动，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于十七日凌晨四时，将黄爱、庞人铨惨杀于长沙浏阳门外。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尽最后力量高呼：“大牺牲，大成功！”^①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黄、庞牺牲后，湖南劳工会堕入了无政府主义者手中，成

^①谷茨：《用鲜血书写新纪元的人——黄爱烈士小传》，载《新湘评论》1981年第12期。

了无政府主义团体。

(五)

风雪带着黄、庞惨遭杀害的噩耗席卷湖南和全国。长沙城里万民啜泣，许多劳工会会员，立即跑到劳工会门口失声痛哭。他们冲进内务厅、财政厅等衙门，向赵恒惕军阀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深宵白昼，常有工人和学生到黄、庞棺前哭祭。工人酝酿罢工，学生议论罢课，反抗赵政府的残杀政策。赵恒惕如临大敌，岗警如林，全城戒严，狂叫“工界罢工，杀工界；商界罢市，杀商界；学界罢课，杀学界”^①。军阀的高压政策，吓不住悲愤的人民。广大湖南人民在中共湖南支部领导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悼念和斗争。

黄、庞被害的当天，湖南工界三万一千人发出《通电》，对赵恒惕诬陷黄、庞“盛倡无政府主义，假劳工会名义，煽惑人心”，“收买枪枝”，乘冬防吃紧，“希图扰乱治安”^②的所谓罪状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明确指出：“黄庞二君平日亦未闻有提倡无政府主义之言论。若夫学说之研究，则世界各国从来无禁止之者，固不得以其研究无政府主义之学说，即谓其有提倡无政府主义之行为也”^③。毛泽东先后在船山学社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黄、庞追悼会，对他们的生平及其被害经过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印发了纪念黄、庞特刊。赵恒惕将湖南的报纸严密

①③1922年2月17日湖南《劳动周刊》。

②李大钊：《黄庞流血记》，见1922年3月25日北京《晨报》副刊。

封锁，不准登载与此有关的报道。毛泽东领导的湖南支部，立即将李立三从安源调回长沙，指示他往常德，动员黄爱六十多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恒惕的暴行。他们到达上海后，将赵恒惕惨杀黄、庞的详情及其罪恶，在上海、广州、北京各地报纸上披露无遗。随后，毛泽东借赴上海之机，帮助流亡在上海的湖南劳工会会员，组织反赵运动，动员国内名流学者，抗议赵恒惕的残暴行径。

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致电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要求南方政府立即惩办赵恒惕。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工人周刊》连续发表几十篇悼念黄、庞的文章和报道，揭露军阀赵恒惕实行“省宪”、“自治”的虚伪面目，鼓励湖南人民起来推翻赵氏的统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黄、庞被害发表宣言，指出：“现在湖南军阀赵恒惕已开端杀害我们底健全分子了！……各地资本家、军阀底残酷举动，是一致呢！我们要谨慎地防备呀！中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呵”^①！社会知名人士李书诚、邵力子等通电责问赵恒惕，为什么要杀害黄、庞二君？并警告其以后不能再有此类惊人之事发生。蔡元培愤怒地说：“我们后死的人，就有两种最直接的责任，一是完成两先生还没有做成的事业；二是替两先生复仇”，“这一回的事变，直接加害的是赵恒惕，那就应该把赵恒惕来偿命”^②。天津学生五百多人，聚集在黄爱生前的学校——天津高等工业学校，举行追悼会，散发了抗

① 《青年周刊》第6号，1922年4月。

② 北京《晨报》副刊，1922年3年23日。

议军阀暴行的传单。广州召开的追悼黄、庞大会，由十二个工会组织发起，五千多人参加，林伯渠还送去了挽联，上面写着：“看举世方以金钱造罪恶，唯二君能将颈血洗乾坤”^①。此外，北京，上海、武汉、济南等地的群众以及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也都举行了追悼会，甚至募集捐款，支援湖南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高度评价了黄、庞牺牲的意义及其革命活动，一致议决将每年一月十七日黄、庞殉难纪念日作为“中国劳动节”，号召各地工人纪念他们，继承他们的遗志。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又发出《通知》，明确指出：黄爱、庞人铨是“中国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奋斗而死的先烈。我们当纪念不忘”。《通知》确定的纪念办法为：“（一）各工会当十七日那天可一律悬旗；（二）发传单寄各报馆发表；（三）开会”^②。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每逢黄、庞牺牲日，长沙和全国许多地方，都召开纪念会，或发行纪念刊物。

对于黄、庞的一生以及他们壮烈的牺牲，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第十五期，赞扬黄、庞“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好团员，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全国学生的先觉”。李大钊在给《黄庞流血记》写的序言中指出：黄、庞的死，是死得有意义的。他们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死，“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所信仰的主义而死。”“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

^① 《广东工界追悼会实录》，1922年4月18日。

^②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

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未成的事业”。“中国社会运动史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以下的空白怎样写法，要看我们的努力了”^①。周恩来与黄爱是五四运动中生死与共的战友。一九二二年，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得知黄、庞牺牲的消息，极为悲愤。他在给国内战友的信中写道：“正品（黄爱）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他把黄、庞比作“中国的卢、李”（即德国工人运动著名领袖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被德国反动政府杀害）。为了纪念死难的战友，周恩来写了《伍的誓词》，表示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同时写了《生离死别》的诗悼念黄、庞：

没有耕耘，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
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②。

^①北京《晨报》副刊，1922年3月23日。

^②中国革命博物馆：《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刊（6）。

黄爱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第一支战歌，激励着湖南和全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踏着他的血迹奋勇前进。就在这年下半年，湖南和全国出现了第一次工运高潮。

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人民隆重公葬了黄爱、庞人铨、黄静源^①、汪先宗^②四位革命烈士于长沙岳麓山。

①黄静源任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时，1925年10月在安源被军阀方本仁杀害。

②汪先宗1925年11月在株州领导农民运动时，被军阀赵恒惕部队杀害。

庞人铨

谷 茨

庞人铨字寿纯（又作受淳），别号龙厂，一八九七年十月十六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农历九月二十一），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清宁镇八三歧（现湘潭县楠竹山公社望梅大队）。父亲庞树纲，母亲江氏，祖祖辈辈都以耕田为业。人铨有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五。大哥庞人钦，是个忠厚诚实的书生，以开馆授徒为生；二哥庞人钧，一生行医；三哥庞人铭，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四哥庞人键，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任湖南省总工会秘书长；秋收起义时，参加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工作，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就义于长沙。人铨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江氏对于年纪最小的人铨分外怜爱，倾注心血，决心把他培育成材。人铨才五岁，就跟着母亲认字。开初，有些不太专心，对所学的东西，“过目辄了了”。母亲对此很不高兴，反复向他说明粗心大意的危害，并用历史上有成就的人从小就专心致志地求学、做事的故事来教育他克服这个毛病。不久，人铨就读于附近的私塾，学习很认真，深为师长所称道。清朝末年，废科举，办学堂。人铨七岁那年，他的三哥庞人铭主办了庞氏族学，他转学到该校。由于刻苦用功，不到两年就学完初小的课程。但因当时这个学校的老师多是迂腐顽固的冬烘先生，只教寻章摘句，不求甚解，不联系实际。人铨很不以为然。他时常向老师提出疑问，喜欢寻根究底，常说：“做个舞

文弄墨，老死牖下的书生，决不是我所取的。”

人铨初小毕业后，考入湘潭县西路高等小学。恰巧这时，庞氏族学缺少教音乐、体操课的老师，人铨便自告奋勇，利用课余时间担负这项工作。一年后，他考入湘潭县楚山观高等小学。在这里，他学习成绩优异，校长陈子京对他很是契爱，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惜后来因病辍学回家。一九一一年暑假，庞氏族校因经济困难无力在外聘请教员，人铨便主动提出不支薪水到学校教课。数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湖南宣告独立。在这新旧交替、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的情况下，社会上一些游手好闲、行为不轨的人趁机混水摸鱼，湘潭县乡下有些不安定。不少乡绅借此诽谤革命，力主镇压。庞人铨力排众议，写信给地方开明绅士，指出：“人性就善，非迫于饥寒，何忍挺而走险”，再三强调要对这些人进行教育和抚绥，明确主张“提高农工，为救亡济世之唯一要素。”^①在庞氏族校，人铨适应形势的需要，整顿校务，改革教育，与各教职员一起研究改进教学方法。只一年多功夫，就使学校气象一新，获得政府的褒奖。许多学生把他当成良师益友，他成了当时教师中关心和爱护学生的模范。

一九一三年，人铨怀抱着新的理想，毅然辞去了教学工作，从湘潭来到省会长沙，考入了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他除了发愤学好在校各门功课外，还经常以“龙厂”的笔名，在长沙各家报纸上发表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他写的“愿以铁锤平社会，欲将机杼织人生”的诗句，曾脍炙人口，

^① 泣选：《亡弟寿纯行状》，《黄庞周年纪念册》，湖南总工会1923年2月印行。

风行一时。正如当时人们所称道的：“湘中报纸凡署着龙厂之文字，靡不受阅者之欢迎。”^①

一九一四年，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创办杂志，人铨以思想新颖，擅长文学，被同学推举担任编辑。在这个杂志的第一期里，他写的《我之家庭》，就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文笔，刻画了母子之间的深沉的爱，感人肺腑，受到读者的好评。然而，由于他单纯、热情，经常发表改造社会的言论，加之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深恶痛绝，洞见症结，因而笔锋所至，群丑震怒。所以他的文章虽为读者所喜爱，可他投给报刊的稿件，往往不被采用而退回。一九一六年他邀集同志组织一个季报，定名为《九十天的杂志》，一切经费全由参加者负担。可是，在那黑暗的旧社会，言论自由只是块招牌。不久，这个刊物，因经费困难和种种原因而被迫停刊了。

一九一七年，人铨从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毕业。他满腔热情地回到家乡，在湘潭织布厂当工人。一年后，与专学织布的杨佩岐结婚。夫妻俩在家乡组织起一个家庭织造社，幻想用机杼去织造人生。他的母亲看到儿子和媳妇志趣相同，心里非常高兴。然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重重压榨下，民间手工业那有什么发展前途！军阀张敬尧横征暴敛，抢劫掳掠。人铨虽避居乡间，也无法避免。家庭织造社几经抢劫，便一空如洗，不得不宣告破产了。严酷的现实开始使他认识到：“今日的中国，军阀与资本家合伙作恶，明抢暗夺，劳动者莫作那种自食其力的梦想！”^②

①泣选：《亡弟寿纯行状》。

②去病：《黄庞的事略》，《湖南历史资料》总第14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

庞人铨继续探索新的人生道路。他觉得“强盗式的军队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不是保障无产阶级的东西，可是目前的湖南人民免除张敬尧的祸害，就不得不利用他们。”^①于是，他抛开了机杼，毫不迟疑地从戎，在湘军陈嘉佑部做副官。“五四”运动后，湖南人民掀起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由于庞人铨对旧军队的反动本质有了深切的了解，对张敬尧部队的情况比较熟悉，因而“在驱张一役，效力甚多。”斗争中，他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九二〇年夏，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张敬尧的部队退出湖南。不久，庞人铨毅然退出军队。一次，他回家省亲，在后山竹林里掰得一笋壳，随即制成一把扇子，并在上面题了一首诗：“世间作扇多绫羽，此独山间竹制成。拿来岂为驱蚊蝇，一扫人间太不平。”充分表达了他那嫉恶如仇、誓扫不平的坚毅决心。

正当庞人铨处于苦闷、徬徨之中的时候，原来和他在甲种工业学校同学的黄爱于一九二〇年九月从常德来到长沙。他俩见面之后，“握手谈心，主张一致。”这时，在省会长沙的甲种工业学校的同学正酝酿组织学友会，便将这一任务托付给他们两人。

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湖南的劳工运动处在比较幼稚的阶段。一些政客和小业主利用工会的招牌，组织“湖南省工业总会”和“中华工会”。这些组织虽然为工人作过一些事，但并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曾为袁世凯称帝“劝进”，替官僚、军阀和资本家效过劳。为了抵抗这些冒牌工

^①去病：《黄庞的事略》。

会，唤醒劳工觉悟，庞人铨和黄爱以甲工学友会为起点，小试其端，终于把这个组织成立起来了。庞人铨被推举为学友会的出版干事，黄爱任交际干事。这是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从事劳工运动的先声，也是湖南总工会建立的基础。

在筹建甲工学友会的过程中，庞人铨目击“湖南劳工受了怪重的压迫，什么工人教育，工人卫生，统统谈不到，供养老小，维持生活，均是梦话，甚至要求最低的个人生活费……也是一万个难。”在这种情势下，他们“不由得怒从中出，拔剑相助，什么势利，他们统统不顾。他们所看见的，只有劳工的苦楚；听到的，只是劳工的悲言。因此，他们认为唯一的自己的责任，就是拯救劳工于水深火热。”这是庞人铨和黄爱发起组织总工会的第一个原因。同时，庞人铨和黄爱在实践过程中，广泛研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既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他们认识到：要创建人类的理想天国，必须联合劳动者，先图阶级的利益，进图全人类的利益；组织一个纯洁而强有力的劳动者自己的团体^①。这就是他们发起组织总工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万事开头难”。由于当时长沙的许多工人“怵于军阀淫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因而要把广大劳工组织起来，谈何容易！而庞人铨和黄爱这时均处于失业的境况中，穷得要命。庞人铨寄居旅店，欠了一身债，可他全然不顾，一天忙到晚，还经常没饭吃；到了冬天，身上没有御寒的衣服，就赖活动身

^①去病：《黄庞的人格》，《黄庞周年纪念册》，湖南总工会1923年2月印行。

体和努力工作来换个不冷。他们不顾别人冷眼和嘲讽，耐心地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劳工团结的重大意义。经过一个多月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广大工人不断觉醒起来，竞相入会。庞人铨和黄爱根据会员们的意见草拟了《湖南劳工会简章》。

《简章》规定，湖南劳工会的宗旨是：“改良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智识”。“凡操机械工业及手工业者，有工业学识者，无论男女，经会员二人介绍，得为本会会员。但须经评议部通过，以昭慎重。”^①劳工会组织，暂分评论、交际、教育、调查、出版，介绍、俱乐、会计八部。对于各部的职责，《简章》也作了具体的规定。由于庞人铨和黄爱在发起组织劳工会时身上只有二百八十文铜元，开办经费多是募捐来的，因此，有人便称它做“二百八十文开场的劳工会”。

在《湖南劳工会宣言》中，庞人铨和黄爱写道，“近世人群进化速率很快，‘人道’、‘解放’……的声浪，排山倒海而来”。“发达的社会产业、供给社会的需要，都是我们血汗换来的，所以我们不仅是组织人类的一分子，而且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先驱者。那末社会的起码的相当的报酬，也应该使我们过‘人的生活’才是！为什么还要紧紧的束缚，层层压迫，简直使我们的物质生活，不能维持肉体上适用的需要，精神生活等于零了呢？因此，我们特地谋了救济的方法，组织这个纯粹的劳工团体——‘湖南劳工会’，本着互助的精神，解决一切极关重要的问题”^②。最后，《宣言》还明确提出了该会的宗

① 《湖南劳工会简章》，《劳动界》第17期，1920年12月5日出版。

② 《湖南劳工会宣言》，《晨报》1920年11月12日。

旨，表示了“自觉自决，朝着光明路上走去”的决心。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八千以上的工人在长沙城内省教育会坪前，召开湖南劳工会成立大会。到会的除劳工会会员外，还有行政、实业机关、省立乙工校及各女子学校的代表。庞人铨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黄爱主持会议并发表了演说。会后，庞人铨被选举为出版部主任，与黄爱一起驻会办公。

在庞人铨和黄爱的主持下，劳工会在成立的初期，为了实行“工读”互助，他们先后主办了工人夜校和工人读书会，设立了图书室和阅报处，成立工人新剧组，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和政治，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庞人铨还常给工人夜校和读书会讲课，在工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二一年一月，劳工会女子新剧组在长沙南门外第一师范大礼堂演出新剧，庞人铨就此事发表了《本会第一次新剧感言》，指出他们扮演新剧的目的，一是筹措本会的教育经费，想在城厢内外，多设几个工人补习学校、图书室、阅报处；二是进行女子服务社会的实验，促使她们赶快的觉悟，自动起来，为社会服务；三是进行共同合作事业的训练。总的来说，就是要“促进社会人类的觉悟。”

一九二一年三月，劳工会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收回纱厂公有运动。关于这一运动的性质，庞人铨在《为沙厂问题敬告熊秉三君》一信中作了很好的阐明。他指出：“吾人主将公办，非官办也。以三千万人共有之公款，办三千万人共有之工厂，不受其政府之支配。人民有自己监督管理之权；而以每年所得之剩余价值，办理三千万人之公共事业，斯则民治事业，可由纱厂事业，实现于各方面。如有野心者利用时机倡言集

股，或竟主张官办，吾人认为所获利益仍集中于少数资本者囊中，或竟垄断生产机关于一、二官僚政客之手，则其反抗运动，而较今日为尤烈。”^①显然，他是要把纱厂收归全省人民所有，由人民实施经营管理、监督支配之权，而不是由军阀政府官办或少数买办商办。这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尚未获得政权之前，无疑是办不到的。然而它与毛泽东当时提出的湖南自治运动的主张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正象当时提出的“湖南三千万人要求湘省自治”一样，它是在中国共产党未成立前广大工人自发地对官僚政客和广大资产阶级垄断纱厂、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的一种反抗。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庞人铨与黄爱等人在报上发表《反对纱厂商办》的宣言，又主张：“第一纱厂由湖南三千万人里面推出有工业技术的人管理，湖南三千万人共同监督。”这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只能是乌托邦。为此，三月十三日，赵恒惕的省长公署对警察厅发出训令，指出：“纱厂事业，为吾湘一线生机。官厅当然有维护之责”，“如有造作谣言，扰乱治安者，定当执法以绳，不稍宽贷。”三月十四日，劳工会发布宣言，列举华实公司十大罪状，即：（一）垄断利权；（二）妨害金融；（二）违约招股；（四）违约用人；（五）不用女工；（六）丧失主权；（七）违约接收；（八）暗阻湘股；（九）苛待湘人；（十）绝无天良。认为“值此湖南民不聊生，嗷嗷待哺之时，稍有天良者，无不设法拯救。”而纱厂竟拒绝招收湘籍技工，实在令人气愤。三月十六日，庞人铨等人起草了《劳工会主张纱厂公办呈省署总部

^①1921年6月6日《民治时报》，转引自《劳工周刊》第16期，1922年3月4日出版。

文》，再一次强调湘省工业“不容少数商人垄断”，并指出“公办二字即非排斥外人来湘做工，实为湖南工人谋生计。”随后又在快邮代电中，就华实公司诬蔑劳工会排外的谬论，指出其目的是“竟图离间我外省劳动同胞，为伊帮助，以遂其垄断之私。”由于赵恒惕政府再次拒绝劳工会的要求，三月二十日，在庞人铨和黄爱等人的主持下，劳工会的代表同机械会及各工厂人员共一千多人，举行了为收回纱厂公有的游行示威，并向赵恒惕政府递交了请愿书。

三月二十日的游行请愿未生效果；各方调停也未解决问题。庞人铨与黄爱等人遂决定举行四月十三日的大示威。这天上午，劳工会代表会同工界代表三千多人过河到第一纱厂直接交涉。总经理赵子安等人“怵于威，迫于理”，各写了不再承租第一纱厂誓词一纸，交代表收执为据。示威群众还同赵子安等一道去省财政厅以当面解除华实公司的租约，后被赵恒惕政府武力解散，劳工会代表王光辉被拘留。四月二十八日，黄爱等人被捕入狱。

黄爱等人被捕入狱后，风声所及，劳工会会员人人自危。庞人铨却毫无畏惧，力支危局，使“会务进行，愈有起色。”尤为突出的是，他出色地组织了一九二一年的“五一”节游艺大会，这在当时长沙劳工界可称是破天荒的大事！本来这年“五一”节前，赵恒惕政府就发出了“在戒严期内禁止开会”的禁令，省城各处戒备森严。庞人铨于“五一”前夕，一面分别通知劳工会骨干来会商议纪念五一的事情，借妥第一师范大礼堂作为会场；赶印传单五、六种，连夜送往各会员家，要他们次日赴会时沿途散发；并且还订做了大批纪念面包，上印“劳工神圣”、“不作工者不得食”等字样，准备在游艺会场出卖。

另一面，派人通知戒严司令部和警察厅，告诉他们：“五一”节将举行集会。当晚，戒严司令部、警察厅及其分署接连来信，不准开会。“五一”清晨，庞人铨派劳工会评议部主任李彤去戒严司令部陈说，并留坐司令部当押质。与此同时，游艺会按计划举行，参加者达六、七千人。大会由庞人铨主持。他首先率全体到会人员高呼三声“劳工万岁”！然后演说，着重讲述“五一”节的由来及今后工人应有的觉悟。最后，他说：

“今日还有许多话，势必不能对大家，只请大家注意一层：今天这样一个会，我们教育部主任（黄爱）哪里去了？”说到这里，“两泪洒洒，直如串珠，全场人众，莫不潸然”。游艺会上，表演了庞人铨编写的《万恶金钱》一剧。“剧中演至政府和资本家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以欺压工人。观者泣，即野蛮兵士亦被感动。”起初，赵恒惕派来两连士兵准备驱散前来开会的群众；后见群众太多，秩序又好，恐激起众怒，一直未敢动手。

就在庞人铨领导数千工人举行集会的五月一日这一天，黄爱等人在狱中开始了绝食斗争。

五月十八日，庞人铨与劳工会另一代表张理全一起，赴第一纱厂调查，写出了《劳工代表调查第一纱厂的报告》。报告中介绍了纱厂风潮以来，厂里职工自动开工后的各方面情况，除了对厂里机器设备、原料来源、出纱数目、盈利情况作了记述外，还对厂内组织、工人技艺、工资和食宿等问题作了考察，指出，现在厂里“工程上一切事务，完全由厂内工匠和技工监工负责，尚觉井井有条。可见纱厂公办，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工人管理纱厂，不仅不会坏事，反可增加生产，精进技术，这是因为有切肤的关系。”这个报告还提出了“厂里宜设喷雾装

置，调和空气湿度；地平没有打好，灰尘过多，须得常常扫除”；“宿舍里面，急须整理清洁，注意卫生”等项建议^①。

庞人铨等组织劳工会员竭力营救黄爱等人的活动，得到了全省广大工人及进步人士的大力声援。赵恒惕慑于舆论压力，不得不于六月九日将黄爱等人释放出狱。黄爱出狱不久，适逢端午节，庞人铨与黄爱等举酒畅饮，庞人铨满怀激情挥笔写了《蒲觞》一首，其诗云：“蒲觞珍重共斯辰，事业天涯始问津。自昔多才唯有楚，而今苛政竟如秦。青萍贮我囊中剑，白眼看他世上人。只恐江山蚕食尽，波臣遗恨作横论。”这首诗，充分展示他忧国忧民的伟大胸怀，表达了他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赵恒惕等封建军阀如狼似虎地压榨人民的仇恨。

六月二十六日，劳工会与华实公司订立了如下数款条约：

（一）华实公司通电全国对工界声明认错。（二）预提红利项下五千元作为湖南工人教育经费。其中华实纺纱厂每年提红利百分之五，作为湖南工人教育经费；厂内职员、技师、工人，应尽先以湘人充任，并须用女工。（三）工厂卫生、工人保障及抚恤条例，由华实公司会同工界另订专章，一一实行。历时数月的纱厂收回公有运动就这样暂告结束。虽然上述条约并未全部付诸实行，然而它却宣告了劳工会及其所代表的工人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在这场斗争中难免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时组织和发展起来的；庞人铨和黄爱在斗争中是英勇的、坚决的；斗争的矛头也是愈来愈明显地对着赵恒惕军阀政府以及与之相勾结的大资产阶级。无论是对于启发工人的觉悟，锻炼工人的组织能力，考验和提高劳工会

^①1921年5月21日湖南《大公报》。

的先进骨干分子，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黄爱在出狱演说中指出的：“吾人不特要注意现在军阀财阀打成一片，且当防范绅阀之专横，阻碍社会进步。”这个认识是在斗争中获得的，它与庞人铨在《蒲觞》和后来的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是吻合的。

继纱厂公有运动之后，庞人铨与黄爱更加致力于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据《劳工会大事记》载：从一九二一年七月到九月，劳工会长沙理发工会会员发动了打破行规争取自由营业的罢工风潮，不少会员被捕入狱，经过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与此同时，长沙土木工人为反抗包头苛待工人，力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到九月发动了罢工，并开了庆祝成功会。同年十一月七日长沙湘鄂印刷公司的工人为反对公司无故开除工人而举行的罢工，也获得了十分圆满的结果。在这些罢工运动中，庞人铨和黄爱“都亲自参加，给予工人以极大的援助。”^①

一九二一年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其翻译、共产党员张太雷，在去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的途中抵达湖南省会长沙，同赵恒惕及其顾问们取得了联系。马林、张太雷听说长沙有一个青年学生组织与工人阶级（纺织工人）有联系，就去接头，从而与劳工会的成员见了面。马林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讲解了阶级斗争、俄国革命和建立工会等问题，对劳工会的成员启示很大^②。同时，由于庞人铨与毛泽东是同乡，二人早就相识，

① 《血祭五一节的复仇檄文》，《血钟》五一增刊，1922年5月1日。

②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24、102页。

在驱张运动中彼此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庞人铨与黄爱领导湖南劳工会所进行的各项斗争中，毛泽东曾多次给予了指导和帮助，还推荐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给他们学习。夏曦也曾多次同他们联系，给予他们不少帮助。庞人铨和黄爱在这些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帮助下，受到深刻教育，思想大有提高^①。

一九二一年十月，劳工会评议部举行闭幕式。随后，照章改组。毛泽东于此时撰写了《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对劳工会一年来的工作和斗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劳工会现在已周年了，我同情于劳工会也一周年了。”“劳工会是劳工的团结体，谁也应该同情的。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我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完备。”紧接着，他针对劳工会前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别注意的。（二）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散也要不得。（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最后，他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口号，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②

^①范体仁：《湖南劳工会的组织活动和黄庞被杀的真相》（1965年9月11日）。

^②《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1921年11月2日出版。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劳工会在改组中将原来的合议制改为书记制，并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其中庞人铨为教育部委员，与书记部委员黄爱、教育部委员张理全驻会办公。随后，按各产业成立了工会，会员也开始缴纳会费。劳工会从此开始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太平洋分赃会议事起，庞人铨深为愤慨。他认为“这种国际帝国主义的大联合，在军阀及资本家，固乐与观成，而血汗工人何能钳默”^①。乃与黄爱发起反对太平洋会议的工人示威运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担任了长沙反对太平洋会议游行示威大会的总指挥，督率上万工人，游行六、七个小时。会上通过的致世界各国和全国各地工会的电文尖锐地指出：“我们苦军阀政客荼毒已久，决不再忍受国际资本的剥削”。“我中国在华府会议中如立在失败地位，国际的资本主义，如将横流于中国之土，我们将联合全国工友为全国的总同盟罢工。更进一步，再为最后的对付。”^②军阀赵恒惕看到湖南工人这样大举活动，政治色彩如此鲜明，虽忌恶庞人铨等，“亦惊叹其能”，但却一时奈何不得。

从劳工会的发起、成立到改组，直至最后被赵恒惕封闭，庞人铨主要负责劳工会宣传出版工作。他很有文学才能，“曾有意将中国历代文学中底描写社会不平的作品，选编成集，作为劳动界的读物。他所举的例子是：“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③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的这个夙愿未能实现。他还结合斗争，撰写了《金钱万

①泣选：《亡弟寿纯行状》。

②1921年12月26日湖南《大公报》。

③《黄庞周年纪念册》第162页，湖南劳工会1923年2月印行。

恶》、《社会福音》和《人道之贼》等新剧，负责编辑出版了四种《劳工》小册子和十三期《劳工周刊》，并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剧本、刊物和文章，其主导思想是好的，是揭露和鞭挞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和大资产阶级的；是宣传阶级斗争、工人团结和社会主义的。

诚然，由于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新村主义等各种新思潮，如潮水般地涌来，与许多同时代先进人物一样，庞人铨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曾接受过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走过一些曲折的路。但从他整个思想来看，当时，他曾是一个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者。五四运动后，庞人铨曾相信过“实业救国”的主张，向往过“日间织布、夜间读书”的工读主义。然而，严酷的现实和家庭织造社的倒闭使他清醒过来。他投笔从戎，想利用旧军队的愿望也遭到了失败。正好这时，毛泽东、何叔衡、夏曦等对他进行帮助。他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秋，黄爱来到长沙时，他俩已是“主张一致”，都“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①。因而他们能够志同道合地从事劳动运动，发起组织湖南劳工会，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但是，不能不看到，他们在宣传阶级斗争、工人团结和社会主义的同时，的确宣传过一些错误的东西。比如，在《劳工周刊》中，就宣传过“关于劳工问题以外的种种，自然是一概不说”^②；并曾认为：五一的起源，“全在劳动组合主义，他的发起人的志向，全然不带政治臭味的纯经济运动”^③。虽然这

①去病：《黄庞的事略》。

②《劳工周刊》创刊号，1921年10月22日。

③庞人铨：《“五一”劳动节》，1921年《劳工》。

里讲的是一八八四年五一示威运动发起人的志向，然而也不能把政治看成是劳力问题以外的事情。这种说法反映他的确受了那种忽视政治，主张只搞纯经济运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影响。不过就整个刊物来看，它的主要倾向，不是宣传无政府主义，而是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宣讲阶级斗争，宣传工人阶级的团结、觉悟和奋斗的。我们不能只看到某一点，而忽视全盘。同时在实际斗争中他们已经纠正了忽视政治斗争的错误思想，积极投入了政治运动。据黄爱生前亲自撰写的劳工会大事记的记载，劳工会成立后的第三天，即十一月二十四日，就特派代表李彤、王坤厚、黄伯达、刘芳四君出席长沙各公团选举省长会议“因提出的组织行政委员会案，未获同意，被否决了”。一九二一年五月，湖南劳工会在长沙第一次组织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无疑也是政治活动。尤其是在劳工会《对于省自治意见复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书》中提出的十七条政治和经济纲领，反映了他们接受了《共产党宣言》的思想观点。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废止常备军，立全省人民皆为民兵之制度”；“实行基尔特自治主义”；“行政及警察，当属于自治者”；人民“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各服公务主要人员，均当出自民选”等。在经济上，主张土地财产渐归公有；实行直接税和高额累进税；银行、铁道、矿山当为公有，由工人自己管理，规定最低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同工同酬，一律铲除人类剥削人类之制度与社会中各种阶级之区别^①。虽然这个意见书中，把《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十条纲领和资产阶级民主制混合在一起，并且提出“基尔特自治主

^① 《劳工》1921年“五一特刊”。

义”等等，说明他们当时思想的混杂，但也反映他们确实是向往和主张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庞人铨和黄爱主持召开的反对太平洋会议的集会游行中，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际资本主义”的口号，并散发揭露巴黎和会、国际联盟和太平洋会议的传单，指出这些会议是“老虎的和平”、“和平的老虎”，都是帝国主义玩弄的“猫儿哭老鼠”的鬼把戏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的。

工会的刊物宣传的错误观点还有一些，如在有的文章中主张从社会教育入手，对社会进行有步骤的改造^①；有的文章把“同盟罢工”说成是对付资本家“不用刀不流血的最利的武器”，是唯一的最好的革命手段^②。这也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观点。庞人铨还在以反战为题材的《人道之贼》的剧本中，通过描写两个兵工厂的工人目睹战争的惨状，认为社会的种种罪恶都是由枪演出来的，因而要把枪炮粉碎万段，反对制造这杀人的武器^③。这个剧本就是他朴素、幼稚的人道主义和反战思想的反映。然而，就在《劳工周刊》的发刊词中，也鲜明地写道：“‘劳工周刊’目的是促进劳工们阶级斗争的觉悟，鼓吹‘劳动组合’——劳动组合大同盟，绝对反对资本阶级的压迫；完全是图谋劳工们精神上的团结，绝对的防止‘地域’、‘帮口’的谬论的传说”。发刊词反复说明“劳动者除却自己一只身一条命和劳动力量以外，别无所有，不若资本家有金钱势力，又有官僚势力，就连军阀绅阀也都操在他们手中，资本家于劳动者，实有横吞直咽的可能，劳动者若徒靠各个人的力量

①③ 《对于藤竹业的意见》，《劳工》第2期，1921年2月1日。

② 《劳工周刊》创刊号，1921年10月22日。

去和资本家对抗，简直是以卵投石。所以劳动者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联合。‘劳动联合’是劳动者对资本家施行一切手段——大规模运动和大示威的预备工夫，是劳动者冲决罗网创造新生命不可少的一件事情。”^①《劳工周刊》和《劳工》还猛力揭露和鞭挞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号召工人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刊物中的许多文章曾鲜明提出“资本家就是强盗，资本就是盗贼。”^②“劳资两个阶级不容有调和的余地”，中国的军阀政客是帝国主义的“侏鬼”。要求劳工同志“认清敌人，认清伴侣”，“采取革命手段”对待资本家和资本家的助手——军阀政客绅士等^③。正如一九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时事新报》报道中所说的：“劳工周刊，主张颇近激烈，对于军阀政客资本家一律加以抨击，有时并指责赵恒惕。”一九二三年老雁在《介绍黄庞》一文中也写道：“他俩所办的劳工周刊，虽然是小小的一种刊物，但这一种刊物，恍惚是一把匕首，比什么大刀阔斧都结实而犀利。”“为什么周刊声威所播，其影响乃如是之速？因为劳工周刊，虽然是一张纸，并不是纸老虎，庞人铨之笔，他那管董狐之笔，可以说把一班政府、华实公司、报馆、冒牌工会的……大大小小，鬼鬼祟祟的人的心肝去掏出来了！”

从上述的种种可以看出，在《劳工周刊》和《劳工》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常常是同那些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观点混杂在一起的。这种情况，正是庞人铨、黄爱在

① 《劳工周刊》创刊号，1921年10月22日。

② 郭开第：《告工人》《劳工》1921年五一特刊。

③ 老雁：《介绍黄庞》，《黄庞周年纪念册》，湖南总工会1923年2月印行。

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过程中，一度混杂的思想观点的反映，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世界观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是由于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断战胜了他们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及和工人运动的密切结合，这才促使他们完成这个转变。

庞人铨在斗争过程中是不能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发生联系的，而且劳工会的会员里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劳工会在组织上开始也采取的是工团主义“合议制”的办法。这说明庞人铨和黄爱在组织上是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的。但是从现有资料来看，尚未发现他们参加了当时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更不是什么首领。据当年长沙无政府主义组织负责人之一的袁绍先回忆，黄、庞那时虽然和他们很熟悉，但没有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和活动^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在《四个死者，一个精神》一文中，就曾明确写道：“无产阶级唯一可靠的同志，最勇敢能战斗的前卫，只有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黄爱、庞人铨等红色社会主义者，亦即是他们所属的第三国际。在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②

据易礼容回忆，一九二一年底，他担任中共湘区委员时，曾去黄爱、庞人铨的住址，告诉他们毛泽东要找他们谈话。几天后，毛泽东在清水塘屋子里和黄爱见了面。过后，易礼容问毛泽东：“谈的怎么样？”毛泽东说：“谈得好！他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③不久，黄爱和庞

^①袁绍先的自述。

^②《先驱》第15期，1923年1月15日。

^③易礼容在湖南党史资料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4月29日、5月2日。

人铨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一月，第一纱厂爆发了工人年终索饷的斗争。庞人铨和黄爱及时加强对这一斗争的领导和支援。本来纱厂年假，照例是发双薪的。第一纱厂工人要求厂方按沪汉纱厂发给年终双薪，却遭到厂方的拒绝。于是全厂工人于一月十三日开始罢工，并包围了经理室。厂方唆使厂警殴打工人，并杀伤工人两名。当晚全厂工人举行会议，决定继续罢工，以反抗武装镇压，同时向厂方提出五项条件：（一）年终发给双薪；（二）工资一律发给银洋；（三）年假不得扣除工资；（四）不得随意开除工人；（五）发给受伤工人医药费。

庞人铨听到纱厂工人罢工风潮发生的消息，深恐工人横遭军阀及资本家的戕害，不遗余力地设法支援。一月十四日，赵恒惕派来大批武装重重包围纱厂，当即拘捕为首工人数名，捆打工人二三十名，在厂内实行戒严，不准工人行动，并迫令工会立即下令上工。一月十五日，工人们发出纱厂二千二百余人十万火急启事，呼吁外界援助。同日，在庞人铨和黄爱主持下，劳工会向赵恒惕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将军队自纱厂撤出。十六日，黄爱在太平街华实公司办事处向厂方提出警告。经理黄藻奇与董事彭祖植诱请庞人铨和黄爱去公司进行谈判，并悄悄以二千元的支票交给黄、庞，说是作为调停费用，妄图进行收买。黄、庞义正辞严，当场把支票掷于议事桌。当天夜里，谈判的双方正在签字的时刻，受了华实公司五万元贿赂的赵恒惕政府，突然派来士兵多人将黄、庞捕去，并将劳工会所有文件一概抢走。

庞人铨与黄爱被押至总司令部时，即由一个姓唐的法官进行审问。唐问庞人铨：“你是庞人铨么？”庞答：“是！”这

个法官马上对众兵说：“绑起！”庞问：“我们犯了什么罪？”唐说：“甚么罪不罪，总司令要杀你们两人。”庞追问道：“要杀我们，也应该把罪状拿给我们看！”唐说：“杀了以后，你们就会知道的。”于是，众兵将黄、庞二人绑起，剥去衣服，拥到了浏阳门外。庞人铨被刽子手一刀两断，身首异处^①。

庞人铨是一个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青年。他是有着“牺牲一己以殉纱厂问题的决心的人。”不过，他始终只是沉默着，终不曾挂在口头上^②。在就义前，他曾遗书其夫人杨佩歧说：“愿汝自谋衣食，万事糊涂了之。他日社会主义发扬，必有因我而提携汝母子者。”^③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

黄、庞流血惨案的真相被揭出来后，国内外人士极为愤怒。毛泽东立即召开会议，对黄、庞烈士进行追悼，并布置了对赵恒惕的斗争和稳定工人情绪等善后工作。一九二二年四月在广东工界召开的追悼会上，林伯渠送的挽联鲜明地写道：“看举世方以金钱造罪恶；唯二君能将颈血洗乾坤。”许多劳工团体也都送了挽联、挽词，厨业职工工会的挽联是：“争自由，折节不挠，忌民贼以毁身，遗恨痛随湘水逝；倡社会，长才未竟，为工人而殉难，垂名钦比泰山高。”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和广大工人群众对他的敬仰和悼念。^④

① 《黄庞被害前后面面观》，《劳工周刊》黄庞被害纪念特刊。

② 老雁：《介绍黄庞》。

③ 泣选：《亡弟寿纯行状》。

④ 《广东工界追悼会实录》，1922年4月18日出版。

卓 恺 泽

汪成法 纪杰

卓恺泽，一九二五年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宣教委员兼团北方区委委员，在《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刊物上写过许多批判国家主义和戴季陶主义的战斗文章，参加组织了北京一九二六年“三一八”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七月，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十月，调团中央宣传部，编辑《中国青年》，用“砍石”、“石”等笔名写了许多文章，继续批判国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一九二七年二月，任团江浙区委委员，参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宣传工作；五月，任团中央委员；九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一九二八年三月，任团中央特派员兼团湖北省委书记，四月英勇牺牲。

(一)

卓恺泽，乳名阿培，笔名砍石。一九〇五年十月（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松岙村。父亲卓祥光，为人正直，颇懂中医妇科，常给村里的人看病。母亲庄氏主持家务，生二女一子。家境比较富裕，后来逐渐破落，在恺泽成年时，尚有土地十多亩，楼屋四间。

卓恺泽七岁起就上松溪小学读书。十一岁考入离家二十华里的裘村忠义高等小学。这所学校，有不少思想比较进步的教

师，经常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动学生开展反对军阀、抵制日货、毋忘“五九”^①国耻等活动。恺泽年纪虽小，已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在一次学校举行的演讲会上，作了一篇题为《暗杀以寒军阀之胆》^②的演讲。这篇演讲，表达了对军阀卖国的切齿痛恨和对祖国的热爱。他讲得声色俱厉，言词激昂，使听者很受感动。

一九一九年，卓恺泽十四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宁波最大的一所学校——浙江省立第四中学。这所学校有不少进步教师，学生运动相当活跃。那时，已是“五四”运动的后期，学校照常上课，但学生会继续活动。卓恺泽受“五四”运动的熏陶，更加努力学习，并经常去学校图书馆阅读课外书刊，吸收新思想、新文化。同时，他劝导和督促成绩较差的同学努力学习，共同进步，同学们都尊他为“学长”。他还担任学生会的工作，带领同学们参加校内外活动，反对读经^③，要求教白话文，要求学生会参与学校行政管理，支持教会学校的师生反对神父和牧师的专制。

一九二二年，卓恺泽参加了宁波青年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雪花社”。他按照这个社“本互助之精神，作社会之改造”^④的宗旨，投入社会活动，向宁波的守旧势力作激烈的斗

①1915年5月9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从此，人们就把5月9日作为国耻纪念。

②卓恺泽少年时代的同学林如醉给卓华山的信（1981年10月18日）。

③当时书目分类以儒家经典属“经部”，简称经。

④潘念之：《宁波团的建立和早期活动》，《宁波背运史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期。

争。同时，他还积极帮助其他知识青年走向进步。

卓兰芳是宁波一个小学的青年教师，家境清寒，家庭经济负担重，常感入不敷出，心情苦闷。卓恺泽向卓兰芳指出：

“中国民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遭受经济困厄，这并不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只有改造社会，才能彻底解决。”^①他帮助卓兰芳提高了认识，于一九二三年也参加了“雪花社”，投入改造旧社会的活动。

一九二三年五月，卓恺泽写信给在宁波第四师范读书的家乡好友裘古怀，提出创办松溪图书馆，为家乡“办点小小公益”^②。裘古怀十分赞同。他们两人热情捐助书刊和资金，并向商界、学界、当地士绅筹募经费，办起了松溪图书馆，委托当时松岙最有权势的知识界绅士卓祥赓代为管理。但是，卓恺泽和卓祥赓在购置何种书籍问题上经常发生争论。恺泽主张购买新出版的通俗读物，而卓祥赓却要买《资治通鉴》一类的大部古书。这使卓恺泽经常放心不下^③，他在给裘古怀的信中曾经指出：“书籍由他们管，恐有买椟还珠的危险。”^④

这一年暑期，卓恺泽在四中毕业回家，发现卓祥赓对图书工作不负责任，图书散失很多，就当场给以批评。卓祥赓在乡间专擅惯了，感到这样一个青年学生竟敢当众伤其体面，恼羞成怒，骂恺泽是“田鸡^⑤学生”，并气势汹汹地要动手打人。卓恺泽不但没有被吓倒，而且毫不客气地“回敬”卓祥赓是

①王安卿 1980年8月10日的回忆。

②裘古怀给卓恺泽的回信（1923年5月16日）。

③谢光祥回忆资料。

④裘古怀给卓恺泽的回信（1923年5月）。

⑤田鸡，宁波方言，指小青蛙。

“座山乌鸦”，说他不为乡里做好事，反而祸害乡里，使其狼狈不堪。这事曾在松岙哄动一时，广大群众纷纷赞誉卓恺泽这种不畏权势的刚勇性格。后来，在卓恺泽和裘古怀等人的努力下，这个图书馆购置书刊达三百多种，为家乡群众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提供了条件。裘古怀在日记中写道：“事业的成绩，与恺泽募设图书馆一事，颇堪自慰。”^①

卓恺泽对权势者无所畏惧，而对贫苦农民则十分同情和支持。有一年暑期，他放假回家，得知有一个农民因在地主的山上疏砍了一担松毛^②而被抓去，他就去同这个地主评理，指出：“穷人上山疏砍一担松毛够辛苦的了，你抓住不放，没有道理，何况老树疏枝，对松树成材还有好处呢。”^③在卓恺泽的说理下，这个地主只好把那个贫苦农民放了。

(二)

一九二三年八月，卓恺泽考入北京的华北大学预科。在大学里，他担任学生会的干部，一面积极参加校内外活动，编辑壁报，开展宣传；一面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他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十二月，他和陈毅、乐天宇等二十多名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④。

卓恺泽入党后，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工作。在一九二四年这一年时间里，他还给当时在宁波四师读书的裘古怀写了十三

①裘古怀日记（1924年7月31日），存浙江博物馆。

②松毛，松树的枝叶。

③卓阿位回忆笔录（1982年6月10日）。

④乐天宇：《卓恺泽同志事迹》（1982年6月19日）。

封信，议论国是，交流思想，论述“列宁死后的中国人”、“论中国之政治经济”、“论孙文北上之失策”、“松溪社会改良之论战”、“在北京为国事波动”以及“择友首以有无革命思想为标准”^①等等，嘱咐裘古怀要关心国家大事，努力宣传新思想，并经常把《向导》、《政治生活》等刊物寄给裘古怀等人阅读。裘古怀在日记中写道：“松溪诸儒中，吾惟独爱卓恺泽者，盖亦以彼乃有希望之人也。”^②在卓恺泽的启发和影响下，裘古怀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北京地方党大会上，改选北京地委，卓恺泽被选为地委候补委员^③。他受地委派遣，巡视各支部的宣教工作，帮助和指导基层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他还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理论问题。对自己不明确的问题，或者对某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他总是大胆地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例如，十一月间，他读了林根的《军事运动与革命》^④一文后，对文中的提法有异疑，就写信给恽代英^⑤。他在信中提出，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必须在最短期间完成革命；革命的步骤“由宣传而组织、训练而军事行动”，虽然这“是四种不同性质的运动”，但“不妨同时并行”。信中还提出革命青年可以打入军阀的军队和军事机关中去，“宣传我们的主义，扩张我们的势力”，把它改造成为一支“赤色

①裘古怀 1924 年 1 月至 12 月日记。

②裘古怀日记（1924 年 2 月 13 日），存浙江博物馆。

③《北京地方党大会报告第一号》（1924 年 12 月 7 日），存北京市档案馆。

④林根，即林育南，当时是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所著《军事运动与革命》一文，刊于《中国青年》第 49 期。

⑤恽代英，当时任《中国青年》主编。

的革命军”，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我们的“军事行动的人才”^①。又如，他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你们所说的是小职工财产，小农夫财产，资本家时代以前的财产吗？那就不消废止了”^②的译文，感到不够明确，也写信向恽代英请教^③。恽代英对他提出的问题，都一一作了答复。

一九二五年春，卓恺泽为我党领导的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而奔走呼号。三月一日，他出席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积极参加悼念孙中山逝世活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由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又能阐明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四月间被北京地委列为宣传工作最佳和对马列主义有相当明瞭的同志之一。^④

“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的党、团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组织各阶层群众，举行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卓恺泽被派到学联中工作，和邓鹤皋、杨善南^⑤一起，在学生中组织沪案雪耻会，发动学生罢课和游行，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六月底，他被选为团北京地委青年部负责人^⑥。

① 砍石给代英的信，载《中国青年》第54期，1924年11月22日。

② 现在的译文：“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见《共产党宣言·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③ 砍石给代英的信，载《中国青年》第80期，1925年5月16日。

④ 《北京地方书记宣传运动工作报告》（1925年4月24日），存北京市档案馆。

⑤ 邓鹤皋，又名邓洁，时任团北京地委组织兼训练部主任；杨善南，时任团北京地委学生部主任。

⑥ 《团北京地委组织宣传运动的报告》（1925年9月22日），存北京市档案馆。

当时，卓恺泽还兼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宣教委员和团北方区委委员，协助赵世炎^①编辑《政治生活》刊物，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地为党工作，还写了不少文章，宣传我党的主张，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七月五日出版的《政治生活》第四十四期上，就发表了卓恺泽写的五篇时事短评。在《取消不平等条约》一文中，他写道：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贫弱”的原因，各地爆发惨案后，更证明它所保障的是“外人在华特殊势力”；“取消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民众的要求”，我们应当集中力量，监督“段祺瑞政府”执行。他在《第一次国际会议》一文中指出，“国家主义者往往保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其实，朝鲜、土耳其、印度、德国、日本等被压迫民众的代表，也参加了六月三十日在天安门召开的国民大会，“表示要与中国人民紧紧地拥抱，共同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并从物质上援助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他说，这是东方“第一次国际会议”，全国有志的青年要明白这个道理，“在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努力求得我们民族的出路”。在《“中国学生为英国大敌”》一文中，卓恺泽引用英国的印度内务部长说的“中国学生为英国大敌”这句话，指出：中国学生不听洋大人“念圣经”、“做祷告”的话，不听研究系^②“多读点书，少于点

①赵世炎，时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负责人。

②1916年以梁启超为首的政治团体。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原进步党的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简称研究系，依附北洋军阀段祺瑞。但在安福国会出现后，即被段所抛弃。

事”和胡适博士“整理国故”、“少谈主义”的话，而“要想在铁蹄下挣扎起来，领导全国民众，去摇动帝国主义在华的基业”，以“求我们民族的解放”，这便成了帝国主义“眼中的仇敌”。但是，我们“热烈的青年，是不怕与帝国主义为敌的”，“并且要努力增进自己的力量”，“增进民众的力量，与帝国主义奋斗”。“全国民众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大敌，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七月二十五日，卓恺泽在《中国青年》第八十四期上，又发表了《讨论国家主义并质曾琦》一文。这篇文章尖锐地指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每每利用‘君主’、‘祖国’来扰乱阶级的阵线，来保护他们自身的特权”，国家主义者“不过是反动队伍中的一个比较漂亮的支队罢了”。现在，“君主的迷信已打破了”，“国家是什么东西”呢？“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用之以掠夺别人的工具罢了”。在军阀统治下的国家，“我们被压迫的人们，是否值得死心塌地去爱它”？但是，“我们也主张爱国，不过我们爱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不是资本的国家；是以国家为过渡到世界主义的工具，不是把它看做终极的偶像；是为了要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无产阶级才爱国，不是想抱‘大中华’的传统观念，步帝国主义的后尘”。而国家主义者却“闭着眼睛不管世界的大势”，想“建设一个大中华的帝国主义”，这是“适合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文章还揭露和批判国家主义者颂扬军阀、攻击共产党和侮辱孙中山的谬论，号召青年们起来“打倒狭义的国家主义”，“打倒冒牌的革命派”。这是一篇战斗的檄文，字里行间表达了卓恺泽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①等小册子出笼以后，卓恺泽在八月十九日出版的《政治生活》第四十七期上，发表了《戴季陶心劳日拙》的文章，对戴季陶的谬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在文中首先提醒大家，“在‘反共产健者’江亢虎^②复辟阴谋暴露的时候”，“在国民党右派正想由国民党内撵出共产党人的时候”，“在中国民众正在和帝国主义及媚外军阀肉搏的时候”，自称“中山先生的信徒戴季陶”，纠集一伙人，又“在上海从事于小册子的著述，隐含着‘反共产党’的意味，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接着，文章论述了孙中山先生在四十余年的革命中，“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摆了戴季陶也承认的“改组以前的国民党是如何的散漫、杂乱，是如何的松懈、消沉”，共产党人“加入之后，有相当的进步”的事实，痛斥戴季陶之流，连他们“所最崇拜的中山先生的面目都未认识”，“忘了他最大的使命——反帝国主义运动”，这与“孙中山遗嘱的精神相去已远”。卓恺泽和其他共产党人的批判文章，大大地削弱了戴季陶主义的影响。

在这段时间里，卓恺泽还受北方区党委的派遣，巡视了西北、华北地区。他从北京出发，经山西的大同、甘肃的兰州、绥远的归绥和察哈尔的张家口等地，了解当地的情况，传达贯彻党的指示，指导各地的革命斗争。巡视结束返回北京后，他

①戴季陶，国民党右派首领之一，1925年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即以这些谬论作为思想武器。他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最得力的帮凶。1949年春，逃到广州，旋即自杀。

②江亢虎，南方大学校长，新社会民主党头领。1924年，他向废帝宣统私下跪呈奏折的丑事，被揭露出来。

即向李大钊、赵世炎汇报了巡视情况^①。后来，他同他的表弟邬景森谈起这次巡视时曾说，西北、华北地区，军阀阎锡山、马步芳等割据一方，搜刮民脂民膏；地主、牧主用宗教迷信来奴役和剥削民众；黄河流域一带，每逢洪水爆发，一片汪洋，干旱季节，赤地千里；人祸天灾，使民众饥寒交迫；那里的党团组织发展迟缓……，勉励邬景森要为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和民众而努力奋斗^②，并介绍邬景森入了团。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春，北方区党委为培训干部，在北京石老娘胡同（后搬到北大三院靠操场的大教室）开办党校，罗亦农任校长，李大钊、赵世炎等亲自讲课。卓恺泽从西北、华北巡视回来，也参加党校工作，还和肖三^③一起，编写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讲课稿。

这期间，卓恺泽积极参加“要求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以推翻卖国的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权为目标的“国民大示威”等运动，参加了“反日讨张”^④、“反英讨吴”^⑤等国民示威大会，在党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开展斗争。但是，每次斗争都被敌人镇压下去，党团员和革命

①乐天宇：《卓恺泽同志事迹》（1982年6月19日）。

②邬景森：《再忆卓恺泽烈士》（1982年11月24日）。

③肖三，时任团北方区委书记，1983年2月病故。

④张即张作霖，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统治东北。1928年6月北京政权垮台，他逃回东北经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

⑤吴即吴佩孚，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为英美帝国主义效劳。1923年屠杀京汉铁路工人，造成“二七”惨案；1926年经日英帝国主义策动，和张作霖联合，一起控制北京反动政权，后被北伐军打垮。

群众随时有被捕、枪杀的危险。卓恺泽常去同乡友人蒋著卿^①家里隐蔽，斗争生活十分艰险。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并纠合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的军阀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同时，各帝国主义军舰云集大沽口，实行武力威胁。帝国主义的这种横蛮挑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三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在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卓恺泽参与组织这次大会，并参加了二千多人组成的请愿团，奔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当请愿团进入执政府的东辕门时，段祺瑞的军警当即封闭了东西两个出口，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当场被打死四十七人，受伤二百多人。卓恺泽在翻墙转移时，遭到反动军警用门杠猛打，从几米高的墙上摔下来，背部腰部受伤多处，遂又到蒋著卿家里治疗养伤。

“三一八”惨案后，北方的党团组织转入了地下斗争。

(三)

一九二六年六月，卓恺泽伤愈后，回到家乡松岙探亲。当时宁波地委派卓兰芳正在松岙一带开展农民运动。他和卓兰芳一起，介绍农运积极分子卓阿位等入党，动员农民参加农民协会。

^①蒋著卿，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主张革新，时在北京挂牌行中医。

卓恺泽在松岙后宅堂前召开的一次农民大会上，揭露了豪绅地主用“打瞎眼筒”^①的办法加重剥削农民的事实，动员农民起来斗争。他说：“我们只有组织农民协会，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再不给地主打瞎眼筒，土地原耕原种，秋收后再付租金，还要实行减租减息”^②。农民听了都拍手叫好，当场有近百人报名加入农民协会。

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引起那些官僚、土豪、劣绅的恐惧和惊慌。卓恺泽的舅父庄世民^③乘机对他施加压力，说：

“你年纪轻轻，正是求学深造之时，应当努力研究学问，岂可跟着共产党胡闹，将来落得生命不保，后悔何及！”^④并以资助他去日本留学为诱饵，企图阻止他参加革命活动。卓恺泽毅然拒绝了他舅父的“好意”，并在一次曹王庙演说时，揭露庄世民和其他土豪劣绅的罪恶，号召农友们团结起来，把那些官僚政客、土豪劣绅统统打倒。

七月三十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任命卓恺泽为中共闸北区委书记。卓恺泽到任后，深入基层，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为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于一九二五年起就着手编写

①“打瞎眼筒”又称打暗码。每年夏秋之交，地主把下年出租的田亩、租金公布，叫农民投标竞租。农民怕租不到田，忍痛增加租价，写在标上，投到筒里。地主开筒宣布，将田出租给投标高者，并预收租金。这是地主苛刻剥削农民的一种手段。

②卓阿位1980年11月1日的回忆笔录。

③庄世民又名庄之盘，奉化曹村人，曾任浙江都督府参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等职。

④卓华山、严式轮：《早期共青团领导人卓恺泽烈士》，《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五）》，浙江省政协1981年8月编印。

《青年平民读本》，这时已完成了一、二、三、四册，每册均为二十四课。第一册的内容，是人们最容易了解的事实和观念，如“工人的红血，清晨的红日，两个相比一样红”；“穷人的黄脸，富人的黄金，两个相比一样黄”；“富人的黑心，炉中的黑炭，两个相比一样黑”；“富人坐在家里吃鱼肉，农工劳苦做工喝薄粥”；“士农工商四种人，父母生来本相同，为甚要分富和穷”^①等。第二册内容渐深，讲述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之初步：“李家村大半是贫苦的农家”，有个农民李东山，从小读不起书，给地主做长工，过着象“牛一样”的生活；后来村里“组织一个农会”，李东山被选为农会委员；“又开办了一个农民夜校”，使农民们懂得了社会上分成两种“利害冲突”的“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等道理，大家就同地主、绅士和贪官污吏作斗争，迫使他们应许“增加雇农的工钱”、“减少地租”等要求^②。第三册讲农民遭受痛苦和压迫的原因：“是地主的剥削，如重租、预租、额外租等”，“是官吏的剥削，如苛税、额外税、贿赂等”，“是放重利债者的剥削”，“是绅阀恶棍的敲榨”，“是兵和土匪的敲榨”，还有最大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这一册还讲述了“资本”剥削的本质：“资本家只是靠剥削工人得利的一种吃人老虎”，“资本主义就是吃人主义”。它还通过讲述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进而揭露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反动本质：“中华民国十余年中，帝国主义者各自寻找一个听他的话的军阀，做他侵略中国的代理人”，“中国因为有

①卓恺泽：《青年平民读本》第1册，存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

②卓恺泽：《青年平民读本》第2册，存北京图书馆。

这两个坏东西，所以从来没有一年太平”。最后讲述了要实行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必须做到：“第一步，要宣传”；“第二步，要组织”；“第三步，要训练”；“第四步，要武装民众。”^①这四册读本的内容由浅入深，通俗易懂，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资本家、土豪劣绅横行城乡各地，弄得劳动人民困苦不堪，非起来革命不可。

《青年平民读本》的稿子经恽代英等人修改后，由各书店公开出版发行，影响很大。孙传芳军阀当局认为这是“赤化”书籍，加以查禁。但它已流入江苏、浙江、上海城乡各地，被进步组织采用为工人和农民夜校的教材，使许多工人、农民从中受到启蒙教育，走上革命的道路。

十月，卓恺泽调到团中央宣传部编辑《中国青年》。他一面做好编辑工作，一面用“砍石”或“石”署名，撰写了许多文章。从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一月这四个月时间里，《中国青年》上发表他的文章就有二十多篇。这些文章观点鲜明，说理清楚，针砭时弊，切中要害，有几篇短文，每篇虽只一、二百字，但却如投枪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

卓恺泽这二十多篇文章中揭露和批判国家主义派占了相当的篇幅。他指出：国家主义者“每以德谟克拉西为口头禅”，实际上却“羡慕法西斯专政”^②。他们鼓吹“日本宪兵司令部又帮他们把‘少数不良分子’捉了”，^③又说什么“没有五色

①卓恺泽：《青年平民读本》第3册，存上海图书馆。

②石：《反赤派眼中的德谟克拉西》，《中国青年》第147期，1926年12月25日。

③石：《国家主义者的国籍问题》，《中国青年》第143期，1926年11月25日。

国旗^①，就无所谓中华民国”。“无怪他们只爱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诸爱国军人治下的中国”^②。

文章还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叫嚷“国民革命的新障碍”，一是“世界主义”（指国际主义），二是“无产阶级专制”，三是“阶级斗争”。“可知右派的国民革命和醒狮派^③的‘全民革命’，根本便是一个东西”^④。“北伐军占领武汉、九江以后”，那些“从前反对国民政府”的右派和“北伐将领亲戚故旧”，“都跑到青天白日旗之下去图‘发展’了！”如果“由他们这样发展下去，国民政府大有与北京政府合并的可能”。文章警告北伐诸将并提醒民众，要“谨防扒手”^⑤，不要把“革命前途上的命运断送在”这些人手里^⑥。

卓恺泽的这些文章，着眼点是教育和发动群众。他指出：“应当极端重视下层群众革命的力量”，除了向群众作口头宣传，还要做“推测群众心理”的、“文字宜浅而精”的、“切实”的“文字宣传”^⑦。要通过“列宁逝世”、“孙中山逝

①五色国旗是1911年至1927年军阀统治时代的旧中国的国旗，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②石：《国家主义者的新逻辑》，《中国青年》第144期，1926年12月6日。

③醒狮派，即国家主义派，因他们曾出版过《醒狮》杂志。

④石：《右派的国民革命就是醒狮派的全民革命》，《中国青年》第147期，1926年12月25日。

⑤石：《谨防扒手》，《中国青年》第144期，1926年12月6日。

⑥砍石：《“到武汉去！”》，《中国青年》第145、146期，1926年12月20日。

⑦砍石：《怎样做下层的文字宣传？》，《中国青年》第137期，1926年10月15日。

世”、“二七惨案”、“五卅惨案”等纪念日的活动，“使革命势力更深入民众”^①。他主张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开展群众运动：革命青年不要“口头上冒称‘左派’，甚至冒称是‘共产主义的信徒’”，应“快些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或是共产党”，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②；小学教师“无论站在本身利益”“或是站在教育问题上”来说，都应该而且必须“加入工农的队伍”，“从事农民运动、市民运动、小学教员运动等等实际的革命工作”^③；同时要组织“劳动儿童团”^④，开展“儿童运动”，培养“未来社会的建设者”^⑤；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战线，要“联合有民族觉悟的‘非洋奴’的基督徒，做反教会、反帝国主义的运动”^⑥。把各条战线的群众都发动起来，“用全国革命的民众”推进“政府与军队的力量”，使帝国主义以及“封建军阀的最后营垒——安国军”^⑦，“完全倒败于我

① 斫石：《革命青年应注意的日子》，《中国青年》第149期，1927年1月6日。

② 斫石：《这是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理由吗？》，《中国青年》第144期，1926年12月6日。

③ 斫石：《怎样做小学教师？》，《中国青年》第138期，1926年10月22日。

④ 劳动儿童团是卓恺泽提出的一种儿童群众组织，在工会、农会领导下，把6至16岁的工厂童工、农村和街道儿童、小学和初级中学的学生，组成劳动儿童团，开展唱歌、体操、开会、演讲、读书、习字、图画以及象童子军那样的各种演习，培养他们具有勇敢奋斗、刻苦耐劳、活泼进取的精神。

⑤ 斫石：《劳动儿童团》，《中国青年》第141期，1926年11月15日。

⑥ 斫石：《所望于基督徒》，《中国青年》第142期，1926年11月20日。

⑦ 安国军，即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

们的脚下”^①。

一九二七年二月，卓恺泽被选为共青团江浙区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不久，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受党的指派，起草《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标语口号、传单等，参加了武装起义期间的宣传工作。

(四)

一九二七年五月，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卓恺泽参加了这次大会，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大会闭幕后，他留在武汉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和陆定一等一起，经常讨论时局问题和理论问题，编写宣传大纲和编辑《中国青年》^②。

八、九月间，团中央派卓恺泽到江浙两省指导工作。他奔波于上海、杭州等地，宣传新形势下党团工作的方针和任务，耐心教育那些由于大革命失败而消极、动摇的同志振奋精神，坚持革命。一位经他介绍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同乡友人，因武汉局势紧张而擅离职守跑到上海，被他遇上了，就严肃地向其指出：“你贪生怕死，小资产阶级意识严重，要革命总要冒点风险”^③。这位同志在卓恺泽的教育和鼓励下认识了错误，卓恺泽又介绍他去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工作。

①砍石：《封建军阀的最后营垒——安国军》，《中国青年》第148期，1927年1月1日。

②陆定一给卓恺泽之子华山的信，载《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五）》，浙江省政协1981年8月编印。

③卓华山：《回忆及友人谈我父亲革命活动的情况（补充部分）》（1982年10月9日）。

九月二十七日，卓恺泽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被选为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会后，省委书记张秋人被捕，卓恺泽仍坚持在杭州进行地下斗争。

十月初，卓恺泽与徐玮^①等人研究筹备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后，省委派他去宁波指导工作。他回到家乡松岙，带了家眷，在宁波西门附近租了三间房子居住，以家眷作掩护，进行秘密活动。

卓恺泽首先整顿了宁波的党、团组织，接着召集宁波市委全体会议。根据党的指示和宁波具体情况，他在会上就学运问题、工会名称问题、商民协会问题和妇女运动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②。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些意见，并向中央作了报告。此后，他帮助宁波各地尽快把党团基层组织恢复了起来。

一天，卓恺泽正在宁波党的联络点柴家研究工作，他少年时代的同学周闪耀恰好也来柴家联系工作。二人相见，分外高兴。卓恺泽对周闪耀说：“我是来宁波恢复团的组织并开展活动的，你是团员，要赶紧把你所知道的团员都找拢来，为革命贡献力量。”^③

几天之后，卓恺泽去鄞南三池小学找周闪耀。周闪耀陪同他到附近的康懋小学，找拢了五、六个党团员开座谈会。卓恺泽向大家询问了鄞南党、团员的情况，又一起分析形势。他强调指

①徐玮，曾任团江浙区委委员、书记等职。杭州团市委书记石天柱被捕后，团中央派他来负责浙江省和杭州团组织的领导工作，1927年11月初在杭州被捕，1928年5月牺牲。

②《宁波市委全体会议对中央提出几点意见》（1927年10月）。

③周闪耀：《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记“四·一二”以后的宁波》。《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三）》，浙江省政协1980年8月编印。

出：“革命需要武装，要用武装的革命来对付武装的反革命。”^①他还列举了优秀党、团员可歌可泣的事迹，勉励大家向优秀人物学习，努力为党工作。

一天，周闪耀和另一名团员来宁波柴家汇报，说他们又找找几个团员。卓恺泽听后，对他们两人说：“要动员这些团员出来工作，再请他们去找别的团员，这样可以找到更多的人，把组织恢复起来。”^②话毕，他叫沙文汉拿出一张“援助被难同志”的宣传画让周闪耀等看，并说：“我们有好多同志在敌人的牢狱里受难，党的经费也发生了极度的困难。为了援助被难同志，党号召党团员要出钱捐助，还要动员同情革命的民主人士也慷慨解囊相助。”^③周闪耀等很受教育，当即把身上所带的钱捐献出来，然后向卓恺泽请示了任务，返回鄞南去了。

中共浙江省委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计划在全省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卓恺泽一面派周铁僧去慈溪北乡工作，并具体交代了“重建党支部，从联系农民骨干入手，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举行秋收起义，夺取政权”^④的任务和方法；一面亲自带领曹鸿塘、柴水香、周鼎、史东标、张雪痕等，去鄞南组织暴动委员会。

暴动指挥部设在周鼎任教的鄞南石桥小学。卓恺泽即派曹鸿塘、柴水香去鄞西联系武装，他和其余成员白天分头去发动和组织群众，晚上在校内订计划、拟布告、写标语、印传单，进行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后因省委制定了《浙东暴动计

^{①②③}周闪耀：《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记“四一二”以后的宁波》。

^④李顺庆：《重回慈北组织秋收起义》，《慈溪党史资料》1982年第2期。

划》，鄞南作为暴动点之一，确定由周鼎负责，卓恺泽遂离开鄞南前往宁波。

十一月，浙江省委被破坏，王嘉谟、贝介夫、徐玮等大批党、团省委领导成员被捕。中央派夏曦、卓恺泽等重建浙江党、团省委。由于敌人搜捕甚严，新省委在杭州无法立足，便迁移到宁波办公。

此时，卓恺泽担任团浙江省委书记，为恢复和发展浙江的团组织，筹办经费和枪枝弹药，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日夜奔波操劳。一次，他来到松岙，省委派卓兰芳等人正在这一带组织奉化暴动，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松岙党支部的部分同志有些动摇。他教育党员说：“要顶住逆流，避过风浪，坚持斗争”；“即使只剩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春草会抽芽，革命一定胜利。”^①他的话，坚定了大家斗争的信心。

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为筹集暴动经费，卓恺泽带着卓阿位去爵岙他姐夫家里和曹村他外婆家里要来了近千元钱。以前，他曾写信给他父亲，提出变卖家产，资助革命。他父亲回信不同意，认为这岂不是倾家荡产了吗？他再次写信动员父亲，信中有“毁家成国，不亦宜乎”^②之句，终于说服了父亲。这次，他向他父亲也要来了几百银元，支持了武装暴动。

十二月，卓恺泽接到团中央通知，要他带家眷作掩护去上海工作。他的母亲为他生命安全担心，劝他不要再离开家乡。他在一次全家团聚吃饭时亲切地对母亲说：“妈，你一向吃素信佛，今天小菜很好，我看你还是开荤吃点鱼肉吧！”他母亲认

^①卓华山、严式轮：《早期共青团领导人卓恺泽烈士》，《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五）》，浙江省政协1981年8月编印。

^②卓华山于1982年6月8日给奉化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的信。

真地说：“这怎么可以呢？我已吃素上社，再开荤是罪过的。”恺泽微笑着说：“妈，你讲得真对！正象你吃素不能再开荤那样，我已参加革命，岂可半途而废！”“再说人生迟早难免一死，请你不要为我担忧。”^①母亲无言以对，只好含泪把心爱的儿子、儿媳和孙子送出了门。

卓恺泽到上海后，很快设法搞到了十二支手枪和十二支木壳枪，每支枪各配一百发子弹，用木箱包装，秘密地托一只经商的帆船带往松岙；另外又搞到几支手枪，派邬景森和史东标送到松岙、桐照，为奉化暴动提供了武器。

(五)

一九二八年三月，湖北省委遭到第一次破坏，团湖北省委书记唐镒壮烈牺牲。卓恺泽被委任为团中央特派员兼团湖北省委书记。离开上海前，他对爱人林文翠说：“武汉局势，确如一幢将倾的大厦，但总要有人去支撑，怎能眼看着让它倒下去？就是必死，我也要去！”^②卓恺泽坚决服从党的派遣，携妻带子，与团湖北省委书记袁寿田一起，很快赶赴武汉。

卓恺泽到武汉不久，由于湖北省委的一个内部交通投敌叛变，使湖北党、团省委遭到第二次大破坏。四月十九日下午，卓恺泽去武昌召开秘密会议，不幸当场被捕。当晚，他的爱人和儿子也被敌人逮捕。

在狱中，卓恺泽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忍受着敌人的严刑

^{①②}卓华山、严式轮：《早期共青团领导人卓恺泽烈士》，《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五）》。

拷打，坚不吐露党的机密。他的爱人林文翠关押在他的隔壁。一次，他乘狱卒不在眼前的机会，对自己的妻子说：“我决心一死，你不要难过，要坚强地生活下去。”^①四月二十二日晚上，他又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人总不免一死，死是最寻常的事。死于枪弹之下，更其比死于床褥之间的痛快而有意义。……我生时，因奔走各地，不克对我亲爱的父母有很好的物质与精神的安慰。但我想，明白的父母决不会以此责恨我。‘为公忘私’，‘为国忘家’，是古有名训的。……父母！你们乐天知命的等着光明的来到吧！”^②这些话语，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视死如归的伟大胸怀。

四月二十六日晨，敌人把卓恺泽从牢狱里带出来，押往刑场。一路上，他横眉冷对，昂首挺胸，临刑前仍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他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作者附记 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者外，还有：

1. 亦民：《悼卓恺泽同志》，《列宁青年》第1卷第4期，1928年11月14日出版。
2. 夏之栩给奉化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的信——卓恺泽任团北方区委委员及其活动情况，1982年5月19日。
3. 卓羽堂、李葆华、史永、陈企荫、卓秀菊等提供的回忆资料或访问笔录。
4. 金再及：《一九二八年湖北省委的三次破坏与重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

^①林文翠：《回忆我丈夫卓恺泽革命活动的情况》（1982年10月3日）。

^②卓恺泽给父母的遗书（1928年4月22日），存浙江博物馆。

杨石魂

熊泽初 罗可群

广东著名的共产党员杨石魂，普宁县钟堂乡人。“五四”时期，他是岭东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在风雷激荡的大革命中，他带领潮汕工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根据党的指示，先后在潮汕、南路（湛江地区）、北江（韶关地区）领导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一九二八年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一九二九年春，党中央派他赴武汉，参与重建湖北省委的工作，不幸被捕牺牲。

杨石魂，原名秉强，字昌义，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一日（农历八月初十）出生于一个中医的家庭。父亲杨汉三，前清附生（附学生员的简称），后又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专心致志于祖国文学兼精岐黄之术”^①，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和教师。母亲方素娥，生下石魂兄弟三人，石魂居长，二弟慧生，名秉龙，字昌敏；三弟名秉高，字昌明。

石魂六岁破读。由于父亲的教育，十一岁时即能作一千多字的文言文。十五岁就读于揭阳榕江中学。榕江中学的前身是历史悠久的榕江书院，辛亥革命时期改为普通中学，与金山中学、韩山师专齐名，并列为岭东最高学府。教师中有曾经留学

^①林声望：《杨汉三先生简略》（1959年5月30日），汕头地区党史办公室存。

的华侨子弟，他们带来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学校风气比较开放，订有许多报纸杂志，以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杨石魂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经常阅读《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团结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同学，一起研究时务，交流学习刊物，交流心得；还通过亲戚关系，与潮安、汕头各校友友好师生建立经常联系；又利用假期回乡机会，与城乡高小师生，交流刊物和学习资料，宣传救国道理，对传播新思想和后来的学生运动，起着推动作用^①。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揭阳后，杨石魂和同学林希孟等人首先响应。五月七日，他们领导学生组织了榕江中学学生会，在校内举行大会后又上街游行，贴标语，发传单，喊口号，还发出通电，声援北京学生。

五月十三日，揭阳全县高小以上学生派出代表，集中在揭阳韩祠广场开会，成立了县学生会，选举杨石魂为县学生会主席、林希孟为副主席。大会发表了县学生会成立宣言，会后县城学生举行大示威，并在县衙前大街包围集隆昌等几家洋货商店，搜出日本货，送往东校场焚毁；还捣毁了那些拒交东洋货的商店。

由杨石魂等学生领袖倡议，五月十四日，又在汕头组织了岭东学生联合会。杨石魂当选为岭东学联主席。岭东学联成立后，各县的学生会改为支会，统属岭东学联领导。有了统一的组织，爱国学生的斗争情绪更为高昂，他们纷纷组织宣传队，到市镇、渡口、交通要道进行演说，查抄日本货，声势很大，

^①揭阳县博物馆：《“五四”运动在揭阳》，载汕头地区党史资料创刊号，1981年7月。

贩卖日货的奸商非常惊恐，爱国群众则拍手称快。有些学生出于爱国热诚，把自己身上穿的日本洋布衣衫撕破，投入江中，甚至把自己身上的日本银元丢下江河，也在所不惜^①。

汕头市警察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局长李少如是个亲日派。他勾结日本领事，包庇走私日货，群众早就恨之入骨，只是慑于李少如权势，敢怒而不敢言。在五四运动后形成的全国性爱国热潮的鼓舞下，岭东学联决定开展对李少如的斗争。杨石魂与方临川、方思琼（方方）等学联领导人，组织学生示威游行，捣毁了汕头市警察局的门窗桌椅，向亲日分子李少如发出警告，并将查抄出的走私日货，当众焚毁。李少如平日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如今在群情激愤的爱国学生面前，无计可施，徒唤奈何。开展对李少如的斗争后，岭东学联组织的纠察队，进一步深入城乡市集，检查、焚烧日货，爱国运动的浪潮，更加高涨^②。五四时期岭东学联领导的爱国斗争，在潮汕地区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二〇年，杨石魂在榕江中学毕业，考进广州铁路专门学校。他和家乡的进步青年仍保持密切联系。假期回乡，他常和大家一起聚会，商讨时事。还与方临川、方思琼、伍治之等人组织了洪阳集益社，做一些反对封建、灌输科学的宣传工作。后来，普宁的大地主方十三，看到洪阳集益社在社会上有影响，想控制和利用这一青年组织，便派他的爪牙打进来，进而把持了这个组织。此后，进步青年都不愿再参加活动，洪阳集

①揭阳县博物馆：《“五四”运动在揭阳》。

②方方：《四十年来普宁革命运动史纪要》（1958年7月），广东省老区建设委员会编印；参见汕头市民政局、档案馆合编：《烈士小传》（1963年7月1日）。

益社便无形中解体了①。

在铁路专门学校读书期间，杨石魂感时忧国，决心投身革命。一九二一年游广州黄花岗，他缅怀辛亥革命中捐躯的先烈，写下四首《十六字令》：

愁，
惨澹黄花白骨幽。
英雄血，
洒遍黑神州！

苦，
英魂郁郁埋芳土。
狮梦酣，
几时重起舞！

悲，
壮志未酬魂已飞。
铁身手，
空换记功碑！

壮，
中原烽火烛天汉。
剑光红，

①方方：《四十年来普宁革命运动史纪要》（1958年7月）；黄学盛、罗可群：《访问伍治之同志记录》（1982年3月21日）。

鸡鸣已三唱^①

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发生了“二七惨案”。杨石魂和进步同学韩盈等人，从“二七”惨案中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狰狞面目。这时，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学生社。不久，杨石魂又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这时起，杨石魂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有位姓郑的同学，是杨石魂的好朋友，两人从小就在一块，一起读中学，一起进铁专。杨石魂有困难时，常常得到他的资助，因而对他的感情很深。后来，因郑信仰基督教，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也反对杨石魂参加青年团，杨石魂多次耐心向郑宣传解释，郑不听，两人争论十分激烈。杨石魂深有感触地说：“姓郑的虽是我总角之交，但大家的政治主张不同，我是人的理想，他是神的理想，友情无法维持下去，绝交算了。”^②

一九二四年暑假，杨石魂又回到家乡。这时，他已转入工程学校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彭湃、阮啸仙等同志。由于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他的革命思想更趋成熟。他回到普宁后，积极开展革命理论的宣传，还动员弟弟杨慧生和进步青年方思琼、黄中坚、伍治之、张清江、谢培芳等到广州去，进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十月，广州发生了以买办陈廉伯为头子的商团叛乱，农讲所的学员暂时停止了学业，投入平叛斗争。杨石魂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通知方思

① 《十六字令》四首，转引自《汕头地区党史资料》1982年第3期。

② 郭瘦贞：《回忆杨石魂烈士》，原件由郭瘦贞家属保存。参见郭瘦贞：《复汕头市烈士陵园办公室的信》（1959年5月28日）。

琼、伍治之、杨慧生等人回潮汕去，在陈炯明的统治区里从事群众运动^①。后来，他们都成了潮汕地区革命斗争的骨干。

一九二四年十月五日至十二日，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代表会议在广州召开。团中央特派员陈延年出席大会，主持改组了团的粤区执行委员会，杨石魂与刘尔崧、沈厚堃、黄居仁、周文雍、郭寿华、赖玉润等七人被选为执行委员^②，担负起领导广东青年运动的重任。

一九二五年二月，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在东江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东征军迅速攻占了惠、潮、梅地区。党组织派杨石魂担任潮汕青年团特别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汕头市总工会筹委会主席，发动和组织广大青年和工人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援助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汕头成立了国民外交后援会，也由杨石魂负责。在工作任务非常繁重的情况下，“石魂为党服务，不遗余力。当时适其祖母弃世，电他回家，他不肯来。嗣后其父诘责他，他以为‘社会事重，我既舍身社会，我牺牲一切，不暇顾及家内云云’，其立志坚决如此。”^③

一九二五年六月，正当汕头的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时候，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叛乱，东征军回师广州。陈炯明的残部洪兆麟见有机可乘，卷土重来，于九月十六日攻陷汕头。霎时间，潮汕上空乌云滚滚，大批革命群众遭到逮捕、

①方方：《四十年来普宁革命运动史纪要》（1958年7月）。

②《团区委关于区委改组及经费问题的报告》第一号（1924年），广东省档案馆存。

③杨汉三：《石魂事略》（1949年11月7日），原件存汕头地区党史办公室。

监禁、杀害，杨石魂被通缉。在这险恶的白色恐怖中，杨石魂隐蔽在汕头市郊，冷静地分析形势，积极采取对策。他首先考虑到工人群众的困难，将外交后援会尚存的四千元，酌量各工会情形，秘密分送最困难的工人维持生活；派方维精等人带领后援会的十几杆短枪到乡村去，等待时机，准备武装暴动，打击敌人；安排一部分青年团员和柔刚、吴梦龙等，留汕头进行地下斗争，另一部分如谢培芳、方思琼等则派到各县去开展工作；还以国民党市党部的名义发出通电，揭露敌军入汕后的残暴行为^①。这些工作做好以后，杨石魂才于九月二十九日和伍治之一起离汕赴穗，向组织报告详情。因广州至汕头间交通早已断绝，不能直接去广州，只得绕道厦门。他俩跋山涉水，一直步行至福建之诏安、东山，然后在东山坐船，直到十月十八日才到达厦门。

他们在集美师范找到了当地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同时还见到了来自陆丰的张威、卓俊才两同志，知道陈军占领海、陆丰后，同样十分残暴，李劳工等同志被杀害，农会干部的家均被焚抢一空。杨石魂非常悲愤。他顾不上休息，十月二十日，就把在厦门和沿途搜集到的情况及时向组织报告。报告中说：“厦门报纸计近十家，大半同情国民革命军之行动”；“潮汕可暴动之农工群众，约数千人；因潮安县各乡绅大地主于我军退出时，将各乡农会执行委员名单，列为土匪，报于陈军，请办清乡，迫于出此。”^②随后，杨石魂、伍治之等在厦门听到

① 《治之、石魂给中英兄信——汕失陷后工作情况概述》（1925年10月19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杨石魂关于敌情的报告》（1925年10月2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东征军攻克惠州的消息，立即决定：伍治之回汕头，张威、卓俊才回陆丰，通知原来“埋伏”在当地的同志预备农民暴动以策应东征军。杨石魂则到上海先向团中央报告详细情况，听取指示后，再转广州回汕头。

十一月，东征军收复汕头，周恩来出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潮、梅二十五县。汕头国民党党部改组时，杨石魂被选为汕头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在中国共产党内，他是中共汕头地委委员，任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年仅二十三岁的杨石魂，担负起了领导潮汕工人运动的重担。

汕头市的工人以交通运输业的人数为最多。他们多是来自海陆丰、潮阳、揭阳等地的破产农民，不仅受反动把头的剥削，还经常受反动警察的压迫和敲诈，毫无政治权利，生活又十分困苦。杨石魂决定从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工人着手，组织他们同反动把头作斗争。为了深入工人群众，他专门赁了一辆车去学当人力车工人，日间拉车，晚上跟工人谈话。他虚心请教，很快学会了拉车本领，也同拉车的工人结成了朋友。工友们向他倾诉生活的痛苦和心中的愤懑；他因势利导，启发、提高工友们的阶级觉悟，人力车工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接着，杨石魂又帮助建筑业的工人组织起建筑业工会，并在彭湃的协助下，以汕头码头青年工人为主，建立了劳动童子团。

那时，汕头市的工人组织繁多，各自的活动互不联系，有些工会则为工头、流氓所把持。我党为了统一对汕头工人运动的领导，决定建立统一的工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杨石魂以国民党市党部工人部的名义，召集各工会代表，共商统一大计。中华全国总工会派代表林昌炽参加指导。经过民主协商，代表们一致赞同组成统一的工会组织。经过短期的酝酿，

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一日，召开了汕头市各工会代表会议，决定将汕头工会联合会正式改组为汕头总工会，杨石魂被选为临时执行委员。五月一日，汕头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开幕，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正式成立了以各行业为基础的总工会。杨石魂以建筑业工会代表的身份被选为总工会的执行委员，分工担任宣传部主任^①。

汕头总工会成立之前，杨石魂就经常深入潮汕铁路工会、汕头建筑工会，培养工人骨干，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随后，他又领导潮汕铁路工人开展经济斗争，使工人的工资由每月十五元增为二十元，有的工人则由原来的二十元增为三十五元。过去营造厂的资本家对建筑工人的剥削非常苛刻，每天工作达十小时，日工资仅八角钱。杨石魂组织建筑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坚持了一个月，终于迫使资本家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即：（一）减少工时，每天由工作十小时减为八小时；（二）提高工资，每天由八角增为一元；（三）在工资中附加百分之一作为建筑工人子弟学校经费^②。

总工会成立以后，杨石魂领导工人在继续开展经济斗争的同时，积极进行政治斗争。他协助汕头的海员罢工委员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汕头办事处，封锁汕头的出海口，有力地支援了省港罢工，支持了广东的国民政府，给英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

①林天：《大革命时期汕头市的工会组织》（1951年），见汕头地区档案馆《剪报资料集》；汕头市民政局、档案馆合编：《烈士小传》（1963年7月1日）。

②吴华胥：《回忆杨石魂同志》（1957年5月9日），见汕头地区档案馆：《剪报资料集》。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汕头市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时，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已达二万一千余人。十月十四日，在汕头市永平楼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杨石魂被选为总工会的执行委员长^①。这时，工会会员已发展到三万余人。汕头总工会的力量不断壮大，威信日益提高，潮汕各县工会纷纷表示拥护和服从汕总的领导，汕头总工会成为岭东工人运动的指挥部。

北伐战争开始后，杨石魂领导潮汕地区的工人群众，大力支援北伐战争，组织了罢工工人北伐运输队，为北伐军挑粮草、运弹药、抬担架。但是，北伐军中的国民党右派军官，对这些罢工工人却诸多指责，百般刁难，甚至殴打、监禁、残害工人运输队员。杨石魂向中共汕头地委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共汕头地委认为，必须与国民党右派军官虐待工人运输队的暴行作坚决斗争。于是，杨石魂组织工人群众到汕头留守司令部示威，提出的口号是：“拥护北伐，反对北伐军中的右派分子虐待工人运输队！”这一斗争，维护了工人的正当权益，迫使那些右派军官不得不释放被监禁的运输队员，补发了薪饷。斗争的胜利，使工人群众对我党更加信赖^②。

工人运动越是高涨，反动势力越加把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杨石魂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杨石魂到揭阳参加工人代表大会（一说是为了调解轮渡工会与伪工会的纠纷），住在张园旅社。十二月十一日（农历十一月初七）下午，揭阳的反动分子周伯初、林宴林、李德萱、孙子庭

^①林天：《大革命时期汕头市的工会组织》（1951年）。

^②蔡洛、罗可群：《访问罗明同志记录》（1980年10月12日）。

等人，指使流氓许实德率领数十名凶徒闯入旅社，绑架了杨石魂，连夜押往潮阳柳岗乡监禁，并企图以土匪绑架为掩饰，暗中置杨石魂于死地。揭阳的人民群众得此消息后，非常气愤，工农商学各界集体向揭阳县政府请愿，并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反动派的罪行。第二天清晨，揭阳工农商学各界代表一百零三人，乘轮船前往汕头，向留守汕头的代理潮、梅绥靖主任何辑伍（何应钦之弟）请愿，要求立即释放杨石魂^①。与此同时，揭阳的农军包围了揭阳县城——榕城，向反动派施加压力。汕头的人民群众在我党领导下，由工农商学各界组成查缉委员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们手执木棒，走上街头，高呼口号，要求驻军派兵去搭救杨石魂，表示如果不答应，则全市进行罢工、罢市。何辑伍明知此事的来龙去脉，暗中支持反动分子，表面上却装聋作哑，置之不理。这时，电话工人勇敢地站了出来，当场揭发何辑伍为绑架杨石魂事与揭阳反动分子通电话的事实。于是，群情更为激昂，表示如果不释放杨石魂，就立即实行全体罢工。潮汕铁路工人已做好了罢工准备，形势紧张，一触即发。何辑伍见势不妙，才支支吾吾，表示要电令揭阳放人。

为了营救杨石魂，中共汕头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地委书记罗明认为，彭湃富有斗争经验，会提出较好的办法。便急电出巡梅县的地委委员彭湃立即赶回汕头^②。

^①参见张南浦等七人：《报告书》（1957年4月28日），原件存汕头市档案馆；普宁修志委员会黄光耀编写：《杨石魂烈士传略》（1958年2月15日），原件存汕头市档案馆。

^②罗明：《我认识的彭湃同志》（1982年），记录整理稿，原件存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

彭湃返回汕头后，和地委的同志一起进行分析研究，鉴于当时仍处于国共合作的形势，决定采用合法斗争的形式营救杨石魂。彭湃建议由他本人亲自到揭阳去交涉，地委接受了他的意见，当晚，彭湃一行三人（其中有一位是潮通社记者梁工甫）乘船赶赴揭阳。晚上十一时到达揭阳后，彭湃先找县农民协会的负责人了解情况。他说：“你先叫农民武装向后撤退，然后再商量营救杨石魂。”那时，反动派与革命群众对抗，紧闭城门，我方人员无法进城交涉。农民武装撤退后，他们才把城门打开。彭湃一进城，就立即去找县长和民团头目，要他们释放杨石魂。他们推推托托，说不知道这回事。彭湃义正词严地说：“你们已经和何辑伍通过电话，怎能推说不知道？”彭湃摆出许多事实后，他们抵赖不了，又惧于工农群众的巨大压力，最后不得不表示释放杨石魂。^①

十二月十七日，杨石魂终于被释放了。但他在被囚禁的七昼夜中，“仅食三个芭蕉，三块桃棵，三碗稀粥”^②。残酷的折磨使杨石魂形容憔悴，甚至连站立都非常困难。因遭受了反动分子的残酷毒打，受了重伤，不能说话。同志们见此惨状，无不为之泪下。石魂的父亲杨汉三亲自医治护理，“急取高丽参炖而服之，越宿而石魂之气色稍转好”^③然后由揭阳县各界代表二十多人，护送杨石魂回汕头。

汕头工农商学各界，为杨石魂的脱险归来，在牛屠地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连附近的街道也挤满了

①叶惠南、何锦洲：《访问梁若尘同志记录》（1980年9月6日），原件存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梁若尘即梁工甫。

②③杨汉三：《石魂史略》（1956年5月1日），原件存汕头地区党史办。

人群。同志们把杨石魂扶上讲台，他嘴边的血伤仍在，声音也十分微弱，但仍坚持讲话，每讲一句，都由旁边的另一位同志大声复讲一遍^①。

杨石魂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被绑架的情形。他说：“到揭阳住在张园旅馆内……被绑架了，用棉花塞住口，手足缚紧，象个粽球……掩住眼。我想这次完了，但为工人阶级牺牲了，是伟大的，光荣的。……他们为什么要绑我？只因为我是为工人阶级服务，为工人阶级谋利益……这是不对的吗？难道我杨石魂不为工人谋利益，而为资本家谋利益吗？……他们，把我缚在柱上，打……打，难道我怕打吗？……我杨石魂既为工人服务，死也不怕，还怕打吗？……打不死，把我衣服脱光，用冷水淋我，直到天光！然后，……二人拉着头，二人拉着脚，象锯杉那样，来回拉着……就是拉锯，……就是把我的肉身从荆棘丛中拉着……兄弟们，同志们，你们看……。”^②

杨石魂把衣服解开，露出皮开肉绽的身体。台下的群众看了，泣不成声。他们一齐愤怒高呼：“打倒反革命！”“打倒帝国主义走狗！”“打倒地主资本家！”“惩办凶手！”会后，群众抬着杨石魂，举行了示威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震天动地的口号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杨石魂的热爱，对反动势力的仇恨。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英国水兵在汉口枪杀中国市民；六日，又发生炮击我九江群众事件。接着，又增派英兵来华，支持封建军阀，压制中国革命。英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激起了

^①刘斌：《忆 1925—1927 年汕头的群众运动和左右派的激烈斗争》，《汕头地区党史资料》1981 年第 2 期。

^②许美勋：《冯铿烈士》，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为此，中华全国总工会通令全国各地于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全国举行总罢工一小时，以示抗议。汕头总工会接令后，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除发表宣言、周密布置各行各业依时举行罢工外，还组织了庞大的宣传队伍。那天上午九时四十分，杨石魂以总工会执行委员长的身份，在总工会门前对各演讲队、纠察队发表演说。他说：“北伐军节节胜利，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大受打击，遂在汉口、九江屠杀爱国同胞，复公然派兵来华，占领上海，援助孙传芳、张作霖，并尽力挑拨，煽动各帝国主义联合向华压迫，其阻抑中国国民革命之阴险，不言而喻。工人乃国民革命先锋队，故中华全国总工会扩大执委会决定通令全国五千万工友，在今天上午十时起，一致罢工一小时表示反抗之决心。但罢工虽然一小时，而意义非常严重：（一）是援助革命军；（二）是反抗英军来华；（三）表示工人之革命力量；（四）引起全国同胞一致反抗；（五）使全世界无产阶级急起援助。所以，今天罢工的工友，可说是反帝国主义军阀的勇猛的战斗员，愿各位代表一致努力。”^①罢工开始了！火车、轮船、人力车、轻便车一律停止行驶，商店停止营业，罢工工人组成的飞行演讲队到处宣传演说，工人纠察队则负责维持秩序。杨石魂直接领导的这次大罢工，又一次显示出潮汕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反帝斗争影响。

二月，汕头召开了潮梅、海陆丰农民和劳动童子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进行反击。大会驳斥了右派对工农运动的诬蔑，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号召工、农、商、

^①1927年2月28日《岭东民国日报》。

学、妇各界要加强团结，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杨石魂十分重视这次会议，不仅亲自出席，而且在二月十四日的农、童代表大会上作《职工运动报告》，表示潮汕地区的工人阶级决心与农民弟兄一起共同奋斗^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汕头的国民党反动派跟随蒋介石，极力镇压工农运动，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月十四日深夜，汕头的反动派包围了汕头总工会，杀害了总工会秘书丘磷，同时悬赏花红三千元，通缉杨石魂。杨石魂隐蔽在福合沟（现福平路）内新乡建筑工人林二家中的小楼上，隔巷传来反动军警的吆叱声，听得很清楚。林二着急地说，困在这里很危险，必须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杨石魂镇静地说：“好，你去找铁路工会张同志，再就是建筑工会方同志，这两人一定要找到，我还有重要的事交代，不单是我个人的安全。”杨石魂还请林二将应急措施的意见转告另外的几位同志。黄昏时，方同志和三、四个建筑工会的工友接连来到林二家。老方对杨石魂说：我们已布置好了。随即帮杨石魂装扮成一个建筑工人模样：头包白布，脸部遮了一半，脚穿草鞋，肩荷一根筑墙的木槌；其余的工友，有的挑着一担竹箕，有的拿着成捆大麻绳，口含香烟，与杨石魂一起说说笑笑地来到街上，看上去，是一群收工归来的建筑工人，他们由中马路转向月眉坞（现公园旁）时，老方还揽着杨石魂的肩，故意把他的脸遮着，瞒过敌人耳目，到了月眉坞边，潮汕铁路工会的张润已经摇着小船，装着赶鸭儿，在那里等着，他们上船后，连夜赶到了张厝下。杨石魂在船上鼓励大家说：目

^①1927年3月1日《岭东民国日报》。

前虽然遭到挫折，但革命一定要胜利的。他还嘱咐张润等同志回汕头后。把存下的文件、名册烧毁，决不能落到敌人手中^①。

杨石魂在张厝下住了四天，又由当地农民乘夜带他到蔡厝下，乘小船到揭阳的焦堂转往沟头。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杨石魂又挑起了领导武装斗争的重担。他和许怀仁等一起召集各乡的农民自卫军和从汕头撤出来的工人武装，组织起东江工农自卫军，杨石魂、许怀仁任副总指挥（总指挥一职由已经前往武汉开会的彭湃担任）。东江工农自卫军原计划反攻汕头，后考虑到汕头方面敌人的力量很强，遂由杨石魂率队开赴普宁，配合当地的农民武装，攻打洪阳的大恶霸方十三，还在普宁的大坝组织了普宁县人民政府，然后向海丰转移。这时，海陆丰武装起义建立的“十日政权”已经失败，吴振民率军转移到了陆丰的河口墟，杨石魂便率队前往汇合。“进行整编后，成立了三个团，吴振民任总指挥，林甦任政治部主任，杨石魂任党代表，余创之任参谋，余坤、钟古、黄强三人分任团长”^②。

在河口，杨石魂受中共广东省委的委派，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有三种意见：杨石魂主张经湖南奔赴武汉；余创之主张化整为零在海陆丰各地打游击；古大存不同意孤军冒险远征，主张在兴梅毗近江西的山区活动。最后，会议根据杨石魂的意见，决定大部分开赴武汉，留林军杰在海陆丰坚持游击

①许美勋：《杨石魂脱险记》；吴华胥：《回忆杨石魂同志》（1957年5月9日），均见汕头地区档案馆《剪报资料集》。参见：吴华胥：《关于四一五事变后杨石魂同志脱险情况》（1982年3月29日）。

②古大存：《自传》，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战。杨石魂以党代表的身份，命令古大存回五华准备策应。河口会议后，吴振民、杨石魂于五月十四日率队北上；杨石魂的弟弟杨昌明也随军出征，负责军需工作。我军在五华农民军配合下，解放了安流。敌人即派一个团的兵力反扑，我军退出安流，进兴宁水口，经梅县、平远，进入江西的寻邬，摆脱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追击。在江西寻邬县的牛斗岗，缴获了国民党第五军独立第六师补充团的公函、文件、印信，于是乔装成第五军的部队，又经会昌、上犹向湖南前进。当农军到达距赣州约八十里的一個县城时，伪县政府、国民党党部以为是国民党的军队来了，曾设宴欢迎。席间，钱大钧某部参谋长刘某大骂共产党。当晚，吴振民率部包围了国民党军政机关，俘虏了一批官僚，押到湘赣边境时，处决了那个反动的刘参谋长，其余的全部释放^①。

农军进入湖南，到了茶陵、酃县时，听到了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消息，七百多人的农军进退维谷。为了与上级党取得联系，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吴振民曾几次派人前往武汉请示彭湃。当时湖南的形势已十分紧张，土豪劣绅向农民反攻倒算，十分猖獗，对外地的陌生人诸多猜忌，有的反动武装甚至专杀有头发者（那时湖南人剃光头），派往武汉的人行动十分困难。吴振民没有得到回音，于是又派杨石魂等四人到武汉去。杨石魂等人在出发时全部剃了光头。但到了一个地方，又听说凡新剃光头者即被杀，于是，四个人只好分散。杨石魂又经过化装，历尽艰险，于六月底才到达武汉，住在中共两广招

^①何锦洲：《访问陈启昌（劲军）同志记录稿》（1964年6月19日），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存。

待委员会。他找到了彭湃，也见到了吴振民最先派往武汉的古柏、陈劲军。古、陈也辗转刚到武汉。这时，形势已经急剧变化，武汉国民党政府日益反动，而吴振民部在汝城已被敌军击溃，吴振民光荣牺牲。中共两广招待委员会书记彭湃对留在武汉的同志说：“全部广东同志回广东工作。武汉国民党可能叛变，但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黄琪翔部（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内）可能与我们合作，打回广东去。你们回广东发动地方武装配合。”^①杨石魂奉命从武汉返回汕头后，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斗争。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公开背叛革命。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起义军撤出南昌后，经过长途跋涉，于九月二十三日进占潮州。杨石魂率领东江工农革命军进入汕头策应。他们打开监狱，释放了被捕的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于二十四日迎接起义军进入汕头，建立了革命政权。革命政权仅存在七天，被称为潮汕“七日红”。在此期间，杨石魂协助周恩来、彭湃等同志，在建立革命秩序、维护社会治安、组织宣传群众、支援起义部队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十月一日，起义军面临强敌包围，全部撤离汕头。杨石魂与周恩来等一起撤退，二日抵普宁流沙镇。三日，在天后庙（后改为基督教堂）的西侧厅举行了紧急的军事会议，讨论党中央关于领导人员分散转移、武装部队向海陆丰撤退的指示。同一天，张太雷、恽代英等党的领导人在平湖读书楼开会，与杨石魂一起研究如何护送中央领导同志撤离战区的工作。当天

^①何锦洲：《访问陈启昌同志记录稿》。

下午，当起义军队伍进到池尾莲花山时，突遭优势敌军截击，因众寡悬殊而失败。由颜昌颐、董朗收集的一千二百名起义军，于十月七日抵达陆丰。十月九日前后，杨石魂和叶挺、聂荣臻等保护着正在发高烧的周恩来，经惠来到甲子港，又由建林寨李厝乡到南塘。杨石魂随即给南塘区委书记黄秀文写信，说他陪同几位负责同志到了南塘，拟在金厢雇船去香港，要黄秀文设法解决交通问题。并约定第二天晚上九点多钟在琐城岭相会。黄秀文立即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按约提前到达相会地点，把周恩来等同志接到了自己家中。当时，周恩来仍在发高烧，无法及时去港。杨石魂对此十分着急，他对黄秀文说：“周恩来同志发烧很久了，昨天过度疲劳，今天烧得更厉害啊！”经过商议，他们决定一面向陆丰县委报告，一面派人雇船只准备出海。第四天，陆丰县委通知将周恩来送到溪碧村医病，那里有可靠的中医生。杨石魂等又护送周恩来前往。过了四、五天再回到黄家，又住了十多天。十月二十八日，杨石魂和黄秀文护送着周恩来、叶挺、聂荣臻，五个人一起乘船前往香港。到达香港时，杨石魂对黄秀文说：你先到海边街潮汕客栈开房等我们。然后，杨石魂背着正在生病的周恩来上岸，胜利完成了转移中央领导同志的任务^①。

大革命失败了，南昌起义也失败了。杨石魂的战友李春涛、廖伯鸿、吴振民等一个个都为革命英勇牺牲了，他的胞弟、共产党员杨慧生也在汕头被敌人杀害。面对鲜血淋淋的现实，

^①黄秀文：《难忘的日子》（1959年《工农兵》第8本）；参见：黄秀文忆述，叶左能整理：《记杨石魂护送周恩来和叶挺等同志由陆丰转移到香港的经过》，《汕头地区党史资料》1982年第3期；范桂霞：《永世难忘的经历》，《广东文史资料》第27辑。

杨石魂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勇敢，更加坚定，更加顽强地奋斗。一九二八年二月，广东省委派杨石魂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到广东南路检查工作，随即担任南路特委书记。南路地区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经费困难，“党员群众的政治意识尚觉低落，城市的工作又未能强大的建立起来。”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杨石魂对工作仍充满了信心。他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特委中几个负责同志都是以全性命来奔赴我们的使命，绝对的积极而且乐观的来从事南路的革命运动，丝毫没有规避的意思，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当然要与比死更厉害的险阻艰难奋斗，我们总能坚决自信的，而且我们对南路的工作正感觉极浓郁的乐趣哩！”^①

当杨石魂知道以前在汕头共同进行革命活动的梁工甫到了新加坡时，就托人给梁带信，鼓励梁继续参加革命斗争。他在信中说：“生意失败了，还要继续经营！”叫他设法回到海南岛工作^②。

大革命失败以后，北江地区“未有很健全的工作系统”^③。一九二八年秋，省委又将杨石魂从南路调往北江，担任北江特委书记。杨石魂到北江特委后，立即于十月二十七日召开两天的“北委”会议，分析北江形势，贯彻省委指示，向各县布置了工作。二十九日，“北委”就这次会议情况向省委写了报告^④。

十一月十六日到二十四日，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了第

①杨石魂：《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11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叶惠南、何锦洲：《访问梁若尘同志记录》（1980年9月6日）。

③④《北委报告》第2号（1928年10月29日），广东省档案馆。

二次扩大会议，贯彻“六大”精神。会议指出：党在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广大的群众，积聚革命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和武装暴动。十二月六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杨石魂当选为广东省委常委，分工是宣委兼农委^①。

不久，党中央调杨石魂到上海分配工作。一九二八年底，杨石魂和爱人熊婉仙由交通员李沛群护送，从香港坐船到了上海，住在五马路的乐群旅社。他们在这里迎来了一九二九年元旦。在这个旅社里，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杨殷、邓小平等都曾找杨石魂谈话，介绍当时党内斗争情况，向他交代到武汉去重建湖北省委的任务^②。

杨石魂时刻牢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他在去武汉之前给《党内生活》的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因年来革命事业遭了巨大的失败，我们党的基础遭受悲惨的牺牲而削弱——尤其是党的干部同志！所以，现在我们要如何艰苦工作来培养新的干部，创造新的基础，以担负这个艰巨的中国大革命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个同志现在当前的严重的任务！……我们要想念两年来在艰苦奋斗中牺牲了的许多同志和干部的领袖们！我们更要想念现在还在农村中与死搏斗的饥寒交迫的成千成万同志们！”^③。

一九二九年春，杨石魂不畏艰险，与陈介陶、刘恢等三人前往武汉。二月十九日抵汉后，立即开展重建省委的工作。二

①恽代英：《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情形致中央报告》（1928年12月3日），广东省档案馆。

②雷仲平、田中伟：《李沛群同志谈话记录》（1980年8月18日）。

③杨石魂：《江苏问题》，《党的生活》第5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藏。

十六日，杨石魂担任省委秘书，化名林禁、拾芬。五月初，正当杨石魂和曹壮父、叶开寅等紧张工作的时候，不幸在办公处被敌人逮捕^①，后英勇牺牲^②。

杨石魂牺牲后，他的父亲杨汉三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加以“纵子参加共产党”罪名而被捕入狱，关押半年，受尽折磨。三弟昌明也被迫流亡海外，病故异乡。全国解放后，杨汉三老人以十分喜悦的心情，写信给周恩来总理祝贺胜利。信中说：“中国共产党经二十八年之苦斗，我之子虽牺牲三人，家产破尽，固可悲伤”，但是，“革命已告成功，蒋匪残余力量逐渐消灭，人民的痛苦自此可以解除，愚遥为先生贺并为全国民众幸也。”^③周恩来收到杨汉三的信后，着令内务部复函慰勉：“三子为国牺牲，实属无上光荣。”^④同时，他私人给杨汉三老人寄去二百元，对烈士的亲属表示深切的关怀。

①曹大骏：《省委被破坏及湖北工作情形报告》（1929年5月6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②关于杨石魂烈士牺牲的时间和地点，据王碧辉1930年初说，杨石魂“在汉口光荣牺牲”（见汕头市民政局、档案馆合编：《烈士小传》）；当年护送杨石魂到上海的李沛群说：“在武汉被捕牺牲”（见雷仲平、田中伟：《李沛群同志谈话记录》）。

③杨汉三致周恩来信，原件存汕头地区党史办公室。

④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内务部给杨汉三的复函（1952年8月13日），原件存汕头地区党史办公室。

黄学增

阮应祺 邓荣诗 杨杰生

黄学增是大革命时期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齐名的广东四大农民领袖之一，土地革命时期广东西江和海南岛武装起义的一位领导者、海南岛红军和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九年七月，在海口市英勇就义。

成 长

黄学增，小名阿贵，学名学曾，后改名学增，公元一九〇〇年九月十四日出生于广东省雷州半岛上的遂溪县乐民区敦文村。

那时候的雷州半岛，以干旱贫瘠著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佃农所耕，“大少数是旱田，一年两造，早造种禾，晚造种薯。其收获之谷，完全交与田主，收获之薯，则归佃农”^①。地主阶级除了通过重租剥削农民，又通过高利贷对农民敲骨吸髓。黄学增故乡乐民区的地主黄海舟，放债年息百分之一百，农民借债半年后，就要交纳年息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垫利”，无钱纳息的，“垫利”

^① 《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上），《中国农民》第4期。

即转为“母本”计息。以借款一百元、借期一年为例，年终还本纳息总额的计算方法是：100(母本)+50(垫利)+75(母本和垫利在后半年里的利息)=225，年利率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五^①！地主的盘剥，使不少农民被迫卖儿卖女，逃亡他乡，有的自卖为“猪仔”，出洋做苦工，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黄学增的家庭，是雷州半岛上无数贫苦农家之一。他小的时候，家里七口人，只有四亩瘠薄水田。父亲黄英如在家务农，母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一家勤劳耕种，所收不足糊口。大哥学颜有力气，兼替别人长途肩挑，挣点血汗钱养家。四弟学孟，少年夭折。黄学增七、八岁起，就割草打柴，或到海边捉鱼虾，地里拣甘薯，还替人看牛养鸭，为家庭增加一点收入。他很会养鸭，一个人看鸭三百多只，鸭子都听他口哨指挥，从不丢失。父母亲见他小小年纪就勤劳敏捷，知道为家庭分忧，心里感到高兴。辛酸的家史，苦难的童年，乡亲们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情景，在黄学增幼小的心灵里烙上了深深的印痕，也培养了他刻苦耐劳、刚强不屈的个性^②。

十三岁时，黄学增才开始进入本村私塾读书。私塾里读的是《三字经》和《四书》，唯求识字，不求甚解。十六岁以后，他转入乐民小学和雷州中学，读的是《国文》、《算术》等新课本，学习一些当时称为“西学”的近代科学基础知识，并陆续从遂溪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强租广州湾的英勇斗争故事里，受到了爱国思想的熏陶。

^①遂溪县档案馆馆藏资料。

^②黄学增胞弟黄学思的回忆。

一九一九年，黄学增结了婚，妻子苏莲也是穷人家的孩子。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父亲又得了病，一九二〇年春，黄学增被迫辍学回家耕田。一些亲友觉得可惜，表示愿意资助他去广州求学，父亲也决定全家节衣缩食，极力支持。于是，黄学增在这年夏天，考上了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他告别了父母和乡亲，背着简单的行李，步行一千华里到了广州市。

此时的广州，马克思主义在广泛传播，各种新书刊象雨后春笋，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尝试着同工人群众相结合，青年运动也在蓬勃开展。黄学增在这种热烈向上的环境中，除了认真学好功课之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并很快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还参加了中共广东支部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杨匏安、张善铭等人一起，成为这个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通过投身各种进步活动和斗争，黄学增的思想出现了飞跃，从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知识青年，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一九二二年，黄学增由团转党，成为中共党组织的早期成员之一^①。

一九二三年初，黄学增同雷州青年韩盈等人发起组织了雷州留穗同学会，团结雷州三县在广州读书的青年，学习革命理论，还邀请高州、琼崖在穗学生，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他俭朴好学，待人诚恳，乐于助人，有时家里寄来一点钱，自己舍不得花掉，但为了帮助同学解决困难，却一点也不吝惜。因此，大家都很尊重他、信赖他。

^①黄学增在广州的活动和由团转党的时间，据《薛文藻自传》；谭天度：《回忆往事话当年》；高军：《广东党组织的建立》等文。

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起，黄学增开始从事农民运动。这年秋天，他接受党的派遣，到广州附近的花县农村，秘密建立党组织；又同在那里工作的阮啸仙、周其鉴等一起，深入农村宣传发动农民，筹备成立农会。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有力地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时，黄学增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花县的工作，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也有了显著的进展。四月，中共花县支部正式成立，并陆续在九湖、元田、宝珠岗、象山、东坎埗等地组织起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反封建斗争。

一九二四年七月，黄学增被选送到彭湃主办的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开展农民运动的方法，并接受必要的军事训练。农讲所毕业后，他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十月中旬，他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会候补委员，分工担任工农部助理；以后又到中共广东区委会担任农委委员。黄学增活跃在广东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为广东农运的兴起而奋斗

一九二四年八月，黄学增在农讲所毕业后，再次被派到花县工作。花县是当时农运重点县份之一，中共广东区委对花县农运相当重视，曾陆续派过彭湃、周其鉴、阮啸仙、何友述、高恬波（女）、韦启瑞等到那里去。黄学增在花县连续工作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他和上述先后到过花县的同志互相配合，协助当地农运骨干，发展农会组织，领导农民斗争。十月十九日，

花县农民协会在九湖乡举行成立大会，六千多名会员和农民自卫军荷锄荷枪出席，还邀请了贫苦农民数千人到会，农民革命声势大振。县农协成立后，立即领导农民向地主土豪开展斗争，实行减租，取消“批头”剥削和送租、送礼等苛例，并决定把地主土豪控制的“猪屎会”的收入款项，收归农民协会管理。

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了地主土豪的仇视。他们勾结县长江侠庵，发起组织了花县田土业权维持会（即地主会），成立民团，购买武器，准备反扑；同时还搞所谓“不认亲”，禁止亲戚同农会会员来往，连出嫁的女儿也不准返回娘家，妄图以此孤立农会。十月底，地主武装五百余人进攻九湖乡。当时在九湖乡的农民自卫军只有六十人，无法抵抗。黄学增等率队撤离，把县农协办事机构迁到鱼苟庄，并决定用“猪屎会”所收款项购买枪枝，扩大自卫军，保卫农民协会。但这件事受到县农协管理财政的王锦昭阻挠，数议不决。后来查清王锦昭是地主会安插在县农协里面的代理人，黄学增遂与王福三等，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带领少数农军前往凤岭村把王锦昭抓了起来。归途中，他们被地主江锦堂带领的民团堵截，双方发生激战。农军人少，王福三壮烈牺牲。为了避免损失，黄学增指挥农军向元田村撤退，在元田群众的掩护下，才安全回到了鱼苟庄。等民团向鱼苟庄进攻时，黄学增等已调集农军严阵以待，把敌人击退，保住了花县农民协会。

花县早期农民运动，锻炼了农民群众，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那里的地主豪绅势力十分强大，且同广州的反动商团互相勾结而成为商乡联团，疯狂向农民进攻。因此，正在发展的花县早期农民运动遭到了挫折。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黄学增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会上，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全省农民统一在省农协的指挥之下，开始有系统地组织和行动，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以实行减租和反抗民团压迫为主要内容的“广东农潮”。据十月份统计，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已从二十二县二十二万人，迅速发展四十县四十六万五千人。

广东农民运动是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影响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在革命实践中，黄学增深切地认识到，工人阶级和农民必须结成“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势力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他代表省农协向省港罢工工人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广宁农运受到地主土豪严重摧残的情况时指出：“在现在国民革命当中，工农两阶级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工农两阶级要有很亲密的结合”。他还宣布，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将特设工人讲习班，吸收工人参加学习后分配到农村去支援农民运动，“务使工农阶级实行结合以打倒帝国主义”^①。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实际活动中，黄学增注意动员农民支持工人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他以省农协代表、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协助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前往宝安县沙井，查办土豪劣绅偷运粮食、破坏禁运、殴打纠察队员、扰乱罢工的事件时，曾遭土豪民团的武装袭击，脱险而回^②。后来他在南路工作时，也很注意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同时

① 《工人之路》第39期。

② 《工人之路》第142、144、150、154期。

积极开展职工运动，组织各县农民协会支持省港罢工，站岗放哨，封锁港口，查缉仇货，打击土豪劣绅和不法官吏破坏罢工的活动。

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在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十分恐慌，加紧反共反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黄学增和宋庆龄、蔡如平、刘尔崧、韦启瑞等九人，代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出席了这次大会，黄学增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农民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审查农民问题提案和《农民运动决议案》。

一月十八日，黄学增向大会详细介绍了《农民运动决议案》的内容。这个决议案指出：“中国国民党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当以农民运动为基础，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亦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利益之本身，政府之行动亦须根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①。为了反击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保护农民利益，保卫农民运动的发展，黄学增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决议案里提出的取消各地民团局和民团武装、惩办反动防军和不法官吏、禁止高利贷和苛捐、规定最高租额、取消押租和上期租、取消田赋附加捐、制止预征钱粮等二十一项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措施。

会议期间，高要县地主土豪卢沂川、梁荣邦等，纠集广宁、德庆、高要三县民团五百人和黑社会组织“神打团”及土匪三千余人，于一月三日至五日包围领村、波河、料村等处，先后打死打伤农军和农会会员一百多人，史称“高要领村惨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日第23号。

案”。惨案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农委指示黄学增、蔡如平，韦启瑞等人，根据各地接连发生的破坏农会、屠杀农民的事件，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山、南海、高要等县民团屠杀农民案》，要求大会审议。接着，黄学增以农民问题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向大会报告了对该提案审查的经过，并提出了火速派得力军队前往救护农民、解散匪团、缉拿祸首、召集流亡、赔偿损失等五项措施^①。大会经过讨论，认为“提议人所具理由非常充分”，准予立案，通知国民政府，指派当时驻在肇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即叶挺领导的独立团），迅即出兵到领村，镇压地主民团的叛乱。叶挺奉命率队开抵领村，在广宁、高要两县农军和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击溃了三、四千民团和神打团反动武装。此举推动了高要县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乡农民协会从二十九个增加到七十二个，农民自卫军也从九百人发展到一千六百多人。

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工人领袖刘少奇在长沙养病，被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扣押，党和各界社团开展了声势很大的营救活动，到国民党“二大”开幕之后仍未获释。一月七日，黄学增在全体会议上带头斥责了赵恒惕的罪行，指出“湖南工人领袖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大会）应有表示”^②，办理营救。大会讨论了黄学增的提议，认为赵恒惕此举，是军阀摧残工人运动的一个严重事件，决议通电要求赵恒惕立即放人。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强大舆论压力和多方营救之下，刘少奇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16号。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日第6号。

终于在一月十六日获释。

国民党“二大”的选举结果，虽然未能形成左派的优势，但由于出席大会的林祖涵、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杨匏安、黄学增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团结国民党左派，坚持正确的斗争，加之当时的整个革命形势正处在高潮阶段，因此仍然使大会“作出了最进步的宣言决议，并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反动分子，执行了党的严厉纪律，这才把孙中山死后动摇了的国民党基础稳定住”^①。黄学增在会上旗帜鲜明，斗争坚决，在反击右派对工农运动的攻击污蔑、打击地主阶级对工农运动的破坏活动、制订决议和措施保护农民运动继续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时候，广东省农民协会决定将全省划分为七个区域，设立六个派出机关——办事处，以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黄学增被委派为南路办事处主任，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底到南路开展工作，同时仍然对全省农民运动发挥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至十五日，黄学增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担任大会秘书长，主持大会会务。他日夜辛劳，为开好这次会议付出了许多精力。会议通过了重要决议案三十项，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广东省农民协会修正章程》。会议的宣言、决议案和章程等文件，秘书处都参与起草、修改，然后提交大会讨论通过。这些文件对后来广东农民运动起着指导作用，也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各地农民运动高潮提供了借鉴。大会选举黄学增和罗绮园、阮啸仙、

^① 《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彭湃、周其鉴、韦启瑞、杨其珊、蔡如平、原基、郭竹朋、朱观喜、薛六、钟耀龙等十三人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分工协作，指导广东农民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据当年十月统计，全省已有七十三个县，七十万农民组织起来，到了第二年三月，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又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①。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战争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极端仇视日益深入发展的工农运动而纷纷站到反革命方面去。他们把广东各地农会说成是“今日之大患”，要求“军事当局加以严厉处分”^②，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以“维持后方治安”和“维持北伐军饷”为借口，限制农会活动，强行预征钱粮，甚至公然收缴农会枪枝、解散农会组织、杀害农运负责人。于是，广东出现了一股由不法官吏、驻防军反动军官和地主土豪勾结起来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反革命逆流。为了严肃批评国民党的这种反动行径，黄学增深入到斗争激烈的电白县农村进行调查，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写了《为电白农民求救》一文，集中揭露了电白县地主土豪和民团武装两个月来在儒寮、那笪、博贺、蛋场、井头坡各乡，围攻、捣毁农民协会，捕捉农会负责人，吊打农会会员，夺回批耕田亩，重新成立“联团”，向农民勒收谷捐等罪行。黄学增深深感到国民党内部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地主、民团的破坏活动，是同国民党内右派势力和站在反动立场的地方官吏们怂恿、支持、

①黄学增：《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

②转引自1926年7月8日《人权报》时评：《今日之大患安在乎？》。

互相勾结分不开的。他在文章里激愤地质问道：“国民党的政纲，不是扶助农民的吗？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一次第二次宣言与夫迭次通令，不是给予农民以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之自由，并保护农民之利益的吗？……奈何二个月来电白的地方长官绝不惩戒或制止土豪劣绅地主们此种不法行为？农民的哭声已震动了全电白县，也许冲到他们衙门去了，难道他们还听不着？或者是和土豪劣绅地主们一样的异口同声说‘农民该杀’罢了！”^①接着，黄学增出席了八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任会议秘书长，主持会务。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派代表瞿秋白、张国焘到会，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共广东区委致函会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革命”^②。会议着重讨论了北伐开始以后广东农民运动的形势和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广东农民目前的最低要求，通过了十五项重要决议案以推动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发表了援助电白、东莞、花县等地农民斗争的通电。会后，举行千余人的游行示威，黄学增被推举为请愿代表，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严惩摧残农民运动的地主豪绅、右派官吏和不法军队，保护农民运动的发展。

为了鼓舞全省农民继续战斗，黄学增在廖仲恺死难周年前夕发表纪念文章，指出仲恺先生是为工人农民的利益奋斗而被反革命派暗杀的。但是，“死的只是仲恺先生的躯体，仲恺先生的精神——奋斗精神还是永远存在”。文章号召农友们深刻认识仲恺先生死的意义，永志不忘，继续完成他为之奋斗而未

①② 《人民周刊》第21期。

完成的事业，“拼命与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地主土匪、一切反革命派继续奋斗。我们是要中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夫自己本身之完全解放”^①。

一九二六年冬，国民党右派势力进一步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这股反动逆流所吓倒，不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迁就让步。针对这种情况，党的许多领导干部都撰写文章，批评右倾错误。十二月二十三日，黄学增也写了《读宫俊先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后》一文，以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态度，论述了同当时革命现实有密切关系的三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共产党的最高目标及其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五个步骤；共产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文章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间一部分最觉悟、最忠实、最勇敢、最奋斗的组织”，它的最高目标，“是本着马克思科学的共产主义，依据共产主义实现的步骤，以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黄学增在论述共产党的最高目标的时候，并没有把当时的国民党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而要求加以推翻，相反，他承认国民党也是“为人民解放的先锋队”，因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阶段应同国民党实行合作。接着，他明确地申述了这种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产党在这个合作中所采取的政策。他说，“这个合作，是要坚坚实实使中国各阶级民众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压迫底下解放出来”。共产党“根本的主张，虽然是社会革命，但是在目前的主张，却是国民革命。在国民革命当中，它虽然是特别代表工农阶级的

^①黄学增：《仲恺先生死了吗？》，《犁头周刊》第13期。

利益而奋斗，同时也不忘记其他阶级的利益（各阶级共同的利益）。所以，共产党不但是人民解放后盾的将领，而且是人民解放的急先锋”^①。这篇文章阐述了共产党的政治观点，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对工农群众运动的攻击，有利于消除统一战线内部一些人的疑虑，有利于农民运动的继续发展。

南路农运的领袖

一九二六年二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黄学增的主要革命活动，是在南路领导农民运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后来，广东省委的文件在称彭湃为“海陆丰农民领袖”的同时，也称黄学增为“南路农民领袖”^②。

当时的广东南路包括十五个县二个市（现在属广东的有阳江、阳春、茂名、信宜、化县、廉江、吴川、电白、遂溪、海康、徐闻、梅菪市，现在属广西的有合浦、钦县、灵山县、防城、北海市），由于地区偏远，农运干部缺乏，农民运动沉寂。

一九二六年初，国民革命军南讨结束，广东统一，南路农民运动开始进入公开发展时期，黄学增从广州回到南路开展工作。三月七日，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在梅菪正式成立，黄学增是办事处主任，又是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和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主席、共产党员潘兆璠于八月离开南路，工作由黄学增负责主持），全面地领导

^①民国15年12月24日高州《民国日报》副刊《高潮》第33期。

^②中共广东省委：《二·七纪念宣传大纲》（1930年1月17日）。

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广东南路革命斗争。

当时党的组织是不公开的，整个南路，党员只有几十人，他们多数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少数以国民党党部筹备员的身份，分散在各县工作。黄学增依靠这些同志，在一些重点县、市，挑选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农运积极分子吸收入党，秘密建立党的支部或小组。一九二六年春夏之间，阳江、吴川、梅菪、廉江、遂溪、海康等县市党支部先后成立。由于这批南路最早的党组织的建立，加速了重点县市的农运、工运、青运和妇运的发展步伐。

黄学增还利用当时革命统一战线采取“党内合作”形式这一有利条件，尽可能把党的干部安排到有关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去，负责重要的工作。党员薛文藻、陈克醒、杨枝水、钟竹筠等，同时在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和省农协南路办事处里面，分别负责党务、农运、宣传、妇女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党员朱也赤被委为茂名县农协筹备处主任，兼国民党茂名县党部宣传干事。遂溪、海康、廉江、阳江、吴川、化县、电白、信宜、北海市郊等县市的农协筹备工作，是由党员黄广渊、黄杰、周永杰、谭作舟、陈信材、卢宝炫、邵贞昌、梁本荣、江刺横等分头负责。南路农运的最高领导机构——南路办事处的领导成员（主任黄学增，书记韩盈，委员先是苏其礼，后是梁本荣）也都是共产党员^①。与此同时，黄学增、潘兆銮等还对南路各级国民党组织进行了认真的改组，使之适应革命的需要。这些措施，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黄学增回南路不久，就仿照农讲所的经验，采取办学校、

^①苏其礼在当时是否是中共党员，尚未查明。

办讲习所和补习班的形式，在短期内培训了一批本地干部。四月间，他以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发起举办了一个梅菪市宣传学校，招收学员五六十人，讲授社会进化史、工农运动史等课程，每周上课二次，学习时间三个月^①。同月，在海康县城三圣宫举办雷州宣传讲习所，招收学员六十人，学习时间三个月，主要课程有社会进化史、国耻小史、中国革命史、演讲须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国民党组织法等。在雷州宣传讲习所开办的同时，还在雷城举办了一期工农补习班，吸收工运、农运积极分子进行短期学习后随即派出工作^②。随着干部问题的逐步解决，以农运为中心的南路革命运动，也在一九二六年夏天进入了高潮。

为了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黄学增在南路办事处成立初期，主持了一次有组织的、深入的社会调查。这次调查不是单靠个人去做，而是依靠集体力量，即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和全部农运特派员一齐参加，划分范围，分工协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黄学增自己眼睛深度近视并患有严重胃病，也带头深入一些区、乡，找农民谈话，找国民党党部筹备员谈话，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并集中各调查人员在各地调查所取得的成果，写成了三万五千多字的调查报告——《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③。这份调查报告反映了高、雷地区九个县的社会情况，内容既广泛又具体，包括农民经济状况、农民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南路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一九二六年七月号）。

② 《雷枝给曾延兄信——五月份总结》（1926年5月31日）。

③ 《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一文，连载于《中国农民》第4期、第5期。

政治状况、农民文化状况、农民运动状况等方面，而以农民运动状况作为调查的重点，分县记述。调查报告对遂溪、海康两县的记述尤其具体，每一个乡农民协会的名称、成立时间、会员人数、农民自卫军人数和武器类别、武器数量等，都有记载。由于有了第一手的调查材料作依据，因而黄学增能够从南路各县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具体的工作任务和采取可行的办法，领导农民运动向前发展。

南路办事处成立不久，领导了吴川县农民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吴川第五区农民，多以种蒜为业。军阀邓本殷统治时期，该县署曾拟向农民抽收蒜头捐和蒜串捐，但未及实行，邓本殷势力即被驱逐。土豪李咏益乘机勾结新任县长苏鹗元，以一千元承包了该项捐税，然后巧立名目，苛抽竟达一万元之多，农民饱受敲榨剥削，痛苦不堪言喻。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该区农运领导人、共产党员李士芬，联合四十八个乡的农民代表五百多人，到梅菪向南路办事处、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政治处请愿，要求取消蒜头捐和蒜串捐。苛捐杂税是压在南路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除“正捐正税”之外，还有各种附加捐和苛例，如屠宰捐、筵席捐、过境捐、担头捐、榨糖捐、酿酒捐、捕鱼捐、牛头牛皮捐、麻蒜薯瓜捐、警察民团捐等等，名目繁多，苛细残酷。黄学增抓住这个同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尖锐问题，以办事处的名义写信给苏鹗元，要求贯彻扶助农工政策，“顾念政府，体恤农民至意，克日将该蒜头捐取消”^①。但是苏鹗元怯于土豪势力，托词推诿，不肯办理。黄学增很气愤，亲自到县署找苏鹗元，据

^① 《吴川农民举行废除苛捐大运动》，《犁头周刊》第8期。

理力争，指责他身为国民政府所委任的县长，却仍然维持军阀时期的苛捐杂税，对国民政府废除苛细杂捐、扶植农工的政策置若罔闻，并且严肃地申明，如果不立即宣布取消此项捐税，南路办事处将按照法律程序上诉。这时，各区农民代表亦齐集县署示威，终于迫使苏鄂元下令取消了蒜头捐，接着又取消了蒜串捐，并附带取消了壳灰（肥料）捐。吴川“反三捐”斗争的胜利，在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农民从中看到了团结的力量，纷纷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反对苛捐杂税，并提出田租减百分之二十五、借贷年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等要求。

农民运动刚刚兴起，地主土豪和反动民团就互相串通勾结，极力造谣破坏，说设立农会是为打仗的，为抽人头税的；有的豪绅还设立假农会，强迫农民参加；有的则混入农民协会，企图控制操纵。针对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黄学增领导南路办事处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予以打击，保证农民运动的发展。三月底，办事处免去了大地主卓子藩窃据的海康县第四区农协候补委员兼肇榄乡农协委员长等本兼各职，逐出农会，不准列名会籍^①，同时清除了卓子藩的亲信，改组了肇榄乡农会，使之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不久，黄学增又通过电白县署，把恐吓申请入会农民、派团丁持枪强迫农会会员退会的电白县第三区巽花乡民团团董李公录扣捕法办，乘势裁撤了第三区巽花、文山、儒寮、牛眠、福船岭等各乡民团，惩办不法团董，收缴团保局公款、枪枝，全部拨给第三区农民协会，在各乡建立农民自卫军^②。

①② 《南路办事处文件存稿》令 4、11、49、50、57、58、59、60、63、78 号。

黄学增在领导南路农民运动时，比较注意对农民进行纪律教育和团结教育。平时，他常到各区、乡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去进行政治教育，批评农民中普遍存在的宗族主义、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要求各级农民协会注意团结，服从指挥。对于违反纪律、妨害团结的现象，坚决批评教育，及时制止。四月初，海康县第六区农民自卫军由于同第四区农民自卫军发生了村族方面的“无意识之争”，擅自缴了第四区农民自卫军的枪械，造成双方不和。事情发生后，黄学增严肃指出第六区农民自卫军此举“显违纪律”，要求第六区农民自卫军还枪、放人、撤防、道歉，双方“言归于好，俾巩固本阶级之势力”。他还派农运特派员陈钧达前往调查处理，“务使革命势力不致分裂为主，如双方不能体谅此意，惟有执行铁的纪律，极力淘汰”^①。

一九二六年秋，南路办事处从梅菪迁到高州。这时候，革命进一步深入，反动势力也在蠢蠢欲动。南路国民党组织里的旧官僚政客和地主土豪，同那些逐步趋向反动的县长和驻防军军官们勾结起来，疯狂摧残农民运动。九月十日，海康县英利民团保卫局长邓志圣，勾结县长苏民和驻防军营长陈公侠，派兵包围海康县农民协会所在地“宾兴馆”，逮捕了农运特派员程赓，并秘密加以杀害。苏民、陈公侠还联名发布了《维持治安通告》，不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集会和收缴民团枪枝，违者按“扰乱后方”罪论处！黄学增采取坚决的态度处理这件事。他公开揭露反动派的罪行；调集遂溪县第六区农军到遂溪、海康两县交界地段，防止事态扩大；又通过海康县农民

^① 《南路办事处文件存稿》令第71、72号。

协会和青年同志社、妇女解放协会等团体向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提出撤办县长苏民、撤办营长陈公侠、缉办劣绅邓志圣、抚恤程赓家属等四项要求。不久，苏民终被撤职，陈公侠亦被调离海康。

从此以后到年底，黄学增同韩盈、梁本荣、朱也赤、钟竹筠等深入茂名、信宜、廉江各县农村，通过开会、演讲、演白话戏、印传单、出墙报、写标语等方式，发动农民起来组织农会。在茂名县，他们支持云炉、莲塘等五乡农民斗争了大地主梁竹铭，并以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咨会茂名县署，将其扣押起来；接着，他们又发动万余农民进入高州城，把地主恶霸杨老二设在城内垄断粪便收售以剥削农民的“大利”大粪公司捣毁，从而打开了茂名县农民运动的局面。十一月十四日，拥有四十多个乡农会的茂名县茂北区农民协会宣告成立，举行了万人庆祝大会和七千多人的示威游行。

在黄学增和南路办事处的领导下，南路农民运动在一九二六年夏到一九二七年春得到较快的发展。全路农会会员从原来的九千多人猛增到约十二万人，成立县一级农民协会或农协筹备会的，有遂溪、海康、电白、茂名、化县、阳江、廉江、吴川等八个县，其他县份和北海市郊也成立了一批区、乡农民协会。广大农民在各级农会的带领下，反对苛捐杂税，取消田主苛例，拒交“批头金”，拒交“田信鸡（鸭）”，拒绝送租（送租到田主家，要给回工钱），拒绝“夺佃”，有的地方还提出了减租要求。各地农民积极参加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支持北伐战争、援助省港罢工、反对不法官吏等重大政治斗争，连农村中拐卖妇女、违章偷拆邮件这类问题，也由农会出面处理，农民协会“事实上都是变成了农民第二个

政府”^①。与此同时，北海、梅菪、阳江、东兴等地的职工运动也开展起来，各行各业成立工会，共有会员一万多人；各县还组织了青年同志社、新青年社、学生联合会和妇女解放协会。原来沉寂的南路，出现了革命高潮。

一九二七年初，中共广东南路地方委员会在高州成立，黄学增任书记，深入一些县检查工作。在化县，他召集了农运干部会议，指出要有重点地选择离县城较远的山区多做工作，建立农民协会，尽快把农民自卫军组织起来，为应付困难局面做些准备。不久，黄学增到广州出席三月十日至十七日举行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讨论挽救广东农民运动危机问题。会后，黄学增奉命留省工作。

战斗在琼崖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广东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杀害。国民党广东省清党委员会和高雷区清党委员会连续发出通告，宣布开除黄学增“党籍”，进行缉捕。

这时，黄学增随同省委机关转移到了香港。在香港期间，他负责同内地来港找党的同志接触，传达省委指示，发动内地群众掀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黄学增任省委西江巡视员，按照省委的指示，先后两次化装成商

^①黄学增：《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载广东省委《红旗周刊》第15期。

人，秘密通过白区，返回西江，指导高要县领村暴动和广宁县螺岗暴动，声援和配合广州起义。由于力量不足，两次暴动都失败了。

一九二八年春，省委决定派黄学增为广宁县委书记，再次回广宁工作。当时领村和螺岗暴动后的农军，都撤退集中在广宁石涧，目标太大，粮食缺乏，补给困难，处境十分危险。黄学增针对这些情况，采取分散活动的方针，把队伍分成小队，活跃于绥江河中段两岸，改造土匪，扩大力量，专打小股反动派，伺机截击敌人船只，以解决经济给养困难。

四月初，黄学增离广宁到香港出席四月十三日召开的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继续全省总暴动”的部署。会上，黄学增当选为省委委员。这时候，广宁县委已经被敌人破坏，五月间，琼崖暴动也遭到严重的挫折。省委决定派黄学增为琼崖巡视员，到琼崖去恢复革命力量。在赴琼崖前夕，他再一次秘密返回广宁，召集干部会议，布置今后工作，然后乘船去海南岛。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黄学增从海口行抵琼崖特委所在地乐会县第四区。此前，琼崖特委组织的、以“割据东路，进迫府城，实行全岛总暴动，夺取全琼崖”为口号的行动已经完全失败，琼崖革命力量遭到了很大的挫折，各级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党的主要领导人杨善集、冯平、符节先后牺牲，红军被打散，不少同志失望情绪严重。六月五日，王文明等主持召开了中共琼崖第三次代表大会，改组特委，以王文明为书记，在艰苦的条件下逐步做恢复工作。但是，敌人仍在疯狂镇压。他们集中了正规军三个团一个营三千多兵马，主力正在向乐会第四区靠拢，企图彻底摧垮我琼崖党组织和红军。

黄学增到乐会以后，马上深入各地调查情况。他由乐会至万宁，又从万宁到乐会，艰苦跋涉了整整一个月，亲眼看到这里不仅党组织和红军主力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存在着供应补给的极大困难。各地粮食和药品奇缺，连特委所在地也是“困难到万分，医院有百余人无药医亦无饭食，各地逃难同志常百余二百人不能分配到各地工作，亦无饭食，军械局工人不得饱食亦不肯做工，其余红军伙食，各机关伙食，真是无法可想”^①。但是，黄学增并未被困难吓倒，他根据省委指示，结合琼崖情况，从各方面开展了恢复工作。

黄学增主持召开了中共琼崖特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特委，黄学增任书记，当即派冯白驹等得力同志到一些重点县去恢复工作。接着，正式成立了琼崖苏维埃，以王文明为主席。各县亦逐步健全或建立苏维埃，原来“革命委员会”的名称一律取消。这以后，各县苏维埃深入发动群众，支持各级党组织和红军开展工作；乐会、万宁、陵水、澄迈等县还陆续开展了土地革命。与此同时，黄学增等抓紧对红军余部的整顿，把红军司令部改为军事委员会，置于琼崖特委直接领导之下，以特委委员梁秉枢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取消西路、中路、东路红军名称，改按营连序列命名，每县建制为一个营，下辖几个连，全岛红军，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加强军械局的工作，制造七九、六八等枪弹，供给战斗需要。一九二九年，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梁秉枢任师长，黄学增任政治委员。

鉴于前段暴动期间各级党组织领导人的身份都已公开，处

^① 《琼崖王（黄）学增报告》（1928年7月16日）。

境危险，继续留在原地工作有困难，黄学增决定对全岛各路、各县的主要干部实行交错对调，使之离开原地，避开敌人耳目，转到新的环境下继续工作。还有一些干部，则自动采取各种办法，在原地或暂离琼崖隐蔽起来。苏维埃所属机关（包括交通处、医院、军械处、印刷处等）和滞留在乐会第四区的红军三百多人，由王文明、梁秉枢、罗文淹等率领，避开敌人包围，退入母瑞山区，休息整顿，开荒生产，克服困难，积极发展地方赤卫队；把红军干部和战士派到赤卫队里面去，一面帮助赤卫队提高作战能力，一面做群众工作，积蓄力量，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①。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琼崖党的力量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先后建立了区委六十七个，特别支部十个，支部七百一十二个，党员发展到二万六千九百一十三人，约占当时全省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红军也扩大到三千多人。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香港召开。黄学增出席了会议，当选为省委候补常委。这次会议虽然接受了党的“六大”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和任务的正确观点，认识到前段强令全省夏收总暴动的做法是“打吗啡针式”的盲动急躁错误的表现，但是，由于省委机关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很深，会议仍然坚持“以城市为工作中心”的口号，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城市工作摆在第一位。根据这个精神，省委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决定将南路、琼崖两个特委合并，改称南区特委，机关设在海口市，领

^①以上各项措施，据《琼崖王（黄）学增报告》和罗文淹：《海南岛初期人民革命史料》等辑述。

导琼崖、南路各县工作^①。

但是，南路特委不久就在广州湾被彻底破坏了，两个特委合并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此时，原来在琼崖长期工作的一些同志，包括领导过琼崖“夏暴”的一些同志，从自己经历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提出不要把特委机关迁到海口市的意见。黄学增坚持要贯彻省委指示，没有采纳这个正确的意见，仍决定特委机关向城市搬迁，留下王文明、罗文淹、冯白驹等一批干部在母瑞山区和各县坚持斗争。由于这些同志的努力，琼崖革命力量在特委迁到海口市以后的一段时间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特委机关在迁入城市后，严重脱离了在强敌分割下的各县、区、乡基层党组织和红军，给恢复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困难，特委机关自身也处于容易暴露的危险环境之下。一九二九年三月，南区特委的常委处和工委处等主要机关陆续被敌人破坏，琼崖革命力量再次遭到挫折。

南区特委机关被破坏后，黄学增仍旧隐蔽在海口坚持工作。由于联系中断，省委对黄学增的安全非常关心，多次向从琼崖转移出来的同志了解他的情况。一九二九年五月，黄学增秘密潜返香港，向省委汇报了琼崖的严重情况。省委（包括黄学增）对琼崖的形势和今后工作进行了讨论，仍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坚持琼崖“工作的中心在城市”的主张。五月二十六日，省委决定重建琼崖特委，以官天民为书记；并决定黄学增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重返琼崖，隐蔽在海口市，继续指导琼崖斗争^②。六月初，黄学增回到琼崖，在干部中贯彻党的“六

① 《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总结报告》（1928年11月）、《省委给琼崖指示第一号》（1928年11月29日）。

② 《广东省委致琼崖特委转各级党部信》（1929年5月16日）。

大”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农村工作决议案的精神，为在琼崖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作准备。

黄学增同周恩来、叶挺、朱德、苏兆征、邓中夏、阮啸仙、澎湃、周其鉴等，是广东省委宣传委员会的特约撰稿人，负责为理论刊物《红旗》“按期供给文字，以给与全省工农兵士的切实指导”^①。黄学增在琼崖工作后期，先后应约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和《省港罢工时代之广州四郊农民》这两篇文章，主要是回顾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说明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乃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继续和深入^②。《盲动呢？不动呢？公开呢？秘密呢？》这篇文章，对琼崖党组织内部在思想路线和斗争方式问题上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表示完全接受和拥护党的“六大”的决议，正确地认识到当前的形势是“旧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高潮还是没有到来”，党应该反对“左”的盲动倾向，注意秘密工作；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把反对所谓右的不动倾向作为当前琼崖党内斗争的主要任务，提出“在琼崖方面，我以为要百分之八十五力量反对不动倾向，以百分之十五力量反对盲动倾向”^③。这表明，黄学增当时受到“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比较深，对这种思想的危害性缺乏认识，从而导致他在行动上比较坚决地执行一些错误的决定和政策，造成他在琼崖后期工作上的失败。

一九二九年七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黄学增在海口市的隐

①广东省委《红旗半周刊》第21期编者的话。

②广东省委《红旗周刊》第15、16期。

③《学习半月刊》第4期。

蔽地——福音医院，被敌人逮捕。当时任琼崖实业专员、负责监督琼崖十三县及海口市行政事务的军阀黄强，是黄学增在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的校长。他首先派秘书找黄学增谈话，要黄学增供出琼崖党组织的情况，但遭到黄学增的严厉斥责。接着，黄强亲自出面“劝降”，利用师生之谊、同姓同宗来诱骗，又以死亡相威胁，说黄学增“走错了路”，“死亡在即”，应该“回头是岸”。黄学增毫不畏惧，坚定的回答说，走错路的是你黄校长，而不是我黄学增。你过去在雷州杀害了无数百姓，现在又在琼崖屠杀革命群众，你已经成了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杀害劳动大众的凶手。现在我已经不是你的学生，更不是你的同宗兄弟。我是共产党员，相信共产主义能够胜利，感到能够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是无尚光荣的事。今日被捕，要杀便杀，学增生不能再为革命多做点事，死也要死得清白坚贞^①！黄强被斥责得无地自容，只好放弃“劝降”的念头。七月底，黄学增被敌人杀害于海口市和府城之间的红坎坡，年仅二十九岁。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访问谭天度、孔令镒、林丛郁（增华）、陈信材、彭中英、郭预灏、韩托夫等人的谈话记录；吴玉章、苏天春、薛文藻等人的《自传》。
2. 《中国农民》（1926年）；《农民运动》（1926年）；《犁头周刊》（1926年）；《人民周刊》（1926年）；《国民周刊》（1926年）；《黄埔潮》（第24、25期合刊）；《工人之路》（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广州《民国日报》（1926

^① 《黄学增同志简史（稿）》，存遂溪县档案馆。

- 年)；高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至12月)；《红旗周刊》(1929年)；《学习半月刊》(1929年)。
3. 《南路办事处文件存稿》(1926年)；《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925年12月至1926年7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6年1月)。
 4. 罗绮园：《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后广东农运情形》、《广东农民运动报告》，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出版。
 5.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和海南行署、湛江行署、遂溪县、高州县、海康县、花县、高要县、广宁县档案馆馆藏部分有关历史档案文件。

俞作豫

覃尚文 吴忠才

俞作豫，广西人，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二月参加广西左、右江起义，任红军第八军军长，领导左江龙州地区的斗争。起义失败后，他在广州红花岗留下“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悲壮诗句，于一九三〇年九月英勇就义。

(一)

俞作豫，一九〇〇年四月十日（农历二月初十）生于广西北流岭垌乡石梯口村。父亲俞庭铸，号壁楷，在家乡教私塾；前母陈氏生下俞作柏等四兄弟后，病故，生母刘氏，生了三男，作豫最小，在宗族兄弟排行十三，后来人们尊称他为“十三叔”。家庭生活担子虽然重，但俞庭铸为着儿子们能有出息，还是尽量设法供给他们读书。于是，俞作豫和他的十一哥，一起到姑父李云东执教的岭垌大路寨学校，与李明瑞等表兄弟同窗就学。俞作豫自小爱读《三国演义》、《岳飞》等历史小说，仰慕侠义英雄人物。后又受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改良思想的影响，读过“国家之文野，观其道路可知也”以及“英国伦敦，异常之富，屋背地底，皆有铁路”之类的文字。随着农村经济日益破产，加上他家人口多，开支大，生活每况愈下，变

得连喝米粥也维持不下去了。艰苦生活的环境，使他对现实社会日渐不满。他憧憬未来，希望祖国能繁荣富强。

俞作豫身材矮小，口音重讷，但志气高，敢作敢为。十四岁那年，他小学还未毕业，便跟兄长们跋涉到离家成百里路的县城，报考刚创办的陵城中学。放榜那天，他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便鼓起勇气，迳直去问校长。校长见他胆子不小，当面考了考他，又查阅了他的试卷，把他作为特号备取生予以录取。为了纪念这件轶事，他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备豫”。

一九一五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接受了日本“二十一条”不平等条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年轻的俞作豫和学校的进步师生一起，不顾县政当局的阻挠，在县城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接着，他与同学又进一步联合手工业工人和市民群众，对贪污县官周国器和贩卖日货的奸商徐宝芝进行斗争，写出“贪污周国器，吾侪定逐之，奸商徐宝芝，捉住来剥皮”的标语，到处张贴，给反动官吏和奸商以沉重打击。

袁世凯倒台后，中国仍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统治。俞作豫决定从军“护法”。一九一八年，他中学毕业后，经他的在护法军林虎部任连长的哥哥俞作柏介绍，前往广州，入西南护法军第二军的燕塘讲武堂学习军事。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受到了一次爱国运动的洗礼，激发了爱国热情。一九二〇年他在讲武堂肄业，和表兄李明瑞同到护法军游击营俞作柏连当见习排长，开始了戎马生活。

这一年，祸害两广的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从广东败退回广西。从旧桂系分化出来的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乘机打着“定桂”、“讨贼”的旗号，与受孙中山节制的粤军联系，几年

间，翦除了旧桂系残部，击败了入桂的滇军唐继尧、龙云两部，统一了广西。俞作豫连年参加征战，先后充任连长、营长等职。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实现。次年秋，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下令讨伐广东南路军阀邓本殷。当时，俞作豫是定桂讨贼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俞作柏）第三团（团长李明瑞）的第二营营长，率部担任先锋，在战合江、下高州的战斗中，以少胜多，连战皆捷，出色地完成了讨伐任务，从此显露头角。这期间，他开始读到俞作柏从广州带回的“宣达革命主义的书籍和文件”，受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教育，决心从事国民革命。

（二）

一九二六年春，俞作豫率部从南路调回南宁整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旅长李明瑞）第三团团长，准备参加北伐战争。此时，俞作柏因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排挤，被剥去兵权，只担任广西省农工厅长、南宁黄埔军校第一分校校长，后来才担任省党部农民部长。俞作柏在广州、南宁与我党干部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多有接触，受到影响，成为广西国民党人士中的左派首领。俞作豫从哥哥那里阅读了苏联顾问赠送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向导》、《革命周刊》等书刊，思想大为开阔。在俞作柏家里，俞作豫结识了中共广西省委筹备小组的黄日葵、陈勉恕和谭寿林等，开始直接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这期间，他与广西农讲所教员、共产党员宁培英，南宁总工会的领导人吴

鹏，南宁郊区农运领导人莫峻峰和省党部工人部长黄家植等也有来往，还到过郊区农村活动，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后来他深有感触地说：“要学澎湃、韦拔群，中国应该学苏联。”^①

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俞作豫和李明瑞受到共产党在军队中政治思想教育的影响。在夺取贺胜桥的战斗中，俞作豫团是李明瑞旅的主力。当叶挺独立团与敌主力激战时，第七军赶到，“即命先头部队俞作豫参加作战，增援第四军右翼。”^②俞作豫率部从桥下涉过湖水，猛烈袭击吴佩孚部的后方。吴佩孚主力受到北伐军前后夹击，很快崩溃，北伐军乘胜挺进武昌城下。这一仗，俞团配合叶挺独立团夺取贺胜桥，首立大功。当时担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后来回忆说：“贺胜桥的胜利，虽然独立团起了决定作用，但如果没有友军的配合，吴佩孚主力是不能消灭的，贺胜桥是攻不破的。”^③在挺进江西德安的战斗中，俞作豫团从左翼进攻，人力弹药都消耗很大，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李明瑞立即把全团的弹药集中起来，配备给两个加强连，趁敌人动摇之际，率部冲锋。激战至天将黄昏，终于与友军从左翼冲破敌阵。孙传芳部狼狈败退，北伐军遂占领德安。

俞作豫为夺取德安立了战功，按理应该论功行赏。可是，新桂系军阀对他倾向革命不满，非但未予嘉奖，反遭到打击。战后，白崇禧召集俞团官兵训话，对俞作豫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

①李静生：《关于俞作豫的一些情况》。

②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③《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出版。

和漫骂^①。随后，白崇禧又以明升暗降的手法，把俞作豫提升为副师长，削去了他的实权，并令其移师武汉。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精神的俞作豫，不甘受军阀的排斥和打击，便借故“省亲”，离开部队。

(三)

一九二七年七月，俞作豫离开武汉，准备经上海返回家乡。经过“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的上海，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我党还继续进行地下斗争。正在苦闷、寻找“出路”的俞作豫，在这里遇上了共产党员谭寿林。他向谭寿林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得到谭寿林的同情和指点。他精神又振作起来，改变了准备回家的主意，直奔香港。到香港后，他见到了因受黄绍竑的追捕而被迫出走的俞作柏。兄弟相见，各诉苦衷。

这时，中共广东省委机关也转移到香港，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左倾分子，都到香港活动或避难。俞作豫在这里见到了广西党组织的负责人陈勉恕、朱锡昂等，还认识了恽代英、李立三、杨殷、聂根等中央和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人。在我党领导人的热情帮助下，俞作豫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打倒军阀，除列强”，才能把中国的革命引向胜利。他“决意不返武汉原职，就地进行革命活动”。^②

为了讨伐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党组织在香港组织并领导了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俞作豫与俞作柏均是该

^{①②}吕鉴周：《俞作柏、李明瑞倒戈反蒋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4辑。

会会员。党组织以该会名义派人往汕头市一带策动军民支援南昌起义南下大军。俞作豫、陈勉恕等受党组织的委派，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但当起义军开到汕头市时，反动军队纷纷集结，进行反扑。因敌众我寡，起义军失败，只一小部分向粤赣边境转移。俞作豫则经厦门转回香港。

一九二七年十月，俞作豫经陈勉恕、朱锡昂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受党的委托，与朱锡昂、陈勉恕、梁君怡等随同俞作柏到广州汪精卫、张发奎组织的，旨在对抗蒋介石的广东军事委员会工作。俞作柏在军部担任指挥员，俞作豫负责参谋处工作。他们利用合法地位，开展有利于党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俞作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一开始，他就同朱锡昂与武装工人赤卫队一起，配合起义主力部队教导团和新编的警卫团向市区敌人发起进攻。反革命军队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向市区内反扑时，他又同武装的工人赤卫队员在同兴街（今广州文化公园处）与敌人进行巷战，阻击敌人，掩护同志们安全转移。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由广州前往香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悼念在起义中壮烈牺牲的同志。俞作豫为死难烈士写了悼词，表示决心沿着先烈的足迹继续战斗。悼词说：“反动的资产阶级，狠毒的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地主，对我革命同志杀之不快，复施以活埋，禁之不足，更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在？然而我们革命者，绝不为敌人所吓倒……。”^①

^①潘兆昌：《何世昌、俞作豫两烈士参加红八军斗争的一些情况》。

(四)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分期分批派以广西籍为主的共产党员回广西工作，主要任务是“首先把党的基层组织恢复起来，到农村中发展革命力量，组织农民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①。根据这个决定，党的领导人找朱锡昂和俞作豫谈话，说：“我们已派了一些同志回广西，但敌人封锁得厉害，过不去，你们看如何？”朱锡昂、俞作豫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去！”党的负责人说：“很危险呀！”朱、俞坚决表示：“危险也不怕！”^②党的负责人见他们态度坚决，就同意了。俞作豫和朱锡昂化装越过了敌特的封锁区，于一九二八年春节前回到了广西北流。

当时，北流和广西各地一样，革命处于低潮。俞作豫和朱锡昂到北流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选择城郊大埠窑头黎衍（健钧）的家作为秘密活动地点。这里离县城约三、四里，单家独户，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黎衍是有钱人家，大革命时期到广州读书，受革命思想影响，曾加入过共青团。这次，他很乐意支持俞作豫与朱锡昂开展活动，并愿意为俞、朱外出打听“行情”，做联络工作。俞、朱便利用他家楼上的几间房子开会、印刷、住宿，并按照党的指示，在这里建立了中共广西临时省委办事处，由朱锡昂担任书记。接着，又在北流街庞仁甫的医务所和华兴隆商号里建立了联络地点。为了解决经费困

^①钟优武：《功高八桂》。

^②访问梁君怡记录。（1976年）。

难，俞作豫把俞氏家族房屋后面的一间铺面辟为商店，亲自给铺子写了庄重有劲的“华丰”号招牌，把自己仅有的一些钱也拿出来作开办投资，还找了一位可靠的亲友担任经理，既做生意，又当联络员。商店办起后生意兴隆，经费困难的问题很快解决了。

这期间，临时省委办事处在黎家庄开了党、团骨干会议，分析形势，布置恢复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并研究发动群众，建立劳农会、工会，开展学运、兵运等工作的具体措施。会议决定建立劳农会，以区别被豪绅地主篡夺了领导权的农会；提出了“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不替军阀当兵”和“打倒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①等口号，用以发动群众。会议还要求凡有条件的地方先建立党小组或党支部，再建立县委；条件未具备的，先建立劳农会；个人那里有社会关系庇护的，就先到那里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北流、玉林、博白、陆川等县委先后恢复。俞作豫担任北流县委委员，县委书记由朱锡昂兼。

随着形势的发展，俞作豫与朱锡昂又派人到南宁与雷经天（共产党员）联系，先后恢复和发展了南宁、宾阳、芦圩、贵县、同正等地的党组织，还加强了对右江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从此，大革命失败后广西各地受破坏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为召开全省党的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同年六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贵县召开。党中央派恽代英参加了会议。大会选举朱锡昂为广西省委书记，决定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斗争，开展土地革

^①见《北流革命斗争史采访资料》。

命。中共北流县委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决定组织党员深入农村，发展劳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斗争。县委还创办了《劳农周报》，宣传动员群众；开办短期训练班，培训农运骨干。俞作豫除了负责县城附近地区的工作外，还化装成商人或风水先生，到九代坡、牛甘塘、牛骨垠、竹围、金城、塘岸、水头垌、牛涡田头、民乐、岭峒和白米等地活动。他作风正派，艰苦朴素，态度和藹，坚定沉着，走到那里，都能和农民倾心交谈。“他爱护农民，农民也很关心他，每次与农民坐下来就谈反动派怎样迫害剥削农民，农民应该怎样的团结反抗，使农民听了都受很大的鼓舞，很快地有很多农民要求参加劳农会，团结在他的周围。”^①在县委的领导下，北流全县许多地方都迅速建立了劳农会，会员达到五百多人，还秘密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在北流的影响下，附近的一些县里，也组织了好些劳农会。豪绅地主对劳农会的发展十分仇恨。他们以收回租佃为借口，企图进行破坏。俞作豫等趁机组织领导北流九代坡的农民进行“武装抢割”，几个村的农民与地主武装对打了一天，轰动全县。反动县长怕事情闹大，不得不释放了关押在牢里的农民，并要求豪绅地主赔偿农民在械斗中受到的损失。“武装抢割”斗争取得了胜利，劳农会也得到了发展。此后不久，俞作豫担任了北流县委书记。是年冬，在梧州的省委机关联络处由于叛徒昌景霖的出卖而受到破坏，南宁等地的党组织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北流、玉林等县的党组织没有受到破坏，一直领导群众坚持斗争。

军人出身的俞作豫，经过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的战斗洗

^①梁君怡：《有关俞作豫烈士史料》。

礼，深知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搞农运的同时，也主动开展兵运工作。当时，北流县的反动武装有县警大队和桂系军阀刘志忠团的一个连。俞作豫除秘密地派一些同志到这两支反动武装里去做工作外，他自己也和一些班长士兵接触，教育他们不要做军阀的工具。他用北流方言对他们说：“你们‘甘垂’（这样下贱）？帮人家做看家狗，送死。跟我们来吧！保证有你吃的、穿的。”^①被启发而觉悟了的士兵说：“跟就跟，怕‘乜野’（什么）？敢做敢当。”结果一些县警和士兵被争取过来，其中还有三个班长。在准备武装哗变时，由于事机不密，被连长发觉，那三个班长被抓起来严刑拷打，但他们均不招供，最后壮烈牺牲。敌人怕再生变故，便将这个连调往玉林。

俞作豫还注意做北流、玉林、六万大山等地的“绿林军”的工作。有人认为“绿林军惹不得。”俞作豫说：“惹当然不行，要去争取教育他们。”^②六万大山的绿林军，多数是破产农民，跟国民党反动派矛盾很深。俞作豫带上黄家菊、邱桂馨等，首先去做他们的工作。起初他们拒不接见，经反复解释，才将俞作豫等迎上了山。俞作豫同他们的头领邱宏才、邱大伯亲切交谈，教育他们参加革命，共同对敌，并答应接济他们粮食和用品。这些“绿林好汉”见“俞团长”对他们客气，看得起他们，心里开始活动了。此后不久，一部分绿林军下山，碰到国民党军警，双方发生了激战。在绿林军将被国民党军警吃掉的关键时刻，俞作豫派出农民武装赶来解围，在危难中救了

①见《北流革命斗争史采访资料》。

②黎晓仓 1983 年 1 月的回忆。

他们。这件事使绿林军非常感动，他们终于接受了我党的主张，同意改编为农民自卫军。后来，俞作豫等又以北流、玉林等县的劳农会自卫军为基础，组成了玉林五属农民武装自卫队。

反动军阀对我党领导的农运武装极为仇视，采取查户口、五家联保、封锁交通等手段来对付我党组织和劳农会、自卫军，并派遣特务、收买叛徒来进行破坏。俞作豫曾几次受敌人的追捕。一天，他正在“华丰”召开县委会议，敌人突然包围了离“华丰”不远的联络站“华兴隆”号，情况十分危急。俞作豫得到情报，立即命令与会人员向九代坡撤退。在我党搞兵运的同志的主动掩护下，参加会议的人员安全撤离了，留在最后的俞作豫刚准备走，敌人已经把“华丰”包围了。俞作豫坚定沉着，很快化装成伙夫，机智地避开敌人的视线，走出了“华丰”，并迅速赶到九代坡，和聚集在那里等他的县委其他领导同志坚持把会议开完。

一九二九年春，蒋桂军阀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双方调兵遣将，准备战争。蒋介石利用俞作柏与桂系的矛盾，对桂系内部进行分化瓦解。俞作柏打算“先倒桂后反蒋”，决定派人去联络李明瑞，从中反戈。在香港的中共组织为利用军阀混战发展革命力量，赞同俞作柏的做法，但提醒他对蒋介石的“欺骗利诱”要警惕，“不要为他所动摇”^①。党组织还认为，俞作豫过去在武汉桂系集团中工作较久，关系甚深，便决定派他到武汉李明瑞部做兵运工作。俞作豫接到香港的电报后，毫无顾虑，决定前往。临走前，他又部署了工作，并满怀信心地对同志们说：“要坚持下去，我一定会回来的”。

^①梁君怡：《有关俞作豫烈士史料》。

(五)

一九二九年五月，蒋桂战争以桂系的第四集团军土崩瓦解而告终。俞作柏回广西担任省主席，李明瑞担任绥靖总司令（亦称第四编遣分区主任兼军事特派员）。俞作豫在李明瑞的十五师参谋处工作，亦随同回到南宁。

俞作柏、李明瑞过去跟我党有接触和联系，受过党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他们回广西执政后，蒋介石派人来监视，汪精卫派人来活动，加上新桂系势力在广西相当深厚，自己又没有“干部班底”，财政也比较困难。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他们愿意与我党合作，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其军队和政权机关中工作。我党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派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去，由邓小平（当时的名字叫邓斌）负责领导，积极开展工作，为实现党的“六大”提出的武装夺取政权、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斗争。

在俞作柏、李明瑞与我党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俞作豫利用他的身份，在为实现党的斗争任务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他是俞作柏的弟弟，又是李明瑞的表弟，我党可以通过他从俞作柏、李明瑞处得到重要情报，也可以通过他向俞、李提出一些建议，促使他们具体实施一些有利于我党和工农运动的政策措施。俞作豫一到梧州就对他的哥哥和表兄直率地说：“关在牢里的‘政治犯’，都是‘四·一二’事变中黄绍竑他们搞的，现在还关他们干什么？”^①还说：“你们要得人心，不恢复群众运动哪行？”^②俞、李知道他的话是代表共产党提出的，

^{①②}访问黄家植记录（1976年3月）。

便立即释放了关在梧州的“政治犯”，并宣布开放群众运动，实行“二·五”减租。他们到了南宁，又继续释放“政治犯”，并且一律加以任用。罗少彦（中共南宁区委书记）、何建南（南宁工运领导人）、陈漫远、谢鹤筹、吴西、陈可禄等，就是当时获释出狱的。八月，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此时，俞作豫又提出建议：“韦拔群（右江农运领导人）急需武器，拨给他们一点吧？这不比口头上讲讲支持农民运动好得多！”^①俞、李满口答应：“凡是韦拔群要的，都给。”^②于是韦拔群从俞、李那里领得了三百多枝步枪、两万多发子弹，武装了一个营（三个连）三百多农军。接着，俞作柏、李明瑞还拨了一部分枪弹，给南宁市郊和左江的农军。由此，左右江地区农民武装声威大震。反动派惊呼：“俞作柏、李明瑞来捣乱，致使左右江的赤焰滔天，原住东兰的共匪，也就死灰复燃。”^③在党的推荐和俞作豫的建议、劝说下，俞、李任用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左倾分子，有的任南宁市公安局长、省府机要秘书，有的在军队中担任连、排长，还有的分别担任果德、恩隆、河池、奉议、左县、东兰、养利、崇善、龙州等县的县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党还掌握了三支武装力量：一是“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李明瑞“答应了”^④。教导总队很快开办，有一千多人，由张云逸负责。二是抓住俞、李要整顿广西警备第四大队

①访问黄家植记录（1976年3月10日）。

②黄松坚：《关于韦拔群的革命斗争活动》。

③见国民党广西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宣传部《党声周报》第1期。

④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见《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的时机，活动由张云逸担任了该大队的大队长。三是俞作豫担任大队长的警备第五大队。党在这三支队伍中加紧开展工作，仅教导大队就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还建立了党的组织。

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执政不到三个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一定进展。但就当时总的形势看，应该说脚跟还没有完全站稳。但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不听我党的劝告，急于联合张发奎举兵反蒋，去进攻追随蒋介石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我党估计俞、李仓促反蒋必然失败，在多方劝阻无效的情况下，研究制定了应变措施，并决定以左、右江地区互为依托，组织武装起义，建立根据地。十月初，俞、李誓师出发的时候，我党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没有训练好和维持后方治安为由，提出将这三支部队留在南宁，得到俞、李同意，并决定让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接受后方的军械库和金库。俞、李率队出征后，按照党的指示，立即把所有的枪械弹药、军用物资、金银等物品，用船只装好，停在码头，以应付紧急事变。同时，又从第四、第五大队各派出一个营，前往左、右江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作武装起义准备。

十月中旬，俞、李反蒋失败，陈济棠奉蒋介石令，派重兵进入广西。在此紧急关头，我党即按原定计划撤离南宁。邓小平、张云逸率领军械船和第四大队、教导队上右江，俞作豫率领第五大队上左江，并负责送俞作柏、李明瑞上龙州。从此拉开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序幕。

俞作豫在南宁这短短三个月时间里，深感到党交给自己的责任重大，不遗余力地为革命日夜操劳。这期间，他的父亲在家乡病故了，但他无暇奔丧，只写了一份悲切的悼词，由俞作

柏带回去告慰老人。他们兄弟早已分家，他的妻子一人住在原籍，除了分得的两间房子外，什么产业也没有置，他把自己的薪俸都拿出来资助革命了。

(六)

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新桂系军阀卷土重来，蒋桂军阀为争夺广西地盘，又爆发了战争。我党趁机加紧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十月下旬邓小平到达百色后，立即召开了有张云逸、陈豪人、李谦等参加的党的委员会议（后改为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作出了四项决定：第一，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我党的主张，广泛发动群众；第二，整顿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反对军阀制度；第三，通过地方党组织，把枪枝发给基本群众，以便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①。会议还决定利用旧有督办官衔，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俞作豫为左江督办。

俞作豫率领第五大队到达地处边防的龙州后，面临着复杂的情况：这里到处是打着各种旗号的军阀势力、地主民团、封建土司和土匪，其中不少股都与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有勾结，他们狼狈为奸，欺压百姓。大革命时期，这里虽然有过一些群众运动，但已被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了。新近由何建南、麦锦汉（均是共产党员）刚恢复起来的下冻地区农民运动，基础不深。俞作豫担任大队长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也还没有改

^①张云逸：《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建立》。

造好，内部成分仍很复杂。尤其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一共只有几名党员干部。俞作豫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担负起筹备龙州起义工作这副重担的。

俞作豫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到龙州后，他首先召开了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了党在龙州发动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指示，部署了各项工作，使大家心中有数，方向明确。其次，他按照党的决定，明确宣布自己担任广西全边对汛督办公署督办，掌握了龙州地区军、政、财和外交大权。接着，他下令收缴了桂系吕焕炎师在龙州的教导队四百多人的武器及仓库里的枪弹，将这批人和督办处直辖的巡缉队以及新招来的农民子弟合编成三个营，使第五大队很快扩大到六个营、二千多人。对于大大小小股匪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把愿意接受改编的土匪队伍和地方武装改编为三路游击队，又抽调了南宁郊区部分农军充实了崇善、左县的游击大队。他和农运领导人何建南、麦锦汉等一起研究整顿和发展群众组织，把收缴的几百枝枪和一批弹药用船运到龙州附近的小连城，分发给下冻地区农民自卫军；恢复工会、妇女会、学生会，建立工人赤卫队。还处决了一些反动土司。这一系列的果断行动，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打掉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使长期以来混乱不堪的龙州城乡，局势趋于稳定，帝国主义再不敢为所欲为，豪绅地主、土匪再不敢横行霸道。

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俞作豫十分重视争取他的表兄李明瑞参加革命。李明瑞是能征善战的北伐将领，在军界中有较大影响，争取了李明瑞，就是争取了一大片。俞作豫和党组织分析了李明瑞的情况，认为他受过民主思想教育，有强烈的爱国心，过去同我党有过合作关系，此次讨蒋失败来到龙州，俞作

柏经越南去了香港，他没有走，仍留下来，协助俞作豫收编队伍。尽管他还没有投身工农革命的决心，只是想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但争取他是完全可能的。而新老军阀则深怕李明瑞倒向工农革命一边，纷纷以高官厚禄和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对他进行欺骗和拉拢，蒋介石就派其心腹唐海安，带了六十万巨款支票和十五军军长、广西省主席的委任状，到龙州、香港等地游说，要他通电就职。这期间，俞作豫经常和李明瑞促膝谈心，帮助他认识要打倒蒋桂军阀，拯救灾难的祖国，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的道理。当蒋介石的心腹来龙州游说时，李明瑞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收买和拉拢，表示绝不为法西斯独裁统治效劳。对于李明瑞的思想变化和龙州起义的准备情况，俞作豫都及时地向党组织作了汇报。邓小平对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非常重视。十一月，趁李明瑞到右江想动员第四大队去攻打南宁之机，他和张云逸一起，耐心诚恳地向李明瑞指出，目前攻打南宁，实际上是参加军阀混战。我们反对参加军阀混战，只有参加革命举起义旗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希望他坚定地站到革命这边来。邓小平、张云逸还表示，待左、右江红军正式建立之后，请他当总指挥。几经挫折的李明瑞，在我党政策的感召鼓舞下，下决心投身革命。他说：“蒋介石要给我当军长，这是狐狸给鸡拜年，信得过吗？我尝‘老蒋’的苦头够了，他需要你就捧你，不要你就一脚踢开^①”。许多从旧军队出来的人见李明瑞参加革命了，都纷纷说：“特派员革命了，我们也要革命。”^②

①岑建英：《李明瑞的一些情况》。

②钟夫翔：《红八军成立前后》。

俞作豫领导准备龙州起义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正当他按照李明瑞去右江前的部署率先头部队到驮芦准备会同右江部队攻打南宁之机，反动军官第五大队副蒙志仁接受桂系特务肖光保的收买，带后续部队二、四营从凭祥进据龙州叛变革命，并自封为团长。情况十分危急。俞作豫得知消息，立即拨马回枪，星夜兼程返回龙州附近的水陇，准备平息叛乱。这时恰好李明瑞从右江回到水陇，他坚决支持平叛，说：“谁叛变革命就消灭谁。”俞作豫和李明瑞当即召开排以上的干部会议，对形势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两营叛军中多数是胁从的，且军心未定，士气不振；我军是正义之师，斗志旺盛，又有群众支持，只要发动军民封锁龙州，断绝粮草来源，组织主力部队进攻，是可以收复龙州的。会后，在李明瑞、俞作豫的直接指挥下，军民同心协力，连续进攻三昼夜，给叛军以重创，一个营长被击毙，另一个营长被打伤，蒙志仁不敢恋战，第四天拂晓便弃城南逃了。龙州遂失而复得。

平息蒙志仁叛变后，俞作豫和同志们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深感彻底改造旧军队的重要性。他和李明瑞一起，又把部队整编为一个旅，下辖两个团，自己担任旅长，继续打着国民党旗号，开展工作。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了关键时刻。邓小平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完成百色起义的部署工作以后，带了何世昌、严敏等到达龙州，向俞作豫、李明瑞等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同意在左、右江举行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红七军、红八军的指示，并介绍了第四大队改造部队的经验，检查了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情况。邓小平在和俞作豫、李明瑞、何世昌、严敏、何建南、宛旦平、袁世烈等党政军负责人

一起研究部署龙州起义时，特别强调要抓好部队的改造工作和群众的发动工作。

邓小平的指示，给俞作豫以很大的鼓舞。邓小平离开龙州后，他和李明瑞、何世昌按照第四大队的经验，吸取蒙志仁叛乱的教训，把改造部队放在重要地位。俞作豫认为，要改造好部队，首先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解决好部队的各级领导权问题。第一团团长何凤川是俞作豫、李明瑞的北流同乡。他自恃平息叛乱有功，争权夺利，包揽龙州税收，贪污腐化，尅扣士兵粮饷，还经常打骂士兵。俞作豫和李明瑞决定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消除这个隐患。他们物色了进步军官何家荣，决定由何家荣和党员潘思文带该团士兵到靖西执行任务，而把何凤川等几个军官留在龙州。一团到靖西后，按照俞作豫、李明瑞的指示，用士兵委员会的章程教育士兵。士兵们觉悟提高后，纷纷揭发何凤川的罪行，一致要求撤掉何凤川的职，有的还气愤地提出：“毙了佢（他）算了！”何家荣见目的已达到，就打电话回龙州。俞、李接电话后，当众宣布了何凤川的罪行，解除他和他的亲信李承统的职务，发给旅费，由镇南关遣送去香港，同时宣布一团团长由何家荣接任，团参谋长兼一营营长由共产党员袁世烈担任，其他连排级军官也都换成了党员或进步分子。这个团经过改造，面貌焕然一新，在龙州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龙州起义受挫后，他们仍转战滇、黔、桂边，历时七个月，到河池会合了红七军。对第二团也做了一些改造，但由于时间仓促，搞得不彻底，坏人没有除掉，以致龙州起义失利后，反动军官刘定西率队叛变，投靠了敌人。

为了鼓动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部队党组织加强了对官兵的思想教育工作，龙州对汛督办和中山公园就是经常开

会和上课的地方。据老战士们回忆：“当时，在部队内部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工作。干部分批听有关共产主义的讲课。何世昌、俞作豫等同志都亲自给我们讲课。已参加革命的李明瑞同志戴着瓜皮红顶帽，也来给大家讲课。不仅革命的道理燃烧着大家的心，而且他们艰苦朴素的作风也深深地感动了广大官兵。”^①俞作豫在给大家讲课时说：“同志们，弟兄们，我们要革命了，我们的革命就是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官僚军阀，要分田地，要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房住，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②他还指出：“革命是不容易的。反革命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他们要同我们拚个死活。我们要准备流血牺牲，不怕艰苦。”^③党组织还决定办军事政治学校，由俞作豫兼任校长，培养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又把原来的《群众报》改为《工农日报》，新创办了《左江红旗》三日刊，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宣传革命的形势、任务和前途。

在抓部队教育的同时，确定由严敏、何建南、麦锦汉等主持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筹建地方革命政权，进一步整顿和发展群众组织。但由于龙州地区原来群众基础较差，加上时间的仓促，群众发动得不够充分，有些地方的群众是一轰而起。因此，左江、龙州起义没有右江百色起义的群众基础深厚。

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工作，龙州起义基本准备就绪。尽管当时条件还不十分成熟，但由于粤桂战争继起，造成了有利的空隙，加上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的鼓舞，俞作豫、何世昌（李明瑞已前往右江，与张云逸一起工作）即按照党的指示，于一

①②③钟夫翔：《红八军成立前后》。

九三〇年二月一日宣布了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邓小平任红七、八军总政委兼红八军政委，李明瑞任红七、八军总指挥，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何世昌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俞作豫、何世昌还宣布了《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行政纲》，明确提出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彻底推翻豪绅地主统治；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取消苛捐杂税，取消一切债务；实行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官兵待遇一律平等和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等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①红八军下辖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和军部各直属部队共三千人左右；收编的四个游击大队未列入红军建制，作为地方武装。在庆祝大会上，俞作豫第一个撕下军帽上的国民党党徽，带领全体官兵举行了庄严的宣誓：“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惜任何牺牲，坚决革命到底。”^②

起义胜利后，俞作豫加紧进行红色政权的巩固和部队的建设工作。二月五日，他在军部召开的士兵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红军与军阀军队不同，红军是为革命而作战的，它不是个人谋私利的工具，红军的全体官兵要共同担负起这个光荣任务，要为革命遵守纪律，英勇奋斗。随后，他派第一、二纵队分赴各地协助各县成立工农民主政权，开展打土豪和剿匪斗争。他还亲自率领一个营前往下冻，镇压了土匪头子黄飞虎的叛乱。当地群众打鱼杀猪热情接待红军。俞作豫拉着农友们的

①见《纪念百色起义五十周年论文资料选编》，《学术论坛》文集（1）。

②吴西：《回忆龙州起义和红八军建立前后》，《红旗飘飘》第19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手，亲切地说：不必破费了，这些东西，大家辛辛苦苦得来不易。只要我们团结好，就什么都不怕，会有好日子过的。不久，他又派军事政治学校师生前往下冻，帮助恢复被黄飞虎破坏了的革命政权，准备开展土地革命。后来由于敌人袭击龙州，土地革命未能实现。

龙州起义具有鲜明的反帝斗争特点。起义后在龙州城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俞作豫等发动群众控诉法国帝国主义以越南为跳板侵略我国的罪行，并且没收了法国领事馆和教堂掠夺来的财产，收缴了帝国主义用以对付革命的发报机、手榴弹、枪支，以及豪绅地主窝藏在教堂里的金银财宝，仅光洋一项，就达十五万元。愤怒的群众火烧了帝国主义垄断的海关楼，驱逐了作恶多端的法领事夫妇和传教士数人出境，镇压了与帝国主义有勾结的大土豪兼资本家谢秋和国民党“清党”委员欧文俊、闭钰达等。法帝国主义对此恨之入骨。他们发出“照会”，叫嚷“现今龙州地方全陷股匪握中，专事种种出轨行为，加以实行公产，公然于城市散布激烈传单，鼓动民众作过激行为”；并扬言要派安南（越南）雇佣军来“保护敝领事职权及领署安全。”接着，法帝国主义又派飞机侵犯我凭祥领空，进行侦察，蓄意武装干涉。俞作豫、何世昌等领导左江人民对法帝国主义的无理干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红八军发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揭露了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军阀扼杀中国革命的阴谋，提出了捍卫中国人民利益的四点严正声明，庄严宣称：“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赶快团结起来，解除我们的痛苦和争中国的权利，必须准备同一切反

动派奋斗，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①与此同时，红八军对侵犯我凭祥领空的法国空中强盗给予迎头痛击，击落法国飞机一架，使法帝国主义企图用军事镇压我龙州起义的阴谋彻底破产。

(七)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凶恶的敌人进行了疯狂的反扑。桂系军阀从粤桂战争前线调回了几个团的兵力，绕道进攻右江苏区。我红七军在隆安、亭泗给敌人以狠狠打击后，为打乱敌人部署，扩大政治影响，主力转移到黔桂边进行游击战争。敌人在我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后，把矛头集中指向红八军和左江根据地，并策动假意接受我收编、又不接受改造的土匪头子黄飞虎叛变，杀害了左江赤卫大队长、龙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何建南。一时谣言四起，形势越来越严重。

在龙州刚宣布起义的一九三〇年二月初，邓小平从上海党中央回来，经龙州去百色。他看到龙州根据地基础较弱，红八军人数又少，曾指示俞作豫、何世昌采取措施，向右江红七军靠拢。俞作豫即命令第一纵队向靖西进发，以打通通往右江的道路，并负责护送邓小平去右江。同时，为了在必要时向右江靠拢，决定收缩在宁明、崇善等地的兵力。但由于对当时敌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够坚决有力，未及时向右江转移，以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三月十八日，正当龙州军民在龙州城内新填地广场参加何

^①见1930年2月12日《工农兵报》。

建南烈士的追悼大会时，敌军以四个团的兵力突然从三面包围了龙州。开始，俞作豫等以为是土匪袭击，没有组织全力应战。当确知是敌人的正规军时，俞作豫立即调整了战斗部署。当时，第一纵队西出靖西，留在龙州的部队只有三个营和赤卫队千余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部队伤亡较大。但红军战士奋不顾身，反复冲杀，接连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战斗非常激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下午五时左右，俞作豫命令部队向凭祥撤退。夜间十时许，撤出的队伍陆续到达凭祥。俞作豫连夜召集了干部会议。他在会上首先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检查了战前警惕性不高、麻痹轻敌和战斗打响后又与强敌硬拚的错误。接着，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我军从龙州退出和原在凭祥的队伍汇合后，尚有成千人，加上在靖西的第一纵队一千人，仍可以与敌周旋；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现在又急于反蒋，形势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他教育大家不要因挫折而气馁，应该树立胜利的信心，坚持战斗。会后，俞作豫派了两个人，连夜去右江向邓小平汇报情况。第二天一早，军部又召集指战员开会，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团，由刘定西担任团长。俞作豫和何世昌都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还没有开完，狡猾的敌人打着农民赤卫队的旗号混进了红军的警戒线，向会场方向开枪射击。俞作豫等派出一个连担任阻击，掩护主力经宁明、明江撤往邕宁苏圩。第二纵队长、共产党员宛旦平在掩护撤退时壮烈牺牲。俞作豫原打算把队伍拉到他家乡附近的六万大山立足，但这时候得知敌人已封锁了去路，计划无法实现，乃率队进到钦州大寺。此时，部队尚有六、七百人。这天晚上，俞作豫召开干部会议，说明了形势和自己对下一步行动的想法；他和何世昌暂时离开队伍，到六万大山组织农民武装；同

时派人与红七军联系。团长刘定西却乘机说，政工人员是“包袱”，要他们和妇女一律离开队伍。俞作豫为避免冲突，只好同意了这个意见。

第二天，俞作豫和何世昌临时改变了主意：另派人去六万大山活动，他俩带了三十多个便衣卫士重回邕宁，准备亲自到右江去找红七军。不料他们行至邕宁的马村，被民团包围打散，何世昌不幸被俘（后在南宁牺牲）；俞作豫带领其余人员冲出包围继续前进，抵达苏圩时，又遭到民团的追击。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在从左江退回来的邕宁农民武装（负责人莫峻峰）的援救下才得以脱险。

俞作豫脱险后，从当地农民武装那里了解到，敌人在南宁的驻军很少。他便和莫峻峰等商议决定，调回刘定西带领的红军队伍攻打南宁，以扩大红军的影响并营救何世昌。恰在这时，农民武装与邕宁反动县警在南宁附近打了一场遭遇战，南宁守敌有了准备；加上红军和农军没有渡江船只，攻打南宁的计划只好作罢，红军遂又撤回六万大山。俞作豫暂时隐蔽在苏圩附近的农会负责人家里，暗中活动。

为了取得党的指示，俞作豫派莫峻峰到香港联系，但没有回音。八月间，俞作豫亲自赴港找党，他走后，刘定西接受敌人收编，叛变了革命。俞作豫到香港后，派与他同行的王敬轩、廖光华到广州活动。王、廖二人因缺乏经验，被叛徒矮仔黄欺骗。这家伙伪装“上级”说，请俞作豫来参加重要会议。俞作豫得到王、廖的报告，因急于找党，“不疑有他”，便随矮仔黄到九龙兴嘴码头上船，下船后转乘特务早已备好的汽车，被劫持由深圳转回广州系狱。

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在各地领导的武装斗争非常惧怕。为

急于得到我党情况，特务们连夜提审了俞作豫，同时在报纸上公布这个消息。我党组织和俞作豫的亲属得知俞作豫被捕的消息，多方设法营救，但没有成功。

俞作豫面对敌人的威逼，毫无畏惧。他坦然地说：“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红八军军长，共产党员。”^①敌人见硬来不行，又变换手法，摆了酒席“款待”，妄图软化利诱。俞作豫傲然挺立，揭露了敌人的阴谋。敌人无计可施，便匆匆下了毒手。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俞作豫留下了“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悲壮诗句，与廖光华、王敬轩一起，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

^①梁君怡：《有关俞作豫烈士史料》。

杨开慧

方大铭 杨布生

杨开慧，字云锦，乳名霞。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六日（农历九月二十六），生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昌济，为人正派，笃志嗜学，是一位满怀爱国热忱的学者。开慧年轻时受到父亲的重大影响。杨昌济在开慧两岁时出国留学，女儿跟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稍长，便帮助妈妈搞些家务劳动，或跟着哥哥上山扒柴。她很同情下层生活的劳动人民，忌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生活的人。热天，她不穿绸衣，而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当年板仓院里，住着一个叫杨乐初的老人，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无依无靠，生活困难。她常帮助这位老人做事，还和妈妈商量，不时送些粮食和衣物给老人，杨乐初很感激，逢人便说：“霞姑娘和她妈对我们受苦人真是太好了！”

开慧七岁入杨公庙官立第四十小学（现名开慧学校）读书。当时，入学年龄一般是十岁左右，她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但由于学习刻苦，成绩很好。别人问她将来打算干什么事时，她回答说：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后来，父亲来信要她妈妈也进学校读书。她便和妈妈一道，转到离家二十多里的衡粹实业学校，妈妈读实业班，她读附设小学班，母女同校读书，一时传为美谈。

辛亥革命后，衡粹学校搬到长沙城，开慧又转到板仓附近

的隐储女校读书。这时，她才十岁，但已阅读了不少诗歌、小说。她最喜读《木兰辞》，曾向同学流露过要仿效花木兰从军抵御外侮的念头，为此她更加努力发奋读书。现还存有当时她在病中写给板仓同学范裕英的一封信，信中说：“近维起居多福，学业日增，为颂！校中功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之焦灼也。妹与吾姊至好，素承规劝，有暇，望赐数行，以慰系念。”^①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杨开慧这时已有运用语言文字的一定能力。据范裕英回忆：开慧在学校不但成绩优良，常受老师夸奖，而且性情谦和，做事心细、果断，不自私，同学们都喜欢和她接近。

一九一三年春，杨开慧随归国的父亲迁居长沙城，转入长沙稻田女子师范附小读书，后来停学在家，由父亲指导自学。这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经常和好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瓚等到“杨寓”求教，讨论治学做人之道，探求救国救民之理，开慧在一旁倾听，深受影响，后来也参加了一些讨论。在这些讨论的启发下，她开始懂得了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她对毛泽东的宏论卓识最为倾服，并认真学习父亲和毛泽东锻炼身体办法，常年坚持冷水浴，行深呼吸，吃硬食。她这样做的目的，在一次作文中写得很清楚：“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

当杨昌济于一九一八年夏应聘到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后，杨开慧又随家到了北京，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九号。因杨昌济到北京后长期患病，她为陪侍父亲没有进学校读书，但仍在家坚持自学。同年秋，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杨开慧又有机会接

^①原件现存湖南师范学院《杨开慧》编写组。

受毛泽东的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因而大大丰富了她的思想，开阔了她的眼界，使她无论在思想上、学识上都得到提高。当时前来探望杨昌济的一位朋友，曾称赞开慧说：“志向尤大，举止温婉，中文亦好，殊属难得。”在这期间，杨开慧由于和毛泽东接近较多，志同道合，感情日深，在父亲的支持下，两人开始相爱了。后来，她回忆这段情形时说：“听到他（指毛泽东）许多的事，看了他许多的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了他”，产生了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情怀。但是杨开慧在爱情上并不是轻率的，直到毛泽东有许多信“表示他的爱意”时，两人才建立了恋爱关系。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七日，杨昌济不幸病逝于北京。开慧怀着极大的悲痛，和全家一起扶柩回到长沙。不久，在父亲的朋友李肖聃的大力帮助下，进入长沙福湘女中选修班读书。

福湘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对学生控制甚严。这时，开慧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已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和斗争精神。她对学校的各种反动措施感到愤慨，积极动员和启发同学进行斗争。例如，她和同学个别谈心时，鼓励她们冲破学校的禁令，不受学校的欺骗，积极地参加社会的进步活动；将《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送给同学们看，并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提高同学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带头不做“礼拜”，并向同学宣传这是宗教迷信，动员其他同学也不去参加。

当时，杨开慧是学校唯一剪短发的学生。学校当局认为这是“过激派”的象征，限令她三个月内将头发蓄起来。她不仅不予理睬，还理直气壮地宣称：“剪短发，有我的自由”^①。

^①据李淑一、蒋英等十余名老福湘同学的回忆。

她在福湘女中读书期间，还在湖南学生联合会中担任宣传工作，经常奔走于各学校之间，组织和发动同学，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一九二〇年十月，周南女校的英文教习李震鹏逼死了出身贫苦的妻子袁舜英，学校当局没有即时采取措施。杨开慧知道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反动势力压迫妇女的罪证。她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建议和支持下，她在福湘、周南等校刊上发表文章，愤怒控诉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罪恶。同时，组织省学联的讲演队到街头巷尾，广泛宣传死者的悲惨遭遇，号召大家为争取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展开斗争。通过学联的发动，教育、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纷纷就这件事联系社会制度展开了讨论。长沙许多报刊连续发表文章伸张正义，为死者鸣不平，迫使周南女校当局对这件事作了处理，同时，也为长沙的妇女解放运动壮大了声势。

开慧除参加省学联的宣传工作外，还接待全省各地来访的学生，并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一次，衡阳一个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的女学生朱舜华来省学联请求帮助复学，受到封建家庭的阻挠。她帮助小朱摆脱了家庭的控制。同时，又针对小朱在复学斗争中认为湖南军阀比北洋军阀开明的幻想，对小朱说：军阀就是军阀，绝不能抱幻想。学校当局是受军阀指使迫害我们爱国学生的。我们不能乞求复学；要向同学宣传，唤醒大家起来进行斗争。后来，朱舜华在她的经常帮助和启发教育下，提高了觉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由于她在校内外进行了一些斗争，做事老练，在同学中享有相当的威信，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开慧姐”。学校当局则把她看成“危险分子”，是进步学生的“后台”，派人监视

她的行动，要设法把她赶出学校。一九二一年夏，湖南知识界中的进步分子提出了实现男女教育平等，“男校宜速开禁”，实行“男女同校”的主张。开慧早就主张男校“开放女禁”。这时，她除了竭力支持蒋英等毕业同学冲破社会和家庭的阻力进入男子大学读书外^①，还串联了福湘和周南两个女校的五个同学，毅然离开学校，转入岳云男子中学第十四班学习，成为湖南在男子中学中读书的第一批女学生。

通过这段时期的斗争实践，和毛泽东对她的帮助，她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念。当时，毛泽东缺少革命活动经费，她毅然动员母亲把父亲逝世时亲友们送的奠仪金，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毛泽东进行革命活动。文化书社成立后，她参加了书社的工作。一九二〇年冬，她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的第一批团员之一。就在这时，她和毛泽东结成了革命伴侣。

一九二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毛泽东以一师附小主事的身份，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二十二号，租了一栋三开间的木板平房，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机关。她随同毛泽东在清水塘居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担任了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还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人运动。据当时生活在她身边的朱舜华回忆：开慧为了协助毛泽东开展工运，经常出入城东小吴门，到文化书社、船山学社、望麓园织布厂等党的秘密联络点，传送党的文件和指示，收集工运动态和秘密情报。她经常接待各地来访的工人代表，热情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

有一次，湘区党委决定派一批党团干部赴水口山铅锌矿搞

^①据蒋英的回忆。

工人运动，住在清水塘的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几个青年也在内。临行前夜，毛泽东向他们交待任务后，又对他们说：到矿山后，要注意常去敲砂棚敲矿，也要下“窿”（矿井）去看看工人是怎样拿生命换回几个铜板的，这才能弄懂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开慧在旁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这番谈话。她又叮咛他们：有什么新的情况可以及时写信回来向党组织报告，以免误了大事。以后，她经常寄《向导》等党的刊物给他们阅读，还把重点内容标出来，请他们注意领会。

清水塘偏僻幽静，是个适于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的好地方。然而她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为了保护湘区党委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她把母亲也接到清水塘居住，一同做好掩护工作。每当召开党的会议，她就到室外流动放哨。为了随时观察敌情，她特意在客堂后壁上挂了一面大镜子，从镜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门外的动静。晚上，她常起来到屋外巡查，观察有无可疑之人。她还经常到附近菜农家串门，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对于毛泽东等起草的党内指示、罢工宣言之类的重要文件，她放在一个妇女们平时盛放耳环、戒指、香粉一类用品的首饰箱里，精心收藏保管，每天夜晚都枕在头下，一直到她被捕前，始终和她形影不离。杨开慧为了让毛泽东聚精会神地从事革命工作，对他的饮食起居，也十分注意照料。

毛泽东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去上海党中央工作。随后，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岸英和岸青两个孩子，也到了上海，住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的甲秀里。她仍象在清水塘那样照料毛泽东并协助他工作，还和向警予一道，以半工半读女子职业学校为掩护，积极参加妇女运动。为了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她经常到小沙渡纱厂工人区的工人夜校和邓中夏组织的“沪西

工友俱乐部”去上课，或进行调查研究。夜校北边是奔流不息的苏州河，对岸是一片荒凉的潭子湾。夜里，这一带冷冷清清，是侦探出没、流氓横行的地方。她每周都要抽出两个晚上去上课，风雨无阻。开头，她讲的湖南话，上海工人听不太懂，她便耐心地一字一句慢慢讲，直到工人听懂为止；后来，她也学着讲点上海话，因而深受大家的欢迎。

一九二四年底，杨开慧随毛泽东离开上海，次年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十四）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她按照当地的风俗，和毛泽东一起以“走人家”的形式，到农民家里调查、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了做好对农民的思想发动工作，她积极协助毛泽东在韶山地区创办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夜校办得最早的是毛氏族校，其次是李氏族校、庞氏族校、郭家亭、孝烈祠、如意亭杨氏族校、毛震公祠等处。杨开慧到这几个夜校教过课或讲过话。她在毛氏族校讲课时，讲过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讲过祖国的地理，讲了“洋财东”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压榨，是我们的死敌；讲了贫苦农民要团结得象一捆柴。当时在韶山流行一首民谣：“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她就用来作教材，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号召大家起来为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紧接着，在韶山地区就相继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与此同时，她还积极协助毛泽东培养发展党员。

韶山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及韶山土豪成胥生等反动派的极大恐慌。反动政府再次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在韶山人民掩护下，于八月离开韶山，秘密往长沙，转到广州。杨开慧将毛泽东留下的工作处理完毕后，也

于同年十月到了广州，住在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的二层楼房里。她到广州后，仍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活动，并参加市妇联工作，还到我党领导的为北伐战争培养干部的政治讲习班旁听学习。在这期间，她继续担任通讯联络工作，经常往来于毛泽东和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之间，传递文件、书信和消息。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毛泽东调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十一月从广州经上海到武汉。杨开慧同母亲一起，带着孩子，回到长沙，住在望麓园。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应邀由武汉到长沙，“回湘指导一切”，参加和领导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她协助毛泽东为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夜以继日地忙碌着。这时，她正怀孕在身，当毛泽东考察衡山等五县农运情况回到望麓园时，她不顾劳累，立即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把他带回的大量调查材料，认真地进行了初步整理。不久，又随毛泽东到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住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当时，她产期临近，身边又有两个孩子需要照料，身体很虚弱。但为了使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运筹革命大事，她仍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对农运调查材料，认真地进行分类、选择、综合，然后用毛笔字工工整整地抄在十行纸上，毛泽东禁不住夸赞她说：我这个好秘书，抄写起来，又快又好。正是由于有开慧这位“好秘书”的协助，没有多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脱稿了，并于一九二七年三月首先发表在中共湖南区委的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

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与老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从武昌回到长沙板仓。同她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帮助带孩子的保姆陈玉英。

当时，板仓周围环境十分险恶：南面驻有国民党政府军张辉瓒的部队，东面有四十八家大地主，北面有罗定安的民团，清泰乡还有范庆熙、梁正球这类土豪劣绅。杨开慧处在虎穴狼窝之中。但她镇定自若，和地下党的同志们一道，机智灵活地坚持了三年多艰苦的地下斗争。

关于她这段地下斗争的情况，陈玉英有如下回忆：

开慧“留在板仓坚持地下工作，她十分重视学习，每天都要挤时间看书。她经常深入农民家里，进行调查访问，宣传革命道理。……她的穿着同农村妇女一样，和群众很合得来，附近的人都亲切地喊她‘霞姑’、‘霞姐’。在板仓期间，开慧同志还带着我们先后到平江县石洞砖屋里的向五舅家和田边屋里钟姨妈家去住。她在这里住几个月，那里住几个月，名义上是走亲戚，实际上是从事各方面的革命活动。”

“在板仓的生活很艰苦，如果有几条小游鱼吃的话，也只是放到火灰里煨熟后拌点盐，从不放油的。但当一些革命同志、回乡的穷苦农民来到家里的时候，开慧同志总是要设法接待，留他们吃饭，长时间同他们谈话，帮他们解答问题，鼓励他们继续战斗。邻居中有人生了孩子没衣穿， she 就把岸英他们穿过的衣服送去；没米下锅的，她总是想方设法接济。她常常对家里的人讲：‘穷人受苦，也就是我们的苦，我们要互相关心。谁有困难，就帮助解决，不能只顾自己，处处要为大家着想。’”^①

在这期间，她深深思念着远方的毛泽东。想着毛泽东在艰

^①陈玉英：《艰难的岁月，幸福的会见》，载《湖南师院学报》1977年第1期。

苦的战斗中，原来的足疾是否痊愈，隆冬到来时，有没有御寒的衣服，……她真恨自己没有一对翅膀，不能飞去看看毛泽东啊！她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思想上有时也感到沉重和孤单，但是，她想到千千万万正在战斗着的人民，立时觉得我并不是绝对的孤立，更加激发了自己谋求知识、坚定信仰的心情。她看到一些革命者的家属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十分愤慨，曾写下痛斥这种“罪诛九族”的野蛮罪行的文章，准备寄给报纸发表。她自己面对死亡的威胁，毫无畏惧，她把为革命而牺牲，当作“是我喜欢的事”，只是担心她死后母亲和孩子无人照顾。为此，她留下了给堂弟杨开明的信，托杨开明在她死后照料孩子，让孩子能在失去了母亲后健康地成长^①。

一九三〇年七月底，红三军攻打长沙，使长沙、平江、浏阳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赤卫队大部暴露。八月初，红军被迫撤离长沙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健卷土重来，在长沙城乡滥捕滥杀，疯狂地进行“清剿”，仅板仓附近的清泰、白沙一带，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四百六十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这时，福临乡长范庆熙为了向敌人邀功请赏，诡称：“毛泽东之妻毛杨氏，三次带兵从井冈山打长沙未遂，隐居长沙东乡板仓杨公庙一带，组织苏维埃，自称主席。”何健闻讯如获至宝，立即派出侦缉队员，坐镇福临乡“铲共义勇队”队部，与范庆熙合谋，加紧搜捕。

在这种险恶情况下，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都劝开慧暂时离开板仓，去江西找毛泽东，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她坚定地说：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遵循党的指示，坚定沉着，坚持斗

^①后杨开明先杨开慧牺牲，此信没有发出。

争。敌人的疯狂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胜利。她仍然无畏地奔走于板仓方圆数十里的地方，顽强地坚持工作。她行踪隐蔽，出没无常，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敌人几次围捕都扑了空。这时，她的舅表弟向钧和堂弟杨开明，先后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她抚慰舅妈和婶母说：弟弟是为党为人民殉难的，我们不应难过，而应自豪。她对亲人们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死者未完成的事业，将由我们活着的人去完成。为了防备万一，她将党的文件密封在一只锻烧有“囍”字的蓝花瓷缸内，埋在叔叔的菜园里。

一九三〇年十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杨开慧被敌人的密探发觉。当天午夜，范庆熙和何键派来的侦缉队员率领兵丁八十余名，将板仓下屋团团围住。当她知道自己已无法脱险后，仍临危不惧，从容地处理了手头上的文件，自己打开房门，横眉冷对冲进屋来的匪兵说：要走便走。敌人把她和在她身边工作的陈玉英绑了起来，拳打脚踢，连同当时年仅八岁的岸英也一起押走了。

杨开慧被捕押到长沙后，敌人弹冠相庆，妄图强迫她交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和毛泽东的具体住址，并认为“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白首”，对她严刑拷打，百般利诱。但是，她大义凛然，始终坚强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她在狱中的斗争，和她同时被捕一起坐牢的陈玉英，在《怀念在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身边的日子》^①一文中，有如下具体的叙述：

“我们被押到长沙的伪警备司令部。十天后，转到另一个

^①载《湖南师院学报》1977年第1期。

监狱——清乡司令部，在那里关了十天，又转到北门外的伪陆军监狱署。我们入狱后，每天都要过堂，审讯和拷打，一个监狱比一个监狱厉害。……过堂的时候，案桌前坐着凶神恶煞的伪法官，旁边坐着一个当记录的人，两边站着许多枪兵。审讯开始，伪法官把惊堂木在桌子上一拍，然后恶狠狠地问：‘毛泽东在哪里？毛泽东的信放在哪里？’开慧同志总是坚定地回答：‘不知道！’‘不晓得！’气极败坏的刽子手们就用皮鞭、木棍、楠竹杠子往开慧同志身上狠抽毒打。开慧同志被打得倒在地上后，刽子手们又用碗粗的木棍压在她的膝弯子里猛踩，一面踩，一面问，得到的答复总是一句：‘不晓得！’敌人从开慧同志的嘴里得不到什么，就脱掉她的上衣，更加惨无人道地进行毒打。开慧同志的背被敌人打烂了，全身到处是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紫、一块绿。敌人把杨开慧同志打昏后，就在她的全身泼上冷水，等她醒过来，又继续拷问。不管敌人怎样残暴，开慧同志横眉冷对，毛主席在哪里，党的组织情况，半个字也不讲。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要她坐着，摆出一脸奸笑，说什么：‘只要你讲出毛泽东在哪里，把你同他做的事讲出来，登报声明，宣布与他脱离夫妻关系，马上放你出去；如果不讲，就只有死路一条。’开慧同志昂首挺胸，望也不望敌人一眼。怒斥敌人：‘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从我口里休想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开慧同志差不多每天都被叫去受审，每次受审的时间最长，有时要到下午四点钟才回监牢。受审回来，次次都是一身血糊糊的，晕倒在牢房不省人事。我和难友们看了，都心痛得如刀绞，难过得直流泪，钦佩开慧同志在敌人面前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她醒过来后，总是要我和同牢的难友别难过，要坚持斗争，并说：‘敌人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开慧同志在狱中的日子里，她对自己早就作了牺牲的准备，每当亲友到狱中探视她时，她总是坚定地说：‘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有次，她对岸英说：‘你长大后，要记住这帮坏人对我们的迫害，把这些情况告诉爸爸。’虽然遭到敌人的残酷迫害，开慧同志仍坚持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一面利用在长沙的六舅妈探监的机会，写好纸条揉成小团带出去，向党组织汇报狱中斗争的情况；一面利用一切时机向狱中的难友进行革命工作，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不要怕敌人，团结起来，互相关心，把斗争坚持下去。她特别关心狱中的难友，六舅妈送点什么菜和钱来，她总是把那点好的菜分给生病和体弱的同志吃，把钱叫看守拿去买点东西来，同样要分给大家吃。开慧同志就是这样为党的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她被捕后，党组织和他父亲的生前友好，曾多方设法营救，但敌人以她系毛泽东之妻，案情重大，又在狱中坚持斗争，顽强不屈，终于悍然将她判处死刑。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就义时，年仅二十九岁。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杨开智：《忆杨开慧烈士》，载1977年5月11日《解放军报》。
2. 肖永义：《骄杨赞》，载1977年第3期《解放军文艺》。
3. 陈玉英：《难忘的岁月，幸福的会见》，载《湖南师院学报》1977年第1期。

4. 张琼：《清水塘畔的亲切教诲》，载1977年10月5日《文汇报》。
5. 李淑一：《毛主席灿如红日光照人间》，载1976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6. 西堂（李肖聃）：《杨怀中先生逝世再志》，载1920年1月20日长沙《大公报》。
7. 1930年杨开慧遇害后湖南《国民日报》（11月15日）、湖南《大公报》（11月18日）、《时事新报》（11月21日）的有关报道。
8. 杨开智、李崇德、李一纯、范裕英、易焕秋、李淑一、蒋英、邓裕芝、赵福初、范绶、张琼、易礼容、许文莹、熊瑾玎、戴毓本、李凤池、贺家修、文东先、毛润发、邹润泉、陈玉英、殷杰、向复、向三立、严嘉等的回忆材料和访问记录。

聂耳

徐继涛

人民音乐家聂耳，原名聂守信，号子义（后改为紫艺），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生于云南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溺水遇难，时年二十三岁。郭沫若一九五四年为聂耳撰写的碑文中，誉他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称赞他所谱的《义勇军进行曲》，“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壮然而宏志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

（一）

聂耳的祖籍在云南省玉溪县。他的父亲聂鸿信是个中医，光绪末年由玉溪迁到省城昆明，在甬道街开了一个叫“成春堂”的小中药铺，聂耳就诞生在这个中药铺的楼上。聂耳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他最小。他四岁时父亲病逝，从此家境贫困，全家的生活重担落在他母亲一人身上。

聂耳的母亲彭寂宽，是一个勤劳而倔强的傣族妇女。她原来就随丈夫学会了一些医药知识，帮助丈夫配方制药。丈夫去世后，她一面继续经营“成春堂”药铺，行医卖药，一面帮人做针线、洗衣服，依靠微薄的收入来养活全家。她把自己的欢乐和幸福全寄托在孩子身上，用全部的心血来教育他们成长，

平时对他们的要求很严格，不允许他们沾染半点不好的习气。

一九一八年，聂耳进入昆明师范附小读书。他学习刻苦用功，各科成绩都很好。初小毕业后，因为家里拿不出十多元钱来做当时学校规定的“童子军”制服，只好转到私立的求实小学继续念高小。

童年时代的聂耳，就受到云南丰富而优美的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的熏陶。他的母亲是他的第一个民间音乐启蒙教师。母亲会唱许多民歌，在给孩子们讲故事时，有时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一些优美动听的曲调。这些民间曲调好象种子，深深地播在聂耳幼小的心灵里。幼年的聂耳，也常去茶馆听滇剧清唱，逢年过节又跑到近郊去观看农民表演花灯，还常常一个人到郊外听农民“对歌”。他的记忆力特别好，白天听了别人唱的调子，晚上能原原本本地唱给家里人听。聂耳十岁时，跟邻居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求实小学组织了一个学生音乐团，聂耳在音乐团里除了演奏乐器，还担任过指挥，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音乐才能。

一九二五年，聂耳小学毕业了。当时昆明一般的中学都要学生在学校搭伙住宿，收费较高，只有联合中学招收走读生。聂耳和一些较贫寒的学生都争着报考联合中学，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该校插班生。

聂耳进入中学的时候，正是全国学生运动高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革命大风暴即将到来的信号传遍各地，也冲击着偏僻的云南。上海掀起的“五卅”运动，以及接踵而来的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深深地触动着聂耳。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自‘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国内罢工之风潮纷纷四起。

始有上海之纱厂，次则商务、中华二书局，而最近有电报局及汉阳铁厂之罢工。……此为何也？盖受资本家之压迫，生计之日高，工资之不敷故也。”“吾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这说明少年时期的聂耳，已朦胧地受到了革命风潮的影响。

一九二七年聂耳初中毕业，同年秋季报考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当时昆明唯一的公费学校，因此报考的人很多，而录取的比例只有十分之一，但聂耳仍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该校高级部（相当于现在的中等师范）英文组。他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除了认真读书外，对音乐、戏剧、文学、美术、体育都有着广泛的兴趣。在学校里，他是文艺活动的最活跃分子，演剧时经常扮演女角（因当时实行男女分校）。因为他曾在《克拉维歌》一剧中扮演过女主角“马莉亚”，后来“马莉亚”竟一度成了他的外号。

当时云南已建立了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和共青团省委。省师是党团组织秘密活动的重要据点。党团员通过阅读进步书籍、交朋友等活动，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组织。聂耳阅读了《东方杂志》的“李宁专号”（李宁即列宁）、《创造月刊》，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等多种书刊，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发与教育。后来还在党团组织的帮助下，直接阅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他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寒假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我读了几页马克思的文件。”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云南新上台的军阀由于正忙于内部混战，还未来得及对付革命群众运动。九二八年初，龙云在与其他军阀的争斗中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即步“四·一二”、“七·一五”的后尘，开始执行蒋介石的“清

共”政策。三月三十日，共产党人赵琴仙、陈祖武、罗采惨遭杀害。聂耳亲眼目睹了赵琴仙等烈士宁死不屈，英勇牺牲的壮烈情景。在新军阀制造的白色恐怖下，聂耳没有退缩，而是更勇敢地追求革命真理而斗争。一九二八年秋，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参加秘密印刷和散发传单等革命活动。

一九二八年后，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将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农村和工矿区。聂耳当时一方面为革命事业不能迅速推进而苦闷，一方面感到云南社会风气闭塞，一心想到外省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因此，他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瞒着家里报考了驻扎在湖南的云南十六军的学生军。离昆明前，他以为学生军就是军官学校。但到了湖南，却一律被编入新兵队。后来得到同学的帮助，才脱离新兵队，当了一个上士文书。次年三月被编入“军官团”，四月被遣散。几个月的士兵生活，使他有幸接触那些朴实的青年农民，对他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起了一定作用。

一九二九年五月初，聂耳由广州回到昆明，仍到省师原班读书，同时继续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这以后，他特别加强了对马列主义著作的学习。在五月二十三和二十四两天的日记中，他曾写下了自己的学习心得笔记：唯物史观，经济条件绝对律；人类意志的决定是绝对受经济条件之支配。马克思说，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法的变动为一切制度变动的标准。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进化的原因。要有阶级斗争，社会才有进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进化〔的〕直接动力。马克思说，资本家所得的利益是剥夺劳动者的过剩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资本集中是资本主义

自己造坟墓。这说明聂耳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聂耳在继续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还经常参加各种音乐演奏活动。他有时在一些“同乐会”、“慰亲会”上演奏小提琴；有时在一些晚会上表演口技、双簧、魔术等节目。还经常与一些朋友在一起演奏中外名曲。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一日，由于云南军阀内部的混战，在昆明引起了一场空前的火药爆炸事件，三千余家居民的房屋被炸毁，死伤人数在四千以上。昆明街头、无家可归、无米可炊的灾民不计其数。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成立了“互济会”的群众组织，发动募捐救灾；在昆明学生中也成立了“七一一青年救济团”，聂耳被选为青年救济团的主要成员。他在协助灾民解决衣物、住宿、卫生、教育和开展宣传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还发动灾民到军阀政府请愿，要求严惩祸首，赔偿损失。反动派对此大为恐慌，派军警四出逮捕学生。聂耳在群众的掩护下侥幸走脱，到乡下去躲避了一段时间。

一九三〇年初，云南新军阀的混战基本结束，龙云的独裁统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又回过头来镇压革命人民，许多共产党人被捕被杀，也有少数不坚定的分子当了可耻的叛徒。这年五月，叛徒供出了聂耳参加共青团的情况。抓人的黑名单已经摆在法院院长的桌子上了。这个院长的儿子与聂耳的三哥是同事，他看到黑名单上有聂耳的字名，马上偷偷跑到聂耳家里报信。家里很快去学校把聂耳喊回来，让他躲藏起来。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一家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刚好这时有个商人邀约聂耳的三哥去上海的一家名为“云丰申庄”的商号帮忙，经征得这个商人的同意，家里决定让聂耳顶替他三哥去上海。七

月十日，聂耳告别了亲人，取道越南前往上海。

(二)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八日，聂耳只身到了上海，在“云丰申庄”当伙计。

上海是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和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大本营，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聂耳一进入社会，就投身到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完全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知道怎样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他在给他二哥的信中说：“繁华的上海，藏污纳垢，您的弟弟早深深地感到。请您象以前一样地相信他，他决不会误入歧途的。”

“云丰申庄”的经营业务只有一桩，就是从上海采购香烟邮寄昆明销售。他们靠一个在邮局工作的股东瞒过高额的特种消费税，从中牟利赚钱。聂耳负责采办、包装和发放香烟回云南，每天劳动达十小时以上。开始没有工薪，只供食宿，后来每月发拾伍元钱，除吃饭外，也仅够添些衣服和零用。这个商号在虹口公平路的一条弄堂里，居住条件很差，周围环境杂乱不堪。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聂耳仍坚持学习英文、日文，学习革命文艺理论。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看了几篇革命文学论文，指示给我现在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今后我们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将改变”，要“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在工作之余，他还经常练习口琴、二胡。他最喜爱的乐器是小提琴，可是靠那几个仅能糊口的薪俸是买不起的。直到一九三一年二月，他替云南戏

院租了几部上海影片，因而得了一百元的酬劳。他把这笔钱一半寄给母亲，另一半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和几本乐谱，才使多年的心愿得以实现。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聂耳仍然没有忘记昆明的斗争生活。每逢“八一”南昌起义纪念日和苏联十月革命节，他总是兴奋地注视着街头，希望能看到革命群众迎接节日的纪念活动。可是每次都使他失望。他在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上海的‘八一’，料想中不会这样，因为租界已经先期严密防犯。今天的报纸开始便是‘今天八一华租界严密防犯’。”到上海两个多月后，聂耳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一些群众性的示威游行。

一九三一年三月，“云丰申庄”因漏税的事情败露，受到巨额罚款后倒闭。聂耳随之失业。正当他徘徊街头、为寻找工作而四处奔波的时候，突然从报上看到了明月歌剧社招考乐队练习生的广告，待遇除供给食宿外，每月还津贴十元零用钱。这对聂耳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它不仅可以解决眼前的温饱问题，更重要的，这是一个专门从事音乐的地方。

四月，聂耳考入了明月歌剧社。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一心钻入艺术之宫，勤奋刻苦地学习他最喜爱的小提琴演奏，每天练习的时间都在六个小时以上。那时候，他的日记中经常出现“一天的小提琴生活”这样的字样，外界的一切仿佛都被他忘却了。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半年多的勤学苦练，聂耳的小提琴演奏技巧有了很大提高，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

聂耳到明月歌剧社时，用的是“聂紫艺”的名字。因为他有一付天生的十分敏锐的耳朵，擅长模仿别人说话的声音和腔

调，又因为他姓聂，因此很多人就叫他“耳朵先生”。后来他索性在自己的姓下面加一个“耳”字作名。因为这个名字叫起来很顺口，很快便被大家传开了。

在明月歌剧社里，聂耳除了伴奏，还经常登台演出。一九三一年七月初，他参加了明月歌剧社在北京大剧团的演出。这是聂耳第一次在上海登台表演。那几天天气很热，每天要连续演出三场，非常吃力。但他一连演了四天，总共才得到六块钱的报酬。为此，他在七月四日的日记中写道：“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是无微不至啊！”“细想一下，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工人们大汗淋漓地在那高热的机械下苦作。”聂耳愿将自己比做劳苦的工人，这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是很难得的。

聂耳在繁忙的演出和专心学习小提琴之余，还通过看电影、听唱片、听音乐会等等活动，来提高自己的音乐鉴赏能力，并刻苦自学各种音乐知识和作曲理论，研究和声和钻研民族音乐。这些，都为他后来的音乐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紧张而艰苦的工作和学习中，聂耳没有放松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经常进行自我反省，严格要求自己。一九三一年七月十日，即聂耳离开家乡到上海刚满一年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对自己作了这样的反省：“在这一年中，我的生活虽有小小的变迁，但仍不如我计划中的一年应有的进步。”他感到自己“背驰了原定的路线”，“放松了某一种思想的发展”，认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学习革命理论，用马列著作来武装自己。因而他开始制定学习计划。当学习计划订出来的时候，他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愉快”，兴奋地在日记中用英语写道：“现在的聂耳，不是过去的聂守信！”这以后，聂耳如饥似渴

地阅读了《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他在八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不论你从那条路跑，你对于哲学的基础不稳定，终于是难得走通的。”“新的脑子的培养，不是用一个模型一套，便一次铸成永不会腐破的。它正如一棵幼小的植物，随时都要合理的灌溉”。否则，“它的一生总是枯萎不振的。”这说明此时的聂耳，从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已经认识到要不断学习革命理论，不断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改造思想，才能符合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永葆艺术的青春。

继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九三二年上海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潮汹涌澎湃。上海爱国军民不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阻挠和破坏，自动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急风暴雨的斗争，更加唤起了聂耳的战斗激情。他对自己过去一度脱离革命斗争，单纯追求音乐艺术的倾向，进一步作了无情的批判。就在“一二八”事变后的十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七日，他向自己提出了“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的问题。他在日记中质问自己：“象过去这样，一天几个钟头刻苦做基本练习，练了几年，几十年，成为一个小提琴名家又怎么样？你能兴奋起、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他对这个问题，作了断然否定的回答：“不对，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

就在这时，党组织向他伸出了热情关怀的手。一九三二年四月，聂耳与革命戏剧家、诗人田汉发生了联系。据田汉后来回忆，在他们初步会晤中，聂耳谈了他的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倾吐了他对共产党的渴望、仰慕和寻求，表示要好好学习，把自己的一切才能都献给党。

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使聂耳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外

敌入侵，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明月歌剧社仍然演出一些与时代的脉搏和人民大众的需要格格不入的轻歌漫舞，聂耳对这种状况深为不满。一九三二年七月，他在左翼刊物《电影艺术》上，用“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题为《中国歌舞短论》的文章，以鲜明的阶级观点，尖锐地指出了明月歌剧社和中国歌舞界所存在的问题，批判了为歌舞而歌舞的观点，主张歌舞必须为大众服务，指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可是这些正确意见，却引起了明月歌剧社一些人的忌恨。这年八月，聂耳以叛逆者的姿态，愤然离开了明月歌剧社。

八月十一日，聂耳由上海到了北平。九月，他报考北平艺术学院未被录取，只好花钱去找一个叫托诺夫的俄国私人教师，继续学习小提琴。聂耳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优秀的成绩，受到了托诺夫的称赞。

聂耳通过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很快与北平剧联取得了联系，参加了他们的演出活动，曾在高尔基的独幕剧《血衣》中扮演角色。十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邀请北平剧联去演出。当时的斗争很激烈，空气很紧张。在演唱《国际歌》时，台下的右派学生起哄捣乱，有的还往台上扔石头，担任钢琴伴奏的人被吓跑了，聂耳不畏强暴，仍坚持用小提琴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演奏完。

聂耳参加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组建工作，协助他们草拟组织大纲，召开成立大会，使北平音乐家联盟很快组织了起来。

聂耳在北平期间，还经常深入贫民区天桥等地，收集北方民族和民间音乐素材，体验劳苦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在九月十一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攒入了一个低级的社会。在这

儿，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真枪的对打声、锣鼓声……是他们生命的挣扎，是他们向敌人进攻时的冲锋号。”

十一月初，北平的天气已经很寒冷，而聂耳的棉衣还在上海的当铺里。他没有考上学校，工作也无着落，不得不决定重返上海，另外寻找工作。

(三)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聂耳由北平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影业二厂做事。

一九三三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占我国领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候。在此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刻，聂耳毅然以一个民族战士和阶级战士的姿态站在斗争的前列，决心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入党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聂耳的文艺思想有了进一步提高，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的新内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态度。”（一九三三年六月三日日记）他鞭策自己，加倍地刻苦学习，决心拿起音乐这个战斗武器，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服务。于是，他开始了艰苦的音乐创作活动。

由于有正确思想作指导和自己的刻苦努力，入党后至遇难前这两年多的时间，聂耳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以

饱满的革命热情，成功地创作了三十多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乐曲。这两年多的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时期。

从北平回到上海后，聂耳先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担任场记。一九三三年夏天，该厂拍摄《母性之光》的影片时，聂耳除了担任场记外，还为该片创作了一首电影插曲《开矿歌》，这是聂耳写的第一首电影歌曲。联华影业公司规定，公司的职员除了担负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要根据需要，随时准备担任各种群众角色。《母性之光》中有一个黑矿工的群众角色，化妆时必须全身涂黑，当时没有一个演员肯干，聂耳主动承担了这个角色，并且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工人阶级的形象。以后，聂耳还在电影《小玩意》、《渔光曲》等影片中扮演过各种角色。

当时聂耳的工作相当繁重。在厂内，除了担任电影场记和各种角色外，还担任了音乐股主任、俱乐部执行委员兼秘书、剧本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厂外，聂耳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是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常委兼组织部秘书，还参加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和任光等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共同研究音乐理论和创作问题。此外，他还经常随左翼剧联到工厂、学校开展演出活动。有一次，他随左翼剧联的剧团到上海郊区用上海话向农民和学生演出反帝话剧，受到热烈欢迎。

在党的领导下，左翼电影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文化”围剿。敌人恼羞成怒，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派遣特务砸毁了曾经拍摄过进步影片的艺术华影业公司，同时发出通告，禁止各影业公司及电影院拍摄和上映进步影片。聂耳在联华公司老板的眼里，早就被视为左倾分

子。一九三四年一月，老板以请聂耳“休养身体”为借口，将他辞退。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聂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进入了英国人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尽管当时反动政府对报刊、杂志、电影进行着严格的审查与控制，但由于百代唱片公司是外国人办的，因此他们也不敢进行干涉。而外国老板则只顾赚钱，别的事情很少过问。聂耳在百代公司，主要协助原已进入该公司的革命音乐家任光做收音工作。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方便条件，在发行电影歌曲、流行歌曲的同时，发行了大量革命歌曲，仅聂耳的歌曲就有二十余首灌制了唱片。民间器乐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等，都是由聂耳改编并灌制成唱片的。这是聂耳对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一个贡献。在百代公司，聂耳还组织了一个“百代国乐队”，虽然只有五个人，但也公开演奏，很受欢迎。

六月三十日，左翼剧联在上海演出了由田汉编剧的《扬子江暴风雨》。聂耳除为这个歌剧创作了插曲《码头工人歌》、《打砖歌》、《打桩歌》、《苦力歌》之外，还扮演了剧中的主角——打砖工人老王。他那卓越的表演技巧，曾得到当时报纸和舆论的好评。

一九三四年，党直接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了。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聂耳著名的《毕业歌》就是为这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歌。十二月，他又为影片《大路》配乐。《大路歌》和《开路先锋》，就是他为这部影片配的两首歌曲。

一九三五年一月，聂耳重新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担任二厂音乐部主任，为影片《新女性》创作了《新女性》组歌。

为了演唱好这首充满革命思想和战斗激情的组歌，聂耳专门发起组织了一个联华声乐团，并亲自担任辅导和指挥。这个声乐团的成员很多都是当时沪东公司的女工。春节期间，影片《新女性》尚未放映，聂耳指挥身着工装的联华声乐团的姐妹们，公开演唱了《新女性》组歌，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聂耳的歌曲为什么这样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是因为他的创作源泉来自人民大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他创作《码头工人歌》时，经常到上海码头去观察与体验码头工人的生活，与工人一起谈心，一起劳动，一起哼着劳动的号子，因此才谱写出了反映工人心声的旋律。在创作《新女性》这首歌曲时，他多次踏着晨霜夜露到纺织工厂去体验女工的劳动生活，倾听她们的呼声，了解她们的疾苦，学习她们的语言。为着创作《卖报歌》这样一个音乐小品，聂耳与一个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问寒问暖，亲切交谈。《卖报歌》写成后，这个被人们称作“小毛头”的女报童，又是他的第一个听众和教唱的对象。

一九三五年三月，党领导的电通影业公司决定拍摄《风云儿女》。聂耳听说这部影片有一个主题歌需要作曲，便主动跑去找担任编剧的夏衍。夏衍后来回忆说：“我给他看了电影剧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看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他重复了一遍，‘田先生（即词作者田汉）一定会同意的’。”这个主题歌就是后来震撼中华大地的、世界闻名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杰出的革命战歌，表达了亿万人民共同的心愿，喊出了中国人民要求奋起抗战的呼声，发出了中华

民族的怒吼，因此深受人民喜爱，很快传遍全国，而且经久不衰。全国解放后，又被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着《桃李劫》、《大路》、《新女性》等影片的放映和唱片的发行，聂耳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毕业歌》、《新女性》、《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优秀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到日本定稿后寄回来的），很快不胫而走，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正因为这样，聂耳的名字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突然得到反动派要逮捕聂耳的消息。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个奋发有为的青年革命战士，同时考虑到他渴望得到进一步深造的要求，决定让他取道日本，然后去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学习、考察。

四月十八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一落脚，他就马上开始了对日本音乐的观摩、考察和研究工作，整天忙于参观学习，观看演出。他打算在日本多停留一段时间，专门给自己制定了一份四个“三月计划”。第一个“三月计划”的重点是突破语言关，同时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

六月二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中华青年会馆内举行第五次艺术聚餐会。聂耳在会上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报告，还演唱了他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他的演说和演唱，深深地打动了与会的中国留学生，不少人评论说，聂耳不仅是一个进步的音乐家，还是一个演说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短短的时间里，聂耳结识了秋田雨雀、滨田实弘等日本文学艺术界进步人士，并通过他们与新协剧团，新筑地剧团等

文艺团体建立了联系，观看了他们的排练和演出。

为了更直接地了解日本剧团的演出情况，聂耳应邀参加了新协剧团去大阪、神户、京都等地的旅行公演。为此，他没有和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一起去房州海滨避暑度假，而是通过新协剧团一个朝鲜朋友的介绍，到了神奈川县藤泽市鹤沼海滨去洗海水浴，还准备登临富士山，然后赶到大阪与新协剧团的大队人马会合，参加演出。

聂耳到藤泽市后，住在日本友人家里，几乎每天都去鹤沼海滨游泳。

七月十六日，聂耳总结了他到达日本后的第一个“三月计划”执行的情况。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日语会话和看书能力的确是进步了，听了很多音乐演出，练小提琴的时间也比在国内多，提前实现了第一个“三月计划”。七月十七日，正当他开始实行第二个“三月计划”的时候，他与友人去鹤沼海滨游泳，被无情的海水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聂耳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及国内文艺界都沉痛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深深怀念这位杰出的人民音乐家。

一九三五年夏末，聂耳的骨灰和遗物，由他的生前好友张天虚、郑子平护送回上海。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安葬在风景优美的昆明西山。解放后，一九五四年人民政府在原地重建了聂耳墓，郭沫若亲笔题写了碑文。同年，日本的友好人士和团体，也在聂耳遇难的鹤沼海滨修建了聂耳纪念碑；一九六二年成立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一九六五年又重建了被海啸冲毁的聂耳纪念碑，并规定每年的七月十七日为“聂耳祭”的日子。一九八〇年，昆明市政府又在西山扩大、重修了聂耳墓，前往

吊唁的人民群众和中外人士络绎不绝。一九八一年，聂耳出生地中国昆明市与遇难地日本藤泽市结成了友好城市。

聂耳只活了二十三个年头，他的生命是短促的，但却闪烁着灿烂的光辉。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更为短暂，一共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为我国无产阶级音乐事业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驱者与奠基人。

聂耳的光辉形象将伴随着他不朽的歌声永远活在我国人民心中；他那激越的歌声将永远激励我国人民“前进！前进！前进！进！”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印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资料丛刊·聂耳专辑》第1—3册。
2. 洪道：《略记聂耳在上海自学音乐的一段生活》、《聂耳年表初稿》。
3. 向延生：《暴风雨中的海燕——人民音乐家聂耳生平简介》。
4. 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关于聂耳的部分文物资料等。

祁天民

张宝裕 陈秀玉 祁鲁梁

优秀的共产党员祁天民，是一位有成就的地质学者和考古学者，抗战后被党派到新疆工作，因为劳瘁过度，于一九三九年在哈密病逝。

(一)

祁天民，原名祁延霈，字霈苍，满族。一九一〇年八月生于山东省济南市的一个教师家里，祖籍山东益都县。祁天民的父亲祁蕴璞(又名祁锡培)，济南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先后在济南高中和师范学校任教，讲授历史和地理两门课。

祁蕴璞娶妻郝霭如，生四男二女，天民是长子。一家九口人全靠祁蕴璞每月的低薪生活。因家境清寒，祁天民自幼营养不良，身体发育不佳，头大身材小，且高度近视，从小就戴上了近视眼镜。

祁天民六岁时，到济南有名的模范小学读书。他聪明过人，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强，加上父亲的严格教育，以及家住“七家村”^①，左邻右舍都是教师之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

^①1918年，祁天民的父亲和同校于丹甫等七位教师合资，在济南东门外乱葬岗子处修建住宅。七家教师迁入居住，故人们称之为“七家村”，此地名至今仍保留。

书。小学六年，他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模范小学有个小图书馆，祁天民几乎每天课余都要去那里阅读课外书籍。由于他爱书好学，加之又品学兼优，后来学校竟让他当上了图书馆的小馆长^①。

一九二二年秋，祁天民小学毕业后考入济南省立一中。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每天放学回家，仍然手不释卷。一年夏天，济南酷热，母亲和弟妹们常于晚饭后坐在院中乘凉，唯独天民闭门读书，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有一次，正吃着饭他想起了一个问题，便放下饭碗，跑回自己房内埋头写起来。母亲说：“这孩子让书迷上了”^②。他不进娱乐场所，而乐在读书中。由于刻苦钻研，他在中学的各门功课成绩皆优，学校每学期的优等生榜上，都有祁天民的名字。

祁天民的父亲对地理科学颇有研究，具有较深的造诣。在他执教的二十多年中，编写了《中华大地志》等一百多万字的有关中国地理、历史以及国际概况等方面的教科书和论文。由于他学识渊博，有专著，精通英语和日语，曾被英国皇家地理协会授予“名誉会员”^③称号。

祁天民受父亲的影响很大。他用心地读了父亲写的每一本书，从中了解了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矿藏，壮丽的山河。他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济南的工人、学生也纷纷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

①祁德庸：《家庭与环境对祁延霏的影响》（未刊稿），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②③祁延煦：《怀念大哥》（未刊稿），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威，声援上海工人斗争，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一向埋头读书、沉默寡言的祁天民，迸发了反帝爱国热情。在省一中举行游行示威时，他积极地加入了游行队伍，昂首挺胸地前进在反帝斗争的洪流之中^①。

(二)

一九二八年夏，祁天民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一九二九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地理系，系主任是中国的地质学家翁文灏。祁天民由于慕名，又重新报考清华大学地理系，被录取。那一年，清华地理系只有祁天民、程玉淇、张兆瑾三个学生。一九三〇年，地理系改为地学系，下分三个专业，即地理、地质、气象。学地质的，除上述三人外，又转来杨遵仪和王植，共五人。

祁天民在清华大学四年，勤奋学习，善于思考，重视实践，并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为座右铭。平时，他认真阅读古今中外有关专业方面的文献资料和参考书，并刻苦攻读外语，积极参加野外作业。他在参加一九三〇年春在北京西山，一九三一年春在河北宣化下花园、张家口、山西大同和五台山，一九三二年在山东泰安、济南、青岛等地进行的地质考查、地形测量和采集标本等活动中，每天和同学们一起早出晚归，爬山涉水，到处勘测、寻宝，把所能见到的有价值的石头、瓦片、陶片，都捡起来装箱运回学校。这些实物标本，为后来的地质考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祁天民还擅长绘

^①祁德庸：《家庭与环境对祁延霈的影响》。

图。在校学习时，他就承担了实业部北京地质调查所委托的绘制地质图的任务，和王植一起填绘了北京郊区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八大处”地质图，和赵金科一起填绘了北京郊区二万五千分之一的“斋堂”、“百花山”等三幅地质图。当时的专家们反映，他们所绘制的地质图，质量都很好^①。

在清华地学系，祁天民不但学习“成绩斐然”^②，而且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在学校担任地理学会总务股长，还是校学生会民众教育科的成员和平民学校的教员。校学生会的民众教育科，负责“办理平民学校、校工学校及其他民众教育事宜”^③。当时清华的平民学校是为附近没钱上学的工人、农民、市民及其子女办的免费教育，晚上上课，教员没有报酬，全尽义务。祁天民对每一项社会工作都尽心尽力。他讲课非常认真，每一次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传授文化知识，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好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西北边陲新疆，曾是俄、英、日等帝国主义的角逐之地，英、俄曾私分过我国的帕米尔。祁天民的父亲激于爱国主义心情，很重视对祖国西北边疆历史和地理的研究，在教书之余，写过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祁天民受父亲的影响，在清华学习期间，也对西北边疆历史、地理问题了进行研究，是清华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大学三年级时，他就写出了两万余字的论文——《帕米尔

①程裕淇：《优秀的地质学家祁延霈》（未刊稿），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②《祁延霈先生事略》，《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3月版。

③《清华大学学生会章程》，《清夏周刊》1930年9月1日。

史地考》，发表在《清华周刊》文史专号上^①。这篇论文“孕育着爱国的激情”，是一篇“有相当份量的论文”^②。

祖国处于内忧外患之际，清华园是不平静的。清华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曾几次闹学潮。一九三〇年，校长是国民党的代理人罗家伦。他的反动言行激怒了同学们，地学系学生许桂馨带头掀起驱赶罗家伦的风潮。学生的行动得到教师的支持，结果，罗家伦被迫离校。国民党又派来陈立夫的CC分子吴南轩当校长。吴上任不久，就搞了个校长治校的章程，取代了原来的教授治校制度，因而遭到教授们的反对。教授会发起罢教驱吴运动，学生起来声援，师生的联合行动获得成功。学校的两次风潮教育了包括祁天民在内的全体师生，使他们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清华师生也义愤填膺。讲师吴其昌到北京香山衣冠冢哭陵，骂蒋介石不抗日；学生们几次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在这段时间内，祁天民虽然几次外出实习、进行野外考查，但只要他在校，就以高度的爱国热忱，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从中接受教育和锻炼^③。

祁天民学习好，为人忠厚老实，生活俭朴，性格刚毅，能吃苦耐劳，因而老师喜欢他，同学敬佩他，亲友对他赞不绝口。大学毕业前夕，他与刘晓雯结婚。

① 《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1932年5月7日。

② 尹达：《忆潘苍同志》（1982年8月15日），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③ 尚传道：《勤奋学习踏实工作的清华优秀生祁延霖》（未刊稿），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一九三三年，祁天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并获得理学士学位。当时的清华毕业生，大多想出国深造，而祁天民却打算用更多的时间在祖国的大地上“实地考查，探求新知”。恰在这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需要一名考古人才。该所认为学地质的搞考古，比学历史的搞考古更在行，而祁天民“在当时考古界是对地质在行的独一无二的人”^①。因此，经地学系系主任袁复礼推荐，祁天民受任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三组助理员。

(三)

祁天民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后，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田野考古。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他先后调查了山东沿海古代遗址、益都铜器时代葬地，参加了山东滕县安上村、日照、两城镇和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墟第十至第十三次发掘工作。著名的殷墟发掘，在我国考古史上是件大事，它发现了中华民族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为商史和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大批可靠的宝贵资料。而第十至第十二次的发掘，又是殷墟发掘的最高峰，因这三次是发掘大墓，即帝王墓。当时，四座大墓同时进行发掘。祁天民在全面负责完成了四座墓地的地质测量工作之后，直接负责二号墓——这四座墓中规模最大、又最完整的一座——的发掘，为殷墟发掘作出了重大贡献^②。通过上

①程裕洪：《优秀的地质学家祁延霈》。

②胡厚宣：《殷墟发掘贡献大，为了抗日赴延安》（未刊稿），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述调查和发掘的实践，他写出《山东日照考古调查记》、《山东日照、两城镇大孤堆发掘报告》、《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等论文。《中国考古学报》刊登的《祁延霈先生事略》中，称他一系列的发掘工作“卓著劳绩”。还赞誉说：“君又精于测量，审于地质，每次发掘，地形图多由君测绘；出土石器，质料多由君鉴定。君短小精勤，体力过人，凡所分担工作，案无存留，每调查爬山涉水时，辄前侪辈，诚考古界之英俊也。”

祁天民很爱他的事业。为了事业，他顾不上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和新婚的妻子。有一次，他从南京出发去外地考古路过济南，但他没回家，只给爱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所从事的考古工作，是“踏遍青山寻宝藏，涉尽万水求真理。”他还向亲人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野外生活：“我们是人而非猴的扮装，披着月光，踏着寒霜，饮清泉，咽干粮，探索沉睡在地下的宝藏，乐在其中，叫你这不知野外风光的人也来品尝！”^①不过，年轻的地质学家的乐观，很快就被苦闷和愤怒所代替。虽然“考古”这门学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与世无争”的冷门，但就是这宗与“古”“墓”打交道的事，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也难以顺利进行。祁天民和尹达等人在殷代陵墓里发掘出了石雕，消息传开，竟被古董商勾结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和盗墓犯，把“宝”盗去了。这件事使酷爱祖国文化遗产的祁天民十分气恼。他深感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考古工作“是否搞下去”^②的大问号。

①刘晓雯《踏遍青山寻宝藏，涉尽万水求真理》（未刊稿），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②尹达：《忆霈苍同志》。

一九三四年冬到一九三六年春，祁天民曾断断续续地在北平住过一些时间。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步步深入，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之后，北平爱国学生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吼声。祁天民目睹国难严重，忧国忧民之心日重。一九三六年春，他和尹达到山东日照、两城镇进行田野考古，又眼见鲁南农村广大贫苦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而蒋介石不去抗日，却叫嚣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切使他悲愤不已。回到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和尹达一面整理田野考古资料，一面议论国事，都感到“在国家危亡之秋，实在考不下去‘古’了”^①。

一九三七年春，瑞典政府派中国史前考古学家安特生来华，要求到我国四川西部去“考古”，理由是他们的瑞典皇太子“热心考古”。祁天民所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得知此事，当即提出：川西是祖国内地，不能让一个外国人随便走来走去，应当有我国的考古学家一同前去。国民党政府对这个建议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同意。于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派祁天民与安特生同去川西。他们到四川开始走了一些地方，祁天民就感到奇怪：这位“大考古学家”为什么不搜集陶片和遗物，而总是东张西望，并不时支起测量仪？他怀疑：安特生“究竟是真心考古，还是另有目的？”经过反复细心观察，他断定安特生“是以学者面貌出现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侦探。于是，当安特生再支起测量仪的时候，他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制止”，致使这位“考古学家”的阴谋未能得逞^②。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轰炸南京。十九

^{①②}尹达：《忆霭苍同志》。

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南京迁到长沙。

祁天民在返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途中，抵达汉口，与逃难到武汉的家人见了一面。当天，他又匆忙赶往长沙。

住在长沙圣经学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其他几个单位的知识分子，每天早晨集合升旗、唱歌。当时，有两个人常来这里演讲，一个是国民党的党棍赖琏，另一位是教育家、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赖琏一开口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听的人极少。徐特立的演讲，宣传抗日救亡的形势，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呼吁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不但内容新鲜，而且言词慷慨，听众一次比一次多。徐老每次讲演，祁天民都去听，思想上深受教育^①。他从抗战以来的大量事实和徐老的演说中得出结论：要抗日救国，只有靠中国共产党。于是，他毅然决定舍掉自己心爱的专业、优厚的物质待遇和亲爱的父母妻儿，到延安去。十一月底，日寇轰炸长沙。祁天民、尹达等便乘此提出，要上山打游击，抗日救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们心里明白，他们是要去延安^②。

不久，祁天民一行六人离开长沙。为掩人耳目，他们每人胸前都戴上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徽章，到西安后，又特意住进接待国民党要员的西京招待所。古都西安，对考古学家是有很大的诱惑力的。但祁天民为抗日救国，只逗留了两天，便和尹达、杨廷宾一起，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迫害，出发北上了。

①尹达：《忆霭苍同志》。

②胡厚宣：《殷墟发掘贡献大，为了抗日去延安》。

(四)

一九三七年冬，祁天民来到日夜盼望的革命圣地延安。他好象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的一切对他是那么新鲜，那么亲切，那么使他振奋。不久，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二期第九队学习。

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学员有来自平津的爱国青年和东北、华北、西北等地的革命学生。祁天民毕业于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是一个颇具名声的地质考古学家，在延安可说是有数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但他很能吃苦，和同学们一起住窑洞，睡土炕，吃小米饭，在露天上大课，过着艰苦的生活，情绪很好，热情很高^①。

在陕北公学这座革命熔炉里，祁天民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课程，积极参加政治、文化、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对党，对形势，对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都有了新的较深刻的认识。他决心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坚信胜利就在前面，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就在这一年年底，祁天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陕公的学员毕业后，多数上前线。祁天民也盼望着能上抗日前线，杀敌保国。但组织上却分配他到新疆去工作。

原来，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一九三三年上台后，为了稳定新疆的形势，巩固他的政权，便伪装进步，提出了“反帝、

^①于村：《祁天民同志在延安》（未刊稿），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抗日。为了抗日和民族利益，我党决定和盛世才建立统战关系，中央先后派陈云、邓发、（化名方林）、陈潭秋（化名徐杰）去新疆任中共代表。盛世才通过中共代表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派干部来新疆工作。党中央同意了盛世才的要求。祁天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组织挑选派往新疆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祁天民、张东月、朱旦华、于村等准备到新疆工作的和准备到新疆或苏联治病休养的党员干部，齐集在延河边等待出发。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勉励大家到新疆后多为各族人民谋利益，要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要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作贡献；并且在每个人的笔记本上签名题词留念。队伍出发了。祁天民仰望宝塔山，情不自禁地喊道：“延安，再见了！”

（五）

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祁天民等一行四十多人乘车到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为了便于工作，来新疆的每个共产党员都改用化名，祁天民就是在这时将自己的“祁延霁”改为“祁天民”的。他取名“天民”，是表示自己愿意“永做天山之民”。七、八月间，他们这批共产党员陆续地被分配工作，祁天民被分配到新疆学院，任学院秘书兼教育系系主任。

新疆学院是新疆的最高学府，但当时只设政经、教育、语文三个系和一个附设的高中部；三个系的学生一共只有百余人。这些学生，大多是官僚、地主和大商人的子弟，不少人是

为了升官发财来镀金的，因而学习松懈，纪律涣散，娇气十足，有的甚至生活腐化。学校的设备简陋，校容很差，教师数量不足，水平不高，教学质量也达不到要求。

为了发展新疆的教育事业，办好新疆学院，党代表邓发还先后派共产党员林基路、杨梅生、许亮到新疆学院工作，林基路任教务长，杨梅生任军事教官，许亮任历史教员。当时的院长是教育厅长兼任，不在学校办公，也不常过问校务，学院的一切工作都由教务长林基路主持。祁天民是学院秘书，协助林基路处理日常事务，是林基路的有力助手。

这四位共产党员来到新疆学院后，以“抗大”为榜样来改造学院。他们组织学生进行建校劳动，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集体主义精神，并且美化校容，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林基路提出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八字校训，以整顿不良的校风，并提出“教用合一”的教学方针，以整顿学风。为了多培养人才，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起，陆续增设了理工系、土木工程系、俄语系，新开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并从延安、新疆当地和苏联聘请了一些专业教员。林基路、祁天民不但在学院任课，而且还经常给学生做形势报告，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击日寇的辉煌战绩，对师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他们还在新疆学院发动和组织师生们进行抗日捐献。尽管教师的薪金低，生活贫困，学生在经济上还不独立，但他们在党的教育下激发了爱国热情，纷纷踊跃捐献。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林基路、祁天民在新疆学院还倡导歌咏和戏剧活动。在祁天民的协助和参与下，多才多艺的林教务长亲自给全校师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

《毕业歌》、《松花江上》和《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抗日歌曲，亲自导演《放下你的鞭子》、《哨声》等抗日话剧。在全市歌咏和话剧比赛时，新疆学院都名列前茅。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新疆学院的学习空气、抗日气氛日益浓厚，师生的精神状态也迅速改变，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被誉为“抗大第二”。

这期间，祁天民除协助林基路抓好校务工作外，还担负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他给教育系学生讲授教育发展史和中国自然地理，给政经系学生讲授中国经济地理和中国社会史。为了讲好一堂课，他常常是通宵达旦地伏案备课。他在给教育系学生讲授“陆地漂流”和“板块学说”时，同学们被他那新鲜的内容、生动的讲述所吸引，听得津津有味，课堂上鸦雀无声^①。同学们都晓得祁老师喜欢收藏和研究各种异石，所以大家有时捡到奇怪的石头就给他送去，他每次都很高兴地用手帕将它包起来留待研究考证。他很关心爱护学生，常深入学生中和他们谈心，鼓励他们好好学习。祁天民曾将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纪念册，写上“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斗志，谦虚的态度，质朴的生活”^②四句话，赠送给一个学生，教育他怎样治学和做人。同学们都很喜欢和尊敬祁老师，视他为良师益友。

林基路、祁天民等为办好新疆的最高学府，为促进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培养新疆的各族青年，真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青年学生们已经悟到了精心培育自己的几位老

①赵明：《优异的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一个纯真的共产党人！》（未刊稿），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②彭吉祥：《不忘祁老师的鼓励》（未刊稿），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师不是一般的人，一定是从延安来的共产党人，都把这几位老师当作自己向上、进步、革命的引路人，自觉地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并且已经涌现出了阿巴索夫、乔国仁等一批有名的进步学生。林基路、祁天民等共产党员在新疆学院的威望愈来愈高，新疆学院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愈来愈大。这可吓坏了阴险狡猾的军阀盛世才。他把林基路、祁天民等共产党人在新疆学院的建树和新疆学院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看作是对自己统治地位的一种威胁，便以“加强地方工作”为借口，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将四位共产党员全部调离学院，派林基路到阿克苏任区教育局局长，祁天民到哈密任区教育局局长，许亮到蒲犁任县长（杨梅生回了延安）。盛世才这还不放心，生怕林基路、祁天民培养教育出来的进步学生以后起来造他的反，后来便制造种种罪名将新疆学院的大批进步学生分批逮捕入狱，许多进步学生被杀害于狱中。

(六)

一九三九年春，祁天民来到东疆边城哈密。他从自己和其他几位共产党员被调离日益革命化的新疆学院、分别派往边远区县这一事实中，认清了盛世才这个投机政客的真面目，从而更加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所以，到哈密区就任教育局局长之后，他就以顽强的革命毅力投入了新的战斗。

哈密地区的教育很落后。全区三个县竟没有一所中学，小学也只有四所：哈密城内两所，广大农牧区两所。因学校数量太少，规模又小，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极低。加之广大农牧民生

活贫困，无力送子女上学，致使文盲占整个地区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就连那仅有的四所小学，也还是缺少教师、教材和设备，条件很差，教育质量很低。过去，哈密区名义上有个教育局，但实属虚设，只有两名工作人员，还无专门办公地点。祁天民到任之初，工作真是困难重重。好的是，张东月、李涛、申玲等共产党员，自一九三八年由延安来新疆后，就被派到哈密。他们经过一年的艰苦调查研究，已经熟悉了当地的情况，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一切，都为祁天民的工作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祁天民首先抓紧建立学校，提高学龄儿童的入学率。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经济落后，财政困难，教育经费少得可怜。他就千方百计发动各族人民办学，实行“民办官助”。当时，在我党抗日救国方针的影响下，哈密已经成立了汉族文化促进会、回族文化促进会和维哈文化促进会。这些文化促进会均属民办，都有会馆和资金。祁天民提出，由各族文化促进会出钱办学，把会馆的房子或庙宇做教室，教师和教材则由教育局负责解决。经过说服和协商，汉族、回族、维哈族的文化促进会都赞成他的办法，很快就办起了自己的会立小学。祁天民又领导教育局多方努力，在农牧区办起了二十七所公立小学。由于城乡小学的建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哈密地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六十^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为了实现这个变化，祁天民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为了解决师资问题，祁天民主办了哈密地区的有二、三百

^①张东月：《忆祁天民同志》（未刊稿）；李涛：《祁天民同志在哈密》（未刊稿）；杜家祥：《怀念我的老师祁天民》（未刊稿）。以上均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人参加的教师训练班。他亲自给训练班的学员讲授政治课，还请张东月、李涛等前来讲课。各族学员经过短期的学习和训练，提高很快，学习期满后被分配到新建的或原有的小学任教，保证了各学校都能在九月初开学上课。九月中、下旬，教育局又举办了哈密全区运动会，以推动各校体育活动的开展。

祁天民在哈密办教育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深受各族人民的赞扬，至今哈密的一些各族老人一提起祁天民，仍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为“我们的祁局长”^①。

祁天民在哈密大办教育的同时，还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从事抗日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在哈密城内经常举行群众大会，向各族群众宣传全国抗战形势，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团结各族人民抗日救国作出了贡献。

一九三九年二月，新疆财政厅长毛泽民（化名周彬），为整顿新疆财政、稳定物价而改革币制，发行新币，通过新旧货币的兑换，将旧币收回统一销毁。祁天民在哈密，大力宣传币制改革的好处，还参加了销毁旧币的工作。十一月初的一天，卡车拉着一捆捆的旧钞票到哈密郊外去销毁，祁天民随车前往。旧纸币烧起来火势很大，但钱捆的中心却烧不透。祁天民拿了根棍棒，围绕火堆来回转着拨翻。他本来体质就差，来哈密后又过度劳累，加上生活艰苦，营养不足，身体更加虚弱。经过这样长时间围着火堆用力翻拨，累得他满身大汗，连内衣也湿透了。完成任务返回时又受寒风吹袭，路途上就着了风寒。但他

^①尤努斯伊敏、马俊杰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没顾这些，回到教育局，又主持召开了一个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这就更使他精疲力尽。恰巧，就在这天，他的妻子带着他未满两岁的独子鲁梁，经过千辛万苦从重庆来到哈密。祁天民因公务在身，只好拜托朋友替他去车站迎接亲人。晚上，祁天民回到家中，忘记了一天的疲劳，兴致勃勃地抱着爱子，与久别的妻子畅谈离后的情思。不料，夜里他竟发起高烧，体温达四十度，立即被送到医院。医院设备条件差，把他患的伤寒病误诊为重感冒。住院治疗数日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日益恶化。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祁天民不幸逝世，年仅三十岁。

祁天民病逝的消息一经传出，各族群众无限悲痛。哈密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的有各机关、学校、团体、工商界的各族民众近千人。维吾尔族老人按照他们民族的习惯，为祁天民举行了丧葬仪式。各族群众在他的墓碑上，镌刻上八个大字：“天山永孝，正气长存”^①。

作者附记：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参阅了有关历史档案、报纸、刊物和祁延爽、祁鲁梁、杨廷宾、杨遵仪、陈方伯、李如楨、张家瑜等写的回忆材料。

^①李涛：《祁天民同志在哈密》。

邹风平

乔毅民 阚孔璧

邹风平，四川省三台县人，出生于农民的家庭。他在龙锦师范求学期间，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以后历任盐亭特支书记、成都东区书记、泸县中心县委书记、四川省工委书记、以及川康特委副书记等职务。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中，不幸去世。

少年时代

一九〇五年六月十九日（农历五月十七），邹风平诞生在三台县北长乐镇凤池庙的柳树湾。他很小就参加劳动，八岁开始上私塾读书，二十岁时（一九二五年）得到祠堂亲族的帮助，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涪江小学高年级。新鲜的科学知识使他打开了眼界，常有“忽然开朗、别有天地”^①之感，特别是校长介绍“五卅惨案”的经过，激起了他的爱国主义热忱。他激愤地说：“应该同英日开战才是办法”^②。老师们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组成了劳农政府，所有田地按人分配，人人一律平等”的言谈，更使他“喜极欢狂，并想将来我们也这样

①② <邹风平自传>。

做。”^①邹风平读完高小两年（旧制为三年毕业）后，经过紧张的自修，假借绵阳籍贯，又以第一名的突出成绩考入四川江油龙绵师范学校。

此时正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高潮。革命的风暴刮到四川，也波及绵州各县镇。在龙绵师范的教师队伍中，陆续增加了一批进步分子。邹风平先从进步老师刘晦若（北大毕业生）那里读到《新青年》、《中国青年》、《响导》、《语丝》、《小说月报》等杂志，使他把孔丘的道德观念从“脑筋中挤出去了，知道中国社会的病根是帝国主义及军阀贪官污吏勾结的危害”。^②他又从教务长姚次恭（共产党员）处读到《独秀文存》、《陈独秀演讲集》、《新社会观》及北伐军政治部出版的小册子，如《经济学大纲》、《政治学概论》及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等书籍，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的薰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使他选定了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久，他就到中坝同陶公若、林勋培（成都外专学生，共产党员）会面，由他们介绍，填表加入“涪波社”。

“涪波社”是一个秘密进步团体，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它按照共青团的组织原则和作风建立起来，以信仰共产主义、研究马列主义学说、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宗旨，要求社员遵守纪律，保守秘密。邹风平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国民党的不满，满怀纯真的感情加入“涪波社”，并误认为那就是入了共产党。他对于加入共产党是看得很神圣的，觉得“既然信仰，必终身如一，牺牲到底”。

①② 《邹风平自传》。

一九二七年九月，邹风平在姚次恭的介绍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一九二八年秋在绵竹由团转党。一九二八年夏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邹风平和赵利群的组织关系均转到江油，编入中共江彰特别支部，张璞任书记。自此，他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投入了艰苦的斗争。

邹风平根据党的指示，一方面做好“涪波社”的工作，使其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得到巩固的发展；另一方面发动师生掀起学潮，反对国家主义派校长傅春吾。经过激烈的斗争，傅春吾终被撤职。此后，根据中共江彰特支的指示，由邹风平和赵利群等组成联师学生党小组，领导师生进一步开展斗争^①。

英 勇 奋 斗

一九二九年，邹风平到葫芦溪涪江小学教书，组织关系转到了绵竹，受该县县委领导。随后，三台县也建立了党的组织，邹风平被编入三台北路特支，负责组织工作。在特支的领导下，他和其他党员一起致力于农民运动，先后在三台北路建立了三个农民据点，利用寒暑假时间在农村开展宣传活动，使当地的农运得到迅速发展。

一九三〇年，邹风平根据三台县委决定，同原北路特支书记赵利群一起，到柳池井袁家庵爱智高小教书，负责领导北区的党组织。不久，邹风平即任代理校长。由于在教工中不少是党员和“涪波社”社员，该校遂成为三台北区革命活动的领导

^①赵利群的回忆。

中心。邹风平在办学方面很有成绩，先被教育局委任为教育委员，后又被委为区教育主任，负责全区初高等小学和私塾教育的指导工作。

邹风平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大力开展革命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首先，他与党员和二十多个回乡的“涪波社”社员一起，分别深入农村，发展新的“涪波社”社员，组织农会，倡办夜校，并利用夜校召开农会会员会议，培训农民干部，宣传革命真理。他还多次领导农民群众进行抗债斗争，甚至还亲自率领三百多人去打“西草钱店”，反击高利贷的残酷剥削。由于他和其他党员的共同努力，使当地的农民运动得到顺利的发展。其次，为了提高广大小学教师的思想觉悟，邹风平利用暑假时间创办暑期小学教员训练班，将所属小学中比较好的教员集中起来，加以训练。这种办法无论在政治影响和社会教育意义方面，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批积极分子的涌现，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党员很快增加到一百余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北区区委，邹风平先任区委秘书兼搞宣传工作，是年秋又任区委书记。

北区的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革命力量继续壮大，由袁家庵到柳池井、马康桥到塔子山等地，有组织的农民达二千余人，以刀矛大杆为主要武器的赤卫队一百多人，三百多名盐工参加了盐厂工会。

正当邹风平和三台北区区委领导农工群众为反对盐厂主盘剥农民和改善工人待遇而斗争的时候，四川省委派袁乃文来三台视察工作。他传达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方针，要求三台党组织立即举行武装暴动，还批评邹风平等“搞单纯的经济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邹风平等

只好把工作中心转到准备武装起义上来，布置附近的几个铁匠铺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刀造矛，并准备夺取土豪劣绅的枪枝^①。这一行动很快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派兵跟踪打击，进行疯狂的镇压。结果，组织被破坏，同志遭捕杀，不仅暴动没有搞成，还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

邹风平等领导人，遭到反动当局到处通缉后，遂离开三台，并根据党的指示，与赵利群等一起前往重庆，找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邹风平等到达重庆时，正值省委遭到破坏，辗转半月未能接上组织关系，他仍返三台。回三台后，邹凤平被县委派往盐亭任特支书记。不久，因胃病发作，经县委批准，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到成都四圣祠仁济医院就医。半月后病愈出院，被派往成都东区任区委书记。两月后，又调成都县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六月，旧病复发，休息了五个月。同年十二月，组织上派他担任成都外东区委书记。

一九三二年二月，邹风平被调到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任干事（当时称为秘书），历时一年。这一年中，他在廖锡坤（即廖恩波，省委组织部长，后任省委书记）的热情帮助下，政治理论、思想觉悟和实际工作水平都有长足的进步。

他曾连续撰写文章，对大革命失败后少数投机分子的叛变，特别是对叛徒任卓宣（即叶青），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

邹风平在《叛徒“任卓宣”与反革命“青锋派”》^②一文

①赵利群的回忆。

②1932年3月20日《四川晓报》。

中，深刻地批判了大革命失败后一批投机分子的丑恶嘴脸，论述了任卓宣之流对革命的危害和“青锋派”的反动实质。他说：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因为受不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向革命势力进攻的白色恐怖和威胁利诱，跟不上革命形势的新发展，便往往因此而恐怖、动摇，直到可耻地投降反革命营垒中去。这些叛徒替反动派当走狗、作侦探，诱捕党的干部，破坏党的机关，成为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派。邹凤平指出：在这些背叛革命的反革命派中，任卓宣是最“别致”的一个。因为他不仅一九二七年在湖南叛变之后，当过何键的反共侦探和走狗，又是托陈取消派的友人，并且现在正以“科学思想”和“二十世纪”作幌子，继续成了为反动派服役的“青锋派”的首领。

文章在详尽而深刻地揭露了叛徒任卓宣在出卖了最后一个革命同志和他所知道的秘密机关，从长沙回到成都组织“青锋派”丑恶历史之后，又在《反革命的青锋派》的标题下，解剖了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实质。指出：任卓宣回到成都后，得到刘湘的支持，当上了成都大学的图书馆主任，改名为青锋，出版了《科学思想》，企图打着革命的幌子，为反动派服务。

这份所谓的《科学思想》，避开一切实际问题，专以“研究、研究”的口号来麻痹青年，企图使他们离开现实的斗争与共产党的领导。为达到这一目的，任卓宣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关于青年应当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指示，还假猩猩地批判张东荪、郭任远之辈反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历史观的论调，以掩饰其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实质。邹凤平说，任卓宣玩弄的这些花招并不高明，他贩卖的是被阉割、被庸俗化了

的第二国际理论，其目的是把青年从革命斗争前线引向死寂的书斋。邹风平尖锐地指出：《科学思想》对青年是吗啡！是鸦片！

邹风平还以列宁在第三国际二次大会上的讲话为武器，紧密联系中国革命斗争实际，对“青锋派”否认中国现阶段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性质，否认中国半封建经济之存在，否认政治上的封建军阀割据，因此否定中国应该进行土地革命，而主张中国应该直接去干“社会革命”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他指出，“青锋派”的这种“理论”，不过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考茨基理论的再版。

邹风平在《叛徒“任卓宣”与反革命的“青锋派”》一文的最后说：我们应当以布尔什维克党员的顽强性，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无情地打击反革命“青锋派”的一切反动主张，坚决肃清他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影响，以巩固我们的党和革命的群众组织。

为了进一步揭露任卓宣的叛徒嘴脸，邹风平又写了一篇《读〈二十世纪〉书后》。这篇长达一万余字的文章，发表在成都《工商日报》^①上，再次深刻地批驳了任的谬论，教育了人民群众，捍卫了革命原则。

邹风平在这场思想斗争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而这场斗争无疑对四川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起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省委还分期分批地轮训全川各地的党员干部，每期三至五人，共办了八十几期。由罗世文、廖诗

^① 《邹风平自传》。

勉、程子健、邹风平等，结合形势宣讲中央文件^①。邹风平还负责轮训人员的接洽、管理工作。这项工作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全川各地的情况，学习到各种斗争的宝贵经验，进而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在省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织学习小组（当时叫列宁小组）的过程中，他与罗世文（省委书记）、廖锡坤编为一组，在罗世文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被誉为模范小组。之后，根据省委的派遣，邹风平又化装进入兵工厂，检查该厂党的工作。接着他又参加和领导了成都兵工厂二千多工人参加的大罢工。

在这段时间里，邹风平的生活是紧张而又艰苦的。他到处奔走，顾不上个人的吃喝和休息。但对于其他同志却十分关心。当时成都正发生巷战，城外的同志进不了城，没有组织救济。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十分着急，便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给这些同志去送钱。对有病的同志，他更悉心照料，从吃食、安全、到病愈后的工作，都给以妥善的安排，表现了他对革命同志的深厚情谊^②。

一九三三年二月，四川省委接到党中央关于抗日作战协定三条件的决议。为了将协议精神及时传达到各地的党组织，邹风平被派为川南巡视员，先后巡视了内江、自贡和嘉定等中心县委及其所属基层党组织，历时三个多月，于六月初回到成都。由于他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省委的“口头嘉许”^③。紧接着，他又以川北巡视员的身分，巡视了三台、阆中和顺庆等三个中心县委，细致地检查了这些地区的工作，号召大家“向武

①③ 《邹风平自传》。

②王波：《回忆我同邹风平同志的接触》。

装行动方面作准备，直到游击战、地方暴动，以响应红四方面军”。在他的推动下，川北地方的武装斗争得到迅速发展。七月邹风平返回成都，被大家推选为省委委员，八月又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曲折前进

一九三三年九月底，遂宁、安岳一带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省委派邹风平为特派员前去领导。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发动，群众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在纵横四、五十里的区域中，有组织的群众即达五千余人，除各乡的赤卫队以外，还成立了三支游击队。在红四方面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农民强烈要求武装行动，但邹风平不懂军事，省委派出的军事指挥员又在中途失掉联络，坚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尚未形成。就在这时，大批敌人从四面向农民武装扑来。情势紧急，只好被迫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寡不敌众，缺乏经验，起义遭到失败，不少农民被抓被杀。邹风平几经周折逃出虎口返回成都后，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还给以“撤消特派员职务并严重警告一次的处分”^①。

遂宁武装起义的失败，对邹风平是一次极大的震动。虽身受处分，但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反而更激起他前进的勇气。他“下定了十二万分的决心，要打出一个局面，彻底检讨自己，要从政治、组织工作、生活各方面做个模范共产党员。”^②为了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对革命的损失，邹风平要求党给予他最艰巨的任务，接受党的考验。当时，正值刘

^{①②} 《邹风平自传》。

湘打败刘文辉，带了一批叛徒在泸州到处抓人，泸县中心县委被削弱，急待健全恢复，省委决定派他到泸县去。

泸县中心县委，共辖十二个县，分为五个特区，各个特区的情况又不尽相同。但中心县委已经执行了“左”的方针，不顾各个地区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同情况，过分的强调要搞统一的群众斗争，要扩大党的影响，即使只有少数觉悟群众、几个党团员，也要发起暴动，并用共产党、共青团的名义公开号召。这样就很快引起敌人的注意，群众斗争遭到残酷镇压。结果，群众的斗争热情受到挫折，党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党员只剩下六十余人，零星地分散在各地，仅有的十几个干部，因过于暴露，无合法的职业作掩护，站不住脚根，只能东躲西藏，难以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邹风平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到达泸县，与留在城内的唯一交通俞明华取得联系后，第二天便化名周文华，以做杂货生意为掩护，奔赴农村调查研究，为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作准备。每到一地，他首先向那里的党组织宣传全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并结合全川和当地的具体情况，同大家一起讨论工作安排。他还以遂安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教育大家：要注意向群众作宣传，发展组织，巩固组织，积蓄力量；注意利用合法形式作斗争；重要的是不要随便轻易地发动斗争和暴动，如搞斗争或暴动一定要有周密的计划，作好充分准备，并对各方面条件作客观的分析，不能单凭主观热情，要记住，盲目的进行斗争或暴动，必然会遭受失败。他强调最好多搞合法斗争，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党团组织领导人，尽可能隐蔽在群众中，不要輕易暴露。邹风平的这些用血换来的宝贵经验，给泸县地区的党员和干部以很大的教育。经过他的努

力，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基本上纠正了各地区的盲目行动。并给以后党团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邹风平从调查研究和斗争实践中，逐步注意把工作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改变了过去着重在城市青年学生中进行工作的状况，有意识、有组织地把党员派到农村去。他强调党的力量要向川、滇、黔边界一带发展，因为那里群众基础较好，又是军阀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工作容易开展。他自己就具体参加并领导了叙永、古蔺、古宋、赤心、合江等地区的工作。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开展了农村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另一方面又避开了城市里的叛徒、特务的追踪破坏，使党的组织得以保存和巩固。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中心县委在川、滇、黔交界的叙永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把中心县委机关迁到叙永。

一九三四年春天，中心县委在邹风平（书记）领导下，在叙永南区的黄泥嘴、两河口分水岭一带和赤水福兴场靠近土城一带，以及古宋部分地区，发动了一次春荒斗争。他们利用贫苦农民易于接受的斗争形式，先组织农民“吃大户”。接着，根据运动的发展，又适时地领导群众“破仓分粮”。最后，再引导农民拿起武器，同地主阶级展开武装斗争。由于领导得力，政策对头，群众发动得充分，使斗争取得了胜利。

中共四川省委及时肯定了泸县的工作成绩，并且对川南今后的工作作了布置。但就在这时，省委发生了马如龙卷款潜逃、投奔军阀刘湘的事件。接着，省委组织部长史伯康等又被捕叛变，致使四川的党组织遭到空前的打击和破坏。泸县中心县委因此失去了上级党的关系。在困难中坚持斗争的邹风平和

他领导的泸县中心县委，得知贺龙率领的红三军进抵贵州婺川、正定一带，便两次派出交通前往联系，却未能接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邹风平等只好根据省委过去的指示精神，独立地领导群众开展斗争。他们深入山寨农村，推动农民运动，深入工厂作坊把赤水兵工厂和泸县的织布工人、码头工人发动起来，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还建立起一支有十余人的游击队。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斗争取得成效，摧毁了一部分农村中的反动政权，为革命筹得了不少经费，使干部和群众都为之振奋。

不久，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叙永，游击队的同志见到主力红军，心情无比高兴。经彭德怀批准，红军给游击队赠送了五十多支枪，还派了几名红军干部到游击队工作，使原来的黄泥嘴游击队迅速地扩大为叙永县游击队。此后，中央又拨给人、枪四百多，将这支武装扩编为川南红军游击队，并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指定徐策为书记，邹风平等为委员，负责领导整个川南地区的斗争。

一九三五年春，中央红军离开川南，挥戈西进后，留在川南的国民党军队和肖镇南的四、五千民团，就乘机加紧围攻我地方武装。由于敌我力量过份悬殊，游击队指战员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大部壮烈牺牲，最后只剩下不到三十人。在此艰难时刻，叛徒史伯康又带着一伙特务赶到泸县，逮捕了中心县委的秘书陈继光。陈继光叛变投敌后，伙同史伯康等到处追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整个泸县城乡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革命斗争，邹风平与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李亚群商量决定：将川南地区的所有干部暂时转移到川滇边境的山区；派人赴上海筹借经费；与自贡、内江等中心县

委联络，共同组成川南临时特委领导今后的工作。按照这个决定，邹风平亲自到内江、自贡等地联络，大家都赞成尽快把川南特委建立起来，并相约四月二十八日在自贡牛佛渡召开三个中心县委的联席会议。不料事不缜密，开会时间与地点被叛徒侦知。二十八日那天，邹风平等赶到牛佛渡时，史伯康为首的一群叛徒特务早已等候在那里。邹风平急中应变，临时通知大家改变计划，很快离开该地，他自己也星夜返回泸县，打算在党员卢泽民（后被捕叛变）家暂避。可是，邹风平刚进卢家门，史伯康等即尾随而入。此时满街警笛齐鸣，狂叫捉拿共党要犯。他赶紧从卢家的前屋转到后院，然后爬上临街的院墙，再转上街房，飞跑到城边，跃身翻上城墙。在后面边喊边追的敌人越来越近，情况十分危急。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活着，就不能让敌人抓走。于是，便纵身从城墙的缺口处跳了下去。城高沟深，漆黑的夜晚看不见地面，加上跳得过急，落地时撞伤了脊骨，身子无法直立，疼痛难忍。他脱下身上的长衫将腰紧紧缠住，咬紧牙关，顺着城墙艰难地向前走，走不动时就爬着向前挪。他凭着顽强的意志和毅力，竟在黎明前来到了连云洞下的一个村庄。两位好心农民把已经精疲力尽的邹风平抬到了江纳泸特区大渡口山上的黄克永家里。黄是特区委员，邹风平住在这里，有群众掩护，安全暂时有了保证，但因为缺医少药，他仍然继续忍受着伤痛的折磨。不久后的一天，他的住所又突然被反动派包围起来。幸得黄大嫂的弟弟紧急报信，由同志们在危急中把他扶至密林深处隐蔽起来才幸免于难^①。

邹风平对屡遭挫折的革命形势十分焦急。由于与上级党长

^① 《邹风平自传》。

期失去联系，他当时还不懂得是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把革命推向险境，也不知道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已经纠正了革命的航向。但他坚决相信，挫折是暂时的，革命必胜，共产主义必胜。在得不到上级党的指示的情况下，他根据当时的实际，于五月二十九日把已经所剩无几的泸县中心县委的干部召集在一起开会，提出了暂时“解散泸县中心县委”、“宣传抗日”、“保全干部”等坚持革命的主张，他的意见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遂把保留下来的干部分散到云南去，坚持川滇边界的斗争^①；并派李亚群去上海寻找党的关系。

会后，邹风平由侯建成护送，于六月四日离开大渡口，准备到云南边境的周一戎（后发展为党员）家养伤，并在那里逐步聚集干部，开展活动。他拖着伤未痊愈的身体，忍受着难以忍受的饥饿和疲累，跋山涉水一千余里，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到达了目的地。

邹风平到周一戎家后，为了活动方便，改名为周子和。几天之后，他就按原计划派侯建成返回四川江安，迎接留居川南的干部来滇会合，共谋斗争事宜。但不幸的是，这些在艰苦斗争中保存下来的干部，又在途中被叛徒特务全部捕去。至此，原泸县中心县委所属的所有基层组织均被破坏无余。原来设想的在川滇边聚集力量，开展活动的计划完全无法实现，邹风平只好在周一戎舅父王应嵩（镇雄第六区区长）家当家庭教师。这种生活一直持续了一年多^②。

一九三六年底，邹风平收到了李亚群的来信，说他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要邹风平“好好养病，病愈时即到上海。”随

^{①②} 《邹风平自传》。

后，邹风平又收到了党组织寄来的报纸和杂志。这一切，使他万分兴奋。他积极做好准备，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动身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党组织告诉他，党中央经过长征，已经到达陕北延安，并决定让他到延安去。邹风平高兴地再上征途，几经辗转，终于来到了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

重 新 建 党

邹风平到延安后，被分配到中央党校第五班学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他参加了由中央负责同志主持召开的四川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分析研究了四川的形势，确定了党在四川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并指派邹风平为四川省工委书记，带领一批同志立即赴川，组建省工委，积极恢复和重建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全川的革命斗争。

邹风平等肩负党中央的重托，离开延安南下。他们翻越秦岭行至四川广元时，在一家旅馆里召开了“广元会议”，确定了回川后的工作任务。决定现有人员分成两路，一路是邹风平、廖志高等人，直接到成都，会合早已在那里工作的张曙时、罗世文，组建省工委；另一路是于江震、王子模和彭世荣三人，到南充建立川北工委。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邹风平等到达成都。新的四川省工委很快由他和廖志高、张曙时等人组成。

建立一个精干而安全的首脑机构，是省工委的首要大事，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决定省工委先设在平安桥街南口的一个独院里，由邹风平和廖志高，并请赵世炎的老母亲夏娘娘一起常驻机关，以作掩护。后来，省工委又迁到焦家巷，由邹风平与

甘棠、赵利群三人同驻机关。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省工委能始终安全、隐蔽、在敌人的鼻子下从容指挥全川各地的斗争，是与邹风平的精细和机智分不开的。

省工委建立后，立即着手清理和整顿各地党的组织。邹风平等一方面将同延安保持组织关系的党员韩天石、陶焕馥等很快找到，给他们布置任务，帮他们建立党的组织；一方面又对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党员进行考察，区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成都党员饶孟文，在同上级党失去联系后，于一九三七年一月联络同志，自发建立起“中共成华特支”，做了很多工作，对推动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不少作用。邹风平对其所属成员，逐一进行考察。分别将他们重新吸收入党。川南的万敬修、廖寒非也建立了类似的自发组织，但内部情况比较复杂。邹风平等通过认真考察，吸收了其中的优秀分子，而将有问题的人予以淘汰。刘连波、刘文哲建立的组织，过去与上海党（特科）发生关系。邹风平为了弄清他们的情况，专程跑到武汉，通过长江局了解，然后加以接收。由于这一工作做得认真细致，既保持了党的队伍的纯洁，也使党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在清理和整顿原有党组织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省工委强调要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逐步壮大党的力量。省工委领导人进行了分工，由廖志高到川东、重庆一带，于江震仍在川北，邹风平坐镇成都统筹全川并兼及川康一带。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各地党组织相继建立并得到迅速发展。到一九三八年春，全省党员已有三百四十人；同年十月，又增加到约四千人。

在邹风平的领导下，省工委对宣传舆论工作十分重视，他从延安到成都不久，就将有文字工作经验的李亚群派往车耀先主

办的《大声周刊》，以加强那里的工作；又抽调杜桴生到《四川日报》，以增强党在该报社内的力量。此外，他还经常关心深受读者欢迎、由党员创办的《时事新闻》、《星芒社》、《全民社》等新闻刊物的工作。这些报刊宣传抗日、教育群众，影响很深广。在检查和布置各中心县委的工作时，他也总忘记不了过问各地方的报纸工作。因此，各中心县委都直接掌握了当地的一些宣传舆论阵地。

对于群众的宣传教育，邹风平也很重视。协进中学是党在成都进行活动很有成绩的一个据点。为了推动那里的工作，他化名周子和，前去兼任课程，利用机会对学生进行教育，给党员上党课，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使该校被誉为“小延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省工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强对革命斗争的领导，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撤销原四川省工委，分别成立川康和川东两个特委。罗世文任川康特委书记，邹风平为副书记，特委机关仍设在成都。

当时的川康特委，辖十个中心县委、近五十个县委或特支。邹风平十分重视党员的教育和培训，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特委所属县以上干部已基本轮训完毕。每期轮训班，都仿照中央党校的几门课程开设。邹风平主讲“党的建设”和“支部工作”。

四川党组织在邹风平等人的领导下，经过曲折艰苦的斗争，学会了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斗争。为了保证党组织的安全，邹风平等领导人把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

一九四〇年三月，蒋介石派康泽到成都，一手泡制了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式的“抢米事件”，使白色恐怖笼罩蓉城。

邹风平等川康特委的负责人在认真检查各方面应急措施及其落实情况后，自己也立即隐蔽起来，移居乡间。尽管敌人指名要捉拿邹风平，前后曾进行了六次搜捕，均以落空而告终。在罗世文、车耀先等被捕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将邹风平等疏散回延安。六月二十四日，邹风平与张曙时等随同董必武告别成都，返回延安。

含 恨 而 死

邹风平从四川返回延安后，一面治病，一面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一九四〇年底，康生在陕北公学搞试点，正式开始审查干部。他用逼供信、车轮战等办法，搞出了许多所谓的“特务”和“特务组织”。在他的操纵下，四川的地下党组织也被诬陷成国民党特务、内奸政策制造的“红旗党”，许多党员被打成了“特务”、“内奸”。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在四川从事多年地下工作、担负四川党组织重要职务的邹风平，也就成了重点追查和逼供的对象。

邹风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主动讲清自己的情况，并检查自己曾经出现过的缺点和错误。但随着康生逼供手段的不断升级，他的这种检查总难以达到要求。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他终于走上了绝路，自杀了。但他并不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就在他走上绝路之前，还曾三次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倾诉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衷情。他在信里依然关怀着四川党的发展，他不希望因为他的死使国民党高兴，使托派幸灾乐祸，使自己的同志沮丧。他相信，随着革命的胜

利，随着四川的解放，他的问题一定会水落石出，“终有为党知道的一日”^①。

党中央对邹风平的问题非常重视，当即责成程子健和梁国令进行调查审议。程子健等经过长期认真的调查研究，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审议报告，对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全面评价了邹风平的一生，否定了康生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之后，中央又进一步作了结论，充分肯定了邹风平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贡献，彻底纠正了对他的各种诬蔑不实之词。

^①邹风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信。

刘 型

邱 锋 熊巢生 刘求真

刘型于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二七年五月讨伐夏斗寅叛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参加领导了萍乡西区秋收起义，率领萍醴游击营上井冈山；是黄洋界保卫战主要作战连队的党代表。土地革命战争中，担任过支队、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军团后勤部政委、方面军敌工部长、组织部长等职。抗日战争中，任南下支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任纵队副政委。建国后，他对国家地质、农垦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九八一年八月逝世。

(一)

刘型，原名劭，幼名绍新，祖籍湖南醴陵，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九日出生于江西萍乡。父亲刘应璋，是位忠厚老实的佃农，除佃耕外，还兼“挑脚”，搬运煤炭和铁砂，往来于上株岭铁矿和萍乡县城之间。由于生活困难，曾被迫三迁其家。母亲李贞娘，农村妇女，勤劳善良，终年操持家务，抚养儿女。

刘型有兄弟姐妹十人，因生活困难只养活了八人。四个哥哥都是佃农，三个姐姐很小就出嫁了。他最小，童年时就帮助父兄干活，拔草、砍柴、放牛，什么都做。每逢过年过

节，母亲还要他到地主富户家去讨年米吃。

刘应璋夫妇深感自己没有文化的苦楚，下决心让聪明伶俐的小儿子读书。一九一四年春，刘型在冷水坑附近的村小上学了，一年后村小停办，又转念私塾。

一九二〇年，刘应璋在贫病交加中故去。临终前再三嘱咐家人：“一定要让绍新多念几年书！”刘型读书非常用功，语文成绩尤好。他还喜欢游泳，坚持锻炼身体。一九二四年秋，他改名弘绪，插入明新高级小学二年级读书，专攻英文、算术，寒暑假时还组织同学一起补习功课。一九二五年秋，全县数百名高小毕业生报考萍乡县立初级中学，录取者共五十二名，刘型是其中之一。

刘型在中学读书时，学习成绩很好。受“五四”新思潮影响，他接触了一些进步书刊和文章，如李大钊的《今》和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等，思想进步更快。

当时萍乡中学校址与驻军兵营和警察局毗邻。反动军阀和警察局经常毒打、枪杀逃跑士兵，严刑拷打老百姓。见此，刘型总是愤愤不平：“这样的世道真要不得。非改不行！”

刘型在明新高小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并组织纪念“五七”国耻反日示威。一九二五年安源资本家勾结军阀制造的九月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以及同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开枪杀害北京爱国群众等事件，都给刘型思想很大震动。于是他与邓贞谦、陈铁铮（孔原）、钟帮武等进步同学共同组织了互助社，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互助社的主要成员后来都是萍乡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随着形势的发展，互助社后改名为策群学会，作为一个公开的学生组织，它继续把一批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周围。

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军攻克醴陵。萍乡各界推举代表到萍醴边界老关、美田桥去迎接北伐军。刘型是代表之一。在北伐军中他得到许多宣传品和国共两党的报刊，除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进行宣传。九月，北伐军分兵三路攻占萍乡，推翻了北洋军阀在萍乡的统治，成立了革命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刘型和策群学会的多数成员担任了各团体的负责人。刘型被派往萍乡小西区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区乡农民协会。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十一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始招生。刘型决意投笔从戎，便持当地革命团体的介绍信去武昌报考，被录取为第六期入伍生。

武汉军校设在武昌兰陵街的两湖书院。第六期新生入校后，编成两个大队和一个女生队，约一千一百人。

刘型先被编入第一大队第二队，与罗瑞卿、陈伯钧同队，后转入第一大队第四队，与游雪程同队。徐彦刚、王良、徐林、程子华都是当时的同学。军校发给每个学生一套灰色军装和一支汉阳造的七九步枪，进行严格的军事操练，每天课后两腿肿胀，蹲不下来，但他坚持训练，从不叫苦。军校的政治课和每周一次实弹打靶演习，他也积极参加。

在这期间，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经常给学生讲课和演讲，毛泽东、沈雁冰、李达等也常到校讲课。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曾在这里讲过。刘型和同学们听后，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武汉是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中共中央创办的长江书店也设在汉口。刘型有机会买到或借到这里出版发行的大批革命书刊，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还有《中共五年

来的政治主张》、《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阶级斗争》、《俄国共产党党纲》、《苏联新经济政策》、《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传》、《新社会观》等。在军校内还经常看到公开发行的汉口《民国日报》和《向导》周报。通过对这些书刊的学习，刘型思想认识迅速提高，由信仰三民主义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武汉军校正式定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刘型和同学们积极参加了反帝反蒋斗争。五月中旬，原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收买下叛变，率部进犯武汉。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兵团、农讲所和廿五师的七十五团等单位组成独立师，配合从前方调回的一部分兵力，在武汉卫戍司令叶挺指挥下迎击叛军。刘型所在的一大队编为第一团，五月十七日开到贺胜桥，堵截叛军。刘型分在第一团侦察队。他和战友们英勇转战咸宁、蒲圻、嘉鱼、赤壁、新堤，打开沔阳城，将夏斗寅叛军和杨森的“老九师”击败。

刘型在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奋勇向前，表现突出，经共产党员游雪程介绍，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型随中央独立师回师武汉后，武汉形势日渐紧张。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与南京蒋介石呼应，公开“分共”和反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迫遣散，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团员也准备疏散。当时，刘型正患病住医院。他带病回到武昌黄土坡，找到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游雪程（在教导团第一营做党的工作）商量办法。根据当时的形势，游雪程建议刘型回到家乡去搞农民运动。刘型同意游的意见，返回了萍乡。

这时，萍乡党组织遭到了反动势力的破坏。刘型回来后找

不到党组织的负责人，只好暂时回到小西区老家隐蔽下来，以在位公祠小学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为了打开这一冷清局面，刘型在积极寻找党的关系的同时，深入群众，串联穷人，团结革命分子，很快恢复了附近农村的革命组织。不久，醴陵南三区共产党员潘疆爪等人，以补锅为掩护到小西区活动。刘型和他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和脱险归来的农运特派员张汝全、小学教员贺鸣和、彭立宪、徐培勉等地下党员一起，以大岭上、勾龙头等偏僻山村为据点，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党的支部，秘密开展活动。在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刘型当年写的《委员责任》，其中有加强自我学习、考察客观环境、提高党性、一切依靠群众和注意发展富有革命性有坚强意志的同志等规定。

一九二七年八月底，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到安源，在平、浏、萍、醴、安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上讨论了军事形势和领导秋收暴动的计划。九月十日晚，安源秋收暴动勃起，王兴亚指挥暴动队伍捕杀反动军官，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次日即向萍乡、老关、醴陵进军。为配合“秋暴”，中共萍乡、醴陵县委号召四乡农民发动暴动。

此时，刘型和战友们正在萍乡东桥和醴陵南区一带响应秋收暴动。他们主要发动农民向反动地主进行斗争。在刘型的影响下，他的三个哥哥都参加了秋收暴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萍乡小西区成立了党的区委会，刘型担任区委军事委员。在这期间，刘型和张汝全等通过驻排上保安队里的两名地下党员颜云山、颜雨山，打死了敌保安队队长，夺得长枪四支，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他们还积极发展革命武装，在萍乡东桥、大岭上组织了一个游击营，有战士三

十多人，刘型任营长。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农历除夕），刘型、张汝全等率领游击营和农会会员二百多人，袭击了排上石家坊张姓大地主，俘虏五名武装团丁，缴枪十多枝，没收了张家的谷米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一月二十七日，中共醴陵县委发动农军围攻县城，刘型率萍西区游击营配合醴陵南区游击营协同作战。这时，刘型看到了“八七会议”告党员书等文件，明确认识了行动方向。

一月二十九日，刘型率萍西区游击营回师排上。区委在上株岭小学开会，研究夺取豪绅地主的据点腊市。反动头目“八胡子”保安队有枪四、五十枝，对革命群众威胁很大。区委决定拔掉这个钉子。三十日，革命群众和游击营分三路进攻腊市，刘型和张汝全直接指挥中路。在敌人的疯狂围攻中，刘型沉着应战，派人通知侧翼两路快速进攻。由于三路配合密切，进攻勇猛，终于击败了敌人。

腊市被农民攻破后，伪县政府大为恐慌，随即派驻军一营，会同湘东保安队、地主家团共约千余人，疯狂进攻小西区。刘型和区委负责同志领导小西区农民把守各个要塞，用土枪土炮（长龙）等武器和敌人激战了一日一夜。敌军在小西区不敢久留，大肆烧杀一阵就开走了。这次战斗农民虽受挫折，但斗争情绪仍很高涨。

在萍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湘东、下埠一带的地主武装蠢蠢欲动，企图联合起来向农民进攻。二月二十七日，醴陵县委调集各区委游击营分三路第二次围攻县城。刘型率小西区游击营参加此役，攻城未克。三月五日，刘型和区委负责人集合了十几个乡村农民约一万多人，在醴南四个区农民武装

支援下，分两路夹击下埠。这次行动因萍乡敌军增援，农军损失较大，不得不撤退到醴陵境内。三月十二日，第三次围攻醴陵县城的战斗打响了，萍西游击营行至醴陵东富，与敌军一连相遇，刘型指挥农军居高临下，用长龙（枪）、土炮袭击敌军，追敌至城边。后为敌人机枪所阻，攻城仍未奏效。

这时，湖南军阀何健大举“清乡”，萍乡之敌也深入小西区烧杀，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按照党的指示，萍西区游击营与醴陵南区游击营合编为萍醴游击营，游龙任营长，刘型任党代表。他们集中了二百多人，跟敌人周旋了一段时间。由于醴陵县委执行了盲动主义政策，脱离群众，乡村暴动没有成功，游击营活动十分困难。刘型通过安源市委秘密交通邓贞谦，了解到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转战在井冈山的情况后，当即召开会议，决定把部队转移到莲花去。由于部队和醴陵县委、安源市委的联系已经中断，部队转移时，只有区委书记易锚前来送行。他把一支手枪赠给刘型，说：“希望你们找到毛委员的队伍，早一天打回来！”刘型激动地说：“请同志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刘型、游龙带领游击营利用夜间行军、白天打游击的办法，机智地摆脱了萍、醴敌人的“清剿”队伍，穿过萍醴边界。在白竺，他们同“青皮梨子”的地主武装打了一仗，在攸县，又同湘东保安司令罗定的队伍打了一仗，两仗皆胜，部队顺利地进入了莲花县境。

（二）

一九二八年四月，萍醴游击营在党代表刘型和营长游龙

的带领下进入莲花后，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决定一部分老弱病伤者回乡，留下精干的八十多人，带着五十多枝枪上井冈山。会后，他们白天隐蔽，晚上赶路，甩掉屁股后面追赶的敌人，终于在永新西乡找到了日夜盼望的毛委员。

毛泽东在一座民房里会见了游击营全体同志，然后又和干部谈话，详细询问了游击营行军的情况。刘型和游龙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说，你们打得不错，人虽然少了一些，但不是弱了，而是强了。毛泽东还详细询问了游击营的生活和醴陵暴动的情况。当刘型谈到游击营平时分散在农民家吃“派饭”，敌人摸到底细，突然对游击营发动分割和包围时，毛泽东说：看来在农民家吃“派饭”不好，要自己办伙食，打土豪解决吃饭问题，本地土豪打光了，还可以打外地土豪，土豪全打光了，再由苏维埃政府供给吃饭，打了胜仗有了缴获，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军需。暴动队一般不集中好，游击队应有一定的集中训练，象你们现在这样能跑能走就好。当刘型汇报到萍醴边境农民成立共耕委员会，实行“共耕制”时，毛泽东沉思了一下，微笑着说：现在这样办不行，还是先把田分给农民，按人口平分，苏维埃政府收一点公粮，这样农民才会坚决干革命，也才能把田种好。将来是要实行共耕制的，但现在条件不成熟。最后，毛泽东肯定游击营向井冈山靠拢的行动是对的，并且向大家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勉励同志们坚持革命。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旬，萍醴游击营随红四军主力，经潞江、小西江区，进抵宁冈茅坪驻扎。在这里进行了二十天左右的整训，内容是学习“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

这时，湘东特委派秘密交通邓贞谦上井冈山，要求调回萍

醴游击营。为了帮助地方武装建设，毛泽东同意游龙率游击营带八十条枪返回萍醴边界，刘型因外出执行任务，未跟游击营走。刘型归队后，毛泽东找他谈话，告诉他四军需要一批连队政治干部，原三十一团一营一连党代表黎育教已调回酃县工作，决定派他接任一连党代表。一连连长恰好是刘型在武汉军校的同学陈伯钧，老同学又战斗在一起，分外高兴。

因为在五月中旬的高陇战斗中营长员一民、三连连长张清泉等五十多人都壮烈地牺牲了，悲痛的情绪笼罩着部队。在团部召开的大会上，毛泽东讲话指出，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前进。

五月下旬，湘赣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刘型在茅坪谢氏慎公祠参加了三十一团党委召开的连党代表会议。他在会上听取了团党代表何挺颖传达的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特点的讲话和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疑问的回答，深受教育。

这期间，湘敌第八军吴尚五个团，企图由茶陵向宁冈推进，赣敌九师杨池生和二十七师杨如轩部共五个团，则从吉安向永新推进。为了粉碎敌人的“会剿”，六月初，红四军集结于宁冈耒市开誓师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北面的铜鼓，南边的汝城，我们都走过了，这里是最好的地方。我们应该以宁冈为根据地，继续壮大自己的力量，发展红色区域，影响湘赣两省。他说，这次打酃县，我们就是要执行这个任务的。

誓师大会后，刘型随部队向酃县进发，在十都、沔渡、水口等地与地主武装打了几仗，敌人望风而逃。部队占领酃县后，分散做群众工作。刘型和陈伯钧带第一连担任警戒茶陵方

向敌人的任务。十多天后，永新县城的敌人出动了。四军佯攻鄱县诱敌的计划实现后，立即由鄱县打回宁冈。

六月二十日，刘型和陈伯钧在古城参加了毛泽东和朱德主持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决定三十一团在新七溪岭方向阻击敌人，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在老七溪岭阻击敌人。第二天，刘型随军开到新城。团部布置以连为单位开会，进行战前动员。刘型和陈伯钧向战士们详细传达了军委和军部的决定，检查了全连的备战工作。第三天即进入新七溪岭阵地。二十九团为前卫，三十一团为后卫。

六月二十三日，正是农历端午节。三十一团抢先占领了新七溪岭的制高点。战斗从拂晓打响，敌人封锁了风车口，部队冲不下去，三连连长资本谦和二连党代表向方复均壮烈牺牲。刘型和陈伯钧带领战士增援二、三连阵地，集中力量扑灭敌人的机枪火力点。班长马奕富使尽全力，勇猛向敌人机枪扑去，堵住了枪口，战士们乘机冲杀过去，把敌人击溃。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得胜后也向新七溪岭下的龙源口包抄过来。当晚全军乘胜追击，第三次攻占了永新城。刘型和连长陈伯钧带领全连战士没有停脚，一直往天河方向追击敌人。这一仗击溃敌人两个团，歼灭一个团，缴枪七百多枝。

六月二十六日，刘型和陈伯钧在永新县城禾川中学礼堂参加了红四军班以上干部和地方党组织、赤卫武装负责人会议。毛泽东报告了形势和龙源口大捷的经验，宣布成立四个区的行动委员会，部署了各团分兵下乡做群众工作的计划。会后立即行动，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刘型和陈伯钧带第一连在天河煤矿一带农村活动。

刘型是连队党代表，注重群众工作。每到一地，首先抓宣

传,要求战士都能宣讲红军宗旨,从群众的切身利益讲起,用土豪劣绅压迫、剥削的事实来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其次是抓调查研究,要求战士详细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武装斗争和文化教育状况,填好社会调查表和土劣调查表,逐级上报。刘型把宣传和调查结合起来,在宣传中作调查,在调查中充实宣传材料;发动群众,组织暴动队,斗争土豪劣绅,建立党组织和区乡政权。按上级要求,他每七天总结一次群众工作,每天向营里汇报一次。刘型工作很深入,在永新石灰桥,他发现有个坏家伙钻进乡政府,便立即做了处理,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七月上旬,刘型收到一份油印文件,是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七月四日给湖南省委的复信。信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敌我形势,以六条充分的理由说明红军不能冒进湘南,应留边界各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以巩固革命根据地。他觉得这封信讲得很有道理,便和连长陈伯钧带领全连战士坚决执行特委和军委的决议,跟随毛泽东继续坚持在永新做群众工作。而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在攻克酃县后,由于省委代表杜修经附和二十九团农军想回家乡的情绪,开往湘南,进攻郴县,结果遭到很大损失。

因为红军大队被调往湘南,敌军乘机集中十一个团的兵力进攻永新。当时在永新的红军只有三十一团的两个营(七个连)。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这两营部队以班排为单位分散在县城周围打游击,掩护群众生产,同时把群众组织起来,村村布岗,山山设哨,并派侦探深入敌军驻地,摸清敌人兵力、装备和行动方向。每到夜晚,组织红军和赤卫队员三三两两去骚扰敌人;白天则在大路、小道和险要地方设埋伏,袭击敌人,使敌军摸不清虚实,提心吊胆,进退维谷。红军虽不足一个团,四乡赤卫队和群众却有二、三万人参战,从城北虚皇山、东乡

江背岭、西乡洋湖村、南乡洲湖村，把十一个团的敌人围困在县城近郊八九个小村子里达二十五天之久，最后不得不撤走。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著名的永新困敌之战。是役，刘型和陈伯钧带领一连战士积极组织群众和地方武装参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胜利地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任务。陈伯钧身先士卒，顽强拚杀，右腿负重伤。

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刘型接到通知，到九陂村参加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党代表毛泽东主持，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传达了省委七月二十日的指示信，又要调红四军北去打萍乡、安源和湘东。毛泽东当即向省委代表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长沙工人运动怎么样？有罢工的吗？学生有罢课的吗？商人有罢市的吗？士兵有哗变的吗？湘东农民有暴动的吗？”袁德生回答不出。毛泽东接着又问：“省委对群众斗争的客观形势怎么看？有什么根据要四军去打湘东？”袁德生仍然无言以对。会议开得十分紧张，深夜时，岗哨突然送来一位跑得满头大汗的农民，他是随红军大队去湘南的，报告了湘南失败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当即决定亲自带领队伍去湘南接应红军大队，留下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和第一营留守井冈山。

第二天，毛泽东率第三营去了湘南。朱云卿和一营营长陈毅安商议，决定一、二、三连暂留永新牵制敌人，团部和营部人员先回井冈山布置防务。

三天后，刘型接到营部通知，要一连和三连立即星夜兼程赶上井冈山，二连仍留永新活动。

刘型让每个战士把裤腿扎紧，装米六十斤，然后集合队伍从永新西乡出发，经磬市、茅坪，沿着崎岖山路，急行军二百多里，赶到小井。此时，陈伯钧和师长张子清均在小井治伤。刘

型看过他们后，安排好住地，立即赶到中井，参加团部召开的干部会。团首长在会上讲了湘赣两省约四个团的敌人围攻井冈山、我军只有两连守山部队的紧急形势，提出了保卫井冈山的作战要求。第二天一早，陈毅安营长又对一、三连的作战任务作了具体布署。刘型马上回连召集支委会、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层层动员，组织各班讨论，明确保卫井冈山的意义和各自肩上的重担。接着，他按照团、营下达的任务，立即带一连出发，登上崎岖的高山，来到险峻的黄洋界哨口阵地。刚一落脚，他又带上班排长去察看地形，规划工事，随即指挥大家动手挖掩体，埋竹钉，搬石头，准备“滚石炮弹”。黄洋界地势险峻，云雾缭绕，山风劲吹，松涛阵阵。刘型在阵地上整整忙了一天。直到深夜陪营长陈毅安检查完全连各排备战情况后，才坐了下来。但他并未休息，又和战士们一起交谈，用历史上官渡、赤壁、肥水之战和大量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鼓励士气，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战斗。

次日清晨，刘型和战士们隐蔽在一连简易工事和单人掩体里，注意着山下敌军的动向。八点多钟，敌人开始沿着唯一的山道，一个跟着一个往上爬，等他们进入有效射程内时，刘型高声喊打，一发发子弹射向敌人。敌军官逼着士兵继续往上冲，一次又一次被我军击退。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打得非常激烈，连在小井养伤的张子清、陈伯钧，也赶到团部参加研究退敌之策。我军因弹药不足，便利用滚石助战，群众呐喊助威，同时还把二十八团留下的一门刚修好的迫击炮从茨坪抬到黄洋界，射出了仅有的三发炮弹。这三发炮弹虽然只打响了一发，但却恰好打中了敌人的指挥所。敌军进攻黄洋界多次受挫，又听“黄洋界上炮声隆”，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便偃旗息

鼓，偷偷撤回了酃县。黄洋界保卫战以不足一营的兵力打退了一师敌人的进犯，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一连和三连受到了上级表扬。九月下旬，毛泽东回师井冈山后听了团首长的汇报，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颂扬这次战斗的胜利。

十月初，赣敌两个营从新城进袭茅坪。在朱德的指挥下，三十一团和二十八团埋伏在垭头垅，三十二团负责截击逃敌，布置了一个口袋形的阵地。刘型和一连战士参加了作战。是役包围和击溃敌军一个营，俘虏敌营长以下官兵一百多人，缴枪一百多枝，余敌退回永新。我军收复了宁冈县全境。

十月中旬，红四军攻打遂川。刘型奉命带第一连深入农村打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他在遂川工作将近二十天，给这里的群众斗争情绪以很大鼓舞。

十一月中旬，红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在茅坪召开。这次大会强调，“连支委为红军党的工作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之负责者，并同时负有计划督促政治工作之公开任务”。会后，全军集中在柏露、新城一带进行大规模的冬季整训。刘型抓连队的政治训练。着重健全士兵委员会，使其发挥作用，以加强连队的政治民主生活。

十二月中旬，刘型在新城参加了欢迎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六百人会师井冈山的大会。主席台前有幅对联，上写“赴红区，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建设红世界；到新城，演新戏，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会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都讲了话。全军士气高涨。决心粉碎三省敌军的第三次“会剿”。

一九二九年一月初，在三十一团干部会上，刘型听了团首长传达“白露会议”精神，知道三十一团和二十八团要转移到外线作战，三十二团和红五军留守井冈山。上级布置连队充分讨论行军方向，刘型和大多数同志认为，既不能向地区狭小无回旋余地的北部山区发展，也不能进攻敌人重兵把守的湘南，而应当向敌人比较薄弱、交通不便的赣南出兵。这些意见，受到了上级的重视。

红四军主力出发前，对干部作了必要调整，三十一团二营六连党代表李开寓调红五军工作，团部调刘型接替李开寓职务。

一月十四日，在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下，刘型随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进军。

(三)

刘型和战友们从小行洲集中出发，告别井冈山，经黄垌，走上犹、崇义到大余。一路上江西敌军追堵不放。红军在大余和李文彬的二十一旅遭遇，激战竟日。此后，部队进入“三南”（龙南、全南、定南），每日行程八十里至上百里，沿途是冰雪未化的山岭，行军十分艰难。刘型积极做政治工作，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奋勇向前。

一九二九年二月初，刘型随军进入寻乌县的吉潭、项山、圳下一带，遭到尾追而来的赣敌刘士毅旅的包围和袭击。红军突围脱险后，到罗福嶂休整。为了迷惑敌人，前委通知变更团的番号，二十八团改为一纵队，军部直属队、独立营改为二纵队，三十一团改为三纵队。刘型调三纵队司令部机枪连任副党

代表。

二月九日，红军以三纵队为前卫，经会昌、武阳，到达瑞金县境。上级命令三纵队派一个营袭击瑞金城，收集敌人报纸。刘型带机枪连参加了这次行动。他们以迅速动作进入县城，袭击了敌人的机关、邮局，收缴到报纸、文件后立即出城。敌人发觉时，全连已回到黄柏圩。未及歇缓，又接受了朱德军长下达的战斗任务，全连进入大柏地以南的麻子垌东面山上，待命伏击敌人。第二天拂晓战斗打响，与敌激战竟日，全歼追敌一个团，俘虏敌团长肖致平及其部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多枝。政治部主任陈毅称这次战役“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①

红四军在大柏地获胜后，挥师向宁都挺进。刘型随红四军继续前进，经黄陂、小布和龙岗，于二月十五日到达吉安县东固罗坑，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胜利会师。

前委考虑了福建敌军已进入江西寻找我军作战的新形势，改变了在武夷山下分兵做群众工作的计划，命令各部队从东固出发，经宁都、石城、瑞金东进闽西。三月十四日，刘型所在的三纵队为左路，二纵队居中，一纵队居右，三路并进，从四都向长汀出击。红军先在渔溪击溃敌人一个团，然后乘胜追击，直驱长岭寨，经过激战，全歼闽西土著军阀混成第二旅三千余人，在牛斗头击毙该旅旅长郭凤鸣。接着，一鼓作气，攻占了长汀县城。

在长汀，刘型调任三纵队政治部民运股股长，负责在西门

^①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外到古城之间的群众发动工作。他带领民运股的同志和一部分战士，深入农村，层层发动，在县城周围建立起二十个农民协会，五个工会，党的组织发展达两倍，并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受到前委的表扬。

十七天后，刘型接前委通知，随军回师赣南，继续做分兵发动群众的工作。由于工作需要，他又回三纵队七支队（相当于营）十三大队（相当于连）任党代表。十三大队奉命随毛泽东去兴国县古龙岗一带开辟工作。随后，又由刘型带队护送毛泽东去宁都青塘。

五月二十日，红四军渡过汀江，进行了首次攻打永定和三次攻打龙岩城的战斗，成立了永定、龙岩两县革命委员会。六月十九日，第三次攻打龙岩，歼灭土著军阀陈国辉部两千余人。六月下旬，刘型参加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

八月初，刘型随三纵队，和二纵队在上杭白砂集中后向闽中进军（一纵队因汀江涨水未能过河集中，仍留在闽西），先后攻下宁洋、漳平县城。不久，二、三纵队在永定福鼎村遭到闽敌卢兴邦部的阻击，部队受了一些损失。朱德主持前委会议，决定回师闽西。回师途中，二、三纵队奉命突袭漳平溪南，歼灭张贞部一个团。九月六日返抵龙岩，宣告了三省敌人“会剿”的破产。

九月，刘型带十三大队在武平六甲区做群众工作，帮助建立地方政权。十月，刘型又随三纵队由武平进攻岩前土匪武装钟绍葵部获胜。此时前委接中央指示并应东江特委要求，命令红四军出击东江。刘型随三纵队为前锋，抵梅县附近，击溃敌警卫队，缴枪三十多枝。十一月初随部回师闽西，二十三日再次攻克汀州城。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刘型出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后，刘型积极参加了部队开展的反对流寇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三官”（官腔、官装、官架，即官僚主义）作风的思想斗争。

一九三〇年初，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做群众工作，刘型随三纵队到永丰。二月中旬，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向三纵队传达了“二七”会议精神，明确了总前委关于扩大苏区、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的任务。下旬，刘型随三纵队参加了在吉安的水南、施家边、值夏一带歼灭唐云山旅一千余人的战斗。战后，又经东固到兴国、于都、石城一带分兵发动群众。三月中旬，部队开赴赣县江口一带参加围攻赣州城的战斗。围城数日没有奏效，三纵队奉命护送伤兵由赣州返回于都，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建立了于都革命政权。五月中旬，刘型随三纵队又开往寻乌县城北部，与毛泽东率领的二纵队汇合。在这里，他看到了毛泽东写的寻乌社会调查材料，和关于《调查工作》（即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油印文件，提高了对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的认识。

六月中旬，红四军前委遵照中央指示，在长汀改编。三纵队和军部特务营以及闽西地方红军改编为红十二军。刘型担任十二军一纵队一支队政治委员。月底，他随军从汀州出发，经瑞金、广昌、石城、兴国、永丰、新干向樟树推进，然后渡赣江，过高安，七月三十日到达南昌北郊的万寿宫。八月一日，刘型奉上级命令，抽调一连武装袭击牛行车站，收缴敌伪报纸，并鸣枪向南昌城示威，纪念八一起义三周年。接着，再向安义、奉新、宜丰、万载进军，一路宣传和筹款。途中，军部

成立干部教导队，刘型调任该队政委。

八月二十日，红一军团分三路进攻文家市之敌戴斗垣旅，刘型随十二军负责攻打孙家垵。是役获胜，全歼戴旅。文家市大捷后，一、三军团会合于浏阳永和市，经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

在一方面军第二次包围长沙的战斗中，刘型随十二军在易家湾至大托铺一带，迎击从长沙城出来的湘敌陶广师，一直追到湘江。九月十日，红军围长沙屡攻不克，总前委决定撤兵，移师江西。

刘型随十二军经株州、醴陵、攸县、茶陵、莲花、安福县境，进攻吉安。十月三日占领吉安后，刘型调十二军三十四师一〇二团任政委。当时有不少干部受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影响，急于要“最火速、最勇猛地夺取南昌”，要继续攻打九江、武汉。为了纠正盲动主义错误，总前委沿途召开过吉安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和罗坊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说服了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在周以栗支持下，团结一、三军团干部，停止了攻打南昌、九江的计划；根据蒋介石十万兵力“围剿”我军的客观实际，确定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的战略方针。按照这一方针，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收拢部队，渡赣江而东，开向樟树、抚州、乐安、永丰地区，边工作，边筹款，边备战。刘型拥护总前委的战略方针和方面军总部的部署。转战途中，他热情帮助杨团长密切官兵关系，团结同志，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第一次反“围剿”前夕，部队在肃反中出现了简单草率，搞逼、供、信，大抓所谓“AB团”的情况，弄得人心惶惶。刘型敢于抵制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倾向，保护了一批革命同志。

如一〇二团团部技术书记刘鹤孔，就是因为籍贯和文化程度，被人怀疑为“AB团”。刘型对此作了认真调查，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使刘鹤孔未遭迫害。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刘型接到通知，到小布圩“三官堂”参加团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毛泽东和朱德关于歼敌主力的战斗部署报告。几天后，红军总部在小布河滩上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刘型兴趣盎然地向参加大会的干部战士边念边讲会场上悬挂的一副对联，这是毛泽东拟写的，内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此时，敌张辉瓒师已被诱入对我有利的龙岗山区。总部决定：第十二军和第三军为左路军，归朱、毛首长指挥，沿君埠攻击龙岗，总攻时间为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十时。

刘型和一〇二团随本军提前于当天凌晨四时出发，经表湖向龙岗西南方攻击前进，占领了龙岗南端和水西南端之盲公山。次日拂晓，满山是雾，敌军欺我装备差、火力弱，不断向我方阵地冲击。双方激战到中午，刘型随十二军按计划向敌人侧面进攻，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则从龙岗北面高山上，往下冲杀。红军奋勇作战，敌军全线崩溃。不一会传来捷报：“前面捉到张辉瓒啦！”这一消息，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第四天，十二军奉总部命令担任正面攻击东韶的谭道源师。刘型和一〇二团参战，与兄弟部队一起迅速将该敌击溃。

从一九三一年五月中旬起，红军开始了第二次反“围剿”。刘型所部先参加了富田、白沙战斗，消灭敌公秉藩师全部、郭华宗师大部。几天后，刘型随十二军冒雨急行军两天三

夜，到永丰中村参战，歼敌一个旅。接着，在向广昌进军时，一〇二团奉命担任后卫。刘型带头泅水渡河，追歼逃敌。五月三十一日，刘型随军赶到建宁，全歼守敌刘和鼎师两个团。十五天内，红军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此后，刘型和一〇二团暂留建宁地区工作。六、七月间，毛泽东三次写信给十二军政委谭震林等，布置该军在宁化、长汀、石城三县，开展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等工作。军部将任务下达后，刘型带领全团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刘型所部随主力行动。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他们神速地穿过两路敌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翻过高山到达莲塘、良村地区参战，打了两个大胜仗。接着，又奉命主攻敌毛炳文师，取得了黄陂大捷。当敌军集中所有部队妄图包围我军主力时，刘型随军悄悄越过敌军之间十公里间隙的争岭、尖岭脑，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回到兴国的枫边、白石等地隐蔽休整。此后，他和一〇二团还参加了打乐安、下宁都、出瑞金的战略行动，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牵制敌人的任务。九月初，刘型随军回师，参加老营盘、方石岭战斗，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在一、二、三次反“围剿”期间，刘型作战勇敢，政治工作做得比较深入，为革命战争作出了贡献。不久，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奉命编入红四军为第十二师，刘型调任该师政治部主任。

(四)

一九三二年一月，刘型接到调令，到红五军团第十三军三

十八师任政委，师长是在武汉军校的同学程子华。

红五军团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举行“宁都暴动”后组建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任命起义将领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并从红军中选调一批政治军事干部去加强该军团的领导和建设，派肖劲光任军团政委，刘伯坚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何长工、黄火青、左权等分任各军政委。在瑞金叶坪召开的欢迎并庆祝红五军团成立大会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都亲往出席。他们在讲话中强调了宁都起义和改编部队、铲除军阀制度、加强无产阶级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这支部队在改编中，全军实行政治委员制，连队建立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并补充了大批从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工农战士。

刘型从井冈山起就担任过红军连队的党代表，后来又担任过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有一套政治工作经验。他调到三十八师后，依靠党员和积极分子，首先从阶级教育入手，提高起义官兵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清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本质。其次，实行官兵平等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不准打骂士兵，更不准克扣军饷，让士兵有说话和管理自己生活的权利。第三，组织士兵开诉苦会，揭发和纠正军阀部队内部存在的问题，并教育那些曾经压迫过士兵的军官改正错误。第四，随着士兵觉悟的提高和积极分子的涌现，在部队中开始建团、建党，向每个连队派遣党员，办训练班，吸收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参加学习；然后在连队把党支部建立起来，配备好支部书记、委员，同时训练他们怎样做工作。第五，挑选了一些表现好的士兵和

下级军官到红军学校去学习。第六，通过战斗锻炼，按照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战略战术原则，改造旧军队那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经过这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出现了新气象、新面貌。

一九三二年三月，红五军团奉命投入红一、三军团已经开始的围攻赣州的战斗。赣州守敌是国民党第十二师的三十四旅和赣南十七县的逃亡地主武装共万余人。他们凭借赣州城西面临水，有坚固的城墙和壕堑、碉堡、电网等有利条件，仍在固守顽抗。刘型随军开赴赣州城郊时，正值城内敌人向攻城的一、三军团红军阵地发动偷袭，而援敌第十四师又沿章江开来，从南门大码头向红军阵地推进，使攻城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红五军团为掩护一、三军团撤兵，英勇参战，同敌人激战一天，完成了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

红军由赣州撤围后，军委决定五军团和一军团组成东路军进军福建，以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四月十四日，红五军团按照预定计划到达龙岩和一军团会合。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随军指挥，根据当时形势，决定立即攻取漳州。刘型随十三军和闽西红十二军位于龙岩、永定、上杭地区监视入闽粤敌的行动。四月十九日，红军占领漳州城。十三军进军南靖等地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刘型抓政治工作热情细心，军民关系处理得很好。

五月底，刘型随东路军回师赣南，经龙岩、上杭、武平，六月末到达广东南雄地区与彭德怀率领的西征军相会合。两军在水口一带与粤军陈济棠、余汉谋的精锐部队遭遇。粤敌十八个团向红军进攻，五军团英勇应战，十三军担任正面攻击，刘型、程子华率三十八师为全军先头部队，开抵弱角村，与数倍

敌人接触。部队刚渡过一条河，又接到命令要撤回去参加另一路战斗。在紧急时刻，刘型与全师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冒险带领部队再次渡河，保证了战斗的胜利进展。整个五军团发挥大刀队的威力，与敌肉搏，赢得了这场恶战的胜利。

水口战役后，刘型所部随红五军团参与夺韶关、袭大余、威胁南雄的行动，使粤敌不敢从南边向中央苏区进犯。接着，红五军团又参加了八月十六日至二十日的乐安、宜黄战役和十一月一日至二日的南丰战役，以及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的南城战役，配合兄弟部队东西转战，歼灭敌人。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刘型调任红五军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该军下辖四十三和四十四师。刘型协助军政委左权主持政治工作，进一步教育和改造部队。他以红军老同志为骨干，积极开展工作；还热情指导和帮助参加宁都起义的地下党青年军官袁汉澄等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向他们介绍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经验。他宽厚和气，平易近人，处处以身作则，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深得干部、战士的拥护和信任。他注意爱护、培养和使用干部，正确对待从旧军队过来的知识分子，增强他们的革命事业心。当年他培养和介绍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军官中，有的后来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

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红五军团参加金溪战役。当时，蒋介石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线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其中周至柔和吴奇伟的两部兵力，向长源庙进犯。红五军团以两个团的兵力牵制敌人九个团，赢得我一、三军团在黄狮渡决战的时间。二月至三月，刘型所在的十五军划归一军团指挥，参加了宜黄南部黄陂、东陂战役和草台冈战役。红一方面军一、三、五军团

用三个星期的时间，打了这两个大胜仗，全歼敌军，活捉敌师长陈时骥，击毙敌师长李明，击伤敌师长肖乾，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三年六月，红五军团缩编，取消军的编制，由军团直辖几个师。原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的人员缩编为十三师，赣南博生、胜利、石城等县的地方武装模范师团组成第十四师。缩编后，刘型到十三师三十七团任政治处主任。他毫不计较官职的大小，为了革命事业，能上能下，勤勤恳恳地工作，受到同志们的好评。七月，刘型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当部长，同时兼任高级军事裁判所所长。

从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以来的六年多时间里，刘型随军南征北伐，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风餐露宿，起早熬夜，胃病越来越厉害。一九三三年八月病倒，不得不离职送往瑞金中央红色医院住院治疗。

九月，蒋介石纠集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敌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二十八日占领黎川。当时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等，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使红军陷于被动的局面，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到一九三四年一月的六届五中全会，发展到顶点。刘型病在医院，心情上的痛苦比疾病的折磨更加难受。二月，他转到长汀河田医院治疗。四月，传来广昌失守的消息。博古、李德指挥红军“分兵六路”，全线防御，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十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失去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

望。刘型在医院心急如焚，坚决要求出院归队。不久，他回到红五军团，担任后方勤务部政治委员。

（五）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夜，刘型随红五军团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的时候，五军团是整个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后卫，担负掩护的任务。刘型负责的后方勤务部又是军团的后卫。由于部队后方机关庞大，携带大批辎重、担架和行李，参加搬运的民工也较多，使组织转移的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刘型团结干部、战士，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红五军团经过遵义董公寺，到达通往桐梓大道之高坪宿营。几天后，军团政委李卓然陪中央代表刘少奇向五军团干部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精神。这次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刘型对此衷心拥护。会后，他接到调令，到五军团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四月，五军团成立随营学校，刘型又调任该校政治委员。

这时，红军已经结束了四渡赤水之战，调头向南，抢渡乌江，直下贵阳。接着，又向云南方向急进，逼近昆明，再转向西北直插金沙江。

刘型率领五军团随营学校的学员，在乌江、土城，积极协同主力部队作战。五月中旬，经过大凉山彝民区时，刘型教育学员执行民族团结政策，还向学员们讲述了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彝民首领小叶丹结盟的生动事例，使

学员深受教育。

六月中旬，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继续向北挺进，进入四川宝兴县的夹金山。这座山海拔四千多公尺，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红军战士们在过金沙江时把仅有的冬衣都送给了当地群众，现在要身着单衣翻越大雪山，困难可想而知。刘型按照湘赣苏区人们吃辣椒、蒜头御寒的经验，叫学员们随身带一些辣椒、蒜头，以备过雪山时食用。

随营学校随红军大队攀登夹金山了。山上狂风呼啸，雪粒扑面，无路可寻。刘型招呼学员们拉住手，弯下腰，五六个人结成一个蘑菇形的人环，迎着风雪，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登上山巅之后，又要大家采用滑雪的办法，或垫斗笠，或垫草鞋，或垫背包，向下滑滚。因又冻又饿，行动十分艰难。

翻过雪山后，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不久，刘型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这时候，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各部队所在位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率领，在毛儿盖地区集结后，向巴西、班佑开进；另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在马塘、卓克基集结后，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班佑，同右路军靠拢，向甘南前进。刘型随红五军团编在左路军内。经朱德总司令提议，他被调到四方面军政治部任巡视员。左路军进入草地后，张国焘以噶曲河涨水无法前进为借口，反对红军北上，并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南下。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耐心的坚决的斗争。

刘型在四方面军政治部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六年三月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四月，又调任敌军工作部部长。当时部队主要活动在兄弟民族区域内，刘型很注意研究民族问题。他和刘瑞龙、刘志坚等同志一起，经过调查研究，编写了对藏民工作和对回民工作的小册子，为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为了沟通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了解，刘型经常向周围同志介绍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指挥红军粉碎敌人几次“围剿”等情况；介绍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从而增进了四方面军同志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了解，对于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这些正确的做法，却遭到了张国焘的忌恨。只因为他说过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领导是正确的，就在甘孜被张国焘撤销了敌军工作部部长的职务，派赴二方面军当收容队长。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方面军到达甘南后，上级决定调刘型担任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十分重视思想工作，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过渭水河后，没有房屋宿营，就住在一大片梨树底下，梨子结的又大又多，有人想摘梨充饥，被刘型坚决制止。当时部队实在无法弄到粮食，经研究允许有计划地采摘一些梨子。刘型要求各单位写明数量，按价把应交的钱捆在树枝上，作为摘梨的付款。此事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并受到上级表扬。

刘型非常关心同志，爱护下级。过渭水河时，他看到组织部青年干事曾长久生了病，便把牲口让给小曾骑，自己徒步过河。过河后的第三天，部队快到河防镇时，刘型的马夫“打摆子”，马也受了伤。这时候，部队突然接到行动的命令。为了照顾马夫和牲口，他自己背着马鞍子跑了二十多里路。在陕西

耀县洪头村时，刘型有次开会回来买了一串猪肺，做好后，自己不吃，全部送给组织部的三个病号。十二月初山城堡战斗刚结束，部队在洪德河连湾休整，统战部何辉的小通讯员及行李都失散了，刘型就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藏民毛毯送给何辉用。刘型对同志、对部下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在指战员中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长征结束后，刘型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奉调到红军大学（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在红大，他既当学员又当教员，讲授过中国革命问题。

十二月，刘型出差到西安。一天，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来了一位衣衫褴褛、冻得发抖的人求访。他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原红五军团十五军一三一团团团长袁汉澄，一问才知道袁到上海搞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在杭州坐了几年监狱，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才被释放，历尽艰难到西安，要求去延安。可是“八办”的接待人员以“情况复杂不好接待”而未予受理。刘型挺身而出，找办事处领导陈明情况。这位老同志在刘型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

一九三八年一月，刘型调到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三月，调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九月，又调任总政治部直属敌工科科长。在敌工科工作期间，刘型协助抗日军政大学开办了日文训练队（又称敌工训练队），主持教学计划和学员培训、分配等工作。他经常深入该队找学员谈心，培养了一批敌工工作干部。刘型非常注意调查研究，了解敌人方面的情况，写出了《日军的政治情况之检讨》、《争取伪军反正的几点意见》、《把敌军工作扩展成战区民众运动》和《八路军两年来敌军政治工作的总结》等文章。这些文章分析

了敌我形势，总结了经验，提出开展敌军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对当时的敌军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

一九三九年三月，刘型和程宜萍结婚。程宜萍从小刻苦读书，后到日本留学，专攻蚕桑专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坚决要求回国，毅然投奔延安，参加抗日斗争，是一位有理想有志气的知识分子。

一九四一年一月，刘型调八路军军政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这所学院是中央军委为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指示，培养具有理论基础的、能充任师、旅级宣传教育指导人才而创办的，学员大多数是团级干部，校址设在延安大砭沟。刘型和兼院长谭政、副院长陈伯钧、教育长张如心等主持院务，刘型负责抓政治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全院政治空气浓厚，党的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很好。

一九四二年一月，刘型调中央党校学习，聆听了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他积极参加整风学习，认真阅读马列著作、党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文章。六月，他写出《读〈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农村调查序言二〉以后》一文，系统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在红军中作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体会，决心加强调查研究，增强党性。九月，刘型留任中央党校一部秘书科科长。当时担任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总学委会副主任康生，利用反奸肃反，怀疑一切，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和刘型同在一个支部的袁德胜，是位老党员、老红军，因为搞过地下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和坏人打交道，在运动中被整了黑材料。有人向刘型调查，刘型仗义执言，说这些材料是莫须有

的，没有这回事嘛，表现了他敢于担风险，坚持实事求是的崇高品德。

(六)

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发展到战略反攻阶段。党中央在杨家岭召开重要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等出席。会议决定派遣三五九旅九个步兵连和由组织部抽调的若干个干部连挺进华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确定了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任命王震（司令员）、王首道（书记兼政委）、王恩茂（副政委）、刘型（政治部主任）等八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部队正式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下设六个大队，全军约五千人。

中央书记处讨论和批准南征计划后，刘型和副主任李立积极组建政治部，做好来队干部、战士的工作，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个人和家属的困难，使之轻装上阵；并组织学习有关文件，让大家了解南征的目的和意义。

十一月一日，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上，举行了誓师阅兵式。刘型和他的战友们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并集体宣誓。五日，刘型到杨家岭参加第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任弼时代表中央宣布南征任务。十日，南下支队在延安各界群众欢送下踏上征途。

十一月中旬，南下支队到达绥德时，刘型主持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下旬，部队到达日军控制的汾阳、平遥地区，夜晚急行军，跨越同蒲铁路，刘型随军一夜赶了一百八十里。

十二月中旬，南下支队进军晋东南中条小区。由于日寇的“三光”政策，把沁水马邑、富店一带搞得一片凄凉。刘型要求各级政工干部注意农村调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沿途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势力。他深入基层，参加群众大会，宣讲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政策。下旬，部队进抵黄河岸边。刘型召开政工会议，做好渡河的思想动员工作。在大石村，他向宣传队讲话说，现在是宣传队发挥战斗力的时候，任务是鼓舞部队越过黄河天险，挺进中原，我们先到河对岸山坡上当啦啦队去。然后，他拄着木棍子，带着宣传队在鼓动棚里做宣传工作。全军以疾行军的速度，绕过敌人的邵源据点，在一个回水湾里找到了临时“冰桥”，顺利抢渡黄河，消灭石曲、石井两村的伪军据点。渡河的当天，南下支队向党中央发电汇报，很快收到毛泽东赞扬“五十天行军，安全过黄河”的回电。

南下支队在宜阳县西南的东、西赵堡，度过了一九四五年元旦。这里的群众受敌伪劫掠，经济萧条，部队买不到粮食，只能吃两餐小米粥和红薯当年饭。艰苦的生活难不倒指战员的革命意志，大家仍如往常一样祝贺新年。刘型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收录稿，指战员对完成南征任务充满信心。部队通过叶县境内时，因群众不明真相，全部跑光，无法买粮。为了部队的生存，政治部统一印发一封公开信。信的内容是：

诸位父老兄弟姐妹们：

本军作战敌后，瞬达八年。军威所至，日伪丧胆。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战绩卓著，中外共闻。军纪严明，买卖公平。借物必还，损坏必偿。军中信誉，遐迩皆闻。迹

者奉命南征，途经贵地，军粮缺乏，不得不就地购粮，以供军食。刻临贵府，适值外出，无法洽购。为保证军食无虞，不得不设法向贵府取去红薯__斤，豆面__斤，每斤以市价____元算，共合法币____元。谨如数留置于柜中，尚望查收并乞见宥。

南下支队留钱购粮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远近乡镇。群众纷纷赞扬八路军遵纪爱民的好作风。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南下支队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在礼山县陈家湾胜利会师。二月下旬，南下支队到达湖北蕲春县田家镇，准备渡过长江天险。刘型和政治部的同志迅速开展群众工作，得到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大力帮助。半夜里，群众开来了几百条帆船，集合在新桥和亚口两个渡口。船工们机智沉着地应付敌人的飞机和巡逻艇，在拂晓前，将全军五千多人安全渡过长江。接着，继续向鄂南推进。

由于战斗频繁，流动性大，部队纪律有些松弛。支队决定在大源休整，发布了关于整顿全军纪律的命令。刘型和李立等深入到各大队去检查部队执行纪律情况，并利用油印《战斗》小报进行纪律宣传，教育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杜绝违犯纪律的不良现象发生。这次休整，为南下支队夺取新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三月二十六日，南下支队夺取了平江县城。进城后为不惊扰市民，全军大部分在街头露营，并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号召农民参军参战。刘型亲自写标语，发传单，广泛宣传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即南下支队）司令部布告》。

一天，南下支队第三大队在平江城天主堂门口招兵，有个孩子从大人的胳膊下钻进来报名，因为个子矮，年纪小，没有录取。但那孩子就是不走。刘型看在眼里，建议招兵同志到孩子家去了解情况。当得知孩子的爸爸是农会会员，被反动派害死，哥哥因不肯给日军带路又被抢杀，病危的妈妈决心要送他当红军为父兄报仇的情况下，刘型马上派医生去给孩子的母亲治病，不幸医治无效，老妈妈病故了。刘型遂批准吸收这个孩子到三大队当司号员，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颜鹏程。

四月十三日，刘型参加了在汪坪召开的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党政军领导机关，以便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二十二日，在张谷英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传达党中央、毛泽东多次来电要部队“十分注意纪律教育，做到秋毫无犯，团结一切好人”的指示。会议还听取了二、三支队和地方工作的汇报，决定扩大新兵，注意纪律教育，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攻势。

五月上旬，刘型参加了在通山县山口铺召开的湘鄂赣边区党委会议。这次会议传达了五月四日毛泽东的来电，决定分兵一部向湘北挺进，一部坚持鄂南斗争，为建立湘鄂赣边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六月中旬，刘型在鄂南利用部队休整时间，组织全军认真学习党的“七大”文件，总结前段工作。在支队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上，他作了长篇报告，要求大家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战胜炎夏酷暑、狂风暴雨、蚊叮蝇扰以及南方夏季流行的各种疾病，胜利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八月十二日，部队到达湖南衡山附近的南湾时，刘型接到王首道政委通知，立即到司令部开会，得悉中央电示：“苏军

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会后，部队在夜色朦胧中出发。刘型是近视眼，晚上行军看不清，有时眼镜摔掉了，要在地下摸一阵才能找到。看到前面马撒的尿水反光，他问别人：谁掉了毛巾呀！碰到前面的牲口，他以为是人，忙叫：“同志，快走吧！”的确，夜晚行军对刘型来说是个苦差事。但他以苦为乐，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志们在行军途中讲到这些生活趣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由于时局变化，蒋介石已电令国民党七、九两战区组成联军，妄图三面包抄夹击，将我军消灭在湘粤边境。南下支队必须迅速南进，与东江纵队会合。部队八月中旬到达安仁车桥，遇顽敌布防，遂改道永兴石柅，以平均每天走七十里以上的速度行进。在到资兴疆家洞的一天中，指战员连续翻过十四个山头，刚进入四都圩，即被顽敌发现，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我军迅速向桂东以西的八面山区转移。这里崇山峻岭，几十里不见人烟，所有出口几乎都被敌人堵住，部队在大山里左冲右突，杀马充饥，依树躲雨，十分困难。王震和王首道下令坚决突围。八月十四日夜，全军神速行动，刘型和李立带着一批伤病员前进。他们咬着牙拄着棍子，爬山越沟，有时干脆就从陡坡上采取“滚石头”的办法往下滚。在饥饿、疲惫、瞌睡的情况下，这批伤病员几乎把全身力气都使了出来，坚持没有掉队。刘型对王首道、李立说：“第一次长征也没有这样紧张，走得这样厉害。为了党的事业，只要还有口气，我们就要走到最后一步！”

八月二十五日，部队进入五岭山脉，宿营在一间好久没有住过人的房子里。山区寒冷，刘型和李立大胆地挤在两副棺材中间，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在翻越帽子峰时，部队冒雨行

军，在烂湿的黄泥道上，有几次刘型跌倒，滚下山坡，幸亏被树枝挡住，才化险为夷。他不仅高度近视，而且身体有病，行军越来越困难。为了保护干部，王首道动员他和其他伤病员留在群众家里隐蔽。他坚决谢绝组织的照顾，说：“我要跟着部队走，死都不离开部队！”

八月二十七日，部队刚刚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络，却发现国民党五个军前堵后追而来，形势十分危急，必须立即改变原来的会师计划。刘型参加了司令员、政委召开的会议，决定发电向中央请示。不久，即接到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支队的方案。二十九日，南下支队开始突围北返。

九月初，南下支队经过上犹、崇义间的田庄时，遭到顽敌堵击，不得不从一个高山上突围往下冲。刘型的身体已经疲弱不堪，但仍然坚持随军突围。在半山腰上，他见到二支队副政委江勇为，诚恳地说：“我要尽最大的力量走下去，万一不行的话，希望你回到延安见到毛主席时，替我问声好，就说刘型为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死了也心甘！”随军作家周立波记述当时情况时写道：“在梅岭山中，谁都吃了一些苦，但是刘主任是吃苦最多的人们中间的一个。……有一次，在崎岖的山路上，天下着雨，刘主任含笑的发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都没有回答，我们想，对于这问题，他是清楚的，人的钢铁，是从革命的熔炉里锻炼出来的。”

九月上旬，刘型随军冲过顽军的阻击线，经左安、七岭，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井冈山。在珠砂冲哨口河边的水潭里，他发现了几条鱼儿在水中漫游，便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注视一会，想起井冈山斗争，他心潮澎湃，对身旁的战友们说：“过去红军在这儿，就有不少小鱼，现在鱼儿长大了，自由的范围也扩

大了。我们为了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平、幸福而奔波着，战斗着，成长着，今天的重逢是十分有意义的啊！”

通过永新拿山时，国民党用三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合击我军，情况很危急。刘型鼓励大家学习当年井冈山红军的战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冲过去。在转战途中，刘型碰到一位老婆婆。老人注视着他，亲热地问：十八年前是你在我家门口放过哨吧！刘型点头微笑，老人高兴地把刘型请进屋里，拿出藏了多年的老窖酒，一定要刘型喝。并说：“你这个大高个子，对我们老百姓真好，我一直盼望你们早点回来啊！”

三五九旅有不少干部、战士是从湘赣苏区出发长征的，他们的家属、亲人还在永新、莲花、萍乡、醴陵一带。刘型非常关心同志，找到保卫部副部长马廷士说：“到了你的家乡了，我这里有点钱，你想办法捎到家里去吧！”他还让一些同志就近看望了自己的亲属。然而他路过株萍铁路时，心里虽很想念老母亲和哥哥们，但却没有停留，继续随军前进。

十月三日，北返部队主力在湖北省黄安县庙基湾与先行北撤的部队会合，很快就和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第二次胜利会师。加上从豫西撤出的豫西支队，共同组成了中原军区。十一月，刘型就任中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首道兼任主任。不久，王首道调走，刘型代理主任。这时正是自卫反击战的紧张阶段，刘型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作了许多政治工作。

刘型从延安出发南征，再从湘粤边境北返回归中原军区，历时将近一年。这一年，他们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七省，抢渡过黄河、汾河、洛河、淮河、长江、湘江等大河，越过吕梁、中条、伏牛、大别、罗霄、五岭等山脉，跨过同蒲、陇海、平汉、粤汉、株萍五条铁路，雪地

行军三十九天，创造过强行军一日一夜一百八十华里的最高记录，北返途中，又连续行军、战斗四十八天。他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坚决执行群众纪律，团结全军指战员共同完成了任务。周立波在《南下记》一书中写道：“政治部主任刘型同志戴一副近视眼镜，和书本子结了不解的良缘。从井冈山时代起，他就到了红军里，经过长征，经过抗战。他的经验是多的，再加上好学不倦，他的知识之广博，政治部里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能够超过他。”

一九四六年三月，刘型调到东北解放区工作。七月，担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校址初设北安，后迁齐齐哈尔。东北军大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和教育东北知识青年，为我党我军培养军政干部。主持军大校务的党委常委有代校长何长工、副政委吴溉之、教育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刘型和组织部长邢亦民。

这时，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党中央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军大的教育和培训任务十分迫切。东北青年由于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影响，日寇投降后，又受国民党控制的舆论工具（报纸、广播）宣传的影响，对国民党的面目认识不清，思想比较复杂。要在半年的学习期内使这些青年的思想来一个根本的转变，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刘型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经常找干部学员谈心，了解掌握学员的思想状况，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启发学员提高革命的自觉性。他不仅做学员本身的思想工作，而且做学员母校教师和家属、亲友们的思想工作，把学校教育与社会工作结合起来，对促使学员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七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

段。组织上通知刘型调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任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司令员。正式调令下达时，政委和司令员均易人。刘型改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从不计较地位和待遇，认为只要是革命工作，干什么都行。新任司令员和政委年龄、资历都比刘型浅，刘型以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积极协助这两位年轻的干部开展工作。刘型尊重集体领导，坚决贯彻党委决议，全军上下一致，团结很好，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八年八月，刘型调任嫩江省委常委兼齐齐哈尔市委书记。为建设东北根据地兼抓城市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九四九年八月，刘型随军南下，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七)

建国后，刘型继续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城市企业部部长、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湖南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宣布和平解放的。当时的社会情况错综复杂。刘型作为秘书长，工作十分繁忙，经常每天工作达十多个小时，有时通宵达旦。他和省委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首道等，团结一致，正确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出色地完成了支援前线、借粮、秋征、收编游击武装、剿匪、减租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任务。

刘型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决议十分认真，抓得很紧。他注意及时地把党的方针政策传达给各级党委，并把基层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收集上来。为此，他亲自主编了《政策指示》、《湖南通讯》、《情况反映》等内部刊物，供省委领导和干部

参考。他主持城市企业部工作时，坚决贯彻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工作方针，创办了内部刊物《城工资料》，并从一九五一年四月起，具体部署和直接抓了杨梅山、观音滩、湘永等煤矿，锡矿山矿务局和安江、裕湘等纱厂八个重点厂矿的民主改革工作。他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反封建不反技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掌握政策，尤其是知识分子政策”，“对技术人员要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放手，生活上照顾”等要求，为省委起草了《关于竹木搬运工人中实行民主改革的几个问题》等文件，对于帮助基层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刘型处处不忘红军的好传统，注意培养机关的新作风。他坚持过党的组织生活，并能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对干部、职工的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很关心，经常问寒问暖，遇有困难，及时帮助解决。他平易近人，穿着朴素，生活上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愿向他说心里话。他对自己、对亲属要求很严格，从不搞特殊，保持着战争年代的好作风。

一九五二年十月，北京成立新型的工科性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刘型调任该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离湘前，他写好了一篇有关充分利用湖南的丰富资源发展地方工业的文稿交给省委，然后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挑起了培养我国地质人才的教育重担。

北京地质学院建院之初，围绕着学校规模和专业设置两个方向性问题，在领导班子内部有争论。一种认为应当按照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模式来办，即规模“小而全”，专业“全而细”。刘型考虑我国正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摸清地下资源这一实际情况，主张规模要“大而重（点）”，专业要“少而精”，并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缩短学制一年。事实

证明，刘型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师资少、设备差、时间紧 任务重的情况下，刘型注意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教师队伍的积极性。他关心和信任老教师，放手让他们工作；也支持和鼓励新教师努力上进，增强新老教师的团结，以老带新，培养一批能独立开课的新教师。他和全校师生员工打成一片，一块在食堂吃饭，经常深入课堂、宿舍了解师生的思想情况和实际困难，并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他在工作繁忙中还挤出时间参加师生员工的运动会和游园会。他深入群众，平易近人，以朋友姿态和师生一块谈心，一块商量问题，深得全院师生员工的敬爱。

刘型反对片面性，重视政治和业务的统一，提倡又红又专。为了适应高校的需要，他要求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努力变外行为内行。地院初办，大多采用苏联教材和聘用苏联专家讲课。为突破语言文字关，刘型带头学习俄文；还挤出时间听专业课，从头至尾听完了苏联专家主讲的《普通地质学》课程。在刘型的带动下，全院学习空气很浓厚。他认真研究外国高等教育的资料，坚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不断摸索我国办大学的新路子。他在地院工作六年，给全院教职员工留下了深刻而亲切的印象。人们一直怀念着他。

一九五八年十月，刘型调任农垦部副部长，分管橡胶和热带作物。这是技术性很强的经济工作。为了把这一工作领导好，他虚心学习，注意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到广东、广西、云南等垦区的边远农场，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每次出差，他都要写工作报告，陈述看法，提出当前应注意和要解决的问题。

这期间，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和以高指标、瞎指

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开始在全国泛滥，政治上的“反右倾”和客观上的自然灾害给经济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九六〇年他带病深入到海南、湛江和西双版纳等地，走访职工，察看胶林，虚心求教，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橡胶生产两次大上大下的历史教训。一九六二年初，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他又带领工作组到南方考察，写出调查报告，积极拥护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抵制了不正之风。为此，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他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刘型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为了掌握橡胶育种、栽培、加工等方面的知识，他孜孜不倦地攻读了许多技术著作，并向专家，技工请教。从一九六一年开始，他主持起草和修改一部橡胶生产技术规程，访问了数千人次，修改了二十多遍，历时两年之久，后经周总理批准，由国家科委和农垦部联合颁布。现在看来，这个规程仍不失为一部好的技术法规。刘型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天然橡胶事业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作出了贡献。

在十年动乱期间，刘型横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他毫不气馁，刚正不阿，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坚决同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他说：“林彪之流为了篡党夺权，篡改历史，我有责任让青年和后代懂得党的历史。”他把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和抢救党的历史资料当作一项重要的革命工作，主动地，自觉地收集、研究革命历史资料，回忆、宣讲革命斗争史，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一九七〇年，他两次参加了井冈山老干部学习班，并在九江为党校和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讲党的历史，用实际行动批驳

林彪、“四人帮”篡改历史的罪行。

在很长一段时间，刘型没有什么职务，但他仍在自觉地辛勤从事党史研究工作。他和北京、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市的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大专院校党史教研室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热情地处理各地同志的来信来访，有问必答，有信必复。几年功夫，有数百人次和他交谈或通信，现在保存的他关于革命历史问题的通信就有一百多件。他亲自校对订正《寻乌调查》的几个版本，为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发表这篇重要著作提供很好的基础。他先后收集整理的党史资料共有四批、七十余篇、三十多万字。其中一些重要资料送呈党中央。有时为了某些急需弄清的历史事实，他亲自走访，与老战友共同回忆考证。他对各地文物、党史部门的工作非常关心，积极提出建议，给予热情帮助。他不图名利，一心一意为党的事业工作。有人劝他向熟悉的高级干部谈谈自己的工作安排问题，他总是说：“你看我不是有工作嘛！”在“批林批孔”期间，“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想拍井冈山电影，要找刘型当顾问，他断然拒绝。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在家里听到孩子们反映他们在广场上目击的情况后，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拍案喝道：“这不是镇压群众吗？”

粉碎“四人帮”后，刘型担任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平反冤、假、错案而努力工作。他还兼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革命史组副组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顾问，热心支持党史、革命史的研究工作。在他病重弥留之际，他还向到医院看望他的胡耀邦表示：“我出院之后，一定要完成你交给我撰写井冈山革命斗争史的任务。”可是癌症日益折磨着

他的身体。一九八一年八月七日，刘型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刘型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正如悼词中指出的：“刘型同志五十五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终保持着共产主义的美德和情操。他坚定地信仰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诚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他革命事业心强，工作认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他勤奋好学，长期以来以惊人的毅力钻研革命理论和业务知识；他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服从真理，表里如一；他为人谦虚，平易近人，团结同志；他艰苦朴素，遵守党纪，对自己、对亲属要求严格；他党性强，不以功臣自居，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追求名誉地位。刘型同志不愧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1981年8月18日谭震林代表中共中央致的悼词。
2. 刘型的《自传》、简历及历史年表。
3. 刘型的回忆文章、谈话记录及来往信件。
4. 王首道、何长工、肖克：《怀念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士刘型同志》，载1982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5. 周里、郭森：《深切怀念忆当年——纪念刘型同志逝世一周年》，载1982年8月4日《湖南日报》。
6. 程宜萍：《回忆刘型同志》，载1982年8月10日《江西日报》。
7. 《萍乡人民革命斗争史》（1959年内部印行）。
8. 《排上公社革命斗争史》（1959年内部印行）。
9. 《江西人民革命斗争史资料》（1962年内部印行）。
10. 《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1. 《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2. 《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3. 《闽西革命史资料》。
14. 王首道：《忆南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 李立：《四十八天》、《转战南北》，均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6. 何康、黄宗道、许成文：《自强不息，殊有建树——忆刘型同志》，载1983年8月6日《光明日报》。
17. 访问王首道、何长工、肖克、程子华、肖华、孔原、曹瑛、赖毅、张令彬、张宗逊、陈士渠、朱良才、刘鹤孔、罗元发、袁血卒、谢良、钱益民、李雪山、刘瑞龙、李贞、何辉、魏传统、颜金生、慕容楚强、李立、马廷士、傅志华、高铁、邢亦民、罗日润、邓飞、何兰阶、张正光、饶兴、方强、李基、梁兴初、刘荣华、甘祖昌、周里、郭森、毛泽普、杜修经、何康、肖英、袁学之、刘亚球、鄢辉、刘俊秀、邹必兆、黄立功、曾敬凡等老同志谈话记录。
18. 访问钟石麟、黄序循、贺石峰、肖洪涛、胡汝球、巫申元、贺良弼、古丁远等萍乡老人谈话记录。
19. 湖南省委召集万迂、沈瑞庭、黄显孟、张邦信、葛琪、谭献鑫、白薇、杨菊荣、林曼云、曹鼎新、韩静华、芦文华、周文才、何小明、姜造时、李锋、陈海波、张治风、宋凯臣、赵文明、刘文慧、白九水、邹文俊、左兢业、房显贵、史雪华等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议记录。
20. 武汉地质学院召集王鸿祯、李世忠、李武元、顾荣起、郝饴纯、杨树和、黄桥、陶世龙、王民山、张汉夫、李长清、魏道功、杨光荣等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议记录。王良、任相、黄占秋同志也多次提供材料。
21. 本传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湖南、江西省委，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军事学院，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萍乡市委，赣州、吉安地委，农牧渔业部，地质学院，井冈山、醴陵、永新、宁冈、遂川、莲花、宁都、兴国、瑞金、长汀、于都、铜鼓、高安、新余、永丰、寻乌、赣县等县县委及有关单位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117

定 价： 1.55 元